

WAR HISTORY STUDIES

战争史研究（二）

主编 阎京生
副主编 刘怡

第37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以外传播仅作个人收藏由战研群友情扫描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大雪满弓刀 02–57

近世中国东北风云录（一）



出没风波里 58–93

日本海军水雷战队旗舰（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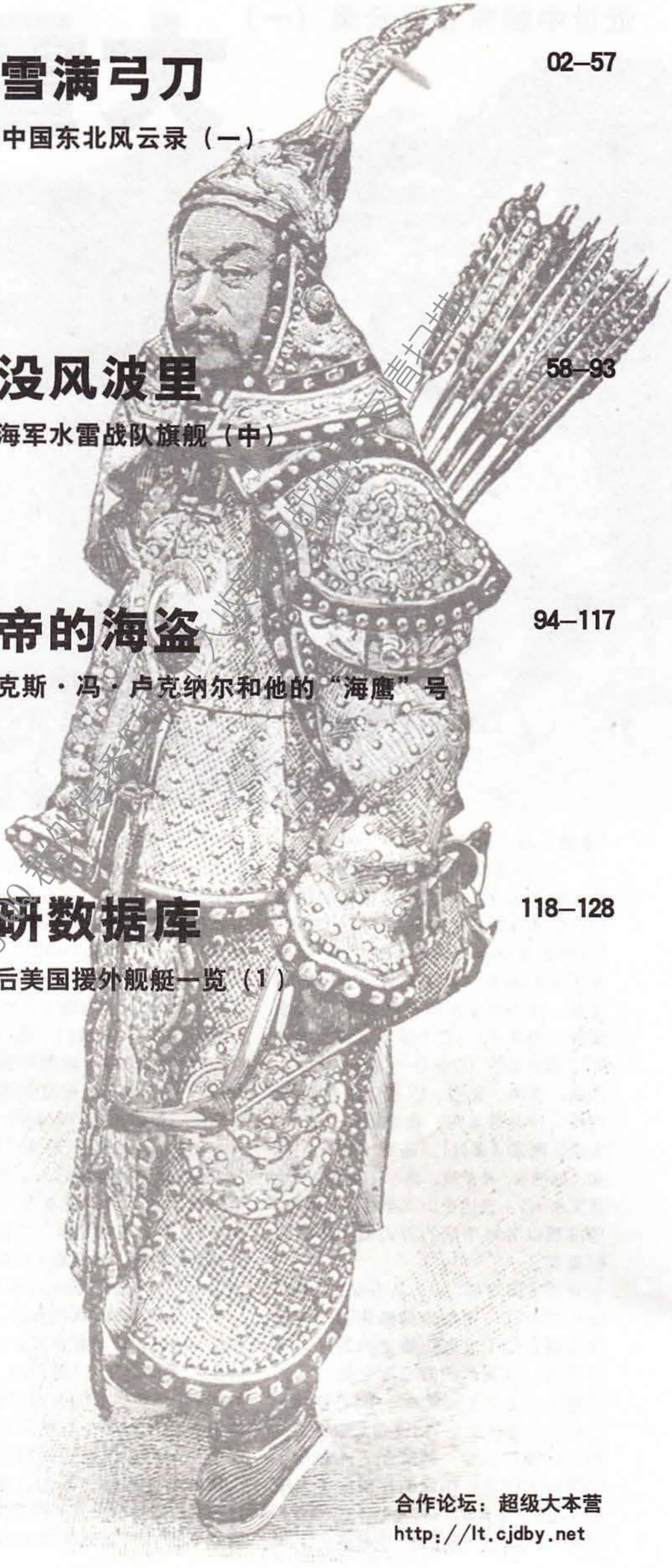
皇帝的海盗 94–117

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和他的“海鹰”号



战研数据库 118–128

二战后美国援外舰艇一览（1）



邮购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增光路45号

《战争史研究》发行部　联系人：杨洁

发行部电话：010-88561472

邮购部电话：010-88560080

邮政编码：100048

编辑部信箱：war.history.studies@gmail.com

（邮购、购买过刊等事务请垂询发行部）

如有错页、漏订、脱页等现象，请与本刊发行部联系调换

合作论坛：超级大本营

http://lt.cjdby.net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

近世中国东北风云录（一）

大雪满弓刀

○ 鹰扬



“东北”与“满洲”

十八世纪的中华帝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当时清帝国的版图包括继承自明帝国的原“两京十三省”（当时已经分为十八个省份，湖广拆分为湖北和湖南，南直隶拆分为江苏和安徽，陕西拆分为陕西和甘肃）、漠南蒙古（内蒙古）、漠北蒙古（喀尔喀蒙古）、漠西蒙古（卫拉特－准噶尔蒙古）、西藏、青海、新疆，以及台湾、澎湖、西沙、南沙等岛屿；此外朝鲜、琉球、安南、南掌（老挝）、暹罗（缅甸）、缅甸、尼泊尔、哈萨克、浩罕、布鲁特（哈萨克东南）、巴达克山（今阿富汗东部）等藩属以各种不同的方式成为中国的附庸国。

在清帝国的东北方，从山海关直到鸭绿江口一线，明朝曾经修建过一道辽东边墙，位于这道边墙之内的辽东都司辖地、以及清朝的发源之地——兴京地区（辽宁省新宾县一带），被视为清朝的“龙兴之地”，设立盛京将军一职进行管辖。曾经被努尔哈赤和皇太极两位大汗定作都城的沈阳中卫卫城被改名叫“谋克敦”（Moukden，西方人写成Mukden），意思是“天眷盛京”，汉文的名字则叫做“奉天府”（满语为Abkai imiyangga fu）。用砖包砌的奉天城周长九里三十步（三百步为一里），城墙高达三丈五尺。在城的四面设有德盛（大南门）、福胜（大北门）、天佑（小南门）、地载（小北门）、抚近（大东门）、怀远（大西门）、内治（小东门）、外攘（小西门）等八座城门，城中央是努尔哈赤时代修建的大政殿和皇太极时代加以扩建的皇宫，在皇宫南边是盛京将军衙门和都察院、理藩院，此外还设有户、礼、兵、工、刑等“盛京五部”（皇太极时仿照明制创立六部，后随顺治入关，盛京五部是康熙年间重新设置的）。奉天城的外面是周长三十二里的圆形外廓城，城墙是土筑的，设有大南边门、大西边门等八座城门。

在盛京将军辖区的北边、原明朝辽东都司边外，分布着女真诸卫所，包括后金－清的前身——建州部。建州女真的首领李满住在1438年受到朝鲜军队的追杀，从位于今日朝鲜北部和俄罗斯滨海州的原住地迁到靠近明朝辽东边墙的地区居住，并先后修建了佛阿拉和赫图阿拉（兴京）两座都城。清帝国建立后，兴京地区被划入盛京将军辖地，而原来的建州故地和“海西女真”居住地区则被划为宁古塔将军辖区。康熙十五年后由于将军驻地的变迁，又改名为吉林将军辖区。

“吉林”是“吉林乌拉”一词的简称，在女真语中，“吉林”是“沿着”的意思，而“乌拉”则指江，“吉林乌拉”的意思是沿江（松花江）。顺治十三年（1656年）在日后吉林乌拉城址所在地创建了船厂，建造松花江和黑龙江巡逻用的木制战船，因此该地又被称为“船厂”。康熙十二年（1673年）宁古塔将军奉命在船厂修建吉林乌拉城，东、西、北三面设墙，各长250步，以高8尺的松木为墙，开设三座城门，南边临江则为水陆码头，不建城墙。木城墙外是灌水的壕沟，再外侧为周长七里的土墙。在木城中设有将军衙门和副都统衙门，管理满洲、汉军、蒙古、锡伯、巴尔虎等八旗官兵，城中有新旧满洲八旗驻军两千多人，还有蒙古鸟枪营和水师营。

康熙十五年（1676年），宁古塔将军奉旨从宁古塔城（分为新城和旧城，旧城在黑龙江海兰县，新城在东南六十里之外的宁安县）徙驻吉林乌拉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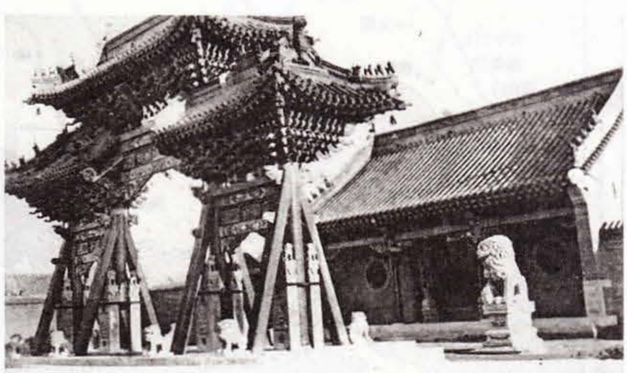


将衙门设于木城中，并改称吉林将军。虽然吉林木城的面积只有0.2平方公里，城池狭小，但战略地位却十分重要，是东北地区最重要的军事战略基地之一，而且黑龙江和打牲乌拉等地进贡给皇室的东珠、貂皮、山参、砂金等物资都要在此进行集散。乾隆年间对吉林城进行了扩建，把木墙更换为土筑城墙，城门增加到五座（清末增至八座，为通往黑龙江的东莱门、朝阳门、巴尔虎门，通往乌拉街的北极门，通往桦皮厂和沙河子的致和门，以及通往奉天大道的德胜门、福绥门和迎恩门），面积增加到1.1平方公里，并且允许商人和民户入城居住。

齐齐哈尔的黑龙江将军府



吉林将军的辖区包括从图们江入海口到黑龙江入海口、以及向北直至乌第河的整个日本海西海岸与松花江之间的大片土地，以及库页岛。吉林将军辖区的西边则大致以“柳条边”和松花江与漠南蒙古和黑龙江辖区为界。至于明朝时期远在汉族中央王朝“王化”之外的所谓“野人女真”居住地，以及属于东蒙古的达斡尔、巴尔虎、布里亚特等“林中百姓”牧地，则在康熙二十三年被设为黑龙江将军辖区，将军的驻地最初设在黑龙江城（今黑龙江瑷珲县），后来又先后迁移到墨尔根（今嫩江县）和齐齐哈尔（今齐齐哈尔市）。



吉林将军衙门

由于黑龙江的江水被冲入大量腐殖质黑土，这些黑土沉积在江底，从江水清澈的地方望去，整条河都呈现出黑色，因此这条河的满语称呼是“萨哈连乌拉”，蒙语名字为“哈拉穆伦”，达斡尔人则称之为“卡拉穆林”，在这些语言中都是“黑河”的意思。十七世纪闯入黑龙江流域的哥萨克则沿袭了当地从事渔猎的达斡尔部落对河中草鱼的叫法，将之称为“阿穆尔河”（意思是“草鱼河”），而用这条河的满语名

字把位于河口的大岛库页岛命名为“萨哈林岛”。

前面提到的“柳条边”是清朝时期在东北修建的一道总长度大约1350公里的禁区界限，最早是由皇太极在崇德三年（1638年）下令修建的，到康熙二十年（1681年）基本上完成。用土堆成一条宽、高各约三尺的土堤，堤上每隔五尺插有三根柳桩，这些柳桩粗四寸、高六尺，埋入土中大约二尺，露在外面的高度是四尺。柳桩之间再用草绳连接，称为“插柳连绳”。这些柳桩有许多在土中生了根，长成绿色的柳树篱笆。在土堤的外侧还挖有一道深八尺、顶宽八尺、底宽五尺的壕沟。“柳条边”西边的有些地段也不插柳桩，而是利用明代辽东长城的残基。

柳条边的平面呈人字形，分为三段，东段是皇太极时代修筑的，从开原附近的威远堡向东南延伸，将兴京和盛京划入边内，然后转向西南的凤凰山，直至凤凰城为止。这段边墙的用处是防止汉人进入松嫩平原和长白山地区；柳条边的西段修筑于顺治年间，沿着明代辽东边墙的走向，从威远堡向西南延伸，直至山海关，其主要用处是防止汉人进入漠南蒙古各部辖地开垦荒地，同时用作漠南蒙古与盛京将军辖区之间的行政边界。这两段柳条边也称为“老边”，而康熙年间修建的“柳条边”被称作“新边”，它从威远堡向北一直延伸到吉林乌拉城北边、松花江附近，这段边墙是用来防止蒙古科尔沁等部的游牧部落向东放牧的。

清朝时期，在柳条边上设有二十一座砖石修筑的边门，门楼上是守门官署，楼下门洞是进出柳条边的通道，旁边还设有两座耳房，分别是驻兵营房和囚禁犯人的监狱。每座边门都驻有一名苏拉章京（武官）、一名笔帖式（文官）和几十名披甲人（平时屯田、战时披甲打仗的八旗兵丁，是降人的后代，地位低于女真旗丁，但是高于汉族和朝鲜族的“阿哈”即奴隶）。凡是往来行人必须从边门通过，不得爬边越壕，并且必须持有当地官厅签发的“路票”，上面写明持票人的姓名、年貌、脸色，限时、限人出入。

康熙十六年（1677年）以后，清廷一再申明，辽东边墙外的长白山及其周围地区为“皇朝发祥圣地”，规定“盛京以东、伊通以南、图们江以北，悉行封禁”，移民定居有禁，田地辟垦有禁，森林矿产之采伐有禁，人参东珠之掘采有禁。当时在乌苏里江流域有专门的满族采珠户，隶属于吉林将军属下的布特哈（打牲）总管衙门，每年五月到九月，官员率领采珠人在松花江、乌苏里江各支流寻采珍珠。采珠是清皇室的专利，严禁私人捕捞，违者处死。采掘人参也是一样，当时长白山被清朝皇室视为“龙脉”，禁止采参挖矿，主要的参山位于乌苏里江以东和绥芬河流域。当时吉林三姓副都统衙门和宁古塔副都统衙门每年发放“参票”，领票人（揽头）领了参票之后便可以带领满族和汉族的“刨夫”进山采参。乌苏里江以东的尼满（今俄罗斯伊曼）、苏城（俄罗斯苏昌）都是采掘人参的重要地点。按照规定，采参者每年必须向政府按额交纳上好人参若干，挑余的剩参方准赏给售卖。

除了上述参山外，清廷还在关外圈定了盛京围场、西安围场、西丰围场、大凌河牧场、吉林西围场、伯都讷围场、阿勒楚喀斐克图围场、安楚香山、藕梨贡山、松花江采珠河口等皇家禁地，在兴凯湖东南勒富河有镶红旗的“围猎山场”和“采捕山场”，在乌苏里江东南雅兰河有正黄旗和镶蓝旗的“采捕山场”，在绥芬河下游有正蓝旗的“围猎山场”，这些都是禁止关内汉人进入的封禁区域。

总的来说，清朝皇帝下令修建柳条边的用意是禁止汉人（以及蒙古人）进入满族的“龙兴之地”从事垦荒、放牧、开矿、挖参、狩猎皮毛和鹿茸等行为，避免对清王朝的“龙脉”——仙女“佛库伦”吞下红果、诞育满洲始祖布库里雍顺的长白山天池——造成损害。此外，此举也有将东北地区作为满洲八旗的根本重地和“战略大后方”、在万一内地十八省爆发无法扑灭的大规模民族起义时用作满族退路的用意。

但是在顺治、康熙和雍正这三个朝代，柳条边禁令一般是雷声大雨点小，虽然也严惩过一些私自出边偷挖人参的汉人（采用刺字、流放等刑罚），但也向柳条边之外大量流放因文字狱而获咎的汉族文臣及其家属（即著名的“流放宁古塔”、“发往打牲乌拉”等等），甚至鼓励汉族农民到边外地区垦荒，移民实边，只是对“大清龙脉”长白山的封禁令稍严而已。

乾隆时期，由于前后持续七十年之久、耗资巨万的准噶尔战争结束，八旗军民得到休养生息，人丁日益繁衍。八旗是一支平时不从事（也不准从事）生

清朝时期关外柳条边及边门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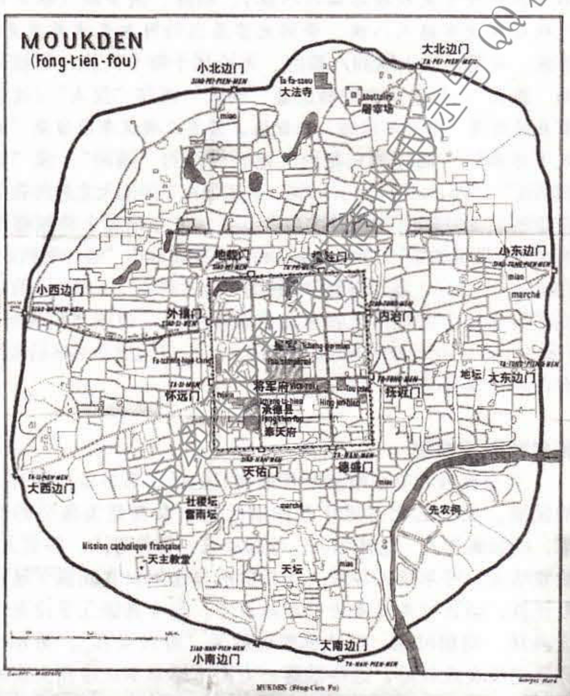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产、贸易等活动，专门用来作战的军事化力量，长期太平无事后，一方面随着八旗人口的增多，粮饷必然增多，造成沉重的财政负担；另一方面，随着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在北京、杭州、成都等地的驻防八旗官兵当中也出现了游手好闲、崇尚浮华奢靡生活、战斗力下降的局面。于是乾隆皇帝决定从北京等地的八旗当中拨出一部分旗丁家庭，给其发放银两、种子、口粮、农具和牲口等等，让其按编制重新移居到关外，实行军事化屯垦。乾隆此举的用意一方面是让其恢复“国语骑射”的“满洲旧俗”，防止其满洲民族意识的逐渐减弱，另一方面也让其杜绝在繁华都市中生活而染上的恶习，在关外保持一支尚武善战的后备战略军。

在努力向关外派遣八旗移民的同时，为了在关外保持“满洲旧制”，同时确保清朝皇室能够垄断关外的人参、貂皮、鹿茸、东珠、砂金等珍贵物产，乾隆皇帝严禁汉人移民前往东北地区拓居。他除了下令山海关和柳条边诸门驻防官兵严加防守外，对可以绕道经内蒙古前往关外的喜峰口、古北口等地也加强了关禁，凡是查出私自越边的汉人移民一律枷号示众、杖责驱逐。除此之外，康熙、雍正各朝以往将触犯文字狱忌讳的汉族文臣流放到东北的做法也在乾隆时期被废止，犯事的大臣改为流放到南方各省“烟瘴之地”或者新疆（比如著名的文臣、四库全书总编纪晓岚，在一度失宠之后就是被流放到乌鲁木齐的）。

其实对于在准噶尔战争结束后新收入清朝版图的新疆地区，乾隆帝也一度试图对汉人移民采取封禁政策，打算将天山以北广袤的牧场（原准噶尔各部的牧地）专门留给满洲八旗，用作未来的发展空间，但是这个封禁政策在新疆遭到了失败，大量来自山西、陕西和甘肃的汉族移民西出星星峡，来自南疆的维吾尔族移民则越过天山，纷纷前往北疆地区定居。甚至直到民国年间，住在北京郊区火器营等旗人聚居地的昔日八旗军后代还这样议论在准噶尔的七十年战争：“一来就选拔八旗精锐，好样的都死在新疆了，弄了那么大一块没用的地方，倒便宜了移民”（《金启孮谈北京的满族》，中华书局2009年）。



清末法国天主教会绘制的盛京城地图。当时曾被无聊文人附会成“外廓圆，象天；内城方，象地；钟鼓楼为两仪；四塔为四象；八门为八卦；角楼敌楼共十二座，象征四季；城门瓮城各三，象二十四节气”

当然，清朝对于东北的这种封禁政策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甚至在边禁最严的乾隆时期，也经常有来自直隶、河南、山东等省的流民由于蝗旱灾害而齐聚于山海关、喜峰口等地，试图出关寻找生路。乾隆帝为此不得不多次允许守边部队开放边门、允许灾民出关，并且为此发出了“其设还与不设同”的哀叹。

柳条边墙封禁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清朝时期对东北地区的经济开发，致使边疆空虚，从而为俄国势力入侵黑龙江流域和朝鲜半岛居民大量越界屯垦提供了可趁之机。黑龙江左岸的极北地区积年累月由于封禁政策而形成的大面积

奉天城外攘门（小西门）



清末的奉天城墙，由于年久失修，女墙已经严重倾斜，远处的角楼也呈现出破落衰败迹象



奉天大北门（福胜门）



“真空地带”给俄国的侵略提供了方便，在1858年到1860年，俄国通过外交手段割去了1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甚至连所谓“大清龙脉”长白山也在清朝末年成为越界垦殖的朝鲜人聚居地，并且为日本帝国主义炮制所谓“间岛问题”等领土纠纷提供了借口，可谓得不偿失。

在清朝时期，对盛京、吉林、黑龙江三个将军辖区的统称是“东北”或者“东三省”，比如康熙七年在停止向关外招募移民的上谕中说“停止招民、封禁东北”，嘉庆八年又在上谕中说“东三省地方为满洲根本重地，原不准流寓民人杂处之间私垦地亩，致有碍旗人生计，例年有禁”云云。奉、吉、黑三地在清朝时期的正式名称是“镇守某地等处将军”，通常以将军的驻地命名，例如“镇守盛京等处将军”、“镇守宁古塔等处地方将军”之类。但是将军辖区有时也在清廷公文中被称为“省”，比如把吉林将军辖区简称为“吉省”。

这里所说的将军相当于内地十八省的巡抚，但是握有军权，权限比巡抚要大，主要管理八旗、蒙古人和北疆回部居民。清朝先后设置过盛京将军、宁古塔将军（后改称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也叫齐齐哈尔将军）等东北三将军，以及总统伊犁等处将军（伊犁将军）、定边左副将军（乌里雅苏台将军）等西北二将军。西方人有时将将军辖区翻译为“军事总督辖区”，也是比较贴切的译法。与此同时，清朝在关外也设有专门管理“民人”的民事行政机构，例如设于顺治年间的奉天府、辽阳府、海城县，和设于光绪年间的吉林府、龙江府（齐齐哈尔）、新民厅、绥化厅、呼兰厅等等，形成了东北地区管理旗人的将军及都统衙门与管理“民人”的府、州、厅、县并立的双重行政管理体制。

盛京将军衙门



МУКДЕНЪ. КИТАЙСКАЯ ФУДУТУНКА, ЗАПРЯЖЕННАЯ МУЛОМЪ.



盛京皇宫大门前的文德坊，近处是大政殿前面的奏乐亭。当时在大政殿前广场的南边没有围墙，而是围以木栅栏



盛京皇宫大政殿

Плацъ и царскій павильонъ въ Мукденѣ.

后金崇德八年（1635年）十月十三日，后金汗王皇太极废除女真（也写作诸申，西方称为Jurchen）的族名旧称、以及“后金”的国号，宣布将族名定为“满洲”（Manchu）、国号改为“大清”。这一天后来被定为“颁金节”，成为满族的民族节日。关于“满洲”一词的由来有几种说法，一种是得自建州女真先祖李满住的名字；另一种说法是明朝为火德，而族名“满洲”和国号“清”都带水旁，皇太极此举有以水克火、以清代明之意。第三种说法是“满洲”与“曼殊”同音，后者是西藏人对文殊菩萨的称呼，皇太极试图用这种方法将自己定为“曼殊师利菩萨”即文殊菩萨的化身，有以黄教笼络蒙古和西藏的用意（每年西藏活佛向清帝献丹书，都称其为“曼殊师利大皇帝”），同时避开汉族对历史上侵略宋朝的女真人以及金朝的不愉快历史记忆，减少辽东及关内汉族对后金政权的抵触情绪。

实际上皇太极所选定的“满洲”一词并非仅仅用来取代“女真”的族名，而是变为一种政治、军事和文化共同体的称呼。后世所谓的“满洲共同体”当中不仅仅包括原先的女真族，而且包括蒙古、达斡尔、锡伯、鄂伦春、索伦、汉（包括今日的回族）、回（即回部，指今日的维吾尔族，其中一部分在乾隆平定新疆后编入八旗）、朝鲜、俄罗斯（雅克萨之战后被清军编入八旗、带回北京居住的阿尔巴津哥萨克）等族。凡是被编入满洲八旗的，无论属于哪个民族，都被称为“旗人”，与之对立的概念是“民人”而非“汉人”（过去常见的所谓“满汉不通婚”的说法，其实正确说来应当是“旗民不通婚”）。而作为东北地区地名代称的“满洲”、或“满洲利亚”（Manchuria）一词，其实是在中国的天主教传教士在绘制地图时标注的西方式命名，正如其在地图上将新疆北部标为“准噶利亚”（Dzungaria）、将南疆称作“喀什噶利亚”（Kashgaria）、或者将蒙古标注为“蒙古利亚”一样。还有一些耶稣会修士在地图上将东北地区标注为“中国属鞑靼地”（Tartarie chinoise/Chinese Tartaria），不过这个名字后来没有在西方流传开来。

雅克萨和尼布楚

后金政权在努尔哈赤时代最初只包括辽东半岛一片狭小的区域。在它的北方居住着许多比建州女真更为落后的部落，比如索伦人、达斡尔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赫哲人、费雅喀人、呼尔喀人等等。这些部落与建州女真同属于通古斯民族，语言（尤其是索伦人的语言）与女真语几乎没有什么两样。明朝时期，这些部落被称为“野人女真”。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后，这些部落一方面不愿意承认建州女真的优越地位，另一方面自身也有向南迁移发展的愿望，因此不断与后金发生战争，例如1636年与鄂伦春部因“盗马杀人”而爆发的战争、1639-1640年与索伦部酋长博穆博果尔爆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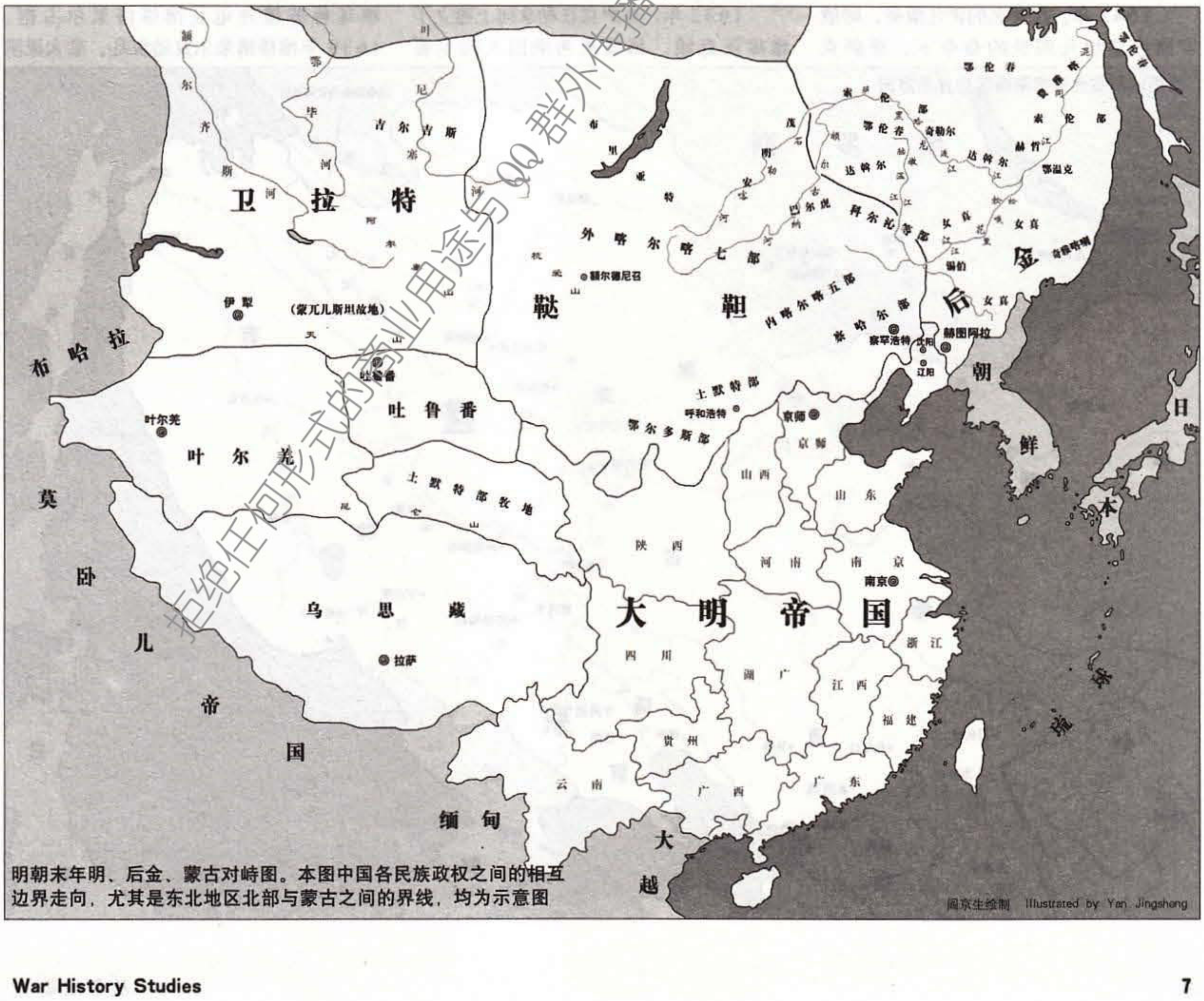
的战争、以及1642-1645年与居住在黑龙江中游的达斡尔人和呼尔喀人的战争。但是每一次战争的结果都是后金或清取得胜利，并把这些部落完全征服。皇太极在1642年吞并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部和呼尔喀部，而翌年俄国第一批探险队从雅库茨克城出发，前往黑龙江流域探险。两者前后虽然只有一年之差，但这一年的时间差足以确定清朝在法理上对于黑龙江流域广大地区的主权。

在清朝，居住在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的各族居民分属黑龙江将军和吉林将军管辖。黑龙江将军所属的“布特哈（打牲）部落”——索伦人、达斡尔人、鄂伦春人和毕拉尔人——分布在南至嫩江、西至额尔古纳河、东至牛满江（布列亚河）、北至外兴安岭的地区，被编为索伦五旗四十七佐领，达斡尔三旗三十九佐领，鄂伦春九佐领，毕拉尔二佐领。每个佐领都设有佐领章京、骁骑校、领催等官员，由黑龙江将军选拔各族头人担任，直接归布特哈（打牲）八旗衙门管辖。

居住在黑龙江下游、乌苏里江和绥芬河流域、直至库页岛的居民包括索伦、达斡尔、鄂伦春、费雅喀、鄂温克、赫哲、奇勒尔、奇雅喀喇（恰喀拉）、库页（阿伊努）等族。他们最初归宁古塔副都统管辖，后来由于行政区划的变动，改归三姓副都统管辖。清朝把这些少数民族按照哈拉（也写成甲喇，是部落、氏族之意）或者噶珊（乡）为单位编入户籍，或者除了挑选人丁编入吉林驻防八旗外，皆设置姓长（哈拉达）和乡长（噶珊达）分户管理。当地各族居民中的男性从出生到二十岁皆列为未成年，不缴贡税、不服兵役；年满二十岁起向清政府缴纳人头税，而且一经政府征召，便立即编入八旗。

清朝时期对黑龙江境内的布特哈八旗征收的人头税为每丁貂皮一张，妇女、老人和未成年者不需缴纳。各族缴纳的貂皮按照质量分为三等，如果缴纳的貂皮既足数、等级又好，便赏给总管及下人青布若干，若数目不足或等级较差，则免于处分。黑龙江将军辖区内缴纳貂皮税的地点在齐齐哈尔，但有些部落居住地偏远，不便于到齐齐哈尔来，则由黑龙江将军衙门另外指定纳税地点，派官吏前往征收。在吉林将军辖区内征收的人头税较轻，为每户貂皮一张，赫哲、鄂伦春、费雅喀、奇勒尔、鄂温克等族一年缴纳一次，库页人两年缴纳一次。乌苏里江两岸和黑龙江下游的居民在宁古塔城（后来改为三姓城）缴纳；乌苏里江以东沿海和库页岛的居民不能按时到宁古塔，则由宁古塔副都统派官吏到乌苏里江以东的尼满和黑龙江下游的普禄（今俄罗斯布拉瓦）等处设立衙门，就近征收。

除了前面提到的柳条边外，清朝还在黑龙江和吉林地区的内地设立了许多卡伦，派遣官兵驻守。“卡伦”一词是满语“哨所”的意思，当时在黑龙江地区设有乌鲁苏穆丹卡伦（今俄罗斯境内布谢西北）、精奇里江卡伦、毕拉河口卡伦、位于博屯河附近的布特哈检貂卡伦、牛满江卡伦、以及黑龙江与松花江汇合处北岸的黑龙江口卡伦等等。这些哨所当中，除了布特哈检貂卡伦归布特哈八旗衙门管辖外，其余都归萨哈连乌拉（黑龙江城）副都统管辖。此外在乌苏里江以东设有乌苏里江口



明朝末年明、后金、蒙古对峙图。本图中国各民族政权之间的相互边界走向，尤其是东北地区北部与蒙古之间的界线，均为示意图

卡伦（今俄国哈巴罗夫斯克附近的图勒密）、西林河卡伦（今符拉迪沃斯托克以东）和雅兰河卡伦，设在珲春东部沿海的蒙古河卡伦、图拉木卡伦和朱伦卡伦等等，这些哨所分别归三姓副都统、宁古塔副都统和珲春协领管辖。设置布特哈检貂卡伦是为了收税，而各卡伦都负有稽查行人、传递公文等任务。

清朝在满洲腹地设置卡伦哨所，主要是为了防止偷越柳条边的满汉人等私挖人参，1742年，宁古塔将军向乾隆帝报告说，在绥芬河、乌苏里、雅兰及“南海诸岛屿”（即俄罗斯大彼得湾内的海岛）等地，十多年间已经聚集了数千名偷挖人参者和逃亡的刺字犯人，他们在冬天渔猎鱼鹿，摘食榛子过冬，春夏则偷挖人参，潜送至宁古塔、吉林等地私下贩卖，同时与宁古塔和吉林的“奸商”结伙，每年从两地向这些地方运送米粮。此外，这些偷挖人参者也渐次开垦地亩，逐渐定居下来。由于他们大都居住于山沟河谷，因此也被称为“沟民”。

1581年，在著名的伊凡雷帝，即俄罗斯沙皇伊凡四世的命令下，哥萨克匪帮头目叶尔马克开始对西伯利亚汗国发动军事远征。他在翌年乘船抵达西伯利亚汗国的卡尔雷克，用火枪装备起来的哥萨克战胜了手持弓箭的鞑靼人。这是俄国人侵东方的开始。1584年，鞑靼人发动暴动，将叶尔马克杀死在额尔齐斯河里。1586年，哥萨克们在位于图拉河口的原西伯利亚汗国都城成吉－乌拉修建了西伯利亚的第一座俄罗斯城市——秋明。两年后，沙皇鲍里斯·戈东诺夫下令哥萨克再次向西伯利亚汗国的残余部分发起进攻，最终将西西伯利亚地区并入了俄罗斯的版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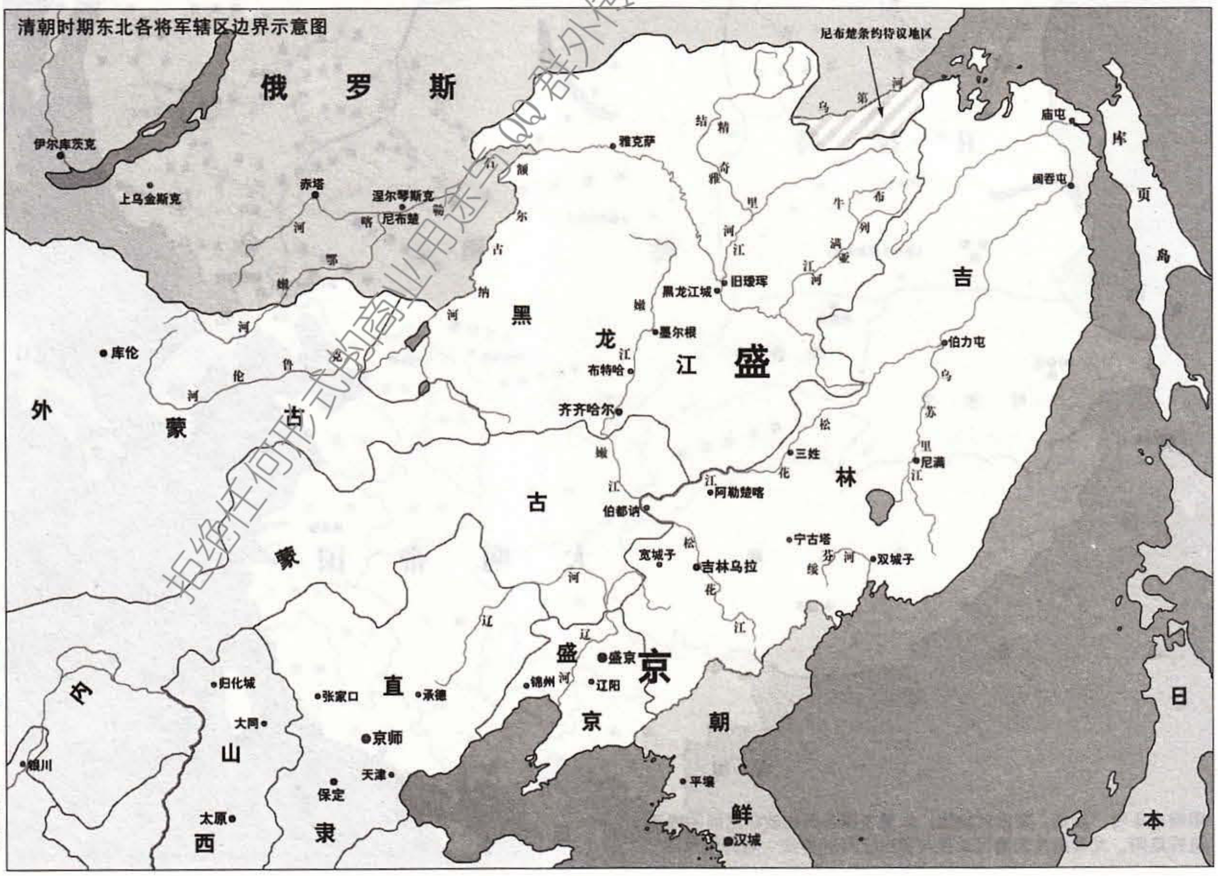
在整个十七世纪里，“发现新土地”的哥萨克继续一小队一小队地向东方推进，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移居西伯利亚的农民。在辽阔的西伯利亚大地上出现了一系列俄罗斯要塞和城市，如彼尔姆（1592年）、塔拉（1594年）、纳雷姆（1595年）、托木斯克（1604年）、库兹涅茨克（1617年）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628年）等等，并且牢固地控制了鄂毕河、额尔齐斯河和叶尼塞河流域地区。

1632年，哥萨克在勒拿河上建立了雅库茨克城，该城成为俄国人的主要基地，他们的“探险队”从这里出发，南下前往黑龙江流域、或者向东前往楚科奇、堪察加和鄂霍茨克海进行探险。1638年，托木斯克哥萨克的五十人长（官名）伊凡·莫斯科维奇和他率领的三十名哥萨克成为抵达鄂霍茨克海岸、并由此驶入太平洋的第一批俄国人、也是第一批欧洲人。

在向东扩张的同时，俄国探险家也在一路向南进入贝加尔湖地区和黑龙江流域，并且侵入传统的卫拉特蒙古和喀尔喀蒙古游牧地区。1651年，贝加尔湖附近的伊尔库茨克要塞落成，三年后俄国人进入黑龙江的上游支流石勒喀河，在这条河畔建起了涅尔琴斯克要塞（尼布楚）。四年之后，这座城堡成为独立的督军辖区的中心，并且成为俄国人侵入黑龙江流域的主要前进基地。在外贝加尔地区和黑龙江流域的全部俄国哥萨克军事要塞全都归其管辖。

1654年，一伙俄国哥萨克在黑龙江左岸（即北岸）建造了阿尔巴津堡(Albazin)。这里原本是索伦部达斡尔人修筑的木制城寨雅克萨（Yaksa），后来被乌鲁苏穆丹屯长博穆博果尔占据。1639年博穆博果尔发动叛乱，皇太极派

清朝时期东北各将军辖区边界示意图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遣萨木什喀、索海等人平叛，并且将雅克萨夷为平地。俄国人在冒险家哈巴罗夫的带领下重建了城寨，并且开始以俄国君主的名义向居住在黑龙江流域的达斡尔人、鄂温克人、阿枪人（赫哲族）、布里亚特人和费雅喀人等部落征收毛皮、谷物和砂金，充当实物税。很快，黑龙江流域的土地被宣布为“沙皇的财产”，居住在这些土地上从事耕种、渔猎和手工业的人都要被迫向沙皇国库缴纳封建赋税，包括“国家什一税”；要服封建徭役，例如修建城寨或提供车马。与此同时沙皇俄国还开始向黑龙江流域安置移民和流刑犯，并且从国库里向他们发放“补贴”，例如农具、马匹、种子和安家费。在黑龙江流域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哥萨克军事要塞和俄国居民点。到1670年代，在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大约四万居民中，俄国人有两千左右。

如果说俄国从十七世纪起不断向波罗的海和黑海发动侵略战争的动机，如沙俄和苏联御用历史学家在辩护辞中所说的那样，可以解释为由于其核心地区——莫斯科国——缺乏山川河流等“天然屏障”可资保卫边界、因此“为了自卫”只得向外扩张的话，那么俄国人不断向东方、向西伯利亚、外贝加尔和黑龙江流域扩张的最直接动机只能解释为对土地和对财富的贪欲。西伯利亚地区盛产大量珍贵毛皮，包括紫貂、雪貂、水獭、猞猁、银狐、蓝狐、狼、狼獾、熊、鹿、麋、灰鼠、松鼠等等，尤其是被称为“软黄金”的貂皮，从十六世纪开始为俄国换取了不少外汇，令其国库充盈。此外，西伯利亚和远东盛产金、银、铜、铅、水银等矿产，鄂霍茨克海出产海獭、海豹、海象、鲸等海洋动物，贝加尔湖、黑龙江和其他大江大河中有多种珍贵的淡水鱼，此外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还拥有世界上储量最丰富的森林资源。俄国政府在1734-1743年组织的“北方大考察”对直至黑龙江流域的远东和西伯利亚地区进行了详尽的考察，对这些地区丰饶的物产作了大量翔实的记录。

迁都北京之后的清朝中央政府并没有放弃对东北地区的重视，一直警惕地注意观察着俄国人在黑龙江流域的各种活动，并力图把俄国人驱逐出这一地区。1652年夏天，以哈巴罗夫为首的俄国哥萨克命令黑龙江中下游地区的达斡尔人归顺沙皇，向沙皇缴赋。遭到达斡尔人拒绝后，哥萨克对其进行大屠杀，杀死了大人和小孩661人，掳走妇女243人、儿童118人。当年秋天，哥萨克又袭击了黑龙江左岸阿枪人（赫哲人）居住的乌扎拉村，在其附近建立了阿枪斯克堡（在今天的哈巴罗夫斯克附近），以此为基地四处抢劫。赫哲人一面抵抗，一面向驻宁古塔的清军报警。宁古塔章京海色闻讯后率领六百名八旗兵，携带六门火炮北上，包围了阿枪斯克，与俄军展开激战，双方均伤亡惨重。阿枪斯克战役后，哈巴罗夫被迫向黑龙江上游撤退。

1658年春天，一支清朝军队包围了松花江口附近的俄国侵略据点乌斯季-库马拉堡，但未能占领这个堡寨。几个月后，镶蓝旗梅勒章京沙尔虎达率领大批清军，乘坐着47艘配有火炮的船只来到松花江和牡丹江汇合处，这次彻底消灭了盘踞在乌斯季-库马拉堡的哥萨克军事探险队首领奥努弗里·斯捷潘诺夫、及其部下270人。入侵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国哥萨克至此全部被肃清，但是清政府却没有趁胜在黑龙江流域地区兴建城堡、屯田戍守，反而试图采取坚壁清野的政策，将当地的达斡尔人迁往脑温江（嫩江）流域居住，从而断绝俄国人在当地的粮食供应，迫使其在饥饿的威胁下撤出黑龙江地区。



十九世纪俄国人描绘的位于伯力附近黑龙江峭壁上的亦失哈石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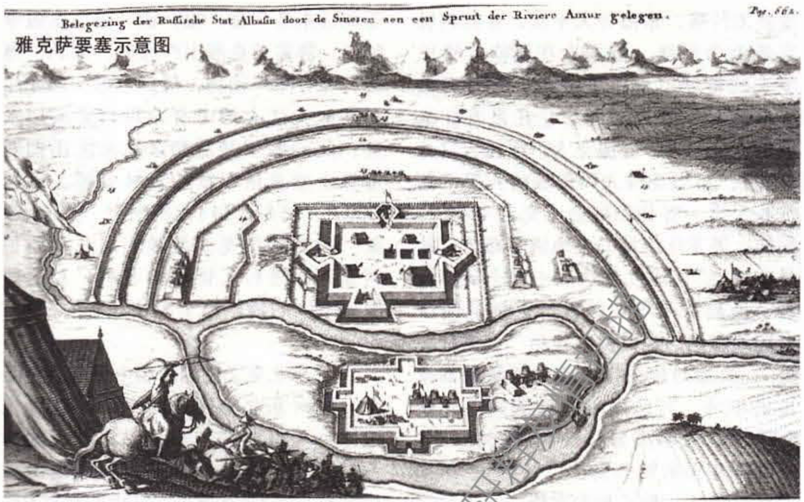


1868年俄国当局在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发现的一处金代寺院石碑基座。当地有金代土城遗址，因此取名为“双城子”

但是此后俄国人却并没有放弃吞并富饶的黑龙江流域的企图。它越来越重视对东西伯利亚的占领和“开发”，并且决定在黑龙江地区设立督军辖区，辖区中心定为阿尔巴津堡（雅克萨）。在这种形势下，年轻的康熙帝在1681年平定三藩之乱后，决定以武力将俄国人驱逐出黑龙江地区。翌年清廷在北京制订了《平定罗刹方略》，规定了侦察地形、建造兵船，从内地向黑龙江两岸调兵、输送武器和军粮，在通往黑龙江地区的要道上增设驿站、派兵驻防，以及从俄国人田里夺粮、驱逐俄人、占领雅克萨、尼布楚等城寨和摧毁其他居民点的一系列措施。

1683年，萨布素将军带领吉林乌拉和宁古塔的官兵1500人，在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汇合处修建了瑷珲城（Aigun，即旧瑷珲城，今俄国境内布拉戈维申斯克南边）。这是一座方形的军事要塞，周长940步，设有5座城门。后来由于旧瑷珲城位于江东，一旦有事缓不济

急，因此在1685年又在其对岸下游的托尔加城旧址上修建了“萨哈连乌拉城”，即黑龙江城（新瑷珲城，今黑龙江爱辉县），并将黑龙江将军驻地迁移至此。新瑷珲城开有四座城门，周长1300步，用顶端削尖的高大木桩为城墙，两排木桩中间夹以土石，并且在西、南、北三面用木排修建了方圆十里的外廓城。新瑷珲城与旧瑷珲城夹江而峙，成为阻断俄国人沿黑龙江顺流而下、侵入其下游地区的咽喉关口。接下来清朝又从吉林乌拉、宁古塔和盛京等地调遣2500余名官兵前往黑龙江沿岸地区屯田驻防，并确定了经辽河、松花江和黑龙江向前沿地区运粮的补给路线，并且在黑龙江城和吉林乌拉城之间设置了19处驿站。



雅克萨要塞示意图

1685年正月，康熙下达以武力驱逐雅克萨地区哥萨克的命令。在1683年，整个黑龙江－达斡尔地区有2000名左右的俄国哥萨克军役人员，配备21门炮、485支火绳枪和182普特火药、143普特铅弹。在整个西伯利亚地区有四五千名哥萨克军役人员，并且可以从耕农中动员2.5万到3万人。在阿尔巴津要塞（雅克萨）内的俄军有450人，拥有3门炮和4发炮弹，而进攻雅克萨的清军部队由黑龙江八旗都统彭春统率，拥有100多艘大船，每船搭乘30到50人，有野战炮100门、攻城大炮40门，此外还有1000多名骑兵从陆路到达雅克萨城下，朝鲜方面也奉命派出了数千人的军队。

在雅克萨围城战中，清军射手箭如雨下，遍布阿尔巴津要塞，而清军中的外国炮手（荷兰人）则开炮轰击。在击退了哥萨克的数次进攻后，清军开始在城寨周围堆积木柴，准备纵火烧城。俄国阿尔巴津督军托尔布津走投无路，只得下令开城投降，并发誓决不再来雅克萨地区。之后清军将其押送至额尔古纳河畔，令其返回尼布楚（涅尔琴斯克），并彻底平毁了阿尔巴津堡。关押在堡中的160名达斡尔人和索伦人被释放，此外有45名哥萨克愿意前往中国定居，清军将其带往盛京。

托尔布津在返回涅尔琴斯克的途中遇到了带着600名哥萨克前去增援阿尔巴津的增援部队，这支部队携带着重武器。托尔布津决心撕毁誓约，卷土重来。当年8月，俄国人重建阿尔巴津城堡，在旧址上建筑起一座更加坚固的城堡，堡内修建了粮仓、火药库和军需仓库，贮备了大量粮食、弹药和其他物资。此后有更多的俄国援兵从贝加尔地区开至涅尔琴斯克和阿尔巴津，两地兵员超过1000人。

此时清帝国与准噶尔帝国（漠西蒙古）的关系恶化了。后者试图独霸整个蒙古，而蒙古又是清朝力图征服的地区。在这种情况下，康熙帝通过被俘的哥萨克送给俄国沙皇一封国书，建议两国在确定边界的基础上订立和约，并为此派遣俄国使节前往边界地区进行会谈。1686年夏天，清军对阿尔巴津堡展开了第二次进攻，虽然清军有5000多人，但是只装备了50多支火枪，其余的士兵装备的只是弓箭刀矛，无法攻克这座要塞，于是在进入冬天后在阿尔巴津堡三面挖掘壕沟、布设鹿角，进行严密围困。到翌年清军奉命撤兵时，堡内的826名哥萨克只剩下70人。

俄国哥萨克在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修建的木制要塞模型。阿尔巴津堡（雅克萨）的构造与此差不多，只是在平面布局及建筑细节上有所差异



由于俄国当时正在西部和南部地区加强针对瑞典、波兰、土耳其等国的边防，无力派出大批军队去占领和控制黑龙江流域地区，因此在1686年被迫同意与清帝国展开谈判。在给谈判使团团长、布良斯克总督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的秘密指令中，两位沙皇（共治的伊凡六世和彼得一世，以及担任摄政的索菲亚公主）要求他力争以黑龙江为国界，如果中国方面不同意，则力图以到布列亚河（牛满江）或者结雅河（精奇里江）为止的黑龙江为界。如果这第二个方案仍不能实现，则力图以到雅克萨为止的黑龙江上游为界，但是俄国应在布列亚河和结雅河沿岸享有渔猎场。最后，如果以上三种方案全都被清方拒绝，则“为了同博格达汗陛下保持最牢固的友爱，依照陛下的愿望”可以拆毁阿尔巴津要塞，清俄双方军事人员都不得进入这一地区，但同时俄国仍保有直至结雅河的渔猎、通行权利。

戈洛文使团是在1686年1月从莫斯科出发的，当年年底在安加拉河畔过冬，翌年为了等待从莫斯科传来的最新训令而耽误了行程，在色楞格河畔的乌金斯克过冬。

1688年5月，康熙帝任命索额图为

清方谈判使团团长，佟国纲、马齐等人担任助手，从北京出发，前往尼布楚与俄国使团进行边界会谈。可是由于准噶尔帝国入侵喀尔喀蒙古（漠北蒙古），索额图使团在到达蒙古地界时接到了康熙帝命令他们返回北京的谕旨。中俄会谈就此耽误下来。驻守在乌金斯克的戈洛文借准噶尔入侵喀尔喀的机会，派兵攻打贝加尔湖东岸的喀尔喀和布里亚特蒙古诸台吉，要求他们臣服俄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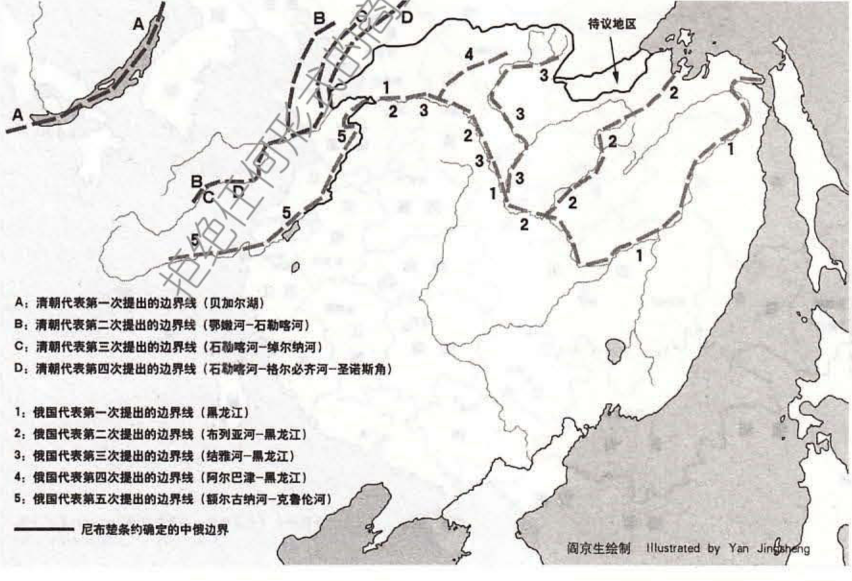
康熙帝获悉俄国人战胜蒙古人的消息后，在1689年春天下令派遣两支大军分别开赴尼布楚和色楞格斯克，宣示清朝对这些地区的主权，同时下令索额图使团在大批军队的护送下前往尼布楚召开边界会谈。根据俄国使团成员的目睹，清朝使团率领总数约5000人的军人，乘坐120艘配有大炮的江船，沿着黑龙江和石勒喀河来到尼布楚，同时清朝陆路大军也带着长长的辎重大军（4000峰骆驼和15000匹马）星夜兼程，只用了49天的时间就从北京赶到尼布楚，并在涅尔查河流入石勒喀河处扎下营寨。

在尼布楚谈判中，清朝提出“直到贝加尔海的所有土地都属于博格达汗陛下”，要求以贝加尔湖作为双方边界，而俄国则提出以黑龙江为边界。在第二轮会谈中，索额图同意以尼布楚为起点，溯石勒喀河而上，河的北岸归俄国，南岸直到鄂嫩河与音果达河汇合之处归中国，而俄国则提出了布列亚河边界方案。在第三轮会谈中，俄方提出以直到结雅河的黑龙江为边界，而清朝则退让一步，主张以直到从左岸注入的绰尔纳河为止的石勒喀河为界。在第四轮会谈中，清方同意以同样从左边流入石勒喀河的格尔必齐河为界，俄国则同意以到阿尔巴津要塞为止的黑龙江为界。双方各持己见，谈判破裂在即。

此时清朝已经向尼布楚地区调集了17000人的军队，而且居住在这一地区、一度被戈洛文征服的布里亚特人和温科特人都重新归顺清朝，而俄方只有1500人。8月21日，清朝使团提出了带有最后通牒性质的最终建议：以到格尔必齐河为止的石勒喀河为界，接着再向下游至石勒喀河与额尔古纳河汇合处，向上游以额尔古纳河为界，直至从左边流入该河的大加集木河为止；位于额尔古纳河右岸的俄国要塞额尔古纳堡迁移到左岸，并不准在额尔古纳河上再建任何俄国堡垒和居民点；阿尔巴津要塞必须拆毁，全部人员及财产要撤出该地，俄国人在此处不得再有任何居民点。戈洛文也提出了俄方的最终方案：以阿尔巴津要塞西边的奥杰康河为界，沿着额尔古纳河至达赉湖（呼伦湖），再至克鲁伦河。

清朝使团仰仗着强大的军事力量，拒绝了俄国人提议的最终方案，与此同时索额图下令当着俄国人的面进行攻打涅尔琴斯克要塞的种种准备工作。戈洛文使团知道，别说从莫斯科，就是从最近的托博尔斯克（戈洛文的父亲在那里当督军）调来援兵也需要两年的时间，而且考虑到在格尔必齐河和阿尔巴津要塞之间适宜定居的地方很少，而俄国控制的额尔古纳河下游左岸地区拥有许多银矿、咸水湖和耕地，因此最终同意以额尔古纳河和从“到河源的第一座石头山”开始的格尔必齐河为界，拆毁阿尔巴津堡，人员和财产撤离此地，清俄双方不得在此修建堡垒和任何居民点，但双方均可在雅克萨地区从事渔猎活动。

清朝使臣大致同意以俄方拟定的这些条款作为边境条约的基础，但是也提出了一些异议，包括反对双方在雅克萨地区拥有共同的渔猎场，认为这恐怕是在将来引起冲突和纠纷的根源。在8月24日由耶稣会会士转交给俄国使团的清朝最终方案中，清朝接受了额尔古纳河段边界，但是对于再往东的边界走向提出了新的建议，即从格尔必齐河源头起，沿着“山脉”直至圣诺斯角（亚洲最东端，今迭日涅夫角）附近的海边。俄方要求清方指出“山脉”的具体位置，得到的答复是那些山脉位于黑龙江和勒拿河之间。换句话说，也就是整个鄂霍茨克海沿岸、堪察加和楚科奇地区都将为清朝所有。俄方则要求以“靠近黑龙江的那条山脉”，即外兴安岭为界，山脉北侧和流向北方的河流属于俄国，山脉南侧及流入黑龙江的河流归清朝；乌第河和黑龙江



身穿传统丝棉盔甲的清代军官。这种棉甲模仿的是明代盔甲的样式



之间的土地不划界，留待将来适当时机再议。8月26日，这个方案送交清朝使团，清方同意了这一提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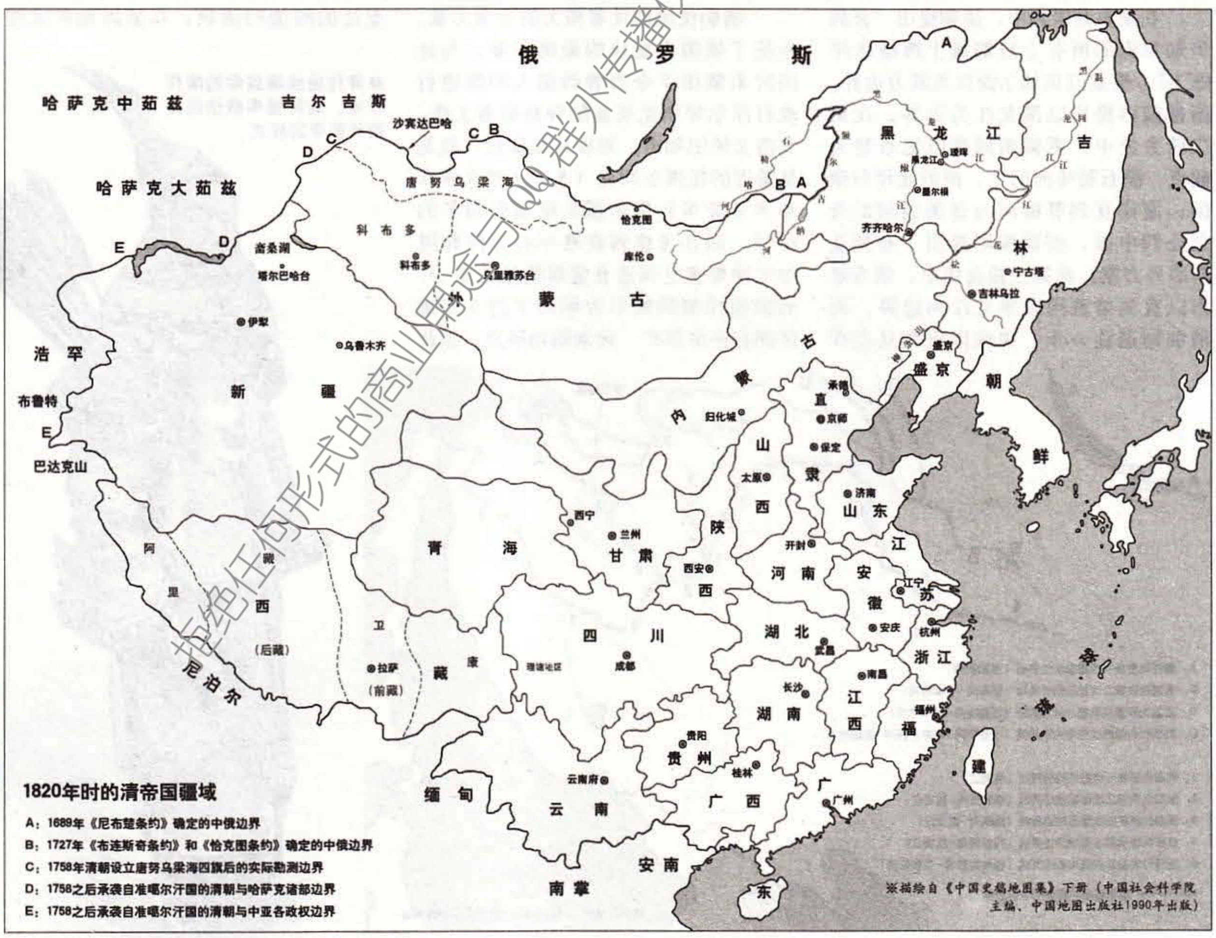
"创世后第7197年"（即西历1689年，当时的东正教俄国使用创世纪年）8月29日，索额图与戈洛文使团在距涅尔琴斯克要塞木桩五十俄丈的地方举行了双方会议，最终签署了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领土划界的《尼布楚条约》。条约分别用俄文、满文和拉丁文各自制成两套文本，由双方签字并加盖印信。这个条约确立了清朝对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的领土主权，在东北地区为中俄两国带来一百七十年的和平，将俄国的扩张势力抵挡在外兴安岭之北、额尔古纳河以西。

在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后，清朝政府开始建立严格的边境巡查制度。每年五月，黑龙江将军从卜奎（齐齐哈尔）、墨尔根（嫩江）和瑷珲三地各派遣官兵数百人巡边，至额尔古纳河西岸俄罗斯属地，察看东岸草地有没有放牧的痕迹，以防俄国人侵界。每次查边，加上往返时间，约为五六十日。从瑷珲出发的巡边队沿着黑龙江溯舟北上，折而往西，过雅克萨城废墟，至格尔必齐河河口，检视该处的中俄界碑，然后向东至外兴安岭山脊。在巡逻队到达目的地后，在木牌上书写官衔、姓名、年月日，然后插在巡逻鄂博（石头堆）上，第二年巡边队将此牌取回送验，同时查下本队的新木牌。

清政府巡视外兴安岭东部边界的方法是，由布特哈（打牲）总管每年六月派章京、骁骑校、兵丁，与捕貂人一道出发，从黑龙江进入精奇里江（结雅河），北行至上游的托克河口。通常每年的例行巡逻到此为止，此外外兴安岭的山脊和发源于南坡的各河流源头每三年由黑龙江城副都统和布特哈总管派兵巡逻一次。巡查外兴安岭的另外两条路线一是从精奇里江入西林木迪河，经该河上游英肯河至外兴安岭；另外一路是沿着牛满江经西林木迪河至外兴安岭，巡逻办法也是河口每年一次、外兴安岭山脊每三年一次。至于黑龙江下游一带，则由三姓和宁古塔副都统分别派遣官兵巡查，巡视范围包括黑龙江江口、乌苏里江流域、绥芬河流域和珲春沿海一带。

各路官兵在巡查边界期间，如果遇到越境的俄罗斯人，即捕送黑龙江将军或吉林将军，然后请旨审理。1693年和1694年，清政府曾经两次致函俄国，抗议俄国人偷越边界到精奇里江上游一带捕貂，指出这是违约侵犯中国领土的严重行为，要求俄国政府查拿和惩办越界者，禁止此后发生这类事件。在清朝的严厉要求下，俄国有关当局按照《尼布楚条约》的规定惩办了私越边界的人。1694年，涅尔琴斯克哥萨克总管加加林曾经致函清朝大臣索额图说，已经当着清朝差官之面，将四名越界主犯处以死刑，六名从犯也分别给予鞭挞和割耳的处分。对于其余尚未查获的越界者，一经查获，俄国方面也将根据和好条约予以惩处。

顺便多说一句，在签署《尼布楚条约》之后，清政府又在1726-1727年与俄国谈判两国边界的中段，即贝加尔湖以南地区的边界走向。当时清帝国正处于长达一百五十年的朝气蓬勃的上升和扩张阶段之中，因此在谈判中，代表雍正帝参加谈判的清朝使团团长隆科多再度对贝加尔湖以东的整个外



1820年时的清帝国疆域

A：1689年《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中俄边界

B：1727年《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确定的中俄边界

C：1758年清朝设立唐努乌梁海四旗后的实际勘测边界

D：1758之后承袭自准噶尔汗国的清朝与哈萨克诸部边界

E：1758之后承袭自准噶尔汗国的清朝与中亚各政权边界

※描绘自《中国史稿地图集》下册（中国社会科学院主编、中国地图出版社1990年出版）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贝加尔地区提出主权要求，并且要求获得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县的相当大一部分，然后将边界线从安加拉河向西延伸至托博尔斯克，再由此向南，以占有整个东西伯利亚和西西伯利亚的南部地区。但是俄方威胁说如果谈判破裂，将爆发战争，并给蒙古人带来不良后果，因此清廷召回了隆科多，由多罗郡王策凌继任使团团长。

在1727年8月20日签订的《布连斯奇条约》中，规定中俄边界的起点“北面在恰克图小河上为俄罗斯帝国卡伦房屋，南面在鄂尔怀图山岗上为中国卡伦标记。上述卡伦房屋与卡伦标记之间土地由双方平分，中心设第一界碑”，边界由此向东至海拉尔河流入额尔古纳河之处，向西至萨彦岭的沙宾达巴哈山口，详细描述了边界走向。《布连斯奇条约》后来成为中俄两国关于划定边界和政治、贸易关系的总条约——即同年10月21日签订的《恰克图条约》——的第三条。

《尼布楚条约》和《恰克图条约》构成了此后一个多世纪里中俄边界东段和中段的基础，至于日后成为中俄边界西段的新疆地区边界，由于当时俄国的势力还未侵入中亚，因此只是清帝国与哈萨克、浩罕等国之间的传统习惯边界。1864年《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使俄国获得了巴尔喀什湖和伊塞克湖之间4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但是



尼布楚条约谈判时的俄方代表费多尔·阿列克谢耶维奇·戈洛文伯爵（1650–1706），俄国外交家，在彼得一世与索菲亚公主的斗争中支持前者，但仍被索菲亚任命为御前大臣，前往尼布楚与清朝谈判边界问题。回国后主管俄国外交，并被封为元帅。为纪念这位沙俄老牌侵华外交家，俄罗斯于2007年在圣彼得堡、莫斯科、罗斯托夫、亚速、伊万哥罗德等城市举行了一系列隆重的纪念仪式

实际上这片土地在并入清朝以前主要是属于哈萨克大茹兹（大帐）和布鲁特人的游牧部落土地。这些部落在清军进入新疆后，在名义上臣服于清朝，但清政府不承认他们是本国的子民，仅为伊犁大臣和喀什噶尔大臣“羁驭巡视所及”。而且因为清朝的国土概念淡薄，在这块土地的西界上没有设立常驻的卡伦哨所，也就是说其实根本没有清政府的常驻军队，所以俄国人其实一枪都没打，只是去勘探了一下，就轻易地根据1860年《北京条约》的条文规定，把位于当时清朝常驻卡伦哨所（设在传统习惯边界线以东的内地，大致在阿拉湖至伊塞克湖一线）以西的大片土地划进了自己的版图。

“外满洲”和“内满洲”

在整个十八世纪里，随着西伯利亚、堪察加和俄属美洲（阿拉斯加）地区毛皮贸易量的上升、以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俄国人感到极需控制并占有黑龙江这条通往太平洋的最便捷航道，以便把粮食和其他物品运往鄂霍茨克海沿岸地区和美洲。《尼布楚条约》并未禁止俄国人沿着黑龙江航行到鄂霍茨克海和日本海去，但是沙皇政府在签约后的一百多年里一直在对华关系上持谨慎态度，认为使用黑龙江航行的问题必须征得清政府的同意。

1805年，俄国海军军官约翰·里特·冯·克鲁森施特恩指挥“希望”号军舰（Nadezhda，原英国三桅炮舰“利安德”号）进行西北太平洋探险航行期间，曾经深入黑龙江河口湾地区探察水文情况。1826年，俄国冒险家乌瓦罗夫斯基率领一支专门考察队前往黑龙江下游地区，在考察报告中指出“整个阿穆尔地区人烟稀少，那里的人不属任何人管辖”，要求俄国政府采取“某些措施”来占领这一地区。但是由于爆发了俄国－波斯战争和随后的俄国－土耳其战争，俄国政府未能着手采纳乌瓦罗夫斯基的建议。

这一时期清帝国与英国的关系十分紧张，两国在1839年11月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次年2月，英国派遣一支由18艘军舰、4艘蒸汽轮船和28艘运输船组成的船队，载着4000多名官兵开往中国海面。战争以清朝失败告终，在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规定开放广州、厦门、宁波、福州、上海等五处为英国通商口岸，赔款洋银2100万元，已被英国占据的香港岛割让给英国



约翰·里特·冯·克鲁森施特恩（1770–1846），俄文名为伊万·费奥多罗维奇·克鲁津施特恩，出身于爱沙尼亚的波罗的海德意志贵族家庭，俄国海军探险家和海军上将，1803年为了探索通往中国的航路，率“希望”号和“涅瓦”号军舰完成了俄国第一次环球远航。白令海峡的克鲁森施特恩岛、喀拉海的克鲁森施特恩群岛、以及苏联海军的一艘帆船训练舰和一艘破冰船都以其命名

“永远占领”。

这场战争是封建的中国同一个欧洲资本主义强国的作战，中国遭到惨败，而且清政府政治制度腐败、政权软弱无能的弱点也暴露在全世界的面前。美国趁英国获胜后的有利形势，也把舰队开到中国海面，准备向中国提出一系列要求。法国也对中国进行威胁，要求获得利权。其他一系列国家，诸如比利时、西班牙、荷兰、普鲁士、葡萄牙等等，为了获得在华利益和特权，也纷纷派出代表来到中国。

对于俄国来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它的对华政策重点在于阻止西方列强渗入紧靠俄国的清帝国领地，独占黑龙江河口及其下游地区。这是沙皇政府迫在眉睫的任务，因为到1840年代末期，英国探险家约翰·塔尔已经开始在黑龙江河口一带侦察沿岸情况，并对东西伯利亚地区的资源进行考察。1845年，东西伯利亚总督府向黑龙江河口地区派出了由军官奥尔洛夫率领的探险队，翌年又派出了由军官加夫利罗夫率领的第二支考察队，不过这两次考察都不成功。

1847年，年轻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这是一位精力充沛、极富侵略性的军事和行政长官。他在1849年向沙皇尼古拉一世递交了一份名为《必须占领阿穆尔河口之理由》的条陈，写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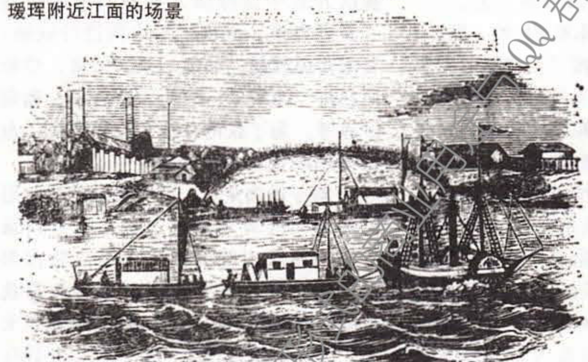
“谁要能占据阿穆尔河口，谁就能控制西伯利亚，至少能到贝加尔湖，而且可以牢牢控制。因为只要占有阿穆尔河口，控制该河的航行，那个国家就能使人口较密、工农业较为繁荣的西伯利亚成为它永久的藩属，并向之纳贡。”同年夏天，在穆拉维约夫的积极支持下，俄国海军大尉根纳季·涅维尔斯科伊率领的考察队员乘坐“贝加尔”号运输船完成了对黑龙江河口的考察，发现库页岛不是以前所认为的半岛，岛与陆地之间是一条可以通航的海峡，海船从南北两面都能进入黑龙江河口。1850年8月1日，涅维尔斯科伊在黑龙江入海口的左岸库艾格达半岛上选定了一个适合建设港口的地点，并在这里升起了俄国海军军旗，并以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名字将其命名为“阿穆尔河畔尼古拉耶夫斯克”（Nikolaevsk-na-Amure，即中国的庙街）。

这个发现从根本上改变了情况，穆拉维约夫要求“刻不容缓地”去占领黑龙江河口地区，因为否则的话“别国从南边进来占领便是指日可待的”。穆拉维约夫认为可能前来占有这一地区的有美国、英国、法国和日本，但最有可能的结果将是被英国占领。在穆拉维约夫的要求下，西伯利亚舰队的主要基地从鄂霍茨克迁至堪察加半岛上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此外还设置了堪察加总督区（总督府最初设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恰克图督军辖区和外贝加尔省，并在1851年组建了外贝加尔哥萨克军。这些哥萨克在当地定居结婚生子，男性年满二十岁即轮流抽调当兵，到四十岁时才解除服役的义务，任其从事贸易、狩猎、农业等活动，但若发生战争仍需听从调遣。

外贝加尔哥萨克兵分为步兵和骑兵两种，步兵服役期为六年，骑兵服役期为三年。没有被抽调进入哥萨克部队的男性平时在家耕种，不需纳税。步兵队平时负责阿穆尔河左岸沿途各处驿站的邮传劳役，驾驶雪橇爬犁、传递公文。1893年10月到1894年5月期间，淮军首领聂士成奉李鸿章之命带武备学堂学生游历东北边境地区，在其日记《东游纪程》中写道，过去见薛福成大臣出使俄国的日记，盛赞俄国风俗淳厚，如中国之商、周时代；如今游历阿穆尔、滨海两省地方，所经的乌苏里江右岸哥萨克各驿站均有门无闩，而院落屋内存储的物资分毫不失，往来行人无分中外，只要能说俄语，一切饮食任其食用携取，诚然有中国上古之风。



1989年苏联发行的纪念侵华头目根纳季·伊万诺维奇·涅维尔斯科伊海军上将（1813–1876）及“贝加尔”号的纪念邮票。在涅维尔斯科伊发现黑龙江口并证实萨哈林岛是一座岛屿之后，沙皇尼古拉一世亲自接见了他，为其授勋，并指着地图上的“尼古拉耶夫斯克”一带说：“俄国国旗不论在哪里，一经升起，就不应当再降下来”。后来俄国当局在符拉迪沃斯托克为涅维尔斯科伊建纪念碑时，公然把这句话刻在石碑上，作为俄国——及苏联——永远奉行的方针

1854年穆拉维约夫组织的“黑龙江浮运”经过瑷珲附近江面的场景


1854年聚集在阔吞屯地区的俄国舰队


1854年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英法舰队驶往堪察加半岛，围攻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要塞，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府为了援救这座军港、并趁机获得在黑龙江上航行的权利，在黑龙江上安排了大规模的驳船和木排浮运航行，向鄂霍茨克海沿岸运送粮食和军用物资。1855年春天，穆拉维约夫又安排了一次黑龙江浮运，并借机在黑龙江沿岸建立了一些彼此相隔18到24公里的俄国居民点，例如伊尔库茨科耶、米哈伊洛夫斯科耶、沃斯克列先斯科耶等等。他让外贝加尔哥萨克军的士兵携带着妻儿，在这些村子里定居下来，并以这一连串村子为哨所，以保卫“边疆”、传递邮件。此外哥萨克骑兵还在马林斯克哨所（中国的阔吞屯）对面的苏契岛上建立了苏契镇。

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令俄国得以腾出力量，转向东方。翌年亚历山大二世沙皇派叶夫菲米·瓦西里耶维奇·普恬廷海军中将出使中国，并携带1万支步枪、50门大炮和炮弹，作为“送给博格达汗（镇压太平天国）的礼物”。在给普恬廷的训令中，沙皇要求他迫使清政府将已经给予或未来将给予西方各国的各种权益都扩及到俄国，并且要他就远东边界问题进行谈判，“占领阿穆尔河左岸及您心中有数的其他地方，另一方面不致中断我们政府和中国政府的关系”。

1857年底，俄国枢密院致信清朝理藩院，指责清朝对俄国1851年和1855年“保卫阿穆尔河不受外国军队侵犯”的“呼吁”置之不理，要求中国“必须把整个阿穆尔河左岸以及直抵朝鲜的一片滨海地区划归俄国”。1858年，穆拉维约夫决定亲自出马逼迫中国割让黑龙江地区。他在当年5月乘船沿黑龙江而下，前往瑷珲城，在5月22日与黑龙江将军奕

山举行了会谈。此时俄国在黑龙江和蒙古边境集结了步兵一万六千人、骑兵五千人，还有许多炮兵作后盾。在会谈中，俄方不断开枪鸣炮，日夜不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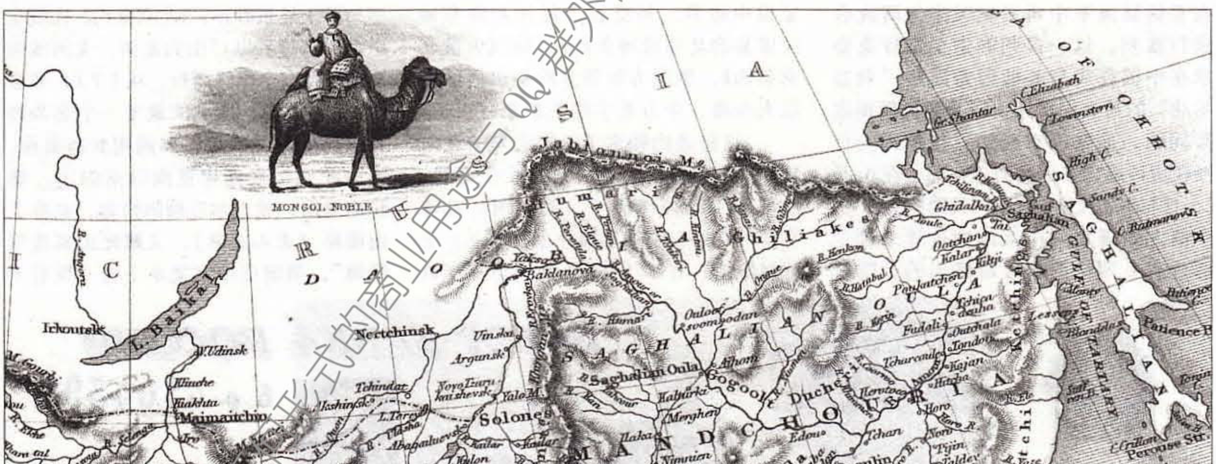
穆拉维约夫与奕山举行会谈的地点是停泊于黑龙江上的穆拉维约夫的快艇。在第一天的谈判中，穆拉维约夫借口说“英国人可能占领阿穆尔河口以及河口以南地方”，建议沿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划界，将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直抵朝鲜的土地悉数划归俄国所有。奕山拒绝了这一无理要求，反驳说首先俄国人所要的大多数地区属于吉林将军辖区，他本人无权管辖，其次中国政府很久以来就在上述地区征收实物税，并且设有卡伦哨所，完全能够抵挡洋人，无需俄国的“外援”。穆拉维约夫则挖苦他说，没有大炮就不能赶走英国军舰。既然连广州都守不住，清朝哪里还能保住这遥远而荒凉的地方呢？

在第二天，俄方向奕山提出一份提案，共有六条，包括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界河上只准两国船只自由航行，两岸准许自由贸易等等。双方就这一条约草案讨论了好几天，奕山顽强地拒绝接受俄方的讹诈。他说乌苏里地区是清朝的发源地，把它割给俄国就是叛国。穆拉维约夫对此答复说，清朝大臣对乌苏里地区一无所知，甚至不知道沿海地区许多地方已经设有俄国哨所。经过长时间的争论，穆拉维约夫最终同意“让步”，同意黑龙江边界只划到乌苏里江口，乌苏里江与大海之间的地方在最终确定边界之前为两国共管。5月28日，双方在瑷珲城签署了条约，史称《瑷珲条约》或《1858年俄中条约》。为了庆祝实现一百多年来俄国扩张主义者获得黑龙江左岸地区的夙愿，穆拉维约夫在6月2日下令把位于瑷珲城对岸的中国城镇海兰泡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即“天使报喜之城”。

《瑷珲条约》由简短的序言和三条主要条款组成，第一条确定领土划界：“阿穆尔河左岸，自额尔古纳河至阿穆尔河的出海口，归俄国；右岸，顺河而下至乌苏里江属于大清国。从乌苏里江一直到海的所有地方和土地，在确定两国之间在这些地区的边界之前，如目前这样由大清国和俄国共管。”此外，对于定居在黑龙江左岸的中国居民，条约作了特别说明：“阿穆尔河左岸，自结雅河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的满洲居民，仍永远留住原来的地方居住，属满洲政府官员所管。”



侵华巨魁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穆拉维约夫（1809—1881），1827年参军，1830年参加俄土战争，翌年镇压波兰起义，1838年镇压高加索山民起义。1846年任图拉军政总督，1847年任伊尔库茨克和东西伯利亚军政总督，在任内不断将哥萨克和获释流放犯布置到黑龙江流域，在西伯利亚各民族中强制推行俄语教育，还在1858—1860年主持了侵吞中国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罪恶侵略活动，为此获得“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爵位。《北京条约》签订后，于1861年退休，七年后移居巴黎，1881年在巴黎病死。1992年，俄国政府将其遗骸从巴黎迁至符拉迪沃斯托克市中心隆重下葬，翌年哈巴罗夫斯克市为其重新树立雕像（1929年曾被推倒）



英国探险家约翰·塔尔在1851年绘制的远东地图（局部），当时中俄边界在外兴安岭一带。有趣的是，图中将朝鲜标为Corea，今日韩国以此图为证据，要求恢复该英文名，以把国名排在Japan前面；同时该图将韩国如今正在发起“正名运动”的“东海”标注为“日本海”，韩方对此却避口不谈

在给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庆贺奏折中，当时的帝俄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说《瑷珲条约》“为俄国增添了幅员广大的领土”，“使中国政府承认了欧洲文明的伟大原则”，恭祝沙皇“在圣朝史册上写下了灿烂光辉的新篇章”。而亚历山大二世则下令授予穆拉维约夫本人以“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称号，以表彰他的“辉煌成就”。1891年，在哈巴罗夫斯克城俯瞰黑龙江的峭壁上竖起了穆拉维约夫的青铜雕像。据1893年聂士成将军访俄时所见，“炮台署西北石台上立铜人如生，右持千里镜，左抱地舆图，面向乌苏里江，为初建（阿穆尔、滨海）两省大将穆列尧夫，盖纪功之意”。

十月革命后，穆拉维约夫的雕像在1929年被拆除，代之以列宁的塑像。苏联解体后，哈巴罗夫斯克市在这座雕像的原址重新树立了“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的巨大雕塑。仿佛这还不足以羞辱俄罗斯的“战略协作伙伴”和“友好邻邦”似的，在俄罗斯联邦发行的最大面额纸币——5000卢布的正面，也赫然绘上了这位“恶贯满盈的老扩张主义分子”、“疯狂侵华的罪恶急先锋”、“沙俄侵华巨魁”的塑像。

在签订《瑷珲条约》期间，俄国代表普恬廷海军中将正在天津与清政府进行谈判，这一谈判的主要宗旨是要求在中国获得与其他西方国家“利益均沾”的最惠国待遇，以及解决两国边界问题。他并没有获知穆拉维约夫已经在瑷珲缔结条约的消息，而是在6月13日与清朝代表签订了《天津条约》，其中第九条规定“中俄两国边界未确定部分将立即由两国政府派出的大臣就地勘察，他们签订的边界线条款将作为本条约的补充条文。划界后将拟定详细记录文字并绘制毗邻地区地图，作为今后两国政府不容争议的边界文件”。

1860年，俄国趁英法联军攻占北京、烧毁圆明园、清咸丰帝出逃热河的机会，对留在北京的恭亲王再度进行敲诈勒索。俄国驻华公使伊格纳季耶夫要求恭亲王必须书面保证“中国政府在同欧洲人的交往中，不得对他（俄使）有任何隐瞒”，中国政府必须同意批准《瑷珲条约》，同意在东方沿乌苏里江直抵朝鲜边境划界、在西部沿着中国的常驻卡伦划界，并且必须同意开放与俄国的陆路贸易、允许俄国在喀什噶尔、库伦和齐齐哈尔开设领事馆。伊格纳季耶夫利诱和恐吓并施，一方面劝诱恭亲王说如果清朝政府批准这些条件，他就说服英法尽快从北京撤军；另一方面则威胁说如果中国拒绝这些要求，那么俄国很可能加入英法一方与中国作战。

1860年10月27日，伊格纳季耶夫开始与清朝的全权大臣进行谈判，伊格纳季耶夫向后者提交了一份条约草案和一份东部边界线地图。11月14日，双方在北京礼部衙门签订了《关于确定俄中边界、外交往来程序和伊犁地区贸易的北京续增条约》，即《中俄北京条约》。俄国方面签字的是伊格纳季耶夫少将，中方签字的是恭亲王。

这份条约确定了中俄边界的走向“从石勒喀河和额尔古纳河汇合处起，沿阿穆尔河顺流而下，到该河与乌苏里江汇合处。阿穆尔河左岸（以北）土地属俄国，右岸（以南）到乌苏里江口



中俄边界倭字碑，原位于黑龙江牡丹江市东宁县三岔口绥芬河南岸（庙沟滚兔岭），现作为文物移至牡丹江市内保存

的土地属中国”。接着，边界线“从乌苏里江口到兴凯湖，顺乌苏里江和松阿察河而行。该江和该河右（东）岸土地属俄国，左（西）岸属中国”。然后，边界线从松阿察河源头跨过兴凯湖，到白楞河，从该河口沿着山脊到瑚必图河口，再从此沿着珲春河和海之间的诸山到图们江。此处仍是以东土地属俄国、以西土地属中国。

除上述条款外，《北京条约》还规定中俄西部边界以“山的走向、大河流向及中国现有卡伦线而行，从1728年依《恰克图条约》所立的最末一个名为沙宾达巴哈的界碑起，向西南到斋桑湖，再由此到伊塞克库里湖以南的山，即腾格里山，或吉尔吉斯阿拉套，亦称天山南路（天山南脉），又顺此山到浩罕领地”。俄国在中文文本上将“现有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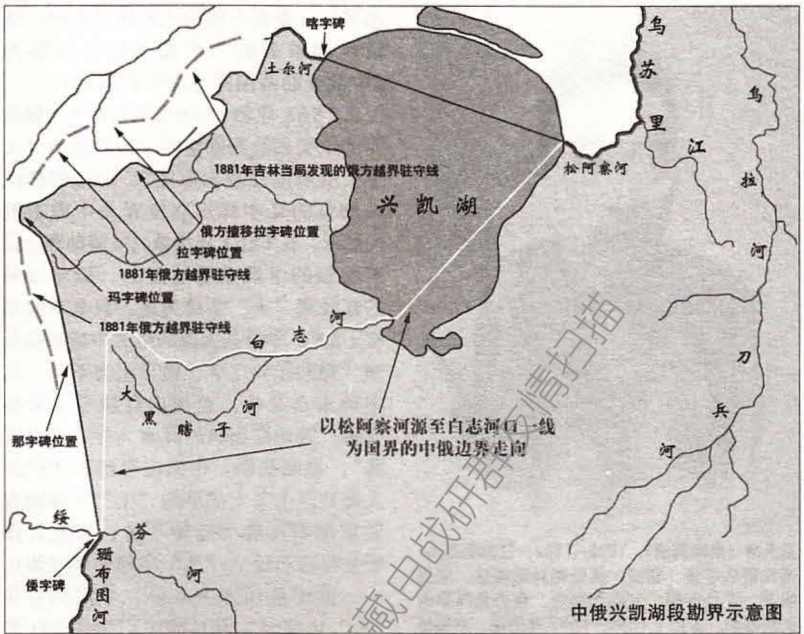
俄国发行的5000卢布纸币，正面是哈巴罗夫斯克市黑龙江岸峭壁上的穆拉维约夫铜像，背面是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市的横贯西伯利亚铁路阿穆尔河大桥

伦”改为“常驻卡伦”，把清朝在新疆境内城镇附近的常驻卡伦硬指为分界标志，把当时为中国内湖的斋桑湖和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定为了界湖。

为了明确中俄东部边界起见，《北京条约》在地图上用红线标明了新的东部边界走向，并在边界线上以俄文字母А（阿）、Б（巴）、В（瓦）、Г（噶）、Д（达）、Е（耶）、Ж（热）、З（皆）、И（伊）、І（亦）、К（喀）、Л（拉）、М（玛）、Н（那）、О（倭）、П（帕）、Р（啦）、С（萨）、Т（土）、У（乌）共计二十个字母为界碑标记，标出边界线走向。

1861年，中俄双方代表在兴凯湖畔举行勘界会议，并树立界碑。俄方的全权大臣是滨海省总督彼得·卡扎克维奇海军少将和东西伯利亚部队总军需官康斯坦丁·布达果斯基上校，清方全权大臣是仓场侍郎成琦和吉林将军景淳。由于清方代表的昏庸，加上烟瘾发作，立碑工作竟完全由俄国一手包办。其结果是，条约中规定的20块界碑仅树立了Е、И、К、Л、Н、О、П和Т共计8块，都是极其简陋的木制界牌。而且一些界碑又没有立在地图标定的位置上。比如“耶”字碑本应当立在乌苏里江与黑龙江汇合处、即哈巴罗夫斯克城西南之江嘴上，实际上却立到了哈巴罗夫斯克以南三十八俄里中方一侧江岸的窝家口屯。原立于兴凯湖及穆棱河流域之间分水岭平坡上的“拉”字碑，原在薛家房子附近，后来竟被俄国人移至大顶子南岗二里处，距原地北移了近十九华里（当地中国居民形象地将之称作“马拉界碑”）。再比如“土”字碑，按照条约应当立在距离图们江入海口二十华里的地方，但实际上却被俄国人立于距江口22俄里（约45华里）远的洋馆坪附近。

除此之外，《北京条约》规定中俄两国边界线从松阿察河河源横跨兴凯湖至“白棱河”河口，因此必须确定“白棱河”的方位，才能解决中俄在兴凯湖至瑚布图河口这一段的边界走向。但是成琦等人遍查吉林将军历年所绘地图，以及早年所存吉林地图，却只有“白珍河”，并无“白棱河”。即使根据伊格纳季耶夫交给恭亲王的地图，也只有一条位于兴凯湖西南的“白志河”。清朝谈判代表认为白志河即为白棱河，但是俄国代表卡札凯维奇却指鹿为马，一口咬定位于兴凯湖西北岸、已经被俄军占领的土尔河为白棱河，从而将



中俄兴凯湖段勘界示意图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兴凯湖的绝大部分湖面划入了俄国版图。

1885年，清政府打算对波谢特湾部分海岸提出领土要求，以作为珲春－宁古塔地区的出海口，并切断俄国与朝鲜的陆上联系。与此同时，鉴于俄国方面在1861年勘界之后不断地越界设卡、蚕食中方土地，因此光绪帝指示总理衙门大臣庆亲王，与俄国共同会勘兴凯湖、珲春河和图们江地区的中俄边界。经过谈判，俄国东西伯利亚总督同意于1886年春季重新勘界，并且将原先的木制界牌换成石质界碑。中方的勘界代表为会办北洋事务大臣吴大澄和珲春副都统依克唐阿，俄方勘界委员会主席为滨海省省长兼司令巴拉诺夫少将。



位于图们江畔中朝俄三国国界交点上的土字碑，光绪十二年四月立。碑旁边界铁丝网呈锐角（而非直角）伸向江边，有中国边界至此顺江出海之势

在这次共同勘界中，吴大澄发现了土字碑树立位置非当这一问题。他要求俄国人按照1861年勘界条约的内容，将“土”字碑立于距图们江口二十华里的地方，而巴拉诺夫强词夺理，竟然说“海口以内二十里是海水涨潮灌入之地，应当算作海的一部分”。吴大澄义正辞严地驳斥说“海口即江口，指海滩尽处而言”，俄方这才勉强同意将“土”字碑向江口方向又移动了10公里。在1886年6月19日，吴大澄与巴拉诺夫在沙草峰南麓十余里处树立了“土”字界碑。与此同时，俄方同意交出非法窃据的图们江东岸黑顶子地区。

1886年7月4日，吴大澄和巴拉诺夫分别在中俄《珲春东界约》上钤印画押，彼此互换。在随后的四个月里，吴大澄还依据《北京条约》条款规定，与俄国代表共同考察了土尔河口以南的中俄边界，将俄方偷移的“倭”、“那”、“拉”字等界碑挪回原处，并在边界上添立了“萨”字碑（吉林珲春市以东61公里处，马滴达乡东南）、“啦”字碑（珲春市东北约78公里处）和“帕”字碑（中俄边境与吉林珲春市和黑龙江东宁县行政界线交点上），并且在“土”字碑与“萨”字碑之间的边界上树立了十六处以土石墩和小石碑为标志的边界记号。此外，吴大澄还在珲春南边的长岭子中俄交界处添立铜柱，上面铭刻“疆域有表国有维，此柱可立不可移”，反应了这位爱国政治家对沙俄随意移



吴大澂（澂字同澄），1835–1902，江苏吴县人，清代著名学者、官员。历任翰林院编修、陕西学政、太仆寺卿、左副都御史、会办北洋事务大臣等职，主持了1886–1887年中俄、中朝勘界，及珲春－宁古塔地区移民垦殖工作。1886年任广东巡抚，1888年任河南山东河道总督，以水泥筑坝加固河道，治理黄河水患。甲午战争中自请率湘军出关同日军作战，在海城战败，受“永不叙用”处分。张之洞、袁世凯等人都是其姻亲。吴大澄还是非常有造诣的书法家、画家和金石家，尤其精于篆书。在中俄、中朝勘界中所立的“疆域有表国有维”铜柱、“华夏金汤固、山河砺带长”十字界碑，以及珲春图们江左岸龙虎村摩崖石刻“龙虎”二字均是其手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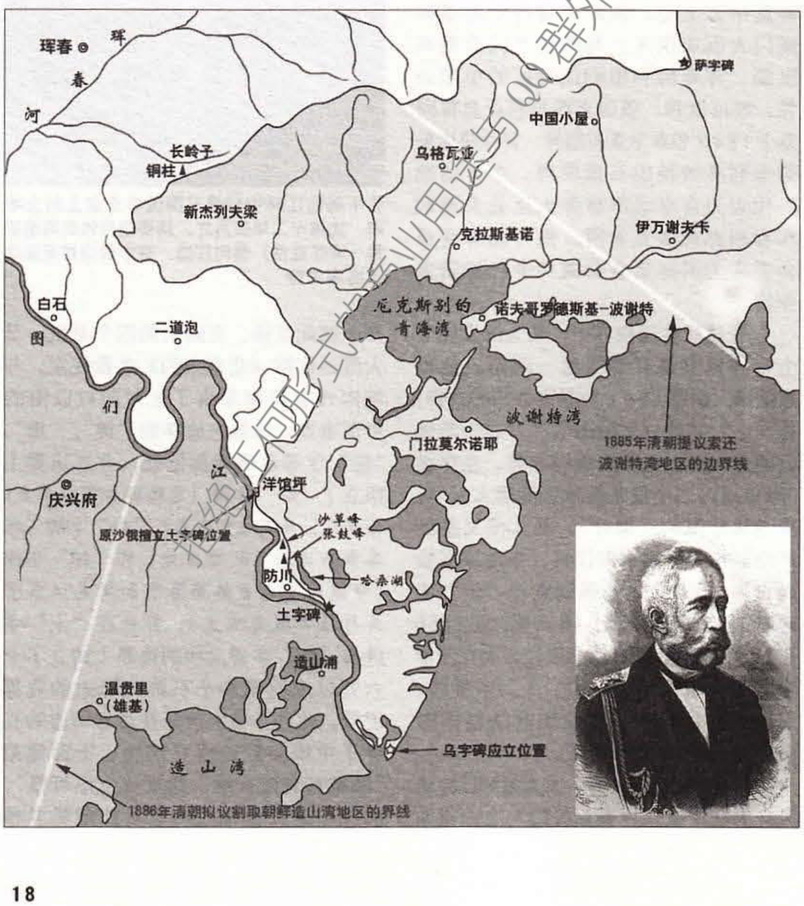
动界标、蚕食中国领土的忧虑心理。这段时间签署的六个勘界协议总称为《中俄查勘两国交界六段道路记》。

1861年和1886年前后两次中俄勘界的记文和绘图都说明“国界线由（土字）界牌沿江通向海边”，即以图们江入海口的乌字牌应立位置为中俄东界的终点。在1861年中俄兴凯湖勘界会议所绘制的中俄东界地图上，标示边境的红线到“土”字碑为止，但是李鸿章在1886年给吴大澄的电文中特意提及到“图们江口之争，由于记文不明，乌字牌未立之故。盖图内红线专为陆路界限，其由江出口，以水为界，无须红线”，也就是说，中俄边界线在图们江入海处以上二十华里的“土”字碑地方紧靠图们江继续延伸下去，直至入海处左岸应当设立“乌”字碑的地点为止——因此从法理上来讲，中国拥有从“土”字碑至入海口的图们江一半江面的主权，这一段的图们江是中国和朝鲜的界河，而不是朝鲜与俄国的界河。俄国人在1886年的谈判中狡猾地回避了这一点，中方在1886年勘界中也未能令俄国当局同意设立“乌”字碑。不过，吴大澄鉴于图们江口已被俄国占据，要求俄方允许中国船只自由出入江口。经过交涉，俄国外交部最终答应给予中国船只从图们江入海的通行权，并将相关照会作为《珲春东界约》的附件，却闭口不谈“乌”字碑的设立和江面主权问题。

比起《瑷珲条约》割走的60万平方公里和《北京条约》割走的40万平方公里土地来，图们江入海口二十华里的一半江面其实只不过是九牛一毛。一个国家不借助战争手段，而只是靠花言巧语和外交诈骗，便从另一个国家割走面积如此广大的土地，这确实是史无前例的。身为旁观者的美国人后来评价说，“伊格纳季耶夫通过《北京条约》‘不发一弹，不需劳远征之费，这个圆滑的俄国人就得到了普里莫尔斯克（滨海地区）这个宝贵的、位于军事要冲的地带，它拥有俄国人现在称作彼得大帝湾的那个宏伟的海港，1861年他们在这港湾上建立了‘征服东方之城’（符拉迪沃斯托克）。依靠这一时期的外交，俄国人不但通过把中国拉到它那一边去而奠定了它在远东的势力，而且洗刷了以英法为敌方的那场克里米亚战争带来的大部分历史耻辱。”

签订《北京条约》后，一些在华的传教士和西方人模仿内外蒙古称谓之区分，将割让给俄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土地称为“外满洲”（Outer Manchuria），而将留在清朝版图内的东北地区称作“内满洲”。事实上内蒙古与外蒙古是依据归附清朝的时间先后而有了内外之分，而中国人自己并没有所谓“内满洲”和“外满洲”的叫法。俄国人最初将其夺占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中国领土称为“滨海地区”（Приамурье），后来分设“阿穆尔州”和“滨海边疆州”（包括原堪察加州的土地），苏联时代在行政上将其分为“阿穆尔州”、“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滨海边疆区”和犹太自治州。

《瑷珲条约》和《北京条约》令清帝国失去了面积达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巨大领土，这也是中国近代史上割让领土最多的两个条约。究其原因，俄国侵略成性的扩张政策是一方面，而清朝本身实行了将近两百年的柳条边禁令也难辞其咎。1853年俄国陆军中校阿赫杰率领探险队进入黑龙江北岸地区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左：1886年珲春－图们江勘界示意图。小图为1852–1854年随普恬廷乘“帕拉达”号进行环球航行时对日本海沿岸进行测绘考察的康斯坦丁·波谢特（1819–1899），他后来在1874–1888年期间任俄国交通大臣。波谢特湾即以其命名

进行“考察”时，发现在如此广袤的土地上居然只有不到两万居民，其中大部分是还不知北京在哪里的部落居民；而且当地没有清朝驻军，最近的军营是在瑷珲的不到一千人的、装备极差的部队。而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在穆拉维约夫的安排下，俄国人借“浮运”的机会，只用两年的时间就从本土迁来两万居民，造成了在黑龙江左岸定居的俄国人多于中国人的局面。清政府在失去这一地区之后才想到向东北移民实边，不过已经晚了。

俄国人要把割占的黑龙江北岸地区变成“西伯利亚粮仓”的计划从一开始就遭到了失败。在割取这片领土之前，俄国探险家注意到当地的满族和汉族开拓者种植的作物主要是玉米和小米，此外还种一些大麻、黄瓜、马铃薯、南瓜和其他蔬菜，而俄国定居者则希望能够在这片地区种植小麦、大麦、铃铛麦（猫尾小麦）。不过，虽然黑龙江流域雨量丰富、植被茂盛，但夏季的大雨对小麦种植是十分不利的，谷物只长茎叶而不结穗。在乌苏里江以东地区短短的植物生长期里，雾气很大，土地潮湿，移居者只好放弃了他们的田地。后来在当地汉族农民的帮助和指点下，俄国移民的蔬菜和谷物收获得多了，但却发生了一些变异，用当地谷物做的面包味道不好，而且使人产生头晕或酒醉的感觉（后来发现这是小麦、黑麦等谷物上寄生的真菌导致的）。这一切都给移居这里的俄罗斯农民带来了苦难。俄属阿穆尔地区——即黑龙江北岸——不仅不能给西伯利亚提供粮食，而且还要经过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从欧洲和中国进口粮食、从朝鲜进口食用牛；位于更北边的堪察加地区和俄属美洲（阿拉斯加）也要依靠从加拿大或加利福尼亚获得供应品。补给方面的困难，以及移民稀少，正是沙皇在1867年决定把俄属美洲出售给美国的最主要原因。

在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占领黑龙江左岸的计划中，要点之一是用这条河来改进俄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但是这条河作为交通干线来说，其天然困难几乎是无法克服的。在黑龙江中游的海兰泡－瑷珲一带，通常从十月底开始结冰，4月20日前后解冻，所以在正常情况下黑龙江每年有173天被冰层覆盖，只有192天可以通航。而在封冻前的17天到27天里，江里飘满危险的冰块，春天解冻时也有这么长的一段危险航行时期。虽然冰封的黑龙江河面在冬天可以当作道路使用，但由于当地居民稀少，用于拖拉雪橇的驭畜也很少，所以只是偶尔使用这条道路。此外，海上运输比陆地和内河运输便宜许多倍（从中国经苏伊士运河运往俄国欧洲部分的茶叶，运输费用比经库伦、恰克图和西伯利亚商路运往俄国的茶叶便宜七倍或八倍），俄国横贯西伯利亚的道路很坏，同时又面临着从海上运来的西欧商品的竞争，因此无法为它的制造品在中国本土找到市场。要实现穆拉维约夫的商业野心，就要有一条从俄国的欧洲部分直通到贝加尔湖和黑龙江的铁路来改善通往远东的运输条件。


1860年时的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


1860年时的哈巴罗夫卡（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当时只有俄国兵营


1860年时的索菲斯克哨所（今索菲斯克）



十九世纪末居住在黑龙江口庙街（尼古拉耶夫斯克）地区的通古斯原住民

因此，很明显，从1860年到1880年，俄国虽然占有了所谓“外满洲”地区，并因此在黑龙江上获得了航运权，但由此给俄国带来的经济利益并不多。相反，由于占领这些领土、维持驻军、补贴移民而给俄国政府带来的财政赤字，在1880年时多达5500万卢布。位于黑龙江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很快衰落下去了，符拉迪沃斯托克这个远东最重要的俄国港口也同样面临惨淡的局面，来到这个港口的大多是外国船只，贸易也大部分掌握在外国人（尤其是中国商人）手里。粮食十分昂贵，进口量是出口量的十倍以上。从俄国经黑龙江运到这个港口的货物，除了样品以外，再没有别的了。

根据《北京条约》的规定，中俄两国居民都有权越过国境一百华里（35俄里），在对方国家境内自由地从事贸易经商活动。中国商人很快就利用了这一条款，在黑龙江左岸和

乌苏里地区的俄国边境移民区展开了获利丰厚的生意。然而俄国人却不能从这一条款中获利，因为一方面俄国人手中没有多少货物，另一方面清帝国当时按照在国境上保持一条无人地带作为缓冲区的传统，在黑龙江沿岸保留着一片宽约200到300公里的荒野地带。在这片地区，除了土匪、偷采黄金者、半开化的猎人和来自中俄两国的亡命者之外，就没有人住在那里了。要想和这种居民建立良好的贸易关系是十分困难的。

在1870年之后，每年有大约500多名来自中国的农民、工匠和手工业者跟随商人的脚步进入俄属远东地区，有些人在那里定居下来，还有些人成为在春节期间返回国内的季节性劳工。到1885年，俄属南乌苏里地区有10353名登记过的中国人，没有登记的可能还有4000名左右，而当地的俄国移民数量是17000人，还有官吏、士兵和临时居民13000人。在当地，哥萨克军和移民耕种的土地是0.6俄亩，而中国人是1.1俄亩。中国不仅控制了俄属远东地区的商品供应，而且也控制了当地的粮食生产和劳动力市场。

当时俄国在远东和阿穆尔地区的软弱无力还可以从这样一个事实看出来：1883年在满洲地区的极北部、黑龙江南岸雅克萨河的支流热尔图加河（老沟河）河谷发现了砂金矿。从1884年初开始，几乎整个西伯利亚都流传着在热尔图加河上发现了“新加利福尼亚”的消息，传说在这条神奇的中国河谷里到处都是俯首可得的宝藏，“拣起一块苔藓，底下都沾满了金子”。东西伯利亚和阿穆尔地区的哥萨克、地方官员、商人、工人、失业者、骗子和其他形形色色的俄国人闻讯后激动地涌向这里。



1900 年时的尼古拉耶夫斯克（庙街），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这座城镇的规模很小

在1883年到1886年之间，有七千到一万二千名淘金者（大多数来自俄国）在当地非法定居下来。居住在这里的人称这块地方为“热尔图加共和国”（Zheltugaskaya Respublik），还常常把它唤作“阿穆尔的加利福尼亚”。中国政府和俄国政府曾屡次命令这些不愿接受任何一方管辖的亡命者解散，但这些人拒不听从。“热尔图加共和国”是根据民主原则和严格的军纪来治理的，他们成立了“市政厅”，制订了法律，建立了警卫队和税收机构，建立了700多座房屋，以及医院和教堂等设施。远东的俄国当局没有力量来消灭它，因此只是沿着哥萨克驻防村布置了一条警戒线，在非法开采的黄金穿越这道警戒线时把它没收。至于消灭这个“共和国”的任务，只好留给中国军队去完成了。

伊犁危机与远东边疆危机

根据1860年《北京条约》的规定，中俄两国约定从1861年起实地标定两国之间的西段边境。为了在边界划分中尽可能多地维护本国权益，清廷在1861年和1862年从塔尔巴哈台（塔城）、伊犁和喀什噶尔等地向边境派出了数支满汉大军，越过常驻卡伦线，深入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地区，支持当地那些忠于中国的部落，并且向其余部落发放揭帖，号召其归附清帝国。1862年春天，中俄军队曾经为此发生过几次小规模冲突。

1864年，由于甘肃、陕西等西北省份爆发回族反清起义，清廷指示谈判代表明谊（时任乌里雅苏台将军）尽快与俄国达成边界条约，以免其利用动乱局势浑水摸鱼。在这种对中方不利的形势下，双方代表于9月25日在塔尔巴哈台城签署了《划定俄中两国中亚细亚边界的议定书》，即《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俄国从中割走了位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塔尔巴哈台山岭、哈巴尔阿苏山口和喀拉套山岭以西，面积多达44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根据议定书规定，位于新的俄国领土之内的中国边防卡伦哨所和中国臣民都将移回边境中方一侧。

1898 年时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远处是金角湾



1862年爆发的西北危机是与太平天国和捻军运动同时期的、规模巨大的武装斗争，起于陕西华州的“砍竹事件”，随即在短短一年时间内波及到陕西、甘肃和新疆北部地区，接着在1864年由北而南，席卷整个新疆。用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中国近现代史研究室主任杨遵道在其《十九世纪末英俄争霸中国史》一书中的话说，“在这场伟大的斗争洪流中，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一些封建主和宗教上层分子在斗争初期便攫取了抗清斗争的领导权，他们在‘反清’的旗帜下把反清武装蜕

变为扩大他们权势的工具，拥兵割据，称王称汉，互不统属，争权夺利，互相攻杀，形成了五个‘汗国’。他们以暴易暴，对内代替清政府凶残地剥削和压迫人民；有的对外不惜认贼作父，勾结外国侵略者，进行背叛和分裂祖国的反动活动”（《十九世纪末英俄争霸中国史》3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

当时在新疆成立的分裂政权包括以库车为中心的“热西了和卓”政权、以伊犁为中心的“塔兰奇苏丹”政权（塔兰奇人是北疆蒙古人对准噶尔战争后移居到伊犁地区的维吾尔族农民的称呼，1949年后民族成分定为维族），以和田为中心的“哈比布拉帕夏”政权，以乌鲁木齐为中心的“妥明政权”，以及以喀什噶尔为中心的金相印（回族）－思的克（吉尔吉斯族）政权。金相印－思的克匪帮久攻清军据守的疏勒城不克，于是向邻近的浩罕汗国求援，浩罕摄政王命令颇有权势的军官——也是其首要竞争对手——阿古柏护送布素鲁克（前新疆叛乱头目张格尔之子）前往喀什噶尔为王。

阿古柏善于使弄权术，在进入喀什噶尔后便把思的克赶走，夺取了统治权，接着又攻占了英吉沙、叶尔羌、以及热西了和卓控制的乌什、阿克苏、库车、库尔勒等地，对各地的满汉居民实行灭种屠杀。在这之后，阿古柏成立了“哲德沙尔汗国”（Yatta Shahar，意为七城之国），自立为“巴达吾来特汗”（也写作“毕调勒特汗”，意为洪福汗）。之后他又攻占了妥明控制的乌鲁木齐、吐鲁番、玛纳斯等地，之后俨然以全新疆统治者自居。

此时清廷在签订《塔城议定书》时的担心变成了现实：俄国果真趁火打劫，于1871年借口“帮助中国人在被夺去的帝国西部各省恢复其政权”，出兵占领了以伊犁为中心的特克斯河流域地区。俄国人为此次出兵找了几条冠冕堂皇的政治理由，分别是：俄国商人经准噶利亚（北疆）和“东土耳其斯坦”（南疆）前往中国内地的商路被破坏；在“东干人”（回族武装）攻克乌里雅苏台并屠城期间，西蒙古地区的俄国商业遭到严重损失；新疆地区的情况日益复杂，严重影响俄国的政治和经济利益；清政府在受到太平天国起义的严重影响之后尚未恢复元气，因而不能从中部各省派出军队、穿过缺水无人的草原到遥远的乌鲁木齐、伊犁和喀什噶尔等地去镇压新疆的起义、恢复秩序。因此沙皇政府决定给予清帝国政府“援助”，同时预定“当清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恢复秩序后把俄国军队撤出”。


十九世纪末的吉林城大东门（朝阳门），城墙十分低矮。当时门外即为通往黑龙江的官道

在占领伊犁地区后，俄国外交大臣戈尔恰科夫特地给驻北京公使弗兰加里（倭良嘎哩）发去训令，要他向清政府此地无银三百两地说明俄国“在任何情况下都无意把伊犁地区并入帝国版图……对我们来说重要的是我国邻邦的统治者能给我们提供物质上和道义上的保证，使我国边境安宁，并促进我国贸易的自由发展”。但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俄国及苏联历史学家都将伊犁地区干脆地视为已经被并入俄国的领土（笔者手中有一本苏联测绘总局绘制、并在中苏蜜月时期翻译为中文的苏联历史地图集，赫然将伊犁地区标注为“1871—1881年属俄国”的、像阿拉斯加一样后来“脱离俄国的地区”）。俄国占领军像在本国一样在伊犁地区进行测绘，设置行政机构，征收赋税，开发矿产，并且派去医生、工程师、教师等人，试图赢得当地居民的好感、促使他们接受俄国的文化，以令其最终选择“自愿”并入俄国。

对于这一点，在中亚和新疆地区游历的俄国探险家和间谍普尔热瓦尔斯基曾经特别不知羞耻地吹嘘说：“游牧的蒙古人、东干人、中国的伊斯兰教徒和中属土耳其斯坦的臣民，特别是后者，都或多或少地想做白人沙皇的臣民。在亚洲群众看来，白人沙皇的名字和达赖喇嘛的名字一样，似乎为一种神秘力量的光环所环绕着（当时已臣属俄国的信奉喇嘛教的卡尔梅克蒙古人和布里亚特蒙古人甚至将沙皇奉为如来佛祖的化身），这些可怜的亚洲人殷切盼望着俄国势力向前推进，他们坚信它到来后就会有一个比较幸福的时代，他们自己的安全稳定的生活也就开始了。”

当时虽然陕、甘动乱已被清军平息，但清朝在新疆地区仅据守哈密－巴里坤－吉木萨尔一线，中国西北边疆危机万分严重。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东南沿海防务又告吃紧，因此在清廷内部爆发了一场“塞防派”与“海防派”之争。海防派首领李鸿章主张放弃新疆，将经费用于充实海防，而以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首的塞防派则主张两防并重，应及时西征收复新疆。经过一年多的周密部署和后勤准备，左宗棠在1876年夏天开始向北疆进军，攻打“盘踞在乌鲁木齐、玛纳斯等地的白彦虎……在当地各族人民支援下，一举击溃白彦虎、马人得等匪帮，收复北疆”（《十九世纪末英俄争霸中国史》45页），此后这位“穆罕默德·阿尤布”（白彦虎的经名）率众南下投奔阿古柏。

1877年四月，在左宗棠的指挥下，已经收复北疆的清军摧枯拉朽，发动了强大攻势，一举攻克吐鲁番、托克逊等城市。阿古柏匪军土崩瓦解，主力被歼，内部矛盾重重，众叛亲离。阿古柏陷入绝境，服毒自杀。当年十月，清军向南疆胜利进军，到翌年一月已经收复了除伊犁地区外的新疆全部领土。

在伪“哲德沙尔汗国”分裂政权覆灭前夕，阿古柏之子伯克胡里与白彦虎“胁迫五千多群众，掳掠大批牲畜，分道逃入俄国。沙俄包藏祸心，予以收留，拒绝清政府引渡有关罪犯的要求，包庇豢养这批匪徒，不断侵扰我边疆……清军攻克库车后，白彦虎逃到

拜城，用武力胁迫各族群众跟他逃窜，各族人民坚决不从……攻克阿克苏后，柯尔克孜族的起义军主动配合清军追歼敌人。白彦虎匪帮与阿古柏残部溃逃时，所经之处，各族人民都纷起打击过街老鼠似的匪军。”（杨遵道《十九世纪末英俄争霸中国史》46－47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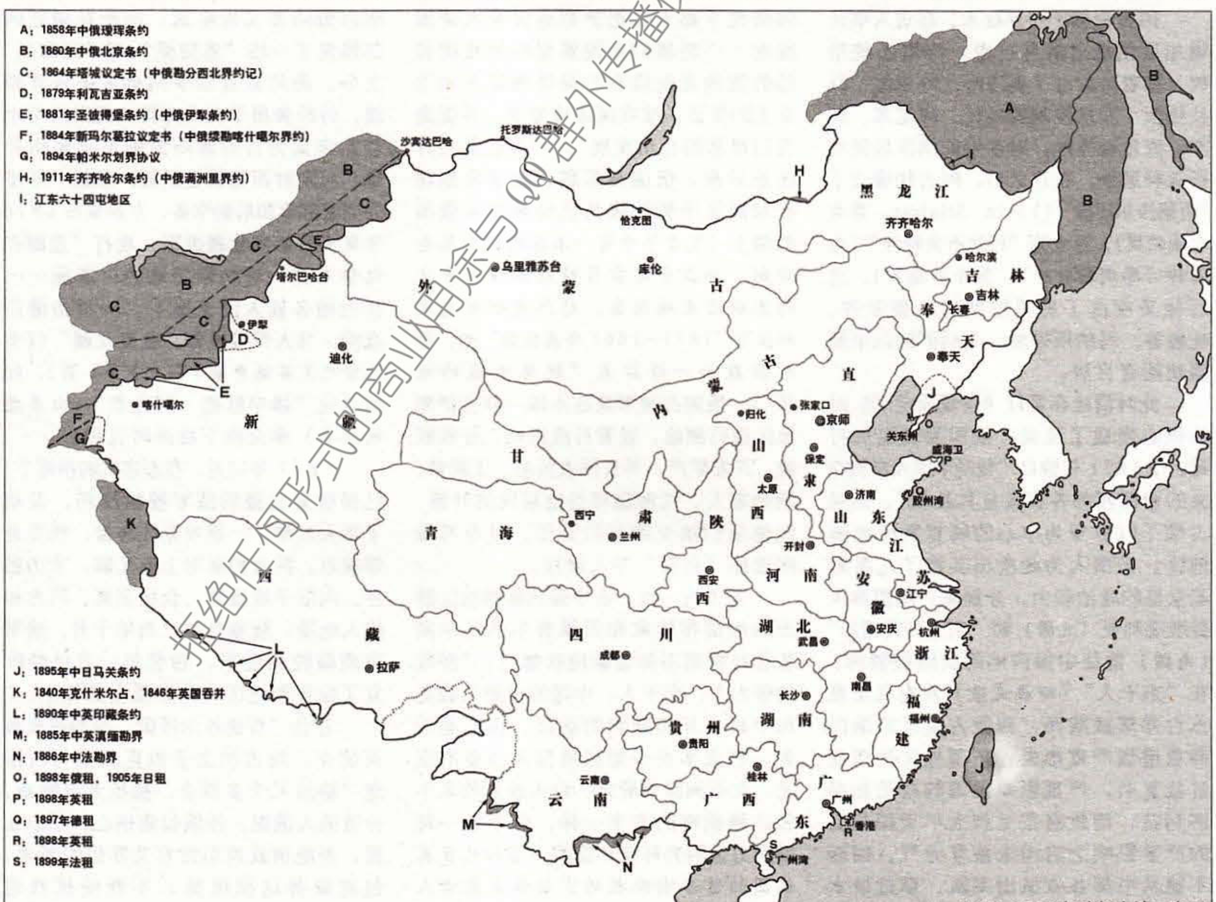
镇压阿古柏分裂势力后，摆在清政府面前的最后一项重大任务是收复伊犁问题。1878年六月，清政府派特别无能的官僚崇厚前往圣彼得堡谈判收回伊犁问题。与此同时，沙俄（不出所料地）在伊犁地区煽动了一出“要求并入俄国”的丑剧，声称“伊犁地方的维吾尔人和东干人得知这里即将归还中国，就给土耳其斯坦的沙皇总督当局送请愿书，申诉中国官吏的残酷剥削和暴行，并要求永远归附俄国”云云。在沙俄的愚弄和胁迫下，崇厚于当年9月在克里米亚雅尔塔的沙皇行宫利瓦吉亚宫（二战时是雅尔塔会议召开地）签署了共有十八条的《利瓦吉亚条约》，即《交收伊犁条约》，割让伊犁城以西所有地区和特克斯河谷，穿过天山的穆扎尔特山口也割让给俄国，致使伊犁城险要尽失，北、西、南三面邻敌。条约还规定中国向俄国赔款500万银卢布，清帝国对伊犁居民实行全体大赦，以及俄国商人享有贸易特权等条款。

《利瓦吉亚条约》的第十八条规定条约要由两国皇帝批准，可是清朝同治帝并未批准这部丧权辱国的条约。当时清朝朝野群情汹汹，无不以同俄国一战为快。许多官员士大夫上疏要求严惩崇厚，张之洞要求将崇厚明正典刑，主战派领导人左宗棠也极力反对批准条约，要求同俄国开战，只有李鸿章支持和平解决。在这种形势下，清廷在1880年宣布将崇厚革职、并判处斩监候，另派驻英法公使曾纪泽侯爵前往圣彼得堡，与俄国重新进行谈判。与此同时，左宗棠在新疆积极备战，并将行营移到哈密，准备回击俄国的侵略。

与此同时，各国驻华公使也注意到中国民心向战已臻于无以复加的地步，中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德国公使要求向华南派遣舰队以保护德侨，英国公使威妥玛也要求英国海军在上海附近增加军舰，以防发生排外危机。英国担心清帝国在中俄战争中失败、失去新疆、导致俄国与印度直接接壤，因此向中国方面施加压力，此外法国和美国也不希望中俄开战。而俄国刚刚经历完俄土战争，国内财政千疮百孔，急需恢复精力，再与清国打一仗也实在是力不从心。只有德国唯恐天下不乱，希望把俄国的侵略矛头引向东方，以减轻德国在欧洲的压力、并趁机在中国沿海割占港口和海军基地。

在这种大背景下，曾纪泽在圣彼得堡进行了七个月艰苦的谈判。中方坚持归还整个伊犁地方，俄国则援引《利瓦吉亚条约》要求做一些领土改动。最后双方都做出了妥协：俄国归还整个特克斯河流域地区，中国则同意在斋桑湖和额尔齐斯河地区改动几段边界作为抵偿。1881年2月12日，双方签订了《圣彼得堡条约》，即《中俄伊犁条约》和《陆路通商章程》。中国收回了伊犁以西九城，但支付给俄国的赔款数额增加到900万银卢布（约500万两白银），同时失去了霍尔果斯河以西、总面积多达7万平方公里的大片领土。

伊犁危机给中俄关系带来了不可避



1840–1900年清朝失地示意图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

免的恶劣和后果，中俄两国关系在签订《圣彼得堡条约》之后的十多年里一直非常紧张。另一方面，研究中国国际关系的一些西方学者认为“曾纪泽侯爵签订的条约使中国开始妄自尊大。中国人对俄国的让步感到惊讶，他们把俄国人出于私心和深谋远虑而采取的步骤看成是中国的威吓的结果；他们从惊慌失措一下子变成了蛮横自负。”对于清帝国在伊犁事件中取得的可怜巴巴的“外交胜利”做出的比较保守的评价则认为，“中国第一次了解到，外交必须以武力为后盾……中国毫不迟疑地利用了这种外交方式。中国在左宗棠将军的军队重新征服中属东土耳其斯坦（新疆）后，紧跟着就发动了一场大规模的政治和外交攻势，目的在于恢复它在东京（越南北部）、安南（越南中部）、缅甸、西藏、朝鲜和满洲诸地衰落不振的威望和影响。”

1882年七月，朝鲜发生壬午兵变，十三个月没有领到饷米的京城五营士兵冲入昌德宫中杀死外戚，并且捣毁日本公使馆，杀死朝鲜新军中的日本教官。长年在朝鲜国王李熙背后遥控朝政的强权女人闵妃化妆成宫女逃往外地。日本公使花房义质和随员也逃往汉城，由英国军舰搭救回国。随后闵妃和花房公使分别请求清朝和日本出兵朝鲜，直隶总督张树声和李鸿章派遣吴长庆率领军队在朝鲜南阳登陆，随后赶到汉城，平息了兵变，并且将在幕后煽动此次内乱的李熙生父大院君擒拿至中国，关押在保定的直隶总督衙门内。此后在清朝洋务派的协助下，朝鲜开始了近代化改革，设立内外衙门，由清朝官员协助朝鲜管理外交通商。清帝国接管了朝鲜海关，要求朝鲜不得向清国以外的其他国家贷款，同时还帮助朝鲜代购洋枪洋炮。两千名中国军队驻扎在朝鲜，朝鲜还在新式军队中任用了中国教官。此外清帝国还与朝鲜签订一系列通商条约，在镇南浦（今朝鲜南浦）、济物浦（韩国仁川）、元山、釜山等港口城市设立了清国租界。

中国的果断干涉结束了壬午兵变导致的朝日冲突，被清廷中的主战派高级官员看作又一场重大的外交胜利。在主战派官员的影响下，1882－1884年的清帝国外交路线呈现出自从康熙大帝和乾隆皇帝之后从未有过的鹰派倾向，在1883年的中日琉球争端中，这些鹰派曾打算让中国投入到对日战争中去，在1883年和1884年又因为安南问题同法国开了战。虽然中国南洋水师覆灭、法国取得了制海权，但中国陆军在谅山取得的胜利却增强了中国的信心。

当时俄国军队仍然占领着应当划归中国的伊犁西部地区，乌苏里地区南部存在未划定的中俄边界，俄国在松花江的航行权和其他许多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容易成为引起中俄东方战争的原因，如果中国的主战派真正想要同俄国开战的话。虽然作为主和派首领的李鸿章设法把朝野当中绝大多数要求作战的呼声都扭转成了要求备战的呼声，但是很多俄国人在1884年前后仍然觉得中俄战争不可避免。在新疆地区，左宗棠将军统帅的中国军队多达十八万人，其中四万人配备着现代化武器，但俄国总参谋部认为来自中国的最危险的主要攻击将是“从满洲进攻阿穆尔河左岸地区”。在那里，俄国的交通线紧邻中国边境达两千公里以上，人烟稀少，防御力量不足，战略地位很弱，同中国的进攻路线形成直角，被认为是“绝对无法防卫”的。俄国总参谋部认为“要防卫沿阿穆尔河的领土，唯一的办法是进攻满洲”。

在俄国总参谋部看来，中国势力在朝鲜半岛以及满洲地区的发展加重了对远东的“威胁”。三个世纪以来，满洲地区一直是禁止汉人移民的。十九世纪中叶以后，许多躲避旱灾和饥荒的难民从直隶和山东进入满洲地区，但他们大多数定居在南满，对俄国的远东领土“没有什么威胁”。实际上随着俄国南侵活动的加剧，清朝的统治阶层本身也逐渐意识到封禁政策的危害。为了缓解东北边疆危机，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的1861年，清朝政府开放了边禁，默许移民出关屯垦。咸丰十一年（1861年）向躲避太平天国之乱的中部各省汉人难民开放了吉林围场、阿勒楚喀围场、大凌河牧场等皇家禁地。到光绪年间，严禁汉族妇女前往长城以外和柳条边以外的禁令也被废除了。

到光绪年间，随着内忧外患加剧，清朝加快了向关外“移民实边”的过程，并且将这一政策推广到内蒙古、外蒙古、新疆和台湾等地。光绪八年（1882年），吉林将军辖区开始招垦，设立了珲春招垦总局，并且由吴大澄（当时任左副都御史、会办北洋事宜大臣）出任“宁古塔、三姓、珲春事宜督办”，从山东和辽南地区大量招揽汉人农民前来垦殖。这些移民十户编为一棚，十棚编为一村。招垦措施实行数年后，就新增人口19940人，开垦官地、旗地11740顷，在几乎被朝鲜移民完全淹没的珲春地区出现了不少新的汉人村屯和小城镇。在1890年，清政府还决定暂缓修建卢沟桥至汉口的卢汉铁路（今天的京广线北段），而优先修建京奉铁路，以满足向东北地区移民和东北调兵边备的需要。按照英国工程师的规划，这条铁路将从北京出发，经过山海关和锦州，在新民厅越过辽河抵达奉天，然后向东北方向继续延伸，经宁古塔直抵珲春垦殖区。为了满足从海路向东北移民的需要，这条铁路还将修建一条从奉天通往位于辽河口的牛庄港（营口）的支线。

光绪年间的东北移民实边政策收效十分明显。有两个地



清末的盛京中街街景，已相当繁华



清末的盛京市民

区受到特别重视，一是前面提到的位于宁古塔城和珲春城之间的珲春地区，它针对的是南乌苏里的俄国移民区和越过图们江擅自前往珲春定居的朝鲜流民；另一个重点移民区在齐齐哈尔以北，位于齐齐哈尔经墨尔根（嫩江）和瑷珲到达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的大路上，它是由黑龙江将军经管的。尽管俄国情报人员起初认为后一项屯垦工作搞得很差、效果也不大，但是黑龙江的人口却从1887年的40.7万猛增为1895年的150万，在八年间增加了将近三倍。到1908年，即奉天、吉林、黑龙江三地撤销将军辖区、仿照内地设省的次年，东北三省的总人口已经达到了1583万。这一时期前往东北地区的中国移民数量比前往远东地区的俄国移民多30倍，而前者定居居民的数量是后者的15倍。前往东北的绝大多数移民来自山东和直隶两省，除了经商务农外，还有些人利用《北京条约》留给中国的图们江出海权"跑崴子"，即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由于发现当地的金角湾里盛产海参，因此中国劳工称其为海参崴）和波谢特（中国劳工称为摩阔崴）捕鱼、采海参、晒盐。


居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中国居民建立的中式庙宇——关帝庙，1938年在苏联当局的消灭华人行动中被拆毁。

Китайская Пагода - Chinesischer Götzen Altar
Владивостокъ - Wladiwostok

除了对东北地区实行移民实边政策外，清帝国还大力加强了那里的军事戒备水平。1881年以后，驻在满洲地区的清朝军队不断增加，并且换上了现代化武器。1885年，满洲军队全部进行了重新装备和改编，平时兵力达八万五千人，其中五万人装备了现代化的来复枪。除此以外，吴大澄还在1883年设立了吉林机械局，这是满洲地区第一家现代化军事工业企业，有机器厂、机器西厂、翻砂厂、熟铁厂、木工厂、强水厂、拉火厂、电气房、库房、画图房、火药厂等建筑，配有机器165件，可以生产克虏伯九磅炮和十二磅炮的炮弹，毛瑟、哈奇开斯、温彻斯特等各种型号的步枪子弹，又仿照克虏伯火炮设计制造了独闩子母炮（口径1.5英寸，射程1000码，可以装在轮船或炮架车上），还可以建造内河小轮船。吉林机械局还设立了培养技术人员的"养正书院"。紧接着又设立了电报局，1886年电报线由奉天延伸到吉林，并进而延伸至宁古塔和珲春，翌年又从吉林架设到瑷珲。


今日的吉林机器局旧址，相当一部分已经被开发商拆除，用来建房出售



在俄国远东当局看来，1886年"热尔图加共和国"的覆灭证明了中国在东北地区势力的增强。当年年初，中国黑龙江地方当局在给这个"阿穆尔的加利福尼亚"居民发出最后通牒后，于隆冬季节在瑷珲集结军队，进攻了热尔图加河谷的营地，当地麇集的非法淘金者被驱散，营地被烧成了平地。中国军队随后踏着冰封的黑龙江河面进入俄国境内，继续追击逃散的"热尔图加"居民，一直追到伊格纳希那和阿马扎尔的俄国哥萨克移民区，在那里消灭了"热尔图加共和国"最后残余的不法之徒。与此同时，其他中国军队还破坏了在萨波扎河和阿拉干河上的新的非法采金营地。

在这一段积极活动的时期里，清帝国还开始设法在朝鲜东海岸寻找一个新的立足点。1885年，中国政府要求俄国归还滨海边疆区位于波谢特湾周围的一部分领土，这一地区对于珲春和宁古塔一带的新垦殖区来说可以成为一个理想的出海口。在重新获取波谢特湾领土的活动失败后，清帝国又要求朝鲜把造山湾（俄国人称为加什克维奇湾）和沿图们江右岸的一块狭长领土割让给中国，以作为珲春地区通往日本海的出海口，甚至打算占领朝鲜东海岸的永兴湾（位于通商口岸元山的北边，俄国人称为拉扎列夫港）。不过，由于后来国际和国内的复杂原因，清帝国对朝鲜的领土要求都搁置了下来。

在1886年，朝鲜重臣闵泳翊密告袁世凯，声称国王高宗李熙密令朝鲜内务总理大臣沈舜泽与俄国驻朝鲜公使卡尔·韦伯签署密约，要求俄国予以保护，俄国兵舰将至朝鲜助威等等。袁世凯入宫晋见高宗，称俄国为虎狼之国，联俄绝对不可行，同时密电国内，准备在必要时出兵朝鲜，废黜高宗、另立新王。清政府遂派丁汝昌率北洋舰队、吴安康率南洋舰队赴永兴湾巡防示威，并保护当地清朝租界权益。当时在清朝国内即有官员要求立即敦促朝鲜割让永兴湾，但是李鸿章顾忌到俄国人对永兴湾的觊觎之心，对其进行了压制。在永兴湾巡防之后，丁汝昌又奉命率舰队护送吴大澄将军前往符

拉迪沃斯托克与俄国人进行勘界谈判[注]。在舰队返程的时候，清廷命令丁汝昌率定远、镇远、济远、威远四艘新锐巨舰访问日本长崎港（在这背后也有警告日本不要对朝鲜有所动作的意思）。

1881－1886年中国在毗邻属国的外交和政治活动或多或少影响到了在这之后的俄国远东政策。在俄国人看来，其远东领土的根本弱点——漫长的边境上人烟稀少，以及交通线不足——仍然是致命弱点。1886年俄国在远东的驻军，除了带有军垦性质的哥萨克军外，只有一万五千人，其中一万一千人驻扎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周围。因为从西伯利亚抽不出军队，所以最近的增援基地是七千公里之外的俄国欧洲部分。根据阿穆尔军区官员的计算，从俄国调兵到滨海边疆区需要十八个月的旅次行军时间。俄国在远东的海军对中国并不是十分重要的威胁，因为中国在成立了北洋舰队之后，它的海军在远东海面上是最大的。在1880年伊犁危机期间俄国海军上将列索夫斯基针对中国的远东巡航失败之后，中国人不怕海军示威了。

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期，中国移民的大量涌入给远东地区的俄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俄国总参谋部在其编著的《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资料汇编》中这样描述：“……北京的大臣们最初得到真相是在1880年，当时直隶总督李鸿章关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事务，并派出使臣（吴大澄和李金墉）调查国家资源。令使臣们惊异的是，在想象中是荒僻猎场的地方，他们发现了大量储藏的粮食以及汉人与满人的繁荣村庄。由于汉族移民不断的大量涌来，满族人都被汉族人同化得忘掉了本民族的语言，而且由早先威严的军人变成了和平的村民……在阿穆尔州的重要行政中心（指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城）近旁竟有14000多名不属我们管辖的居民，其中有满人4500名、达斡尔人约1000名、汉人9000多名（据阿穆尔州总督谢尼也夫少将称，目前至少增加了一倍）……为了更顺利地解决这些在各方面对我们都有害、因而是不受欢迎的居民的问题，需要经费。我认为最有利的是在立即着手将他们迁移出境的同时，向他们征收人头税和土地税……似乎必须即刻在阿穆尔州设立边界官……使他们能够毫不困难地、及时地实施既定计划，以期今后通过逐渐向满人赎买土地并使他迁移出境的办法，，容易地解脱这个令人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菜市场，挑担买菜者多为中国山东人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华人聚居区，1938年武汉会战后斯大林认为中国将亡，在远东展开了排华行动，海参崴华人区与其居民一道被彻底“清除”

头痛的问题。否则，随着行政机关无所作为的间的延长，这个问题势必将越来越麻烦”（《亚洲地理、地形和统计资料汇编》第58卷，1894年圣彼得堡出版，33－39页）

俄国采取了很多措施来补救它在远东的这种软弱地位，包括鼓励本国移民，利用人头税限制并驱逐中国和朝鲜移民——一些中国移民对此进行了反抗，破坏了乌苏里斯克周围若干孤立的俄国村庄，然后撤回了中国国内——以及把外贝加尔、阿穆尔、萨哈林岛和滨海边疆区等地从伊尔库茨克总督辖区划出、单独成立阿穆尔总督辖区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项措施是决定修建一条把俄国的远东和欧洲部分连接起来的铁路，即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当时在俄国国内也有不少

【注】在这次边界谈判中，由吴大澄主持，重新勘定了珲春地区的中俄边界。除此之外，还勘察了从图们江源头与鸭绿江源头之间的中朝陆地边界。当时确定以石乙水为图们江江源，长白山天池的全部湖面属于中国；而朝鲜方面的官员主张以石乙水北边的红土水为边界。朝鲜国王李熙在1885年给清朝礼部的奏文中甚至将中朝界河图们江称作“豆满江”，而妄指中国境内的海兰江为“土门江”。吴大澄在1886–1887年的这次考察中率领中朝两国官员重新勘察了图们江与鸭绿江之间的边界不明确地区，最终确定了中朝边界图们江段应当取石乙水为江源，并且在中朝边界长白山南麓地段树立了十座界碑，分别以“华夏金汤固、山河砺带长”命名，由吴大澄亲笔书写了碑名。这十座界碑后来在日据时期都被朝鲜移民毁坏。
关于天池段边界的走向问题，淮军将领聂士成1894年在其日记《东游纪程》中记录道：“早四点钟向南稍西，行六十三里至输城镇，山道尚平坦，民居较多，有馆驿，日久荒废。又西北行里许，见高山矗立云汉，雪积山头，因以白头名之……及登巅，四围微凸，中洼如仰瓮，口向上，外白内赤，四壁侧立若涂丹殖。折北面之水，瀑出为松花、图们二江之源。从岗脊而下，向南三四里即鸭绿江之源……康熙五十年，乌喇总管（注：穆克登）查边至此，西鸭绿，东图们，又于山半分水岭上立碑，为朝鲜永远定界。又行六十二里至镜城……”（《东游纪程》光绪二十年正月二十九日条，中华书局2007年版）。查1953年中方出版的《朝鲜半岛地形大挂图》，名为“分水岭”之处以及中朝国界均位于天池以南，石乙水为中朝界河。这在1909年中日两国签订的《图们江中韩界务条款》（当时韩国外交权由日本把持）的第一条中也有明文规定：“完全承认间岛为中国领土，以图们江为国境，在江源地方以界碑为基点，以石乙水为分界线”。根据上述条约规定和我方历史资料，长白山和天池都应当归属于我国，但朝鲜方面持有相反看法。而日本朝鲜总督府在1945年以前出版的地图，大都把中朝国界画在天池上，同《间岛条约》并不相符。
抗日战争时，金日成同志率领的朝鲜人民抗日游击队在长白山一带坚持抗日战斗，所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朝鲜人民对这一地区产生了更深厚的感情，朝方把长白山誉为朝鲜人民革命的策源地，其国歌、教科书、电影、戏剧和诗画中都或明或暗地强调长白山和天池是朝鲜领土。对我国出版的地图把长白山、天池画在中国境内一事，朝方自1954年起曾几次向中方提出不同意见，我外交部答复称，这一地带的国界未经两国正式勘定，有待两国政府在适当时机协商解决。1962年10月12日，为了全面解决中朝两国间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边界问题，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中朝两国在平壤签订了新的边界条约，决定中朝边界“从天池以东的2628高地和2680高地间鞍部的大致中心点起……以直线到图们江上游支流红土水和北面一支流的汇合处（1283高地以北），从此界线即顺红土水的水流中心线而下到红土水和弱流河汇合处”（《中华人民共和国条约集》第十一集，196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条法司编，人民出版社1963年9月出版）。根据这一原则确定的国界以红土水为界河，并从东北至西南自天池中央穿过，天池以南的神武城、分水岭等居民点都归入朝鲜。这既符合中朝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助于巩固和加强两国间的兄弟般的友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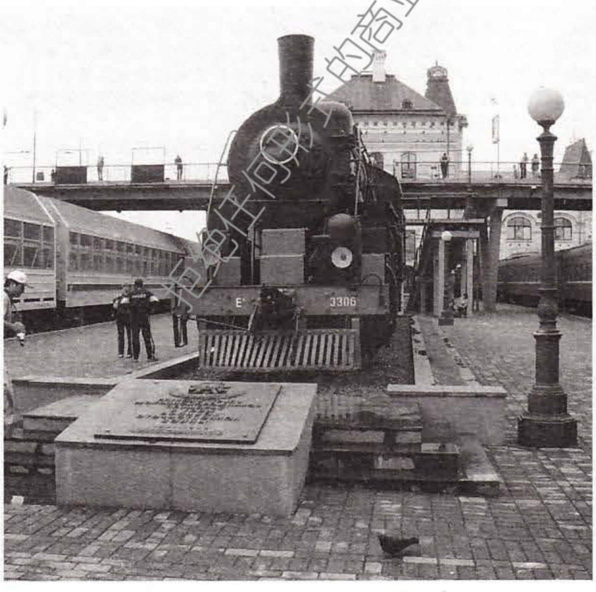
反对修建这条铁路的呼声，例如掌握帝国财政大权的前后两任财政大臣尼·赫·崩格和伊·阿·维什涅格拉茨基，他们认为这条长达数千俄里的铁路于国无益，维什涅格拉茨基还坚持主张这条铁路如果一定要修建的话也要从西头修起，因为倘若从东头开始修的话，那么随着铁路线自东向西的延伸，美国货一定会潮涌而入。

但是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给俄国人留下了不堪回首的记忆，俄国不希望符拉迪沃斯托克再遭到塞瓦斯托波尔军港那样的命运。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证明了铁路对于向战区快速调兵遣将是何等重要。阿穆尔总督科尔夫将军和伊尔库茨克总督伊格纳季耶夫中将反复向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强调了修建这样一条铁路的要求。不过，鉴于这一工程需要大量金钱，而俄国当时正处于一次周期性财政危机当中，因此两人建议先修建两条支线，一条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乌苏里江，另一条从黑龙江上游到鄂毕河。他们说，有了这两条铁路，货物和军队从欧洲俄国运到远东所需的时间就不是一年半或两年，而是一个半月到两个月了。

1886年6月19日，亚历山大三世发布了同意修建西伯利亚铁路的敕令。在其12年的预计工期里，俄国政府预期每年要投入3000万卢布的高额预算，总预算为3.5亿卢布（*实际上在1891年到1901年的10年间耗费了14.6亿卢布*）。为了完全控制铁路的所有权和使用权，俄国政府断然拒绝本国和外国的私人投资，这笔巨款完全由沙俄的国库承担。

1891年，亚历山大三世委派23岁的皇储、西伯利亚铁路建设委员会委员长尼古拉·亚历山德罗维奇（*后来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率领7艘强大的战舰，绕道半个地球前往远东主持这个仪式。1891年3月31日上午10时，尼古拉在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亲自倒空了头一辆装满石砟的手推车，宣告西伯利亚大铁路乌苏里区段的开工。与此同时，从兹拉托乌斯克至车里雅宾斯克的西伯利亚铁路区段也开始动工。3月29日，亚历山大三世发布特别谕令，正式宣布开始修筑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

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火车站的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终点标志



西人描绘的甲午战争前夕驻扎在朝鲜的清军，最左侧为朝鲜新军教官



甲午战争与干涉还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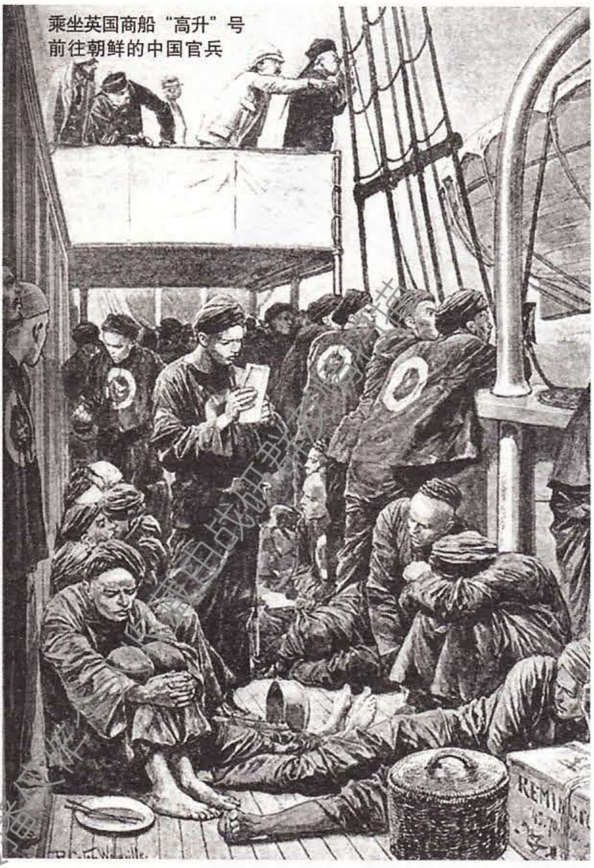
1884年12月5日和6日，汉城发生了一场由朝鲜亲日派官员导演的政变。当时朝鲜国内的年轻士族金玉均（*福泽谕吉的弟子*）、鱼允中、洪英植、朴泳孝等人主张终结与清朝的宗藩关系，借助日本之力实现朝鲜的开化改革，被称为“开化党”。他们接受日本的资助，提出了“打倒清国”的口号，企图借助日军兵力发动政变，实施夺权目标。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后，驻扎朝鲜的一部分清军撤回国内，日本以及朝鲜开化派视为举事良机，开始蠢蠢欲动。当年12月4日晚上，在汉城邮政总局的落成庆典宴会上，开化党举火焚烧隔壁房屋，砍伤前去巡视的禁卫大将闵泳翊。金玉均等人前往朝鲜国王李熙居住的昌德宫，谎称清军作乱，将其劫往供奉历代先王画像的景佑宫。接着又强迫国王写诏书召大臣前往景佑宫护驾，躲在宫门内的开化党将闻讯前来的守旧派大臣一一砍杀。第二天宣告成立“新政府”，提出内政改革方案，同时宣布断绝与清朝的宗藩关系，朝鲜独立。

朝鲜开化派本来没有群众基础，如今又与日本兵勾结，劫持国王，杀害大臣，所以社会上流言四起，说王妃已被开化派杀害，国王生死未卜，开化派将另立新君等等。人民不满开化派作乱犯上的作为，纷纷聚集起来，要杀尽倭奴，解救国王。12月6日，金允植、南延哲等被列入新政府名单的旧大臣致书清营，痛哭乞师。清军将领吴兆有、袁世凯带兵入宫，与日军在宫内展开战斗。清军得到朝鲜士兵的支持，日军抵挡不住，竹添进一郎公使被迫焚烧公使馆，再次出逃仁川。洪英植将高宗挟持到城北关帝庙，深夜才被清军找到，护送回宫，洪英植被愤怒的朝鲜士兵杀死。金玉均、朴泳孝等人随日本人逃窜到仁川，随后亡命日本。1885年4月18日，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就朝鲜善后事宜达成的协议，规定中日双方同时撤出在朝鲜兵力，聘请第三国人员协助朝鲜的军事改革，今后两国若要出兵朝鲜时须预先知会另一国。

这场被称为“甲申政变”的政治斗争几乎导致中日两国直接兵戎相见，之后签订的天津条约只是延缓了两国在朝鲜的利害冲突。由于条约中规定了双方在通知对方之前都绝不对朝鲜采取任何直接干涉措施，因此此后中日两国（*加上俄国为第三方*）靠隐蔽的外交手段和不受限制的经济手段来在朝鲜扩展己方的利益。对于朝鲜来说，这种情况便于它借口“俄国搞阴谋”而获得中国的支持、或者借口“中国搞阴谋”获得俄国的支持；对于清国来说，这种情况便于它提醒朝鲜

注意俄国的领土野心，以便使中国在朝鲜获得更有力的影响，或者把英国卷入朝鲜事务，作为牵制俄日的平衡势力。对于日本来说，它可以利用中国和英国对俄国扩张到朝鲜的担心，来为它自己在朝鲜谋求利益。

在《天津条约》之后相对平静的一段时间里，中日双方都尽量在表面上保持友好关系，与此同时日本迅速培植在朝鲜的政治势力。虽然在这一时期中国在朝鲜的势力占了上风，但日本却密切地注视这这种优势而按兵不动，等待着适当的时机。1893年，朝鲜爆发东学党动乱，使远东突然进入一段激烈的国际角逐的新时期，也使日本等来了干涉朝鲜事务的时机。东学党的纲领曾经多次改变，最终确定的目标是赶走在朝鲜的西方人势力；但纲领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举行反对反动的朝鲜政府的暴动，和采取反对封建地主的措施。这次动乱只是引起了轻微的国际干涉，虽然中国、日本、美国、英国和德国的军舰都已经聚集在仁川港，但在外国军队尚未来得及登陆之前，东学党就被镇压下去了。


乘坐英国商船“高升”号前往朝鲜的中国官兵

可是到了1894年3月，东学党用日本人提供的武器武装起来，并且得到日本浪人的支持，又在朝鲜南部各道卷土重来。当年5月，他们打败了前去镇压的两湖招讨使洪启薰，并在6月危及首都。洪启薰上书朝廷，请求向外国借兵，英国、法国、日本和中国的军舰又聚集在仁川，即使俄国也姗姗来迟地派去一艘1230吨的“朝鲜人”号炮舰（有时也被列为三等巡洋舰）。

6月2日，朝鲜国王正式请求中国出兵干涉。6月7日，北京总理衙门通知日本驻北京代办小村，说中国要派军队到朝鲜去“恢复属国的和平”。于是日本通知中国说它也要派军队去朝鲜，并且补充说日本从来没有承认朝鲜是中华帝国的一个属国。于是中日两国都根据1885年的天津条约开始向朝鲜派遣军队。清朝派出的军队在朝鲜南部、接近叛乱中心的牙山登陆，而日本却把它数量上占优势的军队派到朝鲜首都附近。但是，在登陆部队数量还不多的时候，朝鲜政府就已经控制了变乱，尽管如此，中日两国还是继续往朝鲜增派军队。朝鲜朝廷此后要求日本和中国把它们的军队撤出朝鲜领土，而日本却在6月22日提出了一项新方案，指出在朝鲜对它的内政进行改革以前，日本军队将不撤退。根据中国政府通报给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的正式声明的说法，日本人提出了几项建议，要求日本和中国同样获得对朝鲜政府的控制权，但中国方面拒绝了这一要求，并且在日本人撤走他们的军队之前拒绝谈判。

就在列强试图调停中日两国争端时，日本驻汉城公使大鸟在7月19日向朝鲜政府提出最后通牒，包括把中国军队逐出牙山，废除所有中朝条约等等。朝鲜的答复在规定的三日期限内送达日方，但答复不够明确。7月23日，日本军队开进汉城，并猛攻王宫，监禁国王。亲日的大院君（国王生父）被日军挟持，强迫其组成“新政府”。大院君以国王的名义废除了所有中朝条约，并“请求”日本人把中国军队逐出牙山。李鸿章在临阵磨枪地准备了一番后，从天津经海路向朝鲜派兵增援，但这些援军被东乡平八郎指挥的快速巡洋舰队拦截并击溃了，租用的英国运输船“高升”号也被击沉，死亡惨重。


俄国海军“朝鲜人”号炮舰（Korietz），1886年由瑞典建造，排水量1334吨，2门203mm炮、1门152mm炮、4门9磅炮、4门37mm炮和1具鱼雷发射管，航速13.5节。1904年在仁川海战中炸毁

8月1日，日本宣布和中国处于战争状态，于是中国也正式宣战。李鸿章对此毫无准备，惊慌失措，他再次请求国际调解，并建议中、日、英、法、俄、德、意等国在天津或北京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朝鲜的改革问题。俄国表示它将和英国一起行动（条件是俄国占领朝鲜东海岸的冈察洛夫岛，即马养岛），法国则撒手不管。

到1894年9月，战争的趋势已经确定。中国陆军于9月15日在平壤被打败，而中国唯一的一支精锐舰队——北洋海军，也于9月17日在鸭绿江口的海战



清军将领聂士成（1836—1900），少年时参加淮军，平定太平军、捻军有功，获“巴图鲁”封号。1884年率军赴台湾基隆抗法。1893—1894年率领武备学堂学生考察东北边疆，著有《东游纪程》。甲午战争中随提督叶志超赴朝，后退守国内，在辽东大高岭击毙日将富刚三造。马关条约后任直隶提督，督办新军，提拔张作霖。1900年义和团之乱中反对愚昧排外，所率武卫军因而多受义和团攻击。当年6月击败联军，取得廊坊大捷，后母亲、妻子、女儿均被拳民绑架杀害，本人也被义和团从背后开枪击伤，当年7月在天津城西八里台中炮战死，拳民试图将其戮尸，但被联军驱散。清廷赐谥号“忠节”，并立碑表彰（1949年后平毁）。1984年和2000年天津市政府重新为其立碑立像，予以纪念

中几乎被全部歼灭，日本人赢得了黄海的控制权。10月24日，大山岩大将指挥日本第二军在辽东花园口登陆，未遇到清军一枪一炮之阻击，如入无人之室，在当天占领花园口，10月26日占领貔子窝。

当时清军主要集结在鸭绿江沿岸进行防守，计有四川提督宋庆指挥的毅军、聂士成的芦榆防军、淮军提督刘盛休的铭军、吕本元的盛军、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的镇边军、丰升阿的奉军和倭恒额的黑龙江齐字练军等等，一共有80营，兵力约2万人。这些军队由宋庆和依克唐阿两人分别统领，以九连城为中心向左右沿鸭绿江布防。10月24日夜间，山县有朋大将指挥的日本第一军在义州与虎山之间架设了两座浮桥，在次日拂晓急行军通过浮桥，开始直攻虎山。聂士成和马金叙率军奋勇抵抗，打退了日军的四次进攻。但因两面受敌，伤亡甚众。在没有援军的情况下，为了掩护大队清军后撤，聂士成、马金叙一直坚持到午后才突围到凤凰城，虎山失守。26日清晨，日军进攻九连城，宋庆感到兵力单薄，连夜撤往凤凰城。日军占领九连城，接着又占领安东，清军鸭绿江防线不到两天时间就全线崩溃了。



日本绘页，反映甲午战争中日军在九连城架设浮桥渡过鸭绿江情景



日本绘页，黄海大海战

此后日本地一军兵分两路向奉天进军，一路从凤凰城经辽阳（东路），另一路绕道岫岩、海城，出辽阳之西（西路）。东路日军先由宋庆率军防堵，他在10月30日放弃凤凰城，退守大高岭（摩天岭）。不久宋庆奉命回援旅顺，东路守军改由聂士成指挥。聂士成在当地人民的配合下，利用大高岭天险抗击日军，从正面阻止日军由东路进攻奉天。而依克唐阿率部防守赛马集，从侧面牵制凤凰城的日军，支援了大高岭的正面防御。

11月4日，从花园口南下的日本第二军开始进攻金州。驻守旅顺的总兵徐邦道自告奋勇率部前往御敌，5日与日军大战于石门子，因无后援，寡不敌众，败退旅顺。日军在11月6日占领金州，随后兵分三路进攻大连地区。大连守将赵怀业贪生怕死，未战而逃往旅顺，日军在11月9日占领了大连，随后在11月18日开始进攻旅顺军港及要塞。这个港口是北洋舰队的主要停泊和维修基地，不久前才在欧洲工程师的主持下修建完成。11月20日和21日，日军对旅顺发动总攻，当地守将徐邦道因部队伤亡过重，不得不突围北撤。22日旅顺失陷，日军在城内外屠杀了三万多中国居民。

11月19日，山县有朋指挥日本第一军自大孤山、凤凰城兵分两路进攻岫岩，守将丰升阿、聂桂林率众逃往析木城。12月12日，日军进攻析木城，丰升阿和聂桂林又奔往海城。13日，海城也被第一军攻占，辽沈告急，京师门户洞开。

在这些事态发展中，李鸿章原先设想的借助西方列强“协力合作”调停中日战争的计划越来越搞不起来了。10月6日，英国提议由英、法、德、俄、美五国进行联合干涉，并提出以朝鲜独立和中国对日赔款为基本内容的解决办法。但是美国拒绝参加；德国觉得此时再干涉也没有用了；法国则根本没有对此作出反应。而一向最关心朝鲜和“满洲问题”的俄国此时竟然陷入了惊人的外交瘫痪状态。这主要是因为亚历山大三世沙皇患肾病快要死了（他在11月1日死于克里米亚的利瓦吉亚宫，是亚历山大一世之后近一个世纪里唯一一位死于正常原因的俄国沙皇），身患重病的俄国外交大臣德·吉尔斯也快要死了，但直到临终仍不肯放出权力。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后忙得不可开交，除了随着继位而来的

一系列复杂事务外，按照他父亲的遗命，他还要在11月26日按原定计划和来自德国黑森的阿莉克丝公主举行婚礼。这种局势是不利于俄国在复杂化的远东外交舞台上上下其手的。

1895年1月，日本第三军在山东半岛登陆，并很快占领了威海卫，俘获了停泊在军港中的北洋海军残存主要军舰。与此同时，清军三万多人在海城地区展开了三次会展，但都无功而返。2月21日和27日，吴大澂（此时任湖南巡抚）、魏光焘先后率湘军进行了第四次、第五次海城会战，清军在海城地区的兵力增至六万，但日军却分兵攻击大高岭、鞍山和辽阳等地，清军中计，分兵驰援，海城之围不战自解。

此后日本第一军向西进攻，在3月7日占领了当时东北地区最大的通商口岸营口，随后在营口附近的田庄台与清军遭遇。当时日军有三个师团，近2万人和91门大炮，清军有69个营、2万余人和40门炮。双方先进行炮轰对射，随后日军趁清军炮火稍弱的时机渡过辽河，向清军阵地发起三面包抄攻击，清军阵地被攻破，田庄台失陷，辽东半岛战役结束。

在辽东战役期间，中国政府曾数次邀请其他国家进行调解或干涉，但都未成功，最后只好向日本求和。在3月19日于马关港召开的中日和谈会议上，日本要求中国赔偿“军费”库平银三亿两，割让台湾、澎湖、以及北纬四十一度线以南的辽东半岛，对日本开放苏州、杭州、沙市、重庆、顺天、湘潭、梧州七处通商口岸。3月24日，清朝谈判代表李鸿章伯爵在乘轿子前往谈判地春帆楼途中被日本“爱国愤青”小山丰太郎开枪击伤面部，伊藤博文担心李就此返回国内，导致中日和谈终结、英法俄德等国借机干涉调停，因此放低了价码，把赔款数量降至库平银二亿两，取消了顺天、湘潭和梧州三处通商口岸，同时减少了要求割让的辽东半岛的区域，将界线由北纬41度线向南缩至鸭绿江口－安平河口－凤凰城－海城－营口－辽河河口中心线的位置。



日本绘页，占领旅顺城

1895年4月17日当地时间上午11时40分，中日两国全权代表在春帆楼二楼签署了《日中媾和条约》，即《马关条约》。条约要点如下：中国承认朝鲜独立；割让辽东、台湾、澎湖三地；中国赔偿军费库平银2亿两；日中仿照欧美各国对华条约而缔结通商新约；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允许日人在中国境内通商办厂旅行。就在同一时期，在俄国新沙皇尼古拉二世即位后的第一次御前大臣会议上，大臣们讨论了远东发生的变故。一些陆海军将领提议如果日本侵犯俄国的利益，就派军队占领朝鲜东海岸的某个不冻港，例如说冈察洛夫岛（马养岛）和它对面的新浦港（谢斯塔科夫港）。如果日本霸占北直隶湾（渤海）入口处的旅顺或威海卫，则俄国应当占领满洲的一部分作为补偿。但总的来说，俄国政治家的意见是避免在西伯利亚大铁路完工之前与日本爆发直接冲突，因为直到那时俄国才有力量保卫在远东的军港和其他利益，并在太平洋事务中占据一个有利的地位。在马关会谈期间，为了对日本进行威慑，强大的俄国地中海舰队被暂时调往远东，与原远东舰队合并到一起，一共有22艘军舰和360门大炮，一时成为远东最强大的海军力量。与此同时，俄国在远东的兵力虽然只有三万人，少于日军的数量，但在六个月中可以增加到五万人，并可在开战时组成一支一万二千人的野战军，此外日本的军力也很弱，而且很分散。


甲午战争鸭绿江战役中的日军

俄国新任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当时的意见是一定要阻止日本进入满洲，甚至为此将整个南朝鲜让给日本也在所不惜。他认为日本人在南满取得一个立足点只是时间问题，而日本靠着从中国取得的巨额赔款而增强之后，早晚会夺取朝鲜，并把它的势力扩张到满洲和蒙古地区，并且和中国开始一场新的战争。如果真是这样的话，维特认为，也许“几年之后日本天皇变成中国皇帝并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问题在于，俄国是现在采取行动阻止日本进入满洲呢，还是等西伯利亚大铁路完工、俄国的地位增强了之后再动手呢？维特的主张是马上行动，把日本排挤出南满，但俄国本身一定不能在中国谋取任何领土，否则就会引起新的外交斗争，从而导致列强瓜分中国的后果（维特的意思是，俄国此时在东方的力量很弱，在瓜分中不一

定能占到便宜）。如果日本对于俄国的外交要求坚决不让步的话，就攻击日本舰队，炮轰日本港口，但不占领港口。这样，俄国就充任了中国的救星，中国也会感激它的帮忙，而在日后同意以和平方式修改（中俄）边界。

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亲王于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正式要求德国、法国和英国与俄国一道对日本索取辽东半岛的行为提出抗议。法国只是出于遵循法俄同盟的原则，不得不勉强同意，而德国则很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德皇威廉二世要求德国远东舰队同俄国舰队取得联系，准备采取“共同行动”。英国一开始没有答复，但在一次争吵激烈的内阁会议之后表示英国将继续实行不干涉政策。4月18日，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劝告清政府推迟批准已经签字的马关条约。

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东京公使联合起来向日本代理外相林董递交了内容相同的照会，声称“日本对辽东半岛的占领对中国首都将是一个永久性的威胁，同时将使朝鲜独立成为虚幻的事，并且此后对于远东和平也是一个永久障碍”，要求日本将辽东半岛归还给中国。日本政府对此没有立即答复，一时间俄法德的外交家和海军将领都很紧张，预期将要爆发一场战争。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在4月30日告诉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说，远东已有数十艘俄舰、十余艘法舰和六艘德舰，还有两艘德舰在前往远东途中。停泊在烟台港的十艘俄国军舰已经开始除去炮衣，整理舱面妨碍作战的各种设施，准备投入战斗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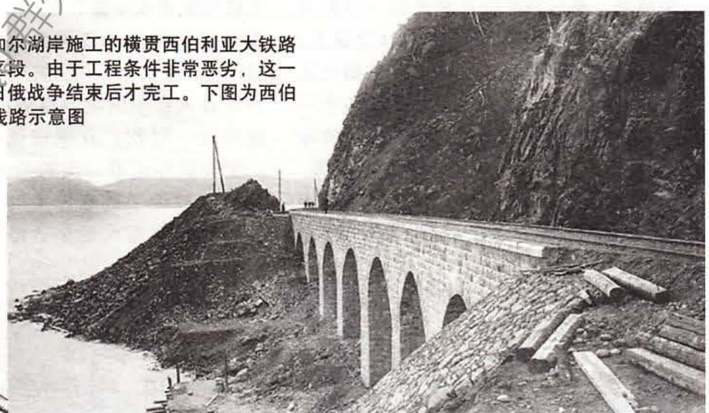
当时在远东，单是俄国海军的力量，就已经略微超过了日本海军，当时它有两艘战列舰、六艘装甲巡洋舰和一艘防护巡洋舰，日本有三艘刚刚在英国建造完毕的战列舰，没有装甲巡洋舰，另有十二艘防护巡洋舰（大部分都已经十分陈旧）。日本参谋本部意识到日本不能和这三个国家的联合军队作战，于是在5月5日对归还辽东半岛的要求作出了让步。5月8日，修改后的中日双方在烟台互相换文，马关条约获得批准，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的要求，中国加付库平银三千万两，作为“赎辽费”。1895年11月8日，日本宣布正式放弃对满洲利益的要求，向清朝归还了至此仍处于日本军事占领下的辽东半岛。

中日甲午战争和三国干涉还辽对远东和远东以外的历史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远东地区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开始变得十分突出。在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之后，俄国自1860年以来第一次采取了积极的远东政策。在1895年以前，俄国满足于维持现状，因为没有任何一个别的强国进入它的“安全地带”——朝鲜、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德国对亚洲事务开始感兴趣了，而日本对欧洲事务也开始感兴趣了。日本在外交上吃了败仗，被赶出了大陆，日本人人对俄国的潜在敌意被唤醒，立即开始了为期十年的“卧薪尝胆”准备工作，以期保证不再发生像退还辽东这样的受辱事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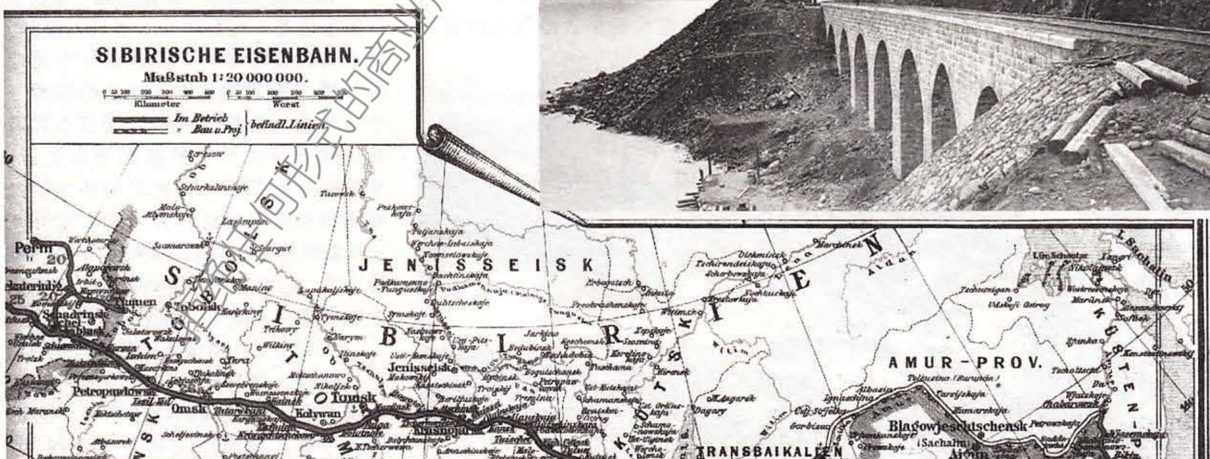
三国干涉还辽事件决定了俄国的三项总政策。首先，在引起日本的敌意之后，今后俄国在远东应该依靠俄中同盟还是俄日同盟的问题得到了解答：依然处于孤立境地的中国开始成为俄国的“理想邻国”，不久就求之不得地以愿意接受俄国政治势力的侵入为代价，接受俄国的财政援助。其次，关于远东“不冻港”的想法的新解释被提了出来，随着俄国远东海军力量的增强，它开始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最后，需要修建一条“取捷径”穿过中国领土的铁路，俄国把这个问题和保卫“阿穆尔边境线”的问题捆绑到一起，得出了俄国要千方百计控制北满地区的结论。

西伯利亚大铁路与中东铁路

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起点为乌拉尔山麓的车里雅宾斯克，劈开西伯利亚



在险要的贝加尔湖岸施工的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贝加尔环线区段。由于工程条件非常恶劣，这一段铁路直到日俄战争结束后才完工。下图为西伯利亚大铁路线路示意图



的原始冻土和参天森林蜿蜒而行，一直通到7000俄里（7420公里）之外的符拉迪沃斯托克，将遥远的太平洋港口与乌拉尔山和帝国的心脏地带连接起来。这条铁路在长度打破了英国人1886年修建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全长4770公里）的世界纪录。其主体工程分为七个工程区段——西西伯利亚区段（车里雅宾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中西伯利亚区段（克拉斯诺亚尔斯克－伊尔库茨克）、贝加尔环线（伊尔库茨克－斯柳德扬卡－米索夫斯克）、外贝加尔区段（米索夫斯克－赤塔－斯列坚斯克）、阿穆尔区段（斯列坚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北乌苏里区段（哈巴罗夫斯克－乌苏里，即今天的列索扎沃茨克）和南乌苏里区段（乌苏里－符拉迪沃斯托克）。

按照设想，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将分为三期完成，第一期工程包括西西伯利亚区段、中西伯利亚区段和南乌苏里区段，总长3494俄里，在1891－1898年完工；第二期工程包括北乌苏里区段和外贝加尔区段，总长1356俄里，在1895－1898年间完成；第三期工程是总长2292俄里的贝加尔环线和阿穆尔线，在1897年开工。整条铁路以贝加尔环线施工条件最为艰难，一共要开凿33条隧道，因此直到日俄战争后期的1905年才完工，在这之前采用尼科尔斯科耶港至米索夫斯克港的夏季火车轮渡和冬季在贝加尔湖冰面上直接铺设铁轨的方式实现通车。

除了贝加尔环线外，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难度最大的路段是斯列坚斯克至哈巴罗夫斯克的阿穆尔区段。根据实地勘察，沿黑龙江北岸修筑铁路会遇到很多技术上的困难。雅布洛诺夫山脉和斯塔诺夫山脉（外兴安岭）的许多支脉延伸到黑龙江，因而需要修建许多隧道。此外，黑龙江左岸有许多大的支流，比如结雅河和布列亚河，需要在这些支脉之间架设桥梁。此外，哈巴罗夫斯克至结雅河的这一段，有百分之五十的线路是沼泽地，需要代价很高的技术工程来解决。最后，沿着黑龙江修筑铁路，就会减少已经投入大量资金的、用于满足沿河移民区需要的俄国轮船运输的用途。

1887年，俄国海军少将科佩托夫首度提出了一条“捷径”方案，即将西伯利亚大铁路从赤塔以东的某地取直线“借地”穿过中国的黑龙江和吉林两省，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对于俄国来说，这样做的好处有两个：第一可以缩短500到700俄里的铁路建设里程，减少成本；第二可以扩大俄国在满洲北部地区的影响，与正在崛起的日本相抗衡。

俄国财政大臣谢尔盖·维特虽然一开始反对这条路线，但是到中日甲午战争结束后一变而成为它的支持者，并且特别强调这条捷径路线的重要性：“从政治及战略方面看，这条铁路……使俄国能在任何时候通过最短的路线把自己的武装力量运到符拉迪沃斯托克，并集中于满洲、黄海海岸和中国京城的近距离处。相当数目的俄国军队在上述据点的出现，将大大增加俄国不仅在中国、并且在远东的威信和影响，并将促进附属于中国的部族和俄国接近。”

除此之外，维特还建议修筑一条从俄属中亚直至甘肃省会兰州的铁路，“在那里，在中国的‘后院’，俄国应该秘密地促使西藏人、蒙古人和中国伊斯兰教徒普遍起来叛离满清朝廷……在他们的叛变成功后，那些领袖将要求俄国沙皇保护，而许多亚洲民族将不经过流血就并入俄罗斯帝国之内……有了太平洋沿岸和喜马拉雅山的俄国，就不仅能主宰亚洲的任何事务，而且还能主宰欧洲的事务。”

1895年2月，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向外交大臣建议，修建

为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捷径”路线——满洲里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俄国在1896年成立了华俄道胜银行。图为该行天津分行大楼





上海外滩15号的华俄道胜银行大楼



华俄道胜银行在中国东北地区发行的纸币



一条穿过满洲极北部地区的铁路的特许权，其具体路线是从俄国边境诺沃楚鲁海图伊哨所经墨尔根（嫩江）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这条路线可以避开黑龙江北部的“大弯子”和雅布洛诺夫山脉的许多支脉。当年5月，新任交通大臣希尔科夫亲王开始着手处理这项计划，在没有获得清朝官方批准的情况下，向北满地区派出工程师，对铁路预定经过的线路进行非法测量。在之后的几个月时间里，俄国总参谋部的一些高级将领认为这条“满洲捷径”牵涉到的领土面积不大，主张干脆“大炮开兮抢他娘”，迫使中国同意将其直接割让给俄国。但这种头脑简单的武夫式手段是和俄国当时正在采取的对华外交拉拢政策相冲突的。

《马关条约》换文生效后，关于日本军队撤出辽东半岛的条件尚未谈妥，中国就已经对库平银二亿两的赔款感到担忧了。在这笔赔款中，半数是需要每年支付一次、一年内分两次付清的；剩下的那一半，年息百分之五，由日本占领威海卫作为担保物，而为了日军驻守威海卫，中国还要每年拿出五十万两“占领费”。这笔巨额款项是无法轻易凑齐的。当年春天，中国请求允许提高关税（当时是收取5％的从价税），但这项措施立即遭到了英国的阻挠，当时英国在中国市场上占的份额最大，而且中国海关也为英国人赫德所控制。清政府甚至考虑把已经很沉重的盐税提高一倍，并准许食盐进口，但是赫德说这也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最终清政府决定对外借款，对象是英、法、德银行团，后来俄国银行也加入进来。

1895年7月6日，中国代表、驻俄公使许景澄在圣彼得堡俄国外交部，当着维特和洛巴诺夫亲王的面，与六家法国银行和四家俄国银行的代表签订了一项贷款协定，即《法俄四厘借款》协议。根据协定规定，中国获得四亿金法郎贷款，按票面价额的94.125％收款（约合1亿金卢布或库平银一亿两，实得3.765亿金法郎），年息百分之四，这是当时给予中国的最低的贷款利率。偿还期限为36年，以中国的海关收入为担保。

作为“法俄四厘借款”的孳生物，维特还纠集法俄银行家创立了俄华银行（Russko-Kitaiskogo Banka）[注]。在六百万卢布的开办资金中，法国资本占八分之五。维特特别规定，这个银行的首要任务之一是为俄国驻华公使喀西尼提供一笔“特别经费”，来向中国的政治家们、特别是李鸿章行贿，以取得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穿越中国领土的特许权。



1895—1896年任俄国外交大臣的阿列克谢·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亲王



中东铁路线路及车站地图

1896年4月30日，李鸿章伯爵抵达圣彼得堡。他是前来参加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的中国政府代表。李大人本来是计划从上海乘船前往欧洲，在中途访问一些欧洲国家的首都的，但是后来在俄国人的劝说下，在埃及亚历山大港登上了一艘前往敖德萨的俄国邮船，然后乘火车直接去圣彼得堡。这样他可以在加冕典礼举行前有三个星期的时间和俄国人谈判“借地修路”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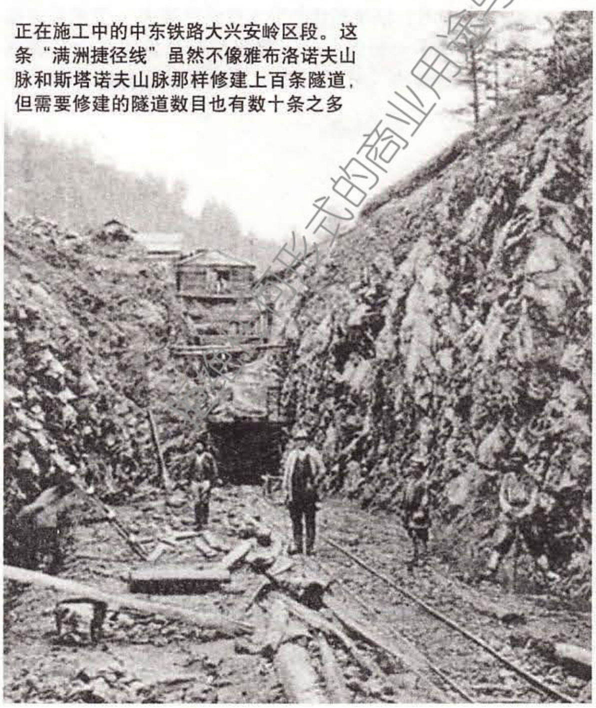
为了得到穿越满洲的铁路筑路权，维特使用了两项有力的武器：一项中俄秘密防御同盟，和一笔300万卢布（约合库平银300万两）的贿赂。这项《防御敌人互相援助条约》或曰《中俄密约》一共有六条主要内容：当日本侵略俄国远东领土或中国和朝鲜时，中俄两国陆海军应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非经协商，任意一国不能独自与敌国（日本）订立和约；战争期间中

【注】1896年中国因修建中东铁路而参股之后，将其改名为“华俄道胜银行”，把中国的名字放到了前面。实际上变的只是中文译名，俄文还是老样。此外，“道胜”二字也是中文名专用，类似英文“香港上海银行公司”翻译为中文后非要测算笔划吉凶、加上“汇丰”二字以图吉利一样。俄国十月革命后，华俄道胜银行总部迁往法国，因外汇投机失败，在1926年倒闭

国一切港口对俄国军舰开放，并供应所需一应物资；中国允许俄国穿越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一条直至海参崴的铁路，其建设与经营工作交给华俄道胜银行承办；铁路建成后，俄国无论在平时还是战时都有权利用这条铁路穿越中国国境运输军队、粮食和军火器材；条约有效期为15年。

这项防御同盟密约在沙皇加冕典礼之后的6月3日，在圣彼得堡的俄国外交部内签字。在签字会场上，俄国外交大臣洛巴诺夫亲王说，双方条约的条文都已经看明白，条约文本也已经完全准确地复写过一遍，秘书们一再核对无误。可是维特拿过条约文本一看，条约的第一段中“本条约于日本在东亚侵犯俄国、中国或朝鲜之领土时适用”一段中的“日本”二字被改成了“任何国家”（这原先是洛巴诺夫的改动，后来虽然报经沙皇批准，但在维特的坚持下改了回来，而条文文本中仍未改）。当维特提醒洛巴诺夫后，洛巴诺夫说：“天呀，真糟糕，我竟忘了告诉秘书们，让他们将此条按初稿改过来。”机警的洛巴诺夫看了一下表，已经是中午十二点一刻，于是宣布吃饭，留下两个秘书重新抄写约文，把错误改正过来。这时李鸿章还蒙在鼓里，吃完饭就在条约上签了字。

李鸿章并不反对300万卢布的贿赂，也不反对这项中俄秘密防御同盟，但是在穿越满洲的铁路问题上只是逐渐让步，在某些要点上则完全没有让步。比如说，他断然拒绝俄国政府直接出面修筑这条铁路的计划，而是要求把筑路特许权给予华俄道胜银行。其次，他反对从这条穿越满洲的铁路向南修建一条“通往黄海某港口的支线”，除非这条铁路采用当时中国正在兴建的其他铁路——比如用法国和比利时资本修建的卢沟桥至汉口铁路，以及英国人正在谋求获得修建权的山海关至新民厅铁路——通用的4英尺8.5英寸（1435毫米）的标准轨距来修建。甚至在谈判双方为了准备沙皇加冕典礼而转移到莫斯科后，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协议。最后俄国人签署了一项保证书，答应第一笔100万卢布的贿赂在清政府批准铁路租约时由华俄道胜银行交给李鸿章，第


正在施工中的中东铁路大兴安岭区段。这条“满洲捷径线”虽然不像雅布洛诺夫山脉和斯塔诺夫山脉那样修建上百条隧道，但需要修建的隧道数目也有数十条之多


俄国利用流放犯人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的情景，可见站立在土坡上的警卫人员

二笔100万在路线勘定时交付，铁路完成后再付给100万。这300万卢布的行贿专款被称为“李鸿章基金”，将作为横贯满洲铁路的修建费用记入银行的借方帐目。

1896年9月8日，中国驻俄公使许景澄与华俄道胜银行代表在柏林签署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中国政府以500万两库平银的资本入股，与华俄道胜银行一道参与这条铁路的修建。铁路的名称为“中国东方铁路”，简称“中东铁路”。根据章程规定，中国将在80年后（1976年）接收这条铁路，或在36年后在清偿债务的情况下有权购买这条铁路。清政府允许中东铁路公司征收建筑铁路所需的土地，在征收的土地内允许铁路公司的警察维持治安，并且在铁路沿线派驻哥萨克护路队。最后，这条铁路将与横贯西伯利亚大铁路一样采用5英尺（1524毫米）的宽轨距。

当中东铁路建设局的测量考察队在1896年夏天进入北满地区时，勘测中东铁路路线的工作又被俄国人所称的“1896年红胡子战争”耽搁了下来。所谓“红胡子”是俄国人和其他西方人对东北地区马匪的称呼，东北人则称之为“胡子”，也称为“绺子”、“响马”或“马贼”。这些土匪的武器一般是土枪，枪口平时塞着木塞，上面系着红缨。在开枪时，土匪将木塞从枪口中拔出来，衔在口中，远远望去就像长了一绺红色的胡子，故而得名。这些土匪的祖师爷是咸丰年间闯关东的山东和河北流民当中的亡命之徒，由于清廷调东北八旗军入关围剿太平天国，因此关外兵力空虚，土匪即“胡子”趁虚而起。这些人平时或是盘踞在山林之中，或是几百人骑马在平原地区呼啸来去，从事砸买卖、抢富户、绑肉票、打官兵、贩鸦片等种种无法无天的活动。

东北地区地广人稀，守防官兵驻地动辄相隔六七百里、八九百里，难以进行有效控制。此外，在开拓东北的早期年代，居民往往半以狩猎为生，因此都拥有火枪，很多时候是冬为猎户、夏为响马；一旦被官兵俘获，往往有地方乡绅联名具保，所以日渐横行，肆无忌惮。久而久之，“胡子”甚至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并且与满洲地区自发的拓荒活动结合起来。这是动荡而荒蛮的边疆地区常有的现象，在十九世纪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中国的内外蒙古、甘肃青海，以及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巴尔干地区也有很多类似于胡子的劫匪、马贼一类武装团伙。

在甲午战争时期，大批淮军、湘军和东北驻防军在朝鲜和辽东半岛战败，也导致不少溃军在关东地区到处流窜，时间一长便“起局”、“占山”、“建绺子”，落草为寇，当地一

些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者贪羡土匪“骑大马、喝小酒、吃大肉、抢娘们”的逍遥生活，也纷纷投奔入伙。甲午战争之后东北地区“胡子”的数量大增，每股胡子少则上千，多则上万。后来叱诧风云的“东北王”张作霖就是在这一时期通过一边办团练武装、一边吸收小股土匪武装而慢慢起家的。

1896 年的这次“红胡子战争”其实是几股小规模的土匪武装侵袭活动，在当年的整个夏天，一帮一帮的胡子，人数有时达三百人之多，袭击了珲春－宁古塔地区的许多居民点，而且数次越过边境、进入俄国领土。在那里，他们被乌苏里地区的哥萨克百人骑兵队打败，并被赶出俄国境外。直到1897 年北满地区土匪活动平静下来之后，勘测中东铁路路线的工作才开始。俄国的测绘工程师在松花江畔一个叫田家烧锅的小村子设置了建筑工程局，建立了警备队，并且在其周围的香坊地区（因为烧锅散发出的烧酒香气而得名）堆积了大量铁路建设物资。这座小村子周边的地区在金代叫做阿勒锦，清朝时期的满语名称为哈尔滨。俄国人在1898 年将以香坊为中心的中东铁路租借地命名为“松嘎里市”（俄国人称松花江为松嘎里河，这个名字来自满语“松阿里乌拉”，意为“天水”，因其发源于长白山天池而得名。松嘎里市即“松花江市”），后来在1903 年又恢复了哈尔滨的名称。

1897 年8 月28 日，中东铁路建设局在绥芬河左岸的三岔口（今黑龙江省东宁县）举行了中东铁路的开工仪式，然而后来经过勘测表明三岔口至乌苏里斯克之间是沼泽地区，不适合修建铁路，因此路线不得不向北推移了40 公里，选择了一条华工和中国商人经常使用的“跑崴子”路线，但是铁路站名依然命名为“绥芬河”。

到1898 年2 月，中国境内的路线勘测完毕，干线路径定为绥芬河－牡丹江－哈尔滨－昂昂溪－海拉尔－霍勒金布拉格。作为中东铁路西端终点的霍勒金布拉格位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正好位于中俄边境线旁，也是从俄国境内向东进入满洲地区的第一个车站，因此在1902 年中东铁路修建至此时，俄国人将其命名为“满洲利亚”(Manchzhuriya)，再转译为汉语时则变成了“满洲里”（附近的蒙古人则称之为满珠尔）。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向东、西、南三个方向同时修建，同时从绥芬河向西修建，从满洲里向东修建，从


中东铁路大兴安岭隧道

已经成为俄国租借地“关东省”的旅顺－大连地区向北修建。

“远东不冻港”与“关东省”

在伊犁对俄国实行鹰派威慑，在凉山大破法军，在朝鲜占有租界，在远东拥有最强大舰队……清帝国这些一度唬住了西方列强的所谓“同光中兴”的牛皮，在甲午战争之后是被彻底地戳破了。而俄国海军部此时也感到确实在远东需要一个“不冻港”了，因为日本在1894 年通过了一项关于外国军舰在日本停泊的条例。根据这项条例，任何一个国家同时停留在日本港口内的军舰数量不能超过两艘。

这一措施严重地影响了俄国海军在太平洋的战略。由于俄国远东舰队一直比英国的驻华分舰队逊色，因此俄国本来计划在和英国爆发战争时在太平洋上打一场商业袭击战，利用日本的港口作为暂时隐蔽、以及修理和补充给养的地方（特别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封冻的那四个月里）。此外，即使在不打仗的时候，俄国在远东的军舰也是以长崎为越冬基地的，它的船只可以自由地为了战术和训练目的进出长崎港。新条例严重地妨碍了这种战略，它不是使俄国军舰行动不便，就是使它们在冬季找不到基地。

1895 年4 月，俄国新任外交大臣洛巴诺夫－罗斯托夫斯基亲王给沙皇写了一份备忘录，提出“如果俄国在中日战争结束后要采取消极的（对华）措施，那么中国将是它的一个

1890 年在日本长崎港越冬的俄国一等巡洋舰“留里克”号。当时由于符拉迪沃斯托克港每年冬季都要冰封，因此俄国远东舰队每年都要南下至长崎、香港、马尼拉等地越冬



理想的盟国，俄国的边境是安全的。如果俄国想采取进取的措施，那么它的目标就是双重的，那就是一方面在太平洋上取得一个不冻港，另一方面吞并为了修建西伯利亚大铁路取得方便路线而所需的部分满洲领土。”

与此同时，中国和日本都在欧洲各国首都展开积极的外交宣传活动。李鸿章通过总理衙门、继而通过中国驻欧洲各国公使，向全世界不断通报马关谈判的经过。他们说，如果日本取得辽东半岛，那么就会控制北直隶湾（渤海），并在中国和朝鲜之间打入一个楔子。而且由于日本势力接近了中国首都，还将导致日本对中国朝廷的控制。在日本人这方面，他们简直是在建议直接瓜分中国。日本驻柏林公使向主张归还辽东半岛的英、德、俄三国外交部暗示，如果英国在中日战争之后索取舟山群岛作为它的报酬，或者德国占领中国东南一个省份的话，日本是不会反对俄国通过与中国的单独协议占领北满地区的。不过，此时德国在远东的帝国主义野心还没成熟，德皇威廉二世虽然含糊地表示过在台湾或者其他地方割取领土的想法，但德国外交部却认为在中国沿海取得一个海军基地和加煤站就足够了。法国外交部也无意进行这种争夺，它更关心的是使日本不占领澎湖列岛，而不是像日本提议的那样去占领海南岛。

俄国在远东要求一处“不冻港”的想法最初是怎样来的，现在已经有些模糊不清了。一些研究者认为，自从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时代开始，俄国人就希望有这样一个港口。但当时俄国在远东既没有商人也没有海军舰队。1854年，穆拉维约夫曾经下令把俄国远东舰队的基地从堪察加半岛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迁到黑龙江河口的尼古拉耶夫斯克，这样就把一个比较不冻的港口换了一个一年之中有半年冰封、几个月浓雾的港口。于是太平洋上的俄国舰队在一年之中有大部分时间失去了战斗能力。1859年，穆拉维约夫下令在彼得大帝湾的金角湾半岛修建了符拉迪沃斯托克（“征服东方”）军事哨所。1862年，哨所改为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并在1875年建市。为了补偿守卫部队的费用，这个港口被宣布为自由港，以吸引各国商船前来装卸货。

位于符拉迪沃斯托克南边的波谢特湾（摩阔崴），它是一座不冻港



虽然俄国太平洋舰队基地在1872年转到了符拉迪沃斯托克，但是这个港口的冰封时间每年也有四个月之久。由于“阿穆尔粮食基地”的失败，远东的俄国军舰养成了开到日本港口去补充粮食和煤炭、以及在长崎、上海、香港或马尼拉过冬的习惯，因为它们自己的远东基地供应不上，或者补给品价格太高。自然，在这种情况改善以前，俄国在远东的海军是不会有什么重要性的。此外1877－1879年俄国为建设和扩建符拉迪沃斯托克港花费了巨额费用，说明俄国要用它作为在远东的主要港口，对这个港口的条件并没有什么不满足。此外，直到1885年为止，俄国在远东的商业投资和海军力量都还没有达到需要一个不冻港的程度。

1885年3月，俄国地方当局违反了在英俄联合委员会划定阿富汗北部新边界以前不向阿富汗继续挺进的诺言，从而造成了尖锐的英俄外交危机。英国全国十分激动，认为这是对印度的直接威胁，准备进行战争。当时英国除了采取其他一些措施外，还决定按照一种传统的战略行事，即派遣舰队去攻击俄国偏远领土上的某个弱点。英国海军部在上一次的克里米亚战争中把堪察加半岛上的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军港定为这个弱点，这一次则把符拉迪沃斯托克作为目标，并决定先占领朝鲜半岛极南端的两个岛屿，即巨文岛。它们环绕着一个被西方人称为“汉密尔顿港”的安全停泊场。英国舰队从这里出发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将比最近的海军基地——香港近1200英里。英国海军随后占领了这处岛屿，并开始进行交涉，以取得清政府对于这项措施的同意。

俄国闻讯后也让其驻北京公使与清廷进行交涉，要求中国允许俄国占领朝鲜东海岸的“某个其他地方”。由于顾忌到舰队与符拉迪沃斯托克基地之间的联系被巨文岛的英国舰队切断，因此这个地方只能位于巨文岛北边，



符拉迪沃斯托克鸟瞰。图中的狭长半岛是什科特半岛，它左边是开放而宽阔的阿穆尔湾，右边是太平洋舰队的主要锚地金角湾——这是穆拉维约夫在1859年以君士坦丁堡的金角湾为其命名的。符拉迪沃斯托克所在的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半岛与俄罗斯岛之间的海峡也被命名为“东博斯普鲁斯海峡”


谢尔盖·维特（1849—1915），俄国国务活动家。毕业于新罗西斯克大学数理系，1889年任财政部铁道司司长，1892年任交通大臣，主持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建造。同年至1903年任财政大臣。因日俄战争后代表俄国签订和约而受封为萨哈林伯爵，但因向日本割让了南萨哈林而被其政敌讥笑为“半个萨哈林伯爵”。

这样就只有永兴湾（俄国人称为拉扎列夫港）和迎日湾（俄国人称恩科夫斯基湾）两处了。清政府答复说，如果英国占据巨文岛、而俄国占领永兴湾的话，那么中国也要占领一个朝鲜港口作为反制措施。

巨文岛危机后来是以这样一种方式解决的：英国海军将领认为这个港口在战争期间会分散和削弱中国分舰队的巡洋力量，所以在1887年最终撤出了这个岛屿。而俄国海军部不久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占领永兴湾或巨文岛，对于破交战无疑是有利的，因为俄国巡洋舰从这里出发会更接近英国在远东的商业运输航线，但这样得到的好处从长期来看是值得怀疑的，因为它会削弱俄国在远东的防卫力量。另一方面，英国占据巨文岛一事表明俄国远东舰队很容易就能被封锁在日本海之内。在战争时期，俄国无法使用中立国港口，因此俄国舰队由于缺少加煤站就不得不采取守势。

在朝鲜取得“不冻港”的阴谋泡汤后，俄国把注意力移向了南满地区。1897年，维特在华俄银行内的代理人向李鸿章提出修建一条通往“黄海某港口”的支线。俄国人可以答应李鸿章的要求，将这条铁路修筑为4英尺8.5英寸的标准轨距，以便于同英国人和比利时人正在修建的北京－奉天铁路接轨（但路基修筑成适合宽轨距的需要，这样俄国人在战时可以在几天之内将其改为宽轨）。当年5月，华俄银行董事长乌赫托姆斯基亲王前往上海，将第一笔100万卢布贿赂款交给了李鸿章，同时提出了修建“南下支线”的要求。

当时俄国还没有考虑好取得哪一个“黄海海港”。在甲午战争期间，俄国再次试图获得朝鲜东海岸的某个港口，比如元山港，并且设法迫使朝鲜割让一条沿海的狭长领土，将之与俄国本土连接起来。《马关条约》生效后，俄国新任外长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和那位穆拉维约夫－阿穆尔斯基伯爵没有亲缘关系）拒绝考虑朝鲜东海岸的港口，因为那些港口很容易被日本舰队封锁，从而成为俄国军舰的陷阱。由于同样的理由，他不赞成俄国海军部对于釜山港、或者马山港－加德岛的租借兴趣。穆拉维约夫一度考虑过朝鲜西海岸的济物浦（仁川）和镇南浦（南浦），但最终把兴趣转向了辽东半岛南端的旅顺和大连。

在1896年，一个俄国海军代表团对辽东半岛最南端的旅顺口进行了考察，而俄国驻烟台领事对大连湾做了勘察。在几百年的时间里，旅顺口只是一座宁静的、无人打扰的小渔村，祖籍山东的渔民定居在这里，捕捞对虾、海参和各种海产。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海军上尉威廉·阿瑟曾经于1860年8月把他的木壳炮舰“阿尔及利亚人”号（HMS Algerine）开往旅顺湾进行维修，并在当地进行水文测量。英国海军部的海图随后将这个优良的天然海港命名为“阿瑟港”（Port Arthur，俄文称Port Artur），而在旅顺北边的大连湾则被命名为“维多利亚湾”（Victoria Bay）。

俄国人对大连湾的考察结果是，这座港口避风、不冻，平均吃水在22英尺以上，便于军舰停泊。而俄国海军代表团则认为旅顺港的条件比大连湾优越，应当优先占领。另一方面，俄国海军大臣提尔托夫海军上将仍不能肯定旅顺口能够满足俄国太平洋舰队的需要，他仍认为朝鲜的港口更合适一些，但从政治上看，占领朝鲜港口的时机还不成熟。他建议俄国先不要采取行动，暂时再使用符拉迪沃斯托克港两三年，将来“还会有取得朝鲜港口的机会的”。

不过俄国政府此时已经强烈地感到，如果再不对旅顺和大连下手，恐怕就来不及了。德国人已经以两名传教士在山东曹州被杀的事件为借口，在1897年11月强占了胶州湾地区——英国对此表示欢迎，因为德国人在那里占领一处据点之后，可以作为在中国北方抗衡俄国的力量。与此同时，俄国海军部和外交部担心英国人利用俄国占领胶州湾的机会而占领旅顺口，因此加快了行动步伐。

1897年12月11日，以“保护中国免受德国侵略”为名义，俄国海军少将鲁诺夫率领一支由5艘军舰组成的分舰队离开符拉迪沃斯托克前往旅顺口。12月19日，这支舰队开进了旅顺港。起初俄国人在旅顺的行为比较“规矩”，在两个月内没有派遣陆战队登陆，也没有在陆上修建任何工事。但俄国对旅顺口的“暂时”占领很快就原形毕露，在旅顺港、大连湾等地设置路卡，敲诈行人，还向当地中国村庄征收粮食，并且公然侵扰附近的金州城。

1897年12月14日，李鸿章向俄国交涉一笔一亿两（1.5亿美元）的借款，以偿还中日战争的最后一笔赔款。维特同意提供提供这笔贷款，条件是中国同俄国签订包含以下内容的协议：只有俄国才有权在满洲和蒙古修建铁路、经营工矿企业；中东铁路公司有权修建一条通往黄海、通到营口以东的任一港口的支线；俄国可以在它选定的任意港湾内修建港口，一切悬挂俄国国旗的船只有权进入。

这种要求甚至让以亲俄著称的李鸿章也感到垂头丧气，转而求助于英国。然而英国提出的条件也绝不客气，包括给予英国修筑一条从缅甸通往长江的铁路的权利；“不割让”长江流域地区；开放大连、南宁、湘潭作为通商口岸。李鸿章既不能在国内举债以筹集款项，只好再次求助于俄国。他坚决反


1896年前往俄国参加尼古拉二世加冕典礼的李鸿章



叶夫根尼·伊万诺维奇·阿列克谢耶夫（1843–1917），俄国海军上将，宫廷侍从将军，沙皇亚历山大二世的私生子。1895–1897 任太平洋分舰队司令，1897–1899 任黑海分舰队司令，1899 年任关东地区军队及太平洋海军部队长官、关东省总督，1900 年参与镇压义和团起义。日俄战争期间因与陆军大臣库罗帕特金意见分歧而辞职，回到圣彼得堡任国务会议代表。1917 年病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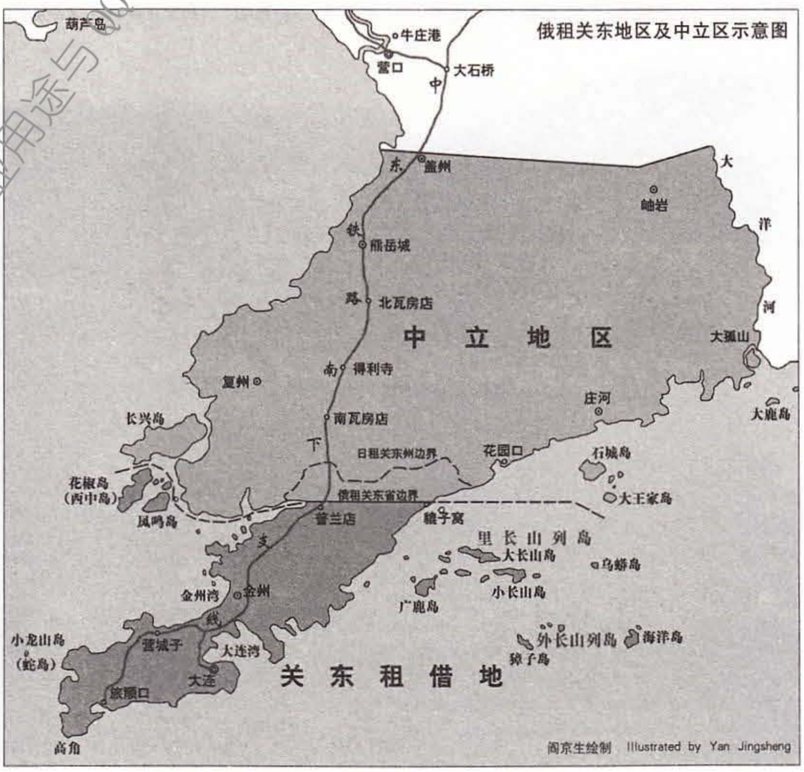
对俄国独占满蒙地区的条款，也反对俄国占领旅顺口的条件，试图让其对鸭绿江口的安东发生兴趣。由于李鸿章的反建议遭到俄国拒绝，于是他又想向英国去借款。俄国此时作出了让步，取消了关于旅顺和大连的所有要求——这说明俄国对旅顺港的占领，最初并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基地。与此同时，俄国人还答应说，如果李鸿章肯于促使中国政府接受俄国提出的贷款条件，就给他100万卢布的贿赂；如果中国政府为了签订借款协定而派遣一个“合适的”亲俄代表团去圣彼得堡，就再给他100万卢布。李鸿章对此没有拒绝。不过，到1898年2月1日，中国驻圣彼得堡公使通知俄国外交部说中国明确拒绝俄国借款条件时，这一切安排就成了泡影。中国从汇丰银行和德华银行得到了所需的1600万英镑贷款，答应了英国要求“不割让”长江流域的要求，而且只要英国对华贸易量高于其他国家，海关总税务司的职位就由英国人担任。最后，中国政府还承认了德国对胶州湾的九十九年“租借”。

当时俄国的政策总的来说是在取得旅顺港和修建中东铁路南下支线这两者之间摇摆不定。到中俄借款协定泡汤后，取得不冻港成了俄国的主要目标。俄国陆军大臣克鲁泡特金公爵、海军大臣阿列克谢·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财政大臣维特、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海军参谋长阿维兰海军上将和陆军参谋长萨哈洛夫将军召开了特别会议，研究租借旅顺－大连地区的问题，并定下了明确的目标：1、俄国租借辽东半岛南部，北部成为中立区；2、取得修筑一条从中东铁路通往旅顺的铁路的权利；3、派遣陆海军部队前往旅顺，以便实现这些要求。

沙皇政府是最善于恫吓的，它在这方面具有丰富的老经验。从圣彼得堡的那次“特别会议”之后，俄国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向旅顺口不断增兵，当时停泊在中国海面的俄国军舰达47艘，舰上载有3000人的海军陆战队和多门大炮，并且都进入了临战状态。2月20日，俄国外交部为租借旅顺口而和中国驻俄公使重开谈判，3月3日将谈判地点从圣彼得堡移到了北京。中国请求英日两国予以支持，而俄国以惯常使用的行贿手段来“润滑”，加速谈判的进行。3月21日，俄方谈判代表、华俄银行天津分行经理璞科第根据圣彼得堡的指示，向清方谈判代表李鸿章和张荫桓提出，如果能在几天之内签字，就给两人每人五十万两的贿赂。李鸿章仍然矜持地反对租借旅顺和大连，但这次却不太坚决了。3月27日，双方代表在最后的租约上签了字，俄国得到了它渴望已久的“不冻港”。28日，李鸿章收到了50万两银子，对此“甚为满意”。

《中俄旅大租地条约》规定以貔子窝湾至普兰店湾（俄方称为“亚当湾”）一线为界，将此线以南、总面积3160平方公里的旅顺口、大连湾及其附近水面租借给俄国，以25年为期限。租借地的行政管理权归俄方（金州城除外），俄国可以任意修建炮台、营房和其他军事设施，中国陆军不得驻扎于界内。开旅顺口为军港，只许中俄两国军舰驶入；开大连湾为商港，其中专门划出一区供中俄军舰使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准许各国商船任意停泊。在租借地北边划定“中立地区”，其行政事务由中国官员管理，但中国军队不经俄方同意不得入内。条约的第八款规定俄国可以修筑一条通往旅顺和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此外俄国还取得了从这条“南下支线”修筑东至鸭绿江、西至辽河口的铁路分支线的权利。

对俄国强索旅大租借地反应最强烈的是英国和日本。1897年12月25日，即俄国舰队抵达旅顺一周之后，两艘英国巡洋舰——一等装甲巡洋舰“不朽”号（HMS Immortalite）和防护巡洋舰“伊夫根尼亚”号（HMS Iphigenia）——开进旅顺口、并打算在那里和俄国舰队一同过冬。根据记载，当时英舰队指挥官“怒形于色，声称‘准许俄船



在此，就不能阻我驻此”。鲁诺夫对此并未提出抗议。但是当第三艘英国巡洋舰“月桂女神”号（HMS Euphemia）试图跟随俄国舰队驶进海港时，鲁诺夫设法让岸上的中国港务当局对其打出了“禁止进港”的信号。

除了向旅顺口直接派出军舰外，英国海军还调集六艘军舰在吴淞口示威，十一艘英国军舰停泊在舟山。12 月30日，英国把它强大的远东舰队集中在仁川和朝鲜海峡，“舰队带有监视俄国舰队并随时准备应付不测事件的密令。”与此同时日本也进行了军事动员，据中国驻日公使裕庚和德国驻日大使屈乐尔的报告，日本各军港加强了备战活动，在沿海各要塞宣布了戒严，横须贺军港的水兵也都奉命紧急返回到舰上。日本海军已经向对马海峡集中，准备截击仍停泊在长崎的一些俄国军舰。

但是，虽然列强在远东剑拔弩张，但毕竟没有发展到酿成一场热战的地步。当时英国陷于空前孤立的状态：美国在委内瑞拉－圭亚那领土争端中不惜与英国开战；法国与俄国结盟，而且英法两国为了争夺尼罗河上游地区而几乎陷入战争；英国与德国因为摩洛哥问题而发生尖锐的矛盾；英国在远东唯一可能的盟友——日本也正忙于扩军备战，国内困难很多，对俄决一死战的准备远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只得一方面抛弃“光荣孤立”政策，缓和与法德等国的关系，一方面寻求与俄国达成妥协，争取交换承认长江流域和长城以北为英俄双方的“势力范围”。

1897 年在日本长崎港内发炮庆祝维多利亚女王生日的英国装甲巡洋舰“不朽”号。在俄国舰队抢占旅顺湾后，该舰曾尾随而入，以示反对



在取得辽东半岛租借地之后的第二年，即1899 年，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大连湾为自由港。俄国当局在大连湾南岸的青泥洼一带强征了3300 多顷土地用来建设海港、铁路和都市，并将这座新建的海港城市命名为达里尼（Dal'ny），意思是“遥远的地方”。至于旅顺港则沿用了英国人取的名字，称之为“波尔特－阿图尔”（Port-Artur，即英文“阿瑟港”的俄文发音）。整个旅大地区在俄国人获得租借权的第二年被命名为“关东省”（Kvantunskaya oblast），由驻旅顺的太平洋分舰队司令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中将兼任军政总督。不过，尽管阿列克谢耶夫的权限很大，但“关东省”最重要的部分——位于大连湾畔的大连市建设工程——却不归他管，而是和哈尔滨－大连铁路的建设工程一样，归中东铁路局总工程师尤戈维奇管辖。后者住在六百俄里以外的哈尔滨城，直接听命于财政大臣维特。

旅顺湾入口非常狭窄，在入海通道的对面俯瞰城区的是美丽而丰满的白玉山。由于某种古怪的误会，先是法国人，然后是俄国人，把这雅致的中国名称改成了“鹌鹑山”，尽管山上没什么鹌鹑。这座山上的两块重叠的白色削尖岩石起着导航标志的作用，引导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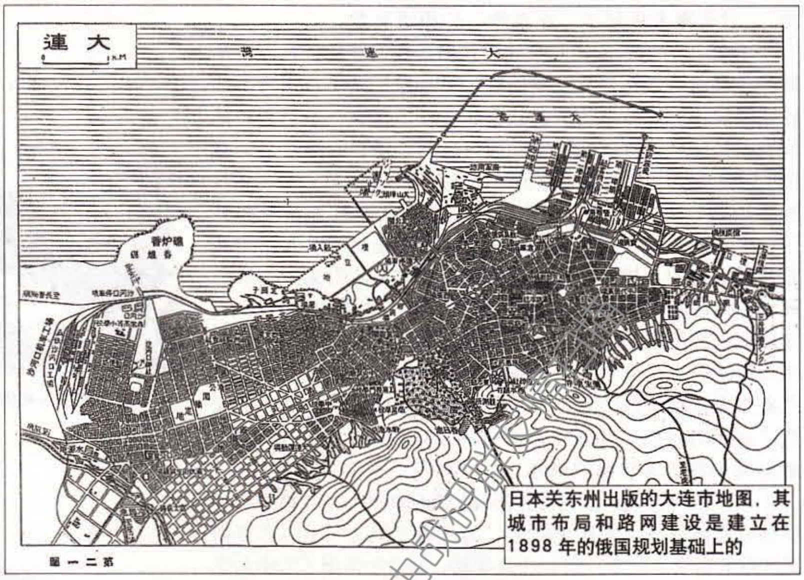


1899 年的旅顺港。画面近处停泊的两艘俄国军舰，左侧是“海狸”号炮舰，右侧是“纳瓦林”号战列舰

只穿过黄金山和老虎尾半岛之间的狭窄水道。黄金山里面的旅顺内港被俄国海军称为“圆形港”，它虽然对于清朝的北洋海军来说也许是足够的，但对于不断扩充的俄国太平洋舰队来说却是太小了，以至于舰队不得不经常升火待发地停泊在老虎尾角以外、面向公海的外停泊场。1904 年它将为这种停泊方式付出沉重代价。

尽管旅顺被认为是“不冻港”，但是在1898-1899 年的那个冬天，它竟然结了冰，在远东的大部分俄国舰队只好又去长崎过冬——尽管日本政府颁布了那项关于外国军舰在日停泊数目限制的法律，但俄国舰队带来的强大消费能力总是受长崎当地的商会和艺妓欢迎的。在俄国获得旅顺的头几个月里，这座偏僻港湾的生活条件相当原始，长官和士兵都住在临时搭建的帐篷兵营里，卫生条件十分恶劣，缺少饮水，食物要从日本和烟台运来，淡水也要靠军舰上的冷凝器来提供。俄国工程师为旅顺基地规划了拥有笔直街道和宽阔广场的欧洲式新城区，可是迟迟未能动工。

与旅顺相反，大连的规划工作倒是很快就开始了，俄国人想把它建设成“北方的香港”。中东铁路局大连建港和城市建设部总工程师弗拉基米尔·萨哈罗夫设计了宏伟的大连都市规划，并建成了完善的城市设施：道路、下水道和自来水，还设计了公园。俄国人将大连分为行政区、欧洲人区和中国区。行政区紧邻海港，是管理铁路、港口和城市的中心，通过跨过铁路的立交桥与南边的尼古拉大广场（今中山广场）相连。立交桥北边是一座半圆形小广场，放射状延伸出几条道路，北边临海处还辟有一座小公园。欧洲人区位于西公园（今劳动公园）和码头之间，北



日本关东州出版的大连市地图，其城市布局和路网建设是建立在1898 年的俄国规划基础上的

起铁路，南至南山，这里地段平缓，环境优雅。欧洲人区包括居住区和商业区，以尼古拉大广场为中心，向四周放射出10 条街道，主干道是莫斯科大街（今人民路），来自俄国的建筑师为其设计了许多新艺术运动风格（19 世纪末从法国兴起的一种追求曲线美感的艺术风格）的建筑。中国区则位于西公园的西边。

但是，尽管这座“北方的香港”设计得十分完美，但在俄国占领时期，除了中东铁路和大连港的行政官吏（主要是波兰人）之外，并没有多少居民住在大连，全部俄国人都挤在旅顺口的小木屋里。华俄道胜银行希望通过出卖这个新建港口城市的地皮来获取巨额利润，但是它的希望落了空，商业公司宁愿设在旅顺，因为在那里至少是可以和驻军做买卖的。

总的来说，身为“关东省总督”的阿列克谢耶夫不支持俄国政府在关东省的“远大规划”，特别是不相信俄国能使满洲地区殖民化。他认为维特和其他官员关于通过工业、贸易对中国实行经济掠夺的计划是个空想，因为俄国本身和西伯利亚的文化就不发达。阿列克谢耶夫认为朝鲜半岛东南端的马山港湾又大又方便，将来应当成为太平洋舰队的主要基地，以代替他认为不太合适的旅顺口；目前则应当主要加强旅顺口的军事地位，巩固港口要塞群，并保证同俄国的海上交通联系，因为在他看来铁路很容易被切断。

阿列克谢耶夫这位关东总督始终把占领旅顺和建设大连看作是个大错误，这种心态可以从以下一个小小的事实看出来：日本人在日俄战争之后攫取了关东省，将其改名为“关东州”，将“达鲁尼”重新改名为大连（Dairen），并在城市和郊区到处植树造林。昔日光秃秃的、峭壁重叠的山岗很快覆盖了稠密的针叶林，植物的生长使得当地的小气候变得湿润多了，与邻近的日本的气候很相似，居住起来也很舒适。在俄国人占领大连时期虽然也有过类似的植树计划，但由于关东省总督府的漠不关心，只是开了几次会、成立了一些委员会而已。

中东铁路以哈尔滨为中心，向东至绥芬河车站的里程为511 俄里，向西至满洲里车站为876 俄里，往南通往旅顺和大连的建设里程为909 俄里。其干线（满洲里至绥芬河）分为13 个工程区段，支线（哈尔滨到大连）分为8 个区段，铁路沿线的车站平均每30 公里设置一座，全都采用汉语音译，比方说金州被称作“钦照奥”，盖州是“凯照奥”，营口被叫成“营考奥”，大石桥是“塔石


1900 年时的大连，从照片中可以看出，虽然俄国当局已经为其作出了尽善尽美的城市规划，但大规模城市建设尚未起步

俏”，只有奉天采用了“谋克敦”的满语发音。

按照维特的构想，建设这条铁路所需的铁轨、机车、车厢和各种铁路器材都从俄国采购，但是中东铁路公司为了加快铁路建设的速度，花高价从美国进口了铁轨、车辆和其他设备。为了修筑穿过大兴安岭的将近两公里长的隧道，一直到1904年为止都是租用的美国和意大利的凿岩机。机车和其他车辆购自美国、法国和比利时，枕木是购自加拿大和美国，中东铁路公司的轮船和铁路上的用煤是从日本九州的三井商社购进的，旅顺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守备队的菜牛是从中国山东的通商口岸烟台购进的。除此之外，来自中国、日本、美国以及西欧的货物，沿着已经铺轨的中东铁路南下支线，从大连这个自由港和牛庄的通商口岸蜂拥而入，这些货物在以来中东铁路过活的六万名铁路工人以及他们的家属当中找到了有利的市场，为此支付薪金的却是俄国——总的来说，俄国商人在这条铁路的修建工作中并没有捞到什么好处。

到1899年初，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向西的中东铁路干线已经铺设到绥芬河，并且在翌年1月开始了绥芬河至乌苏里斯克区段的客货运业务。到1900年初，从哈尔滨南下的中东铁路支线已经完成了路基的修建工作，并且在中东铁路局工程师基尔什曼的指挥下，率先铺完了支线的南段、也就是从旅顺、大连直到铁岭这段区间的铁轨。从铁岭南下的铁路从1898年9月开工，从旅顺北上的铁路是1899年4月开始的施工，到当年10月就铺到了辽阳，11月铺到了奉天。到1900年，已经完成了一亿平方俄丈的土方工程，挖掘了约10万立方俄丈的岩石，架设了500多座桥梁，砌了1.5万立方俄丈的石头桥。然而就在这年夏天，在东北大地上突然爆发了从关内传入的义和团运动，很快就破坏掉了将近一半的已完工路段。



1900年时的中东铁路建设中心——哈尔滨，近处是已经铺完的路轨，远处是松花江大桥



位于哈尔滨的中东铁路松花江大桥

义和团战争与“黄俄罗斯附属国”（上）

义和团的产生及其迅速发展，是由于清政府的软弱无能、地方当局的压迫、以及中国北方经常不断地发生的各种教案和自然灾害而造成的。老百姓对洋人的积愤主要是因传教士和教民的活动所引起的，由于某些列强，特别是德国在山东和俄国在满洲的侵略政策，使这种积愤在19世纪末更加强烈起来了。

义和团是由一种名叫“八卦教”的民间宗教演化而来的，八卦教以八卦之名分为八团，义和团最初兴起于山东的“乾”字和“坎”字两团，教民人教时要习拳颂咒，因此也被称为“义和拳”。在基督教教民与非教民冲突激烈的地区，不信奉基督教的农民往往在发生教案后大规模加入义和团寻求庇护，而后者借人数众多而获取势力。



中东铁路的客运列车，摄于1901年

义和团的首次骚乱发生在1898年，是在山东以反对传教士的暴动形式出现的。实际上这是在当时的中国经常发生的类似事件的重演，只不过规模更大而已。义和团开始焚毁传教士的教堂、学校、医院和慈善机关，并且屠杀传教士和教民。动乱很快从山东蔓延到直隶、河南、安徽、内蒙古和东三省等地。拳民为了避免被围剿而从一开始时就打出了“扶清灭洋”的旗号，致使清朝政府在运动爆发的初期不知道这件事会朝哪个方向发展，而持观望态度。总的来说，朝廷的态度是一方面因为义和团破坏现有秩序而视其为乱民，另一方面又由于他们好像追求爱国的目的而对其加以支持，甚至使这一教派合法化。山东巡抚毓贤宣布自己是义和团的保护人，对他们给予极大的支持。为了对驻京外交使团的抗议让步，清廷把毓贤调到了山西，而代之以袁世凯。袁世凯在幕僚的分析下，在山东省境内对义和团进行围剿，拳民转而大量涌入直隶省。

1900年1月，慈禧太后立端郡王载漪的儿子溥俊为“大阿哥”，即皇位继承人。载漪素以仇视洋人而著称，这次一下子靠“我儿子是大阿哥”抖了起来（比“我爸是李刚”那位可牛多了），兵部尚书大学士刚毅、军机大臣兼顺天府尹赵舒翘等人出于未来政治投机的目的而投其所好，义和团运动在这些官员的扶植下发展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当年5月初，英国公使窦纳乐爵士通过从外省逃往北京避难的西方传教士口中了解到，窜入京城的义和团企图袭击使馆区，大批屠杀外国人。不久之后，义和团焚毁了京津铁路和卢汉铁路（今京广铁路）的枢纽丰台车站，破坏了通往天津的铁路，与此同时还袭击了在正在保定府地区施工的卢汉铁路上工作的法国和比利时工程师，打死了十六个人，只

有五个人好不容易才逃了出来。

公使们见事态正在恶化，便向当时正停泊在大沽的各国海军军舰呼救。各国舰长向北京派出了一支由英、美、法、俄、日、意六国水兵组成的三百多人的联合部队，前去守卫使馆区，稍后有几十名德国和奥地利海军陆战队也参加了这支部队。与此同时，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中将向位于辽河口的营口派去了"勇敢"号炮舰，以保护那里的欧洲人居住区和海关码头，并且命令六艘俄国军舰前往大沽海面与各国军舰会合。这六艘军舰是战列舰"伟大的西索伊"号，装甲巡洋舰"季米特里·顿斯科伊"号，鱼雷巡洋舰"骑士"号和"海达马克"号，鱼雷驱逐舰"霹雳"号和炮舰"朝鲜人"号。"骑士"号和"海达马克"号将负责在旅顺口和大沽之间的邮件通讯联络。在旅顺停泊场，太平洋舰队在旗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的铁甲板上举行了送别祈祷，洒了圣水。

6月9日，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又接到沙皇直接发来的电报，要求他派出配有炮兵的陆军部队去北京。第二天清早，东西伯利亚第十二步兵团的全团人马，以及炮兵、哥萨克骑兵和工兵都登上了包括战列舰"纳瓦林"号和"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号在内的增援舰队，于6月10日抵达大沽。6月11日，驻津各国领事组织了一支两千人的联军，在英国海军中将、驻华舰队司令爱德华·西摩尔的率领下乘火车向北京开进，准备营救使馆人员，但在杨村、廊坊一带由于铁路被扒毁而受阻，与聂士成将军指挥的武卫军及义和团遭遇。

聂士成曾游历东北、俄国远东与朝鲜，对中外局势颇有研究，一向主张镇压义和团这种邪教，在6月初攻打天津租界时，由于义和团趁机四处焚掠，曾派兵镇压，杀死一千多名拳民，因而被义和团污蔑为"二毛子"。其武卫军官兵也由于使用洋枪洋炮、洋式操练而经常遭到义和团的攻击骚扰，因此聂士成这次命令义和团打头阵上前冲锋。这些狂呼"刀枪不入"的拳民在八国联军的机枪下伤亡惨重，掉头向回逃跑，又遭到武卫军的机枪扫射，被射杀殆尽，之后武卫军才与联军正式交火。西摩尔联军成员多是海军陆战队，不习陆战，加上武卫军配有克虏伯大炮和机枪等先进武器，因此联军作战不利，被迫退回天津，史称"廊坊大捷"。


1900年停泊在旅顺口外停泊场的"伟大的西索伊"号战列舰。该舰的海军陆战队参加了西摩尔远征军。1901年底，该舰因机械故障返回圣彼得堡修理，随后转入波罗的海舰队。1904年随第二太平洋舰队前往远东，1905年在对马海战中沉没


1900年从旅顺口前往大沽的俄国太平洋舰队"纳瓦林"号战列舰。它在1902年调往波罗的海舰队，1905年在对马海战中沉没

在五月底，各国驻京使团都认为这次动乱只不过是清朝历史上发生过多次的那种平常的反传教士运动。然而在6月11日，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永定门外的马家堡车站打听西摩尔联军所乘火车到站的消息时，被刚刚从南苑调往北京的董福祥统帅的甘军士兵杀死，并被剖腹挖心。京城居民闻讯莫不栗栗戒惧，知道将有大祸，而各国驻华使馆也纷纷质问总理衙门究竟有没有保护外交官的能力。当时清政府试图作出安抚人心的保证，声称发生的一切都是在未经政府批准的情况下造成的，并且建议外交使团在荣禄将军指挥的中国军队的保护下撤离北京。荣禄以仇视欧洲人而著称，因此使团拒绝了这一建议。

当时清廷内部对于如何处置义和团和外国使团的问题也存在着分歧，一些大臣，比如前驻圣彼得堡公使许景澄，就坚决反对与外国决裂。但是，为了转移已经开始发生的反清运动的方向，多数满族大臣和慈禧太后主张借义和团的力量把西方人驱逐出去。

在西摩尔联军向北京挺进的同时，停泊在大沽的列强军舰借口"一支中国陆军正在从芦台向大沽开进"、"中国军队在白河航道内布雷"等理由，蛮横地要求大沽炮台司令官交出炮台。在最后通牒过期后，联军在6月17日攻陷了大沽口炮台。

慈禧在收到大沽炮台失陷这一消息的同时，又得到了端王一伙人传来的虚假情报，以为列强的这次干涉行动是准备要求她归政给光绪帝，于是决定对列强开战。总理衙门奉命向各国公使馆发去最后通牒，以联军占领大沽炮台为由，再次要求各国驻华使团撤出北京。这个最后通牒令公使们惶恐不安。一些国家的使节主张听命逃往天津，而多数国家的公使认为路上会遇到困难，主张留在北京继续谈判。经过激烈的辩论，主张撤离的人占了上风，于是各国公使馆开始手忙脚乱地作离开北京的准备。由于通往天津的铁路已经被破坏，因此只能坐大车

离开。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男爵想弄清局势，在临行前向同行们提议要到总理衙门去一趟，弄清中国方面的态度。应该指出，克林德从一开始就对义和团运动十分不客气，曾经让防守德国使馆的卫兵向逼近使馆的团民开枪。在乘轿子前往总理衙门途中，克林德在东单牌楼北边的西总部胡同西口同正在巡逻的神机营发生冲突，双方展开了枪战，克林德在交火中被打死了。这个事件吓得在京外国人丧魂落魄，打消了离开北京的念头，决定在使馆区构筑街垒、采办粮秣、“就地自卫”。

第二天，慈禧太后颁布诏书，以光绪帝的名义对“彼等”（即当时在北京设有公使馆的英、法、俄、德、美、日、奥、意、荷、比、西等十一国）宣战，并且开出了悬赏捕杀洋人的赏格：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长期以来列强军队与清军和义和团持续不断的军事冲突至此终于演变为正式的战争。


义和团战争期间派往大沽口的俄国太平洋舰队炮舰“朝鲜人”号

在5月21日向总理衙门提交联合照会（向驻京使馆增派护卫士兵）以前，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并未参加欧洲各国驻华公使团对中国政府提出要求和抗议的共同行动。俄国外交部保有一份自1891年起在中国内地发生的、以及自1899年2月起在满洲地区发生的排外骚动的详细记录，因而能够充分了解这些骚乱的严重程度。俄国外交分析家认为，义和团的仇恨主要是针对欧洲人的传教活动，这种活动由于欧洲的商业和铁路利益渗入中国内地所引起的经济竞争而加深了。对于这两种活动，俄国在长城以南、尤其是义和团运动发展最快的山东和直隶两省，都参加得不多。当时在上海有一个俄国东正教堂，在天津也只有25名俄国男人和7名妇女。在北京有一个俄国传教会，在安定门外有一个小小的阿尔巴津哥萨克后裔社团，也从未进行过积极传教的活动。总的加起来，如果不算隶属于俄国外交和领事系统的几十名工作人员的话，1900年初在山海关以内的俄国臣民和侨民还不到250人。在关内的俄国东正教会，如同东三省一样，并不像天主教或新教各教派那样积极从事向中国人传教，改变他们宗教信仰的活动。为数很少的中国东正教徒基本上都是由于同俄国人的密切接触（比如在1896年由驻天津领事创办的俄文学堂就读）才对其宗教感到好奇、并进而受洗入教。

在除旅顺大连地区以外的东三省，在1900年春天时有1500名俄国平民，他们当中包括中东铁路的工程师和职员，华俄道胜银行在哈尔滨、吉林、奉天和牛庄等地的分行职员，隶属于中东铁路的烟台煤矿（在辽阳北边）和松花江航运公司的职员，此外还有大约4500名护路队员。当年3月，中东铁路的哥萨克护路队和驻扎在奉天省的军队发生了一次冲突，波兰裔的扬科维奇上尉和两名哥萨克士兵在冲突中被打死。



清末奉天城内的法国天主教堂

东三省地区的义和团运动是五月份从内蒙古地区传入的，接着又有几个“大师兄”从山东来到奉天，试图发展新团员。但是由于住在这个城市的安定居民不赞成暴乱政策，因此他们只是在奉天的最贫困阶层中，在乞丐、游民和赤贫者当中招募了一些新成员。

甚至在六万名参加中东铁路及其南下支线修建工作的中国工人——其中一大半来自义和团的发源地山东省——当中，义和团也没收到什么成效。在华北地区，欧洲人兴建的铁路夺去了数以万计本来从事运输行业的人的工作，增加了居民的生活困难；而东北三省的俄国铁路并没有破坏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在这一地区，由于地旷路遥，除了利用辽河和松花江外，没有其他的办法来经营大规模的运输业；而在辽河和松花江流域地区，由于铁路尚未完工，所以运输业也几乎不受铁路竞争的影响。与此相反，由于其规模宏大，它不仅维持着六万名参加筑路工作的中国工人的生活，而且还维持着数万名当地居民的生活，这些人可以经营包办铁路职工伙食的好生意，并且向他们出售各种日用物品、出租马车、出售烧酒。

总的来说，义和团战争在东三省的表现形式和直隶省是截然不同的，在直隶地区，战斗是在较小的几支欧洲军队（包括守卫北京使馆区的士兵和从天津向北京开进的联军）与一股股由中国平民和士兵中的狂热分子组成的义和团之间进行的。而在东三省，军事活动从一开始就是由当地正规军和

受正规军军官指挥的辅助部队（包括义和团成员，但人数并不多，更多的是在6月21日颁发宣战诏书后被官军招募收编的“红胡子”武装）进行的。此外在这两个地区，战斗的形式也不同：在直隶地区，由于乡村人口稠密，视界狭窄而受限制，非常适于中国方面采用突袭和伏击前进部队的战术，给联军造成惨重的伤亡。而在东北地区，特别是在从“中立地区”直至哈尔滨的广阔的平原地区，坡度平缓的丘陵和稀少的人口容许俄国军队有机会对他们的军队作战略上的调动，并使用步兵和炮兵火力的最大射程来发挥他们在装备上的极大优势。

义和团战争期间侵入北满地区的西伯利亚第二军司令扎苏利奇将军正在检阅部队



从1900年6月初开始，俄国军事当局即密切注视着直隶地区义和团运动发展的趋势，同时加紧进行战争准备，寻找进攻满洲地区的时机。6月8日，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中将宣布关东省进入战争状态，命令军队作好临战准备。6月15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命令驻伯力的阿穆尔军事总督格罗德科夫中将制订进攻东北义和团及清军的作战计划。

6月17日，八国联军侵占大沽，沙皇尼古拉二世便于6月23日宣布在阿穆尔军管区进行战争动员，全区进入战争状态，并立即编组先遣军。接着，在沙俄亚洲部分的西伯利亚军管区和土耳其斯坦军管区，以及欧洲部分的某些地区实行动员。7月6日，尼古拉二世宣布自任俄军总司令，陆军大臣克鲁泡特金公爵任总参谋长。不久，俄国陆军部下令将原驻阿穆尔地区的西伯利亚军改编为西伯利亚第一军，并将新征调的部队进行统一编组和部署：

西伯利亚第一军：分别集结于关东省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包括作战部队约34300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32个营）、骑兵14个连、工兵一个营又一个连、炮兵两个营又六个连（装备各种火炮96门）。

西伯利亚第二军：集结于哈巴罗夫斯克，作战部队约36200人，计有步兵四个旅（32个营）、骑兵一个混成师（共27个连）、工兵一个营、炮兵两个营又七个连（装备各种火炮90门）。

西伯利亚第三军：集结于赤塔－涅尔琴斯克地区，作战部队约31300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28个营）、骑兵一个师（共25个连，其中有一个装备6门炮的骑炮连）、工兵四分之三个营、炮兵九个连（装备各种火炮70门）。

登陆军：集结于乌苏里斯克和符拉迪沃斯托克地区。作战部队约33700余人，计有步兵四个旅（共32个营）、骑兵13个连（一说11个连）、工兵一个营又一个连、炮兵三个营又一个连（装备各种火炮78门）。

以上共有作战部队约13.5万人，火炮328门。此外，远东和阿穆尔地区各要塞和军区尚有留守部队四万余人。与此同时，中东铁路公司又向东北三省铁路沿线增派哥萨克护路队，将其由原来的6000人扩充至11000人。

东北地区的义和团成员正在拆毁铁路



由于俄国人这些过于明显的增兵威慑行动，从6月下旬开始，黑龙江将军寿山认为同俄国开战不可避免，主张先发制人，而盛京将军增祺和吉林将军长顺则试图与俄国保持友好关系。这两人预见到义和团运动在东三省地区没有真正的基础，而一旦出了乱子，他们就是别人过错的头一个替罪羊。除此之外，俄国人还使出了惯常的老手段——行贿，维特发电报指示华俄道胜银行给东三省的每个将军各开一笔15万卢布（当时合库平银10万两）的账户。如果他们能够控制本省、并在义和团已经开始闹事的地方对其进行镇压的话，这就算是第一笔付款。

不过，义和团派去的代表还是取得了盛京副都统晋昌（俄国人称他为“二大人”）和吉林伯都讷副都统嵩昆的支持和同情。在盛京，由于晋昌鼓动义和团的行为妨害了增祺将军的威信，因此他颁布了反对义和团的告示，将其称作“暴徒”。但是这个告示却起了相反的作用，因为当时盛京的大部分官员和军人都同情义和团，他们开始指责增祺缺乏爱国精神、姑息俄国人，并管他叫“假洋鬼子”。6月21日慈禧太后对十一国宣战后，相关的敕令也传到了奉天，并且任命晋昌为义和团首领，命他招募和组织拳勇，奉天户部和刑部的侍郎也被授权领导义和团同洋人作战。

增祺将军担心自身的安全，没有阻止晋昌的行为，但是又在6月29日做了

一次阻止义和团的尝试：他为了戳破义和团“刀枪不入”的神话，找了几名志愿者做试验，他们站在奉天城的墙根下，士兵们对他们齐射，但实际上用的是空包弹。当然，这些拳民没有受伤，因此围观群众陷入了笃信“神功”的狂热状态。增祺看破了士兵们的把戏，下令又找来几名志愿者，并警告说这次用的是实弹。这些拳民同意了，结果当然被打死了。增祺下令把他们的头割下来，当作骗子示众。众拳民怒不可遏，嚷嚷起来，说义和团原本有起死回生的法术，将军无权砍下这些尸体的头。此时围观者的愤怒加剧了，奉天城内开始出现一片混乱，大街上出现了一群群的义和团，号召人们去杀洋人和教民。

居住在奉天城中的外国传教士看到局势正在恶化，就赶忙离开了，他们跑得也正是时候，因为次日义和团就攻击了奉天的罗马天主教会，杀死了5名没有跑掉的教士以及一些躲入教堂的中国教民，烧毁了城中的欧洲人医院，并攻打位于城墙外10公里处的中东铁路奉天车站，烧掉了站房和俄国兵营。由于这次袭击行动既出乎意料又非同寻常，因此俄国当局没有特别重视它。自此事件之后，增祺就完全被晋昌架空，从此只好随大流了。

7月4日，晋昌都统发动了一场政变，率领义和团推翻了增祺将军，将他软禁在将军衙门里。接下来，晋昌以增祺的名义发布了命令，驻扎在奉天省的清军正规部队和义和团向铁路沿线所有的俄国人哨所同时发动了进攻。从旅顺到铁岭这段区间已经建成的铁路有489俄里，而义和团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就拆毁了275俄里，破坏最严重的是北段，即铁岭到海城的那一段。在当时铁路上的1600节车厢中，被损坏、烧毁和破坏的有700节，六十辆火车头中

中东铁路辽阳车站，远处为辽阳城及辽阳白塔



有17辆落入到义和团手中，其中11辆在辽阳火车站被破坏。义和团还剪断了铁路沿线所有的电报线，捣毁了所有车站和铁路员工的住房，并且烧毁铁路桥梁4500丈，迫使中东铁路工程全面停工。

在7月4日到6日的三天里，帕维尔·巴甫洛维奇·米申科上校率领两百多名哥萨克护路队队员和104名带有家眷的中东铁路员工，被围困在距离辽阳城墙10俄里的中东铁路火车站鼠疫隔离病舍里（当时辽河流域爆发了鼠疫疫情）。守卫队员顽抗了三天，在6日晚上趁夜色溜出了辽阳火车站，逃往南边的鞍山站，在那里遇到了从营口赶来救援他们的库班哥萨克骑兵部队。这些狼狈逃跑的俄国人在辽阳扔下了价值3万卢布的11辆机车，总长度256俄里的已完成的铁路，许多节车厢和载货平车，中东铁路局的许多贵重物资和员工的私人财物，和价值2万卢布的白银。

在辽阳南边的沙河车站，两百多名义和团成员在7月4日当天包围了车站上的十八名铁路员工和哥萨克护路队成员，将其击退到车站营房里，然后在四周堆上稻草，准备用火烧。这时两名俄国司机驾驶一辆蒸汽机车赶来救援，火车头上搭载着五名哥萨克，他们用步枪向拳民射击，被围的俄国铁路人员趁机逃出营房，逃往辽阳。在辽阳北边的铁岭，俄国人逃跑时丢下了价值40万卢布的白银（用来支付中国工人工资的费用）。在当地的北段铁路上工作的工程师希德洛夫斯基和斯列金斯基等人在铁路守卫队的护送下一路向北逃跑，最终逃到了哈尔滨，而为铁路工作的一些中国译员和绘图师却被这些俄国人丢了下来，被当作“二毛子”砍头杀死了。

在奉天，当地的车站和铁路工地在7月4日晚上遭到了驻扎在奉天城外的清军的炮轰，俄国铁路工程师韦尔霍夫斯基和外里海第二步兵营军官瓦列夫斯基中尉带领一些铁路员工和两名俄国妇女，在84名护路队员的护送下往南逃往旅顺方向。在苏家屯车站，他们试图寻找留在那里的12名护路队员和5名俄国铁路工人，但赶到那里之后没有找到一个俄国人。原来，除了3名队员和两名工人之外，苏家屯站其余的俄国籍铁路工作人员以及为中东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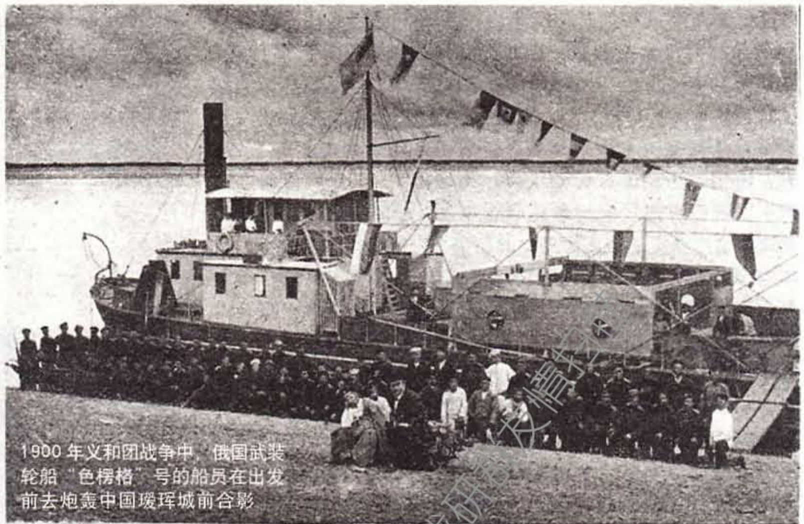


俄国人描绘的在辽阳城处决中东铁路工程师韦尔霍夫斯基和护路队成员（左图）、及将其头颅悬挂示众的情景

路工作的中国员工都已经被义和团杀死了。这时一支清军部队从奉天赶来，追击瓦列夫斯基一伙，打死打伤了15人。剩下的俄国人逃到辽阳北边的烟台煤矿，在那里又遇到了从辽阳派来的军队。7月7日，这些俄国人躲到辽阳城外的太子河畔，发现米申科上校和辽阳站的俄国人都已经撤离了。

瓦列夫斯基决定向东逃往朝鲜，韦尔霍夫斯基则建议逃往营口。这支队伍分成了几伙，沿着太子河偷偷向西逃跑。7月8日，瓦列夫斯基被中国军队发现，被一枚小口径鹰炮炮弹打中了胸口，他在临死前给其余人下的命令是“一定要往朝鲜逃”。有50名护路队员听从了他的命令，成功逃到了朝鲜，但是韦尔霍夫斯基带着大多数铁路员工和14名护路队员继续逃往营口，但在途中被中国军队抓住了。在当地官员的命令下，在辽阳城墙下面将这些俄国铁路员工和哥萨克护路队队员公开处死，随后将其头颅装在笼子里，挂在辽阳的城墙上示众。

7月6日，分别在吉林城和齐齐哈尔城公开贴出了据称是由北京的皇上签署的敕令，命令当地的中国正规军队和义和团联合起来，攻击俄国人。这张敕令贴出来之后，事态的发展就具有对俄公开作战的性质了。在北满地区，军事行动是在黑龙江将军寿山的掌握下有秩序地展开的，并没有义和团那种无秩序的狂热过火行为。7月8日，寿山向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提出建议，要求他把所有的俄国妇女和儿童撤出哈尔滨，并通过水路安全地送到哈巴罗夫斯克。7月10日，进驻海拉尔的清军也事先警告了在那里的俄国侨民和铁路员工，要求其撤出这座正在施工中的城市，与从富拉尔基车站（在齐齐哈尔南边）撤回的中东铁路职工家属一道，沿着尚通行无阻的铁路线撤回到俄国境内。



1900年义和团战争中，俄国武装轮船“色楞格”号的船员在出发前去炮轰中国瑷珲城前合影

7月12日，第一批俄国妇孺登上中东铁路公司的松花江汽船，平安地离开哈尔滨。到7月24日，从哈尔滨撤走了最后一批2500名铁路职工及俄侨家属。剩下的一千多名中东铁路职员和工人组成“义勇军”，与哥萨克护路队成员一道留在哈尔滨。在接下来同义和团及清军的战斗中，中东铁路建设总局所在的香坊地区遭到围攻，当地的气象局、小学、商店和铁路物资仓库均被焚毁，俄国人向西退踞到地势最高的秦家岗（今哈尔滨南岗区）一带负隅顽抗。在义和团战争结束后，由于原先被中东铁路公司选为“松花江市”中心的香坊地区遭到很大破坏，俄国人以南岗地区为中心建设了新的哈尔滨市。

在吉林地区，局势比黑龙江混乱一些。当地的俄国铁路工作人员分不清攻击他们的究竟是中国正规军，还是红胡子，还是义和团，还是当地村民，亦或是这些人当中的某种联合。一些偏远村庄的村民自发地前往铁路附近，把正在向东撤退至俄国境内的火车搞出轨，然后拆走机车锅炉上面的铜管和其他零件，拿去打造农具和脸盆。在珲春地区，此前一直较为温和的朝鲜移民趁乱对当地的中国垦殖者发动了血腥屠杀，试图将这里变为“纯种”的朝鲜人地区。



1900年7月俄军从布拉戈维申斯克炮轰对岸的黑河屯的情景

布拉戈维申斯克（海兰泡）的俄国哥萨克驻军在阿穆尔军区发布动员令后就向哈巴罗夫斯克集中，并被编入了西伯利亚第二军。7月12日，按照俄国、苏联和西方研究者的说法，驻扎在河对面瑷珲城的中国军队开始向在黑龙江中航行的俄国军用货轮“米哈伊尔”号和“色楞格”号开火（事实上俄国陆军大臣在7月9日即下达了入侵满洲的命令）。第二天，中国炮兵开始还击，从黑龙江的这一边炮轰布拉戈维申斯克城。阿穆尔哥萨克军统领格里布斯基将军收到了黑龙江将军寿山从齐齐哈尔给他发去的电报，通知说由于俄国军队正在进入满洲，因此他下令炮轰海兰泡。格里布斯基随后在《阿穆尔边区报》上发表了《给阿穆尔哥萨克人的号召书》，要求“健壮倔强的阿穆尔子孙们拿起武器，以哥萨克方式，坚决地、迅速地清除掉那些破坏和平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要为不必要的请示和等待批准浪费时间。”报纸上还刊登了格里布斯基的另外一项命令，即各地邮局收到这份报纸后，马上在所有哥萨克人居住的地方进行宣读。

连俄国和苏联史学家也承认，清军对布拉戈维申斯克的轰击并不严重。在此后的三个星期里，中国炮兵从黑

龙江对岸断断续续地时不时炮击这座城市，但是由于大炮口径小、加上发炮技术差，因此大部分炮弹都没有打到市区，而是落在了城市外头。在整个炮轰期间，布拉戈维申斯克城仅有15人到20人伤亡，外加一些微不足道的物质损失（俄军向对岸的黑河屯和瑷珲城开炮射击造成的损失更大）。然而，所谓“中国军队可能入侵这座城市”、以及居住在当地的中国侨民可能“发动暴乱里应外合”的假情报，却着实在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俄国居民中间引起了一阵恐慌。根据1860年的《北京条约》，中国的流动工人、小商人、农民、淘金者、工匠和手工业者可以自由地往来于国境线俄方一侧一百华里的地区，并且定居下来。当时在3.8万人口的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及其近郊地区，有将近一半是中国人。俄国当局认为，如果这些人在清军越江进攻时起来反对俄国人，将很容易影响战斗的结果。因此在7月14日，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俄国军事当局不顾格里布斯基将军此前向城中中国人作出的保证，决定“采取果断措施”，把城里和附近村庄中的中国人全都驱逐到黑龙江对面的中国领土上去。

格里布斯基曾经对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中国侨民许诺说，尽管中国以皇帝的名义对俄国宣了战，但他们仍可以“无所顾虑地留在居住的地方，因为你们是在伟大的俄罗斯帝国的土地上，这个帝国的政府永远不会允许和平的外国人遭到骚扰”。然而到了7月16日，他便毁弃了自己的许诺，以所谓“从中国人的住处搜出了枪支和炸药”、“中国人即将发动暴动”为借口，宣布将阿穆尔军管区及布拉戈维申斯克城置于军事管制之下，命令当地警察局一个不留地逮捕城中以及郊区所有的中国人。全副武装的俄国士兵闯进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里，不分男女老幼，一律逮捕押走，就连怀抱的婴儿也被强拉了出来。有1500多中国人逃到城外躲藏，也被俄军搜

布拉戈维申斯克城南的结雅河（精奇里江）江口




布拉戈维申斯克城的警察和哥萨克将国捕到的中国人辫发捆在一起，准备押至江边屠杀


1903年在布拉戈维申斯克江边散步的中国人（右侧），在照片左侧可见几门老式大炮和中国式的炮架车，这是义和团战争中俄军在对面瑷珲城缴获的

出，许多人被刺刀活活捅死，活着的人被赶进警察局。这一天共搜捕了近3500人，警察局容纳不下，于是这些人在当晚又被押送到结雅河（精奇里江）畔的一个锯木场里（法国目击者利奥·多伊奇说，当夜关押中国人的是一座废弃的哥萨克村庄）。

根据利奥·多伊奇（有趣的是，他是一名反斯拉夫主义者，对所有的俄国事物都持批判的态度）和中国幸存者的描述，7月17日清晨，布拉戈维申斯克警察局把所有在城里逮捕起来的中国人赶到黑龙江边，谎称用船将他们渡过对岸，可是岸边连一条船也没有。到了江边，哥萨克士兵便挥动战刀，把所有的中国人一直赶进水里。当妇女们把他们的孩子抛往岸上，乞求至少饶孩子一命时，俄国士兵却逮住这些婴儿，挑在刺刀上，并将婴儿割成碎片。其他的人则被哥萨克用马刀赶到了河里，此段的黑龙江江面约有半英里（800多米）宽。据利奥·多伊奇说，俄国人强迫这些中国男人、妇女和儿童“自己游过河去”，当这些难民正在游泳时，对岸的中国军队朝他们开了火，而俄国哥萨克兵“也开玩笑似的开了火”，结果只有一些最强壮的人游到了对岸。

不过，据另一位非俄国的目击者，《泰晤士报》和《伦敦新闻画报》的图片记者史密斯－德里恩上尉的说法，当时有许多中国难民是用俄国人提供的木筏过河的。当对岸的中国军队透过晨雾模糊地看到逐渐接近的木筏满载着认不清面目的人群时，他们可能猜想是俄国人在渡河，于是向他们的同胞开了火。木筏上的中国人在惊恐之中挤翻了木筏，许多人掉入河中淹死了。无论这两种说法哪个是真的，事实是俄国当局这种灭绝人性的驱逐行动一直持续到7月21日。到7月22日，阿穆尔军管区宣布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内的中国人已经被全部“肃清”了。根据后世学者的估计，大约有三千到五千名无辜中国人死于这次屠杀（五千名是加上了江东六十四屯屠杀的受害者数字）。

根据1860年的《北京条约》，清帝国将黑龙江左岸的所有土地都割让给俄国，但结雅河以南的江东六十四屯仍由中国人居住，由中国官员对其进行管辖（主权则属俄国）。俄国人当时同意在江左保留一块供中国人居住的飞地，是为了给阿穆尔地区的俄国移民提供粮食。这一地区北起结雅河江口，南至霍尔默勒津屯，最初南北长一百五十华里左右，东西宽约八十华里。到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着俄国远东移民

数量的增多，对土地的需求压力增大，而黑龙江下游地区属于沼泽地带，上游为茂密的原始森林，最具备耕种条件的就是江东六十四屯周围地区了。俄国人开始慢慢蚕食这一地区的荒地和草甸，到1883年时，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缩小为南北一百四十里、东西四十二里，面积约1600平方公里。

在雅克萨战役时，为了供应军粮，清廷在当地设立了一些满族和达斡尔八旗的军事屯垦村庄，通称为“江左旗屯”，又按照屯子的数目称为“江东二十八屯”、“三十余屯”、“四十三屯”、“四十八屯”等等。在1900年时，这里有六十四个村庄，因此被称为“江东六十四屯”。根据俄国1881年的最后一次人口统计，当地有中国臣民一万四千人，其中汉人八千六百人，满族四千五百人，达斡尔族九百人，共1266户。当地的满族村屯多集中在沿江一带，达斡尔村屯则位于东部和南部。清末光绪年间随着开放东北边禁，大量汉人移民到这里，或单独建屯，或在满族和达斡尔族村屯中与其混合居住。这些汉人移民绝大多数来自山西和山东，与当地的旗人一道种植大豆、小麦、小米等作物，并且酿造烧酒，所需的农具和布匹则由江右中国地区供给。根据俄国《阿穆尔边区报》的统计，到1900年时，居住在江东六十四屯地区的中国人口约为3.5万人，除去1.5万名伐木工人和商贩等流动人口外，常住中国居民约有两万人左右。

7月17日当天，当俄国当局开始在海兰泡屠杀中国人后，清军统领王良臣率部队携带火炮渡过黑龙江，准备保护屯民。这支部队在布尔多屯地区与当地俄军哨所交战，随后于次日退回中国境内。得知此讯后，一些居住在周围地区的俄国哥萨克退伍军人和小股的正规部队（隶属于阿穆尔驿路警卫队的哥萨克骑步兵）在江东六十四屯地区对中国居民的村庄进行了多次扫荡，仅在布尔多屯及其周围的几个村子就杀害了近千人。在有的屯子里，俄国兵把中国人驱聚到一间大屋中，然后点火焚屋。其他屯子的房屋也大多被俄国兵放火焚烧，居民遭到枪杀。接下来俄国兵又将一些沿江屯落的居民，不分男女老幼、农夫工匠、负贩商贾，统统驱赶到黑龙江边，强迫其“游回满洲去”，上千人在江中溺水身亡，生还者只有六七十人。这场屠杀被称为“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江东六十四屯示意图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后来和“海兰泡惨案”合称为“庚子俄难”。

7月31日，布拉戈维申斯克市议会举行会议，授权格里布斯基征用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所遗弃的粮食、家畜，收获庄稼，以供民用和军需，拍卖海兰泡中国居民的财产，利用中国人的住宅和商店为军用医院和军人宿舍。中国居民的全部田园财产均被沙俄军事当局征用和没收。

在“庚子俄难”中遇害的中国居民的财产损失没有精确的统计数字。据清朝东北地方当局的估计，仅江东六十四屯人民所遗房产、牲畜、粮食、犁具及资财器物，就约值五六十万卢布（另一种估计为三百余万两）；土地损失约为一百万卢布（每俄亩按十卢布计算），总数不少于一百五六十万卢布。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市内，仅中国人开设的大商号就有二百三四十家，小商小贩布满全城。据俄国人记载，“中国人居住区有几百间商店和仓库，其中有价值千百万卢布的贵重物品”。根据估算，中国商人、雇工、农民、工匠损失的货物、现金、房产、家私、粮食等等，其价值绝不少于100万卢布。再加上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损失，总共约为250万卢布左右。

当然，对于居住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华人来说，海兰泡惨案和江东六十四屯大屠杀并不是他们遭遇到的最后一次灾难。在1910年时，居住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中国定居者大约有15万人，此外每年春季进入俄国境内寻找工作、冬季带着工钱返回中国的季节性劳工在7.5万到20万人之间。在1917年时，远东地区的华人数量达到高峰，大约有35.5万人。俄国革命后，由于苏联一度实行“新经济政策”，之后


海兰泡及江东六十四屯屠杀的主要凶手——阿穆尔哥萨克军

又致力于开发远东和滨海边疆区，因此东北三省和山东每年仍有十多万季节性劳工前往苏联远东地区寻找工作，并在当地从事商业贸易、城市和道路建设、林业采伐、捕鱼等工作。在1926年苏联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时，定居在苏联的中国人有10万左右，其中三分之一居住在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市有22%的居民是中国人。

在1937年和1938年，一场比海兰泡屠杀更加深重惨痛的灭族之灾降临到苏联境内的华裔苏联公民和华侨身上。根据斯大林的命令，对居住在远东地区和莫斯科的华人，特别是对居住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哈巴罗夫斯克一带的中国人展开大搜捕。许多无辜的中国人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安上“社会危险分子”、“有害分子”或者“日本特务”的罪名被枪决，轻者动辄被判处八年、十年、十五年徒刑，其家属则流放到边远地区。当时在远东地区被逮捕的中国人大约为11000名，被流放的有18000人左右。一些拥有苏联公民权的华人比较幸运，可以和远东朝鲜人一道被流放到中亚地区，但没有苏联国籍的华侨则大多数被押往北极地区，无论乘船乘车，一直押送到没有道路的地方为止，然后便将其推下车船，丢下一袋土豆之后便任其自生自灭。到第二年春天，内务部军人持枪前往流放地，如果发现幸存者，就命令其原地垦荒，种植粮食交公，到时候交不出粮食便就地枪毙。

到1938年苏联国内的“大清洗”运动登峰造极时，远东地区的排华气氛也达到恐怖至极的顶点，甚至有中国边民前往苏联境内城镇购买日用物品、或者中国林业工人在黑龙江一侧流放木排时被江水卷到苏联一侧的，也都被安上“日本间谍”的罪名逮捕判刑。当时在远东地区已经存在了三百多年的华人社区至此被彻底扫荡一空。经历过北极地区残酷的流放、战后能够返回原住地的华人幸存者寥寥无几。

山东商人在海参崴城内开设的商号





在海参崴街头卖艺的中国杂技演员，后面人群里有一名俄国警察



哈巴罗夫卡（哈巴罗夫斯克）火车站外的中国劳工



在哈巴罗夫斯克江边散步的中国妇女

除了华人之外，当时居住在滨海边疆区和阿穆尔州、主要耕种稻田的十八万朝鲜族苏联公民也遭到种族流放，被放逐至中亚的哈萨克斯坦地区。据1938年叛逃到日本的内务人民委员部远东地区头子格奥尔基·留希科夫大将说，对朝鲜人和华人流放的原因是斯大林不信任黄种人，认为如果放任他们居住在远东地区，日满方面势必会派遣华人和朝鲜人间谍，因此“从防谍角度考虑”下令对黄种人实施了种族流放，之后沿着边境线苏联一侧划定了宽20公里的无人区，任何人进入这一地区都格杀勿论。

2009年10月，俄罗斯远东滨海边疆区为了迎接2012年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市郊区修建道路，筑路工人发现了好几座掩埋中国人遗骸的集体墓冢，在其中一座墓冢当中发现了两百多具中国人的遗骨，以及皮衣、皮鞋、烟斗、中国秤、中国象棋、中文和俄文报纸，其中一份报纸的日期是1937年9月18日。根据推测，这些华人可能是在1937年内务部队围剿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内的华人聚居区“百万街”的行动中被逮捕并杀害的。

在血腥驱逐和屠杀了当地的中国人后，布拉戈维申斯克城中的俄国居民自知犯下罪孽，时不时地处于“中国军队即将渡江前来报复”的歇斯底里性恐慌中。当时在其对岸的黑河屯（今黑河市市区）和瑷珲城之间驻扎有一万八千人的中国军队，以及45门大炮，而俄国这一边的正规部队早已被抽调走。7月17日王良臣部队的渡江护侨行动加剧了这种歇斯底里的情绪。直到7月28日，一支俄国部队从斯列坚斯克经水路前来增援——这支部队曾因石勒喀河水位低而受到阻碍，布拉戈维申斯克的俄国人才安下心来。

顺便多说一句，这些俄国居民当中许多人的下场也很有意思。十月革命后，当俄国工农红军消灭盘踞在远东阿穆尔地区的谢苗诺夫白军势力之后，一些赤卫队成员在布拉戈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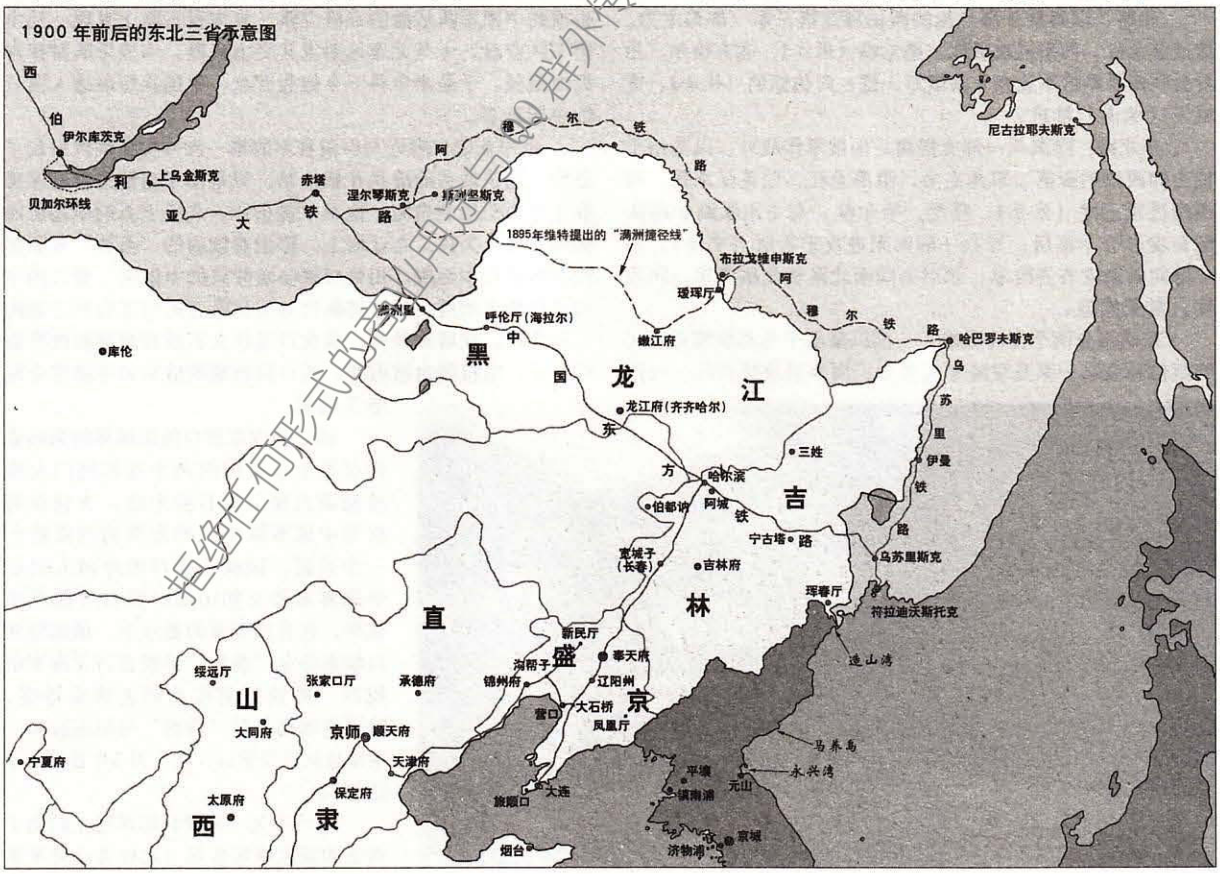
申斯克城中搜捕来不及逃到对岸中国境内的“反革命分子”，将许多旧沙俄官吏、富商、警察等“阶级敌人”及其家属武装押送到冰封的黑龙江江面上，然后将其活活扔进冰窟窿里。据称当时“黑龙江江面上俄人妇孺哭声震天”，对岸黑河屯和瑷珲城的中国居民闻声站在江岸上遥望，一边咂舌，一边直说“报应，报应”。

7月22日，格里布斯基的间接上司、阿穆尔省军事总督格罗德科夫将军在哈巴罗夫斯克获知了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发生屠杀事件的消息（当时已经有许多尸体漂到了哈巴罗夫斯克一带的江面），于是在当地的报纸《东方评论》上对布拉戈维申斯克居民和其他一些人的行为提出严厉警告，说“那些犯有杀人罪、抢劫罪和对和平的、手无寸铁的中国人采取其他暴行的人，将要受到审讯，并将按照军事法受到严厉的惩处”。7月28日和8月18日，格罗德科夫又两次重申了这道命令。但是即便在这之后，沿着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又发生了许多起大规模驱逐中国人、以及在俄国境内（有时甚至越境）有组织地袭击和屠杀中国人垦殖村庄的事情，有几百名中国人遭到杀害。在涅尔琴斯克、斯列坚斯克、哈巴罗夫斯克和乌苏里斯克，甚至在大多数居民（包括中国人和俄国人）保持着良好秩序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都出现了市民恐慌和中国人大批离境的情况，在当年夏天七八月间，有四千多名中国人逃出符拉迪沃斯托克市及其郊区。

8月2日，利用黑龙江夏季涨水的机会，俄国军队采取了攻势，在布拉戈维申斯克地区渡过黑龙江，攻占黑河屯和瑷珲城。在黑龙江上，格罗德科夫派出武装轮船，沿黑龙江、额尔古纳河和乌苏里江面来回航行，袭击并焚烧中国一侧的边境卡伦哨所。8月14日，格罗德科夫下令把黑河屯改名为“伊林斯基一号哨所”，而已被俄军焚毁、只剩下一座兵营和一座火药库的的瑷珲城被改为“玛丽娜·玛格达雷娜二号哨所”。在呈给尼古拉二世的贺信中，格罗德科夫说：“五十年前的八月一日（公历8月14日），涅维尔斯科依在阿穆尔河口、该河的左岸升起了俄国旗，并奠定了我们对这条伟大河流的所有权。现在，经过顽强战斗，我们占领了阿穆尔河右岸，从而将巩固把整个阿穆尔河归并于俄国领土之内——使该河成为内河、而不是界河——的伟大事业。”

在这种狂热情绪的鼓励下，沙文主义的格里布斯基在8月17日发表了要吞并黑龙江右岸的张狂的文告。虽然这项未经批准的专横行动在8月25日被俄国最高当局否决，但吞并黑龙江右岸地区的主张在格罗德科夫那里也找到了共鸣。他提出将中俄边界大大向南推进，以大兴安岭、伊里胡里阿赖、小兴安岭、那兰哈达、肯特阿赖、老爷岭等山脉的山脊划界，“一定要取得纵深达到划分阿穆尔河流域和满洲平原的分水线的土地”，“如果将满洲一边的河岸归还给中国，那就终将导致对阿穆尔河沿岸的俄国领土‘判处死刑’的后果”。

俄国最高当局也并不赞成格罗德科夫的意见。1901年5月，在阿穆尔省成立了军事法庭，对海兰泡屠杀和江东六十四屯屠杀事件进行调查。审讯工作一直到1902年2月才结束，当时俄国内政、司法和陆军大臣取得了一致意见，把事情了结了。格里布斯基将军被认为应对“驱逐问题处理失当”而负责，但是鉴于他“过去的功劳”，只是把他调到总参谋部。布拉戈维申斯克城的军事司令官被判处三个月监禁，然后撤销职务。实际负责驱逐中国人过河



1900 年前后的东北三省示意图

阎京生绘制 Illustrated by Yan Jingsheng

的当地警察局局长被判处监禁三个月。对于所有其他的控诉，一概不再受理。

义和团战争与“黄俄罗斯附属国”（下）

1900年7月9日，在维特的请求下，俄国陆军大臣克鲁泡特金下令俄国军队侵入满洲，“镇压义和团暴乱”。同日，萨哈罗夫将军带领四个步兵营、三个哥萨克连和26门大炮，乘汽艇和驳船离开哈巴罗夫斯克，前去“解救”哈尔滨。他在8月2日赶到哈尔滨，此时尤戈维奇指挥的中东铁路“义勇军”和哥萨克护路队已经同中国军队打了快一个月的仗。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清廷因京城危急，已经无力顾及东北三省的危局。俄国陆军大臣克鲁泡特金公爵抓紧这一时机，分别于7月18日和22日致电在哈巴罗夫斯克的格罗德科夫和在旅顺的阿列克谢耶夫，指示俄军三路从北部（铁岭以北，含吉林、黑龙江省）、一路从南部进攻满洲地区：北部由西伯利亚第二军、第三军及登陆军一部担任主攻，司令部设于哈巴罗夫斯克，由阿穆尔军事总督格罗德科夫中将任总指挥；南部由西伯利亚第一军及登陆军一部担任主攻，司令部设于旅顺，关东省总督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中将任总指挥。这次作战的目标是攻取齐齐哈尔、哈尔滨、吉林、辽阳奉天等重要城市，迅速夺取东北三省全境。

经格罗德科夫和阿列克谢耶夫的建议，后来又对上述方案作某些调整，最后决定按下述五路部署进攻：

西北路：以集结于赤塔、涅尔琴斯克的西伯利亚第三军一部为主力，越过阿巴该图洲渚，向东南进攻呼伦布雨尔（今海拉尔市）和齐齐哈尔，尔后会同北路俄军及东北路俄军一部，向吉林、奉天推进；

北路：以集结于海兰泡的西伯利亚第三军一部为主力，渡过黑龙江，向南进攻瑷珲、墨尔根（嫩江）、齐齐哈尔，尔后会同西北路俄军及东北路俄军一部，向伯都讷（扶余）、宽城子（长春）推进；

东北路：除派兵一部支援海兰泡俄军作战外，以集结于伯力的西伯利亚第二军为主力，沿黑龙江、松花江水路，向西南进攻三姓（依兰）、呼兰、哈尔滨，与中东铁路护路队配合攻占哈尔滨后，分兵一部向东进攻宁古塔（宁安），另一部向西助攻齐齐哈尔，尔后会同西北路和北路俄军，向吉林、奉天推进；

东南路分两个方向进攻：一部以集结于乌苏里斯克地区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及登陆军为主力，向西进攻牡丹江、叶河


义和团战争期间北满地区的中东铁路武装护路队

宁古塔；另一部从克拉斯基诺出发，向西进攻珲春、鄂摩和。尔后合力向吉林、奉天推进；

南路：以集结于旅大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和登陆军一部为主力。一部从水路进攻营口；另一部从陆路进攻熊岳、盖州，尔后向辽阳、奉天推进，并在铁岭同北部战场的四路俄军会合。

由于需要动员相当大的军事运输力量，因此俄军的总攻势要到七月的最后一周才能进行。当总攻开始时，上述五路俄军（后来是七路）从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向满洲的两个主要中心点汇拢。北面的首要目标是解救哈尔滨，而南面的目标是占领清朝的陪都重镇——奉天。

7月26日，从辽阳撤退到营口的帕维尔·米申科上校带领部队到前往盖州火车站的路上侦察，这是在熊岳城被俄军击溃的中国军队后撤的必经之路。米申科在路上发现一处中国军队营盘，于是无理地要求其交出武器。中国军队指挥官拒绝缴械，于是米申科下令炮轰营盘，中国兵纷纷逃入营口的中国地界。

俄军在营口附近与中国官军的第一次冲突在城内引起了恐慌，逃进城里的溃兵开始抢劫，只是由于当地道台明保采取了有力的压制措施，抢劫才被止住。成千上万的中国居民搬到了船上去住。在辽河上，停泊着俄国的“勇敢”号驱逐舰和两艘日本炮舰，用炮口威胁着营口的中国区。营口的中国当局要求增援，增援部队在当天从附近的田庄台和二道沟开进营口。在城市外面，从营口通往大石桥和旅顺的铁路被破坏了，电报线也被剪断，营口同旅顺的俄军司令部完全断绝了联系。


1900年8月16日，俄军攻陷北京东便门

由于驻守在营口俄国租界的东西伯利亚第七步兵团的两个连和两门大炮被抽调去保卫大石桥车站，支援在那里与中国军队交战的东西伯利亚第十一步兵团，因此在营口的外国人担心中国官军和义和团随时都有可能进攻租界。在各国领事的要求下，俄国驻营口领事命令“勇敢”号舰长科龙海军中校派一艘快艇前往旅顺去请求增援。阿列克谢耶夫派“霹雳”号驱逐舰和一支陆战队开赴营口，在7月30日驶入了辽河口。

此后不久，在营口的街道上贴出了伪造的盛京将军告示（此时这位将军早

已处于软禁状态），号召人们起来消灭洋人。在大街上还出现了悬赏，宣布取得一个洋人头颅赏银二十五两，而取得一个俄国人的头颅赏银五十两。营口各国领事在商埠区非法筑起了街垒，由俄国海军陆战队守卫，中国官军也在对面筑起了自己的街垒，并在城中到处派烧饼站岗，城内的中国军队已经增加到两千名左右。

8 月3 日，营口俄国领事馆照会营口道台，说次日是俄国皇后生日，要鸣放礼炮33 响，希望城中百姓勿自惊扰。义和团认为这是洋人想屠杀义和团的阴谋，于是在8 月4 日黎明向领事馆区的街垒发动进攻，并喊出了“杀洋人、烧教堂”的爱国口号。到上午10 点，义和团突破了领事馆区的街垒，冲到营口东海关，准备放火。正在这时，停泊在辽河中的“霹雳”号和“勇敢”号开始开炮，米申科上校也带着援兵从大石桥赶来。俄军有四连步兵、半连炮兵、哥萨克骑兵、铁路守卫队、以及从两艘驱逐舰上登陆的海军陆战队，总共约一千人，只有三人受伤、一人震伤。辽河中的两艘日本炮舰没有参加炮击，但是派了陆战队来保卫日本领事馆及其附近地区。

到8 月4 日傍晚，营口道台和其他中国官吏、全部中国官兵、以及义和团全都逃出了营口，俄军占领了城市，布置了岗哨，并在海关上空升起了俄国军旗。英国领事为此提出抗议，声称海关的房子是英国臣民罗伯特·赫德先生（即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私人财产，因此升起俄国旗是非法的，但是俄国人没有加以理会。第二天清晨，阿列克谢耶夫海军上将乘二等巡洋舰“莽汉”号到达营口，宣布俄国对这座城市实行军事占领。

占领营口后，俄国人俨然以这片土地的新主人自居。俄国海军借口“剿灭辽河流域的水上红胡子”，派遣“参孙”号武装轮船对辽河进行了水文测量，同时向南满地区的平原、山林和草甸派出军事测绘员，来绘制军事地图。俄国占领军还非法组建了由俄国侨民和军人把持的“大俄罗斯帝国牛庄港－营口临时官厅”，新的官厅叫市政公署，负责人是由关东省总督任命的市政长官，有权向当地居民课税、征收和支配原属清政府的动产和不动产、审批官厅的所有经费。市政长官下面设立咨议机关委员会，成员包括城防司令、领事馆代表、洋行代表、中国商行代表、海关税务司和卫生局局长等人。此外还设立一个由当地中国商人代表组成的议会。阿列克谢耶夫指定的营口市政长官是华俄道胜银行营口分行的经历奥斯特罗维尔霍夫，营口城防司令是“勇敢”号舰长克拉皮埃·德·科龙中校。

1900 年7 月，俄国海军陆战队在辽河口升起圣安德烈十字旗



КРЬПОСТЬ ИНКОУ. ФОРТЪ ПРИ УСТЬѢ РѢКИ ЛЯОХ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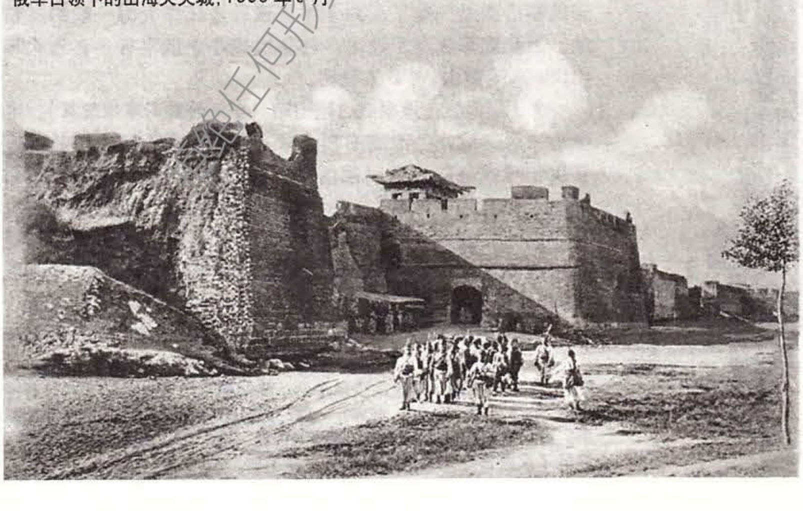
营口失陷后，盛京副都统晋昌率兵南下驰援，增祺将军趁机发动了一场反政变，恢复了自己的权力。他下达的第一道命令是火速镇压奉天省境内的义和团。在营口，退守到田庄台的奉军部队对裹在败兵队伍中的义和团展开了大屠杀，同时在全省的其他城市也展开了对义和团的全面剿杀。此后在奉天省境内的战争，就只是清军与俄军的战争了。

清帝国的首都北京是在8 月16 日沦陷的，但是八国联军战争并未到此为止。德国人要求向西继续追击出逃的清朝皇室，法国人则南下占领直隶省其余的地方。俄国军队在占领北京后向芦台方向进军，打算抢在英军之前占领塘沽－山海关－营口铁路。而英国人则纠集停泊在大沽口外的各国联合舰队，准备从海上进攻山海关。从旅顺出发的俄军部队搭乘俄国志愿舰队的“鹰”号和“莫斯科”号两艘辅助巡洋舰，以及中东铁路公司的两艘轮船，在“俄罗斯”号巡洋舰的护卫下，抢在英军的前头把圣安德烈旗插上了山海关车站，从而控制了从塘沽到营口的整条铁路。

在8 月25 日递交给各国驻圣彼得堡使团的声明中，俄国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宣布说俄国对满洲的军事占领“仅仅是迫于击退中国暴徒对中东铁路的袭击的绝对需要；和平一经恢复，铁路安全一经得到保证，只要其他列强的行动不造成阻碍，俄国一定会从中国领土上撤回自己的军队”。在8 月27 日，财政大臣维特也让中东铁路总工程师尤戈维奇向哈尔滨市民宣布，俄国对满洲地区的占领只是暂时的，仅仅是由于俄罗斯帝国政府希望在中华帝国的领土上恢复秩序。然而俄国人的言行不一致却引起了其他国家和中国政府对俄国的真实目标的怀疑。

8 月27 日，迪昂·伊万诺维奇·苏鲍季奇将军（Dean Ivanovich Subbotich）来到旅顺口。根据尼古拉二世的谕令，他被任命为南满部队司令，并立刻组织部队向奉天进军。南满部队的参谋长是阿尔塔莫诺夫上校，他是俄国在

俄军占领下的山海关关城，1900 年9 月



阿比西尼亚（埃塞俄比亚）的著名间谍。在出发前，苏鲍季奇宣读了一篇特别不知羞耻的命令：“南满部队各部，我们得到一项极其光荣的任务——坚决粉碎麇集在奉天城及其周围要塞里的暴乱的中国义和团民。最近在瑷珲、海拉尔、齐齐哈尔、天津和北京等地的战斗经验证明，中国军队尽管人数众多，装备现代的精良武器，但在纪律严明并有坚强领导的俄军面前，在深知自己对沙皇和祖国的崇高职责并珍惜军人荣誉的俄罗斯军队面前，他们就无法抵抗我们协调一致的进攻。

“我们秉从至高无上的沙皇陛下的意志，怀着对上帝的坚定信仰，怀着对俄国为例必胜的信念，即将出发进军。我们作战的目的：坚决击溃仇视我们并对抗我们的暴乱的中国军队，绥靖地方。那里的和平居民，正在遭受同室操戈的暴徒的蹂躏……在打击和消灭抵抗我们的中国军队和暴徒的同时，我部必须又是和平居民的保卫者，使他们不受任何侮辱和损失，要以公正爱护的态度对待居民，协助地方尽快恢复安定。这是伟大的沙皇陛下寄予我们的另一个期望和圣志。”

9月21日，苏鲍季奇由海路来到营口，当天乘火车到达海城。在这里集结了他所属的部队，包括东西伯利亚第一、第二、第十一和第十四步兵团，东西伯利亚第十五步兵团第一营，护路队的两个连，东西伯利亚炮兵营第一臼炮连，东西伯利亚第二炮兵旅第三连，上乌金斯克哥萨克第一团的两个守卫连和第五连的半个连，外贝加尔哥萨克第一炮兵连，关东省工兵连和第三别动辎重队的半个队。总计有47个连、28门火炮、两个半哥萨克连和半个辎重队。俄军预定用这些部队攻打奉天。

此外，为了保卫后方和通讯联络，留下了一些后备部队：在营口有东西伯利亚第三步兵团的三个连、东西伯利亚第一炮兵旅第二连的四门大炮、涅尔琴斯克第一团第五连的半个连；在辽河炮台留下四门小炮和两挺机枪；在盖州留下东西伯利亚第三步兵团的一个连和第一炮兵旅的四门大炮。在熊岳留下第三步兵团的半个连；在海城和铁路沿途各段留下东西伯利亚第二步兵团。该团在从大沽向北京的艰难进军后有五百多名士兵患了痢疾。其团长默德尔上校被任命为海城城防司令和铁路分局局长。东西伯利亚地十五步兵团以及第十


联军攻陷大沽口后入坞检修的俄国海军“海狸”号炮舰

四步兵团的两个连也分散布置在铁路沿途各段上。

海城是辽阳和营口之间的商业要地，像满洲地区其他古老的城市一样，四周围着砖砌的古老城墙，城墙呈四方形，长宽各二俄里。离城四俄里是中东铁路的车站，但在当年夏天已经被义和团焚毁，只剩下断壁残垣。当时，海城是以旅顺口为起点的铁路列车运行的终点站（运营里程约300俄里），再往北的铁路已经被全部破坏。

从海城到奉天约有110俄里，预计分七天完成行军。苏鲍季奇为了减轻士兵的负担，下令除了枪支和弹药外，每个士兵随身只带一件大衣、两套换洗内衣、一床行军帐和一个饭盒。其余的笨重东西，例如军服、灯笼裤、皮靴等物，都留在海城，存放在专门仓库里。这样，以前用来运送军服的那些两轮辎重马车就可以用来运粮食了。

在俄军前进的路线上负责抵挡的是接受过德国教官训练的奉军官军，包括步兵、马兵和炮兵。有六千人驻扎在距海城25俄里的老牛庄，一万四千人的主力部队驻扎在海山屯，有两千人驻扎在辽河沿岸的秦庄台，但是不久就撤走了。俄军在9月23日先攻打了牛庄，参战的俄国部队包括东西伯利亚第一、三、十一步兵团、东西伯利亚炮兵旅第一炮兵连、哥萨克第一炮兵连的两门大炮，总计六个营和10门大炮，外加两个哥萨克连和半个工兵连。当天黎明，牛庄的中国守军发现俄国人前来攻打，就从城墙内和附近村庄里猛烈射击，俄军用大炮和步枪还击。整个早晨双方都在对射，中国军队被逐村地赶退。到俄军最终占领牛庄时，那里的中国守军和居民都已撤退一空了。由于牛庄城外是汪洋大海一般的高粱地，因此俄军放弃了追击。在这次战斗中俄军有一名士兵阵亡，9人受震伤，21人轻伤。

9月26日，俄军抵达鞍山站（今天的鞍山市旧堡区）。这里是一块高地，生产高粱和小米，北面和东面环山，从远处看像驼峰或马鞍，所以俄国军官管这两座山叫“驼峰”，而中国人称之为“鞍山”。在两座山之间的隘口处有一处始建于明朝的古驿站，叫鞍山站[注]，修筑中东铁路的俄国工程师用这个名字来命名当地的火车站，但是却把发音拼成了“鞍相江”。

根据俄军的情报，从牛庄败退的寿长带着六千名部下撤



义和团战争期间由哥萨克卫队把守的松花江大桥

【注】汉字中“站”字用来表示车站、驿站的这个语义实际上来自蒙古语的“jam”（或jamchi，站赤）一词，元朝及明朝时期才在汉族中流传开来。古代中国在表达类似语义时使用的是“驿”字，如今只有日本汉字保留了汉语古意，将火车站称作“某某驿”

到了这里，与盛京副都统晋昌率领的一万四千名主力军会合了。这些军队都装备着新式的毛瑟步枪，在鞍山高地上，晋昌还部署了32门最新式的克虏伯远程炮和马克沁机枪，此外还部署了一万人的后备部队。

守卫鞍山的清军总数达60个营、3万人。晋昌重兵防守鞍山的原因是，在它后面就是通往北边的沙河平原和奉天的大门。俄军的进攻计划是把部队分为三个纵队，从西、南、东三面向鞍山高地发动进攻。弗雷舍尔将军率领的西路部队从牛庄出发，直扑鞍山，并在9月26日清晨从西面攻击中国军队的右翼。米申科上校率领的右路纵队在同一时间攻打清军的左翼。阿尔塔莫诺夫上校指挥的主力部队在同一时间发起正面进攻。



苏鲍季奇（前排中，1852–1920）。他在义和团战争结束后先后出任外里海军区和阿穆尔军区司令，1905年任土耳其斯坦总督。十月革命后流亡南斯拉夫，1920年死在萨格勒布

9月26日清晨9时，三路俄军都已经抵达预定的攻击阵位。在东边绵延着千山山脉齿状起伏的蓝色群山，北面有两座驼峰状的高山耸立在群山之中，两山由一个隘口分开，这就是鞍山高地，是俄军进军的目标。清军在山上挖了战壕和散兵壕，加固了阵地。在其左翼有座庙宇，也构筑了工事踞守。

西路俄军进入阵地后，就在米申科上校的指挥下开始轰击鞍山高地上的清军筑垒工事，进行大胆的火力侦察。中国军队觉察到俄军的意图，因此哑然无声，按兵不动。米申科见炮火侦察没有奏效，于是开始从东面迂回进攻，攻击“左面那头骆驼的右驼峰”。此时弗雷舍尔的部队也从西面开始向高地发动进攻。居高临下的清军发现了有被俄军包抄后方的危险，于是开始猛烈开火，拼命地向左右两边开炮，但没能阻挡俄军的攻势，于是急忙带了克虏伯炮和马克沁机枪，在俄军合围之前撤出了鞍山高地，向东北辽阳方向后撤。到下午两点，俄军占领了东鞍山和西鞍山两处高地。

第二天，俄军在鞍山北边的沙河地区同清军再度交火。这里是一片丘陵地带，有些地方被水淹没，有些地方则密布着半干涸的小溪，四周是无法通行的红色高粱地，即使坐在马背上的骑兵也会被隐没在里面。清爽的早晨已经变成炎热的白天，部队在狭窄的小道上前进，被炎热、灰尘、气闷憋得喘不过气来。两旁的高粱像铜墙铁壁一样构成了闷热的走廊，如果没有风，在里面连呼吸都十分困难。走在前面的队伍还算可以自由地行进，而后面的队伍却因尘土飞扬而在活受罪。难怪俄军在汪洋大海般的高粱地里竟然丢失了整整一个营，花了好几个钟头才找到道路，和主力部队会合。



在义和团战争中装备了先进的德制毛瑟步枪的奉军士兵

在沙河村，俄军遭到附近山上清军居高临下的射击，伤亡惨重。米申科上校率领他的小股部队向一座小山上冲去，占领了山上的阵地，但是却落入了中国军队交叉火力的射程之内，清军从北面和东面的山上用大炮向他们射击。为了歼灭这股俄军，中国士兵从附近的一个村庄里、从左边的铁路路基后面、以及从前面和右面的高山上对其射击，甚至还包抄到后方，从后面的高地上放枪。被包围的哥萨克炮兵连已经打光了榴弹和榴霰弹，护路队员每人也只剩下7到15发子弹。三颗中国炮弹炸伤了哥萨克炮兵连的6名炮兵，其中一名被炮弹打掉了腿，拖大炮的车架也着火了，一门大炮的炮架和机件被炸毁了。

就在米申科部队即将被歼灭的时候，阿尔塔莫诺夫率领增援部队赶来了。在他们把大炮拉上山时，另一枚中国炮弹炸伤了3名炮兵，把炮架上的两个车轴炸坏了。米申科无暇做周密的考虑，即带了增援的哥萨克第八骑兵连、护路队第二连、第六连和东西伯利亚第十四团第四连，去攻打中国军队的左翼。阿尔塔莫诺夫带了第十四团的两个半连去攻击正面阵地上的中国军队。与此同时，南满部队炮兵司令尼琴科夫上校骑马来到步兵散兵线上，为苏鲍季奇将军新派来增援的部队寻找炮兵阵地。

在对面，一个中国炮兵连拖着四门大炮开始进入阵地。但他们一看到远处俄国人的另外几个炮兵连也赶到战场、正在进入阵地时，就把大炮重新装回炮车上，然后及时撤退了。失去炮兵的掩护后，中国军队遭到俄军炮弹的轰炸，俄军第二旅第三炮兵连方位和

方向都没有瞄准，就开始急射，发射了16枚榴弹和16枚榴霰弹，哥萨克士兵也用步枪向中国阵地射击。到下午1点25分，在清军一侧前沿阵地上射击的毛瑟枪变得鸦雀无声了，俄军占领了正面的高地，缴获了一门马克沁机枪、十五门小口径鹰炮和一些旗帜。


东西伯利亚第14步兵团的士兵在攻占辽阳后合影

在吃完午饭、抢回伤员和尸体之后，战斗在下午重新打响了。尽管遭到俄军20门大炮、4挺机枪和无数步枪的射击，但几千名中国士兵仍然顽强地坚守在山上的岩石后和战壕里，不肯退出阵地。他们熟知战场上每个角落的地形，对被俄军占领的地方的射击就好象打靶那样熟练。但是由于中国军队发射的大多数榴弹都落在了新耙过的松软的土地上，失去了冲力，因此大多数都没有爆炸。而中国炮兵发射的榴霰弹却往往过早地在空中开了花，因为他们还不太会使用能让榴霰弹在规定时间和规定距离内爆炸的定时信管。而另一方面，俄军发射的炮弹却飞撞在岩石上，在一群群聚集在一起的中国士兵头上猛烈爆炸，造成了惨重的伤亡。

经过了四小时的对射后，中国阵地上的大炮不作声了。但是还没等俄军欢呼胜利，大炮又响了起来——这些勇敢的中国军人只是转换阵地而已。俄军左边的铁路路基、加上前面和右面的高地，构成了一个马蹄形的战场，俄军就进入了这个地方。中国军队想把他们包围在里面，像捕捉落入陷阱的野兽那样将其一股歼灭。

下午3时，苏鲍季奇将军派来了臼炮连，对据守在村庄里和山岗后面的中国步兵和马兵进行了一个小时的令人胆战心惊的炮轰。有几枚大口径臼炮炮弹落在密密麻麻挤在村庄里、准备对俄军发动冲锋的中国士兵中间，其效果是极其可怕的。一颗装满火药的炮弹在一条挤满中国士兵的街道中间爆炸，一切都被炸烂，尸体变成肉糊，血肉横飞。此时从那座已经被命名为“米申科山”的高地上搬下了四门大炮，与臼炮、步兵和工兵一同向中国军队的散兵线射击，陆军中校克鲁泡特金伯爵指挥的第四炮兵营的半个炮兵连也进入阵地，一齐开火。

在沙河畔的这场战役中，中国军队顽强得惊人。他们曾经对俄军部队发动过几次进攻，竭力想包抄俄军。俄国人的战线被拉得足有十俄里长，而清军打算用一个约十五俄里长的半圆形来包围俄军。他们起初从正面向米申科的部队进攻，接着又从后方进攻，一会儿又对俄军的右翼、一会儿对左翼、一会儿又对右翼进行交替射击。在七个小时的战斗中，这些勇敢的中国军人用尽了全力来打击俄军，直到最后无法坚持时才撤退。俄国人遭到了从未有过的猛烈火力，步兵在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里一会儿调到这个方向，一会儿又调到那个方向。由于整天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吃任何东西，所以被炎热、气闷、疲劳和口渴折磨得狼狈不堪，许多筋疲力尽的俄国步兵都晕倒了。到下午四点，晋昌率领中国军队撤出战场，俄军占领了沙河地区，战斗停止了。第二天双方在辽阳城外还有另一场恶战。

正在使用新式步枪进行军事操练的奉军士兵



9月28日清晨六点半，俄军向辽阳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在一条长长的山岭上据守着坚固的阵地，堵住了俄军的去路。弗雷舍尔将军率领一支纵队，带着四门大炮，迂回到中国阵地后方，以厚重的辽阳城墙后面那座高高的白塔为参照物，向辽阳城进军。与此同时，阿尔塔莫诺夫正面进攻中国军队的阵地，米申科上校的别动队去攻打高地。战斗的经过与头一天差不多。中国炮兵的炮弹打得特别准，但大多数落入松软的泥土中，没有爆炸。在受到弗雷舍尔纵队迂回包抄的威胁后，中国炮兵撤离了阵地，因此阿尔塔莫诺夫的部队对中国阵地发动全面进攻。中午12时，俄军占领了阵地，发现清军扔下许多食品和弹药，还留下两门完好无损的克虏伯大炮和一挺马克沁机枪，以及许多炮弹、枪支和子弹。俄军的步兵和机枪手在攻占的高地上居高临下地用火力追击急速撤退的清军部队。

下午1时，俄军摆开战斗队形，向辽阳城进发。弗雷舍尔的纵队遇到中国骑兵部队的袭击，但是哥萨克骑兵将其击退，并夺得了20匹马。这支先头部队到达太子河畔时，朝乘小驳船撤退的中国步兵扫射，并缴获了他们的辎重。下午2时，弗雷舍尔纵队抵达辽阳城下，派出两个连队去占领通往奉

天的官道的渡口。辽阳城里没有一点抵抗，但是所有的城门都紧闭着。俄军第三团和第十一团捣毁了两处城门，随后开入城内，缴获了几门新式大炮之后，在辽阳城墙上升起了俄国国旗。他们在城墙上发现了装着韦尔霍夫斯基工程师和中东铁路护路队员头颅的木笼子，用隆重的仪式安葬了这些头颅。

此后俄军在辽阳休整了两天，然后在9月30日又开拔了。根据俄军的情报，中国军队是朝三个方向撤退的，一部分往西撤，另一部分往东撤，还有一部分沿着通往奉天的官道，向离奉天城10俄里远的白塔堡村撤退。全部被击溃的中国军队都要在那里重新集结。



奉天德盛门（大南门）、1900年10月1日，俄军从这里攻入奉天城

俄军在南满地区同中国军队的战斗是十分残酷的，双方都不留俘虏。清军士兵把俘虏来的洋人一概看作是野蛮人，同时为了报复和泄恨，统统把他们折磨死或打死。与此同时，俄军也把俘虏来的中国士兵和义和团民统统杀害，用刺刀挑死或者用枪打死。这首先是由于不知道该把俘虏安顿到哪里，不愿意担负看管俘虏、为他们提供膳食的麻烦事，其次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国人是“野蛮人”，不仅士兵，而且许多俄国军官也认为“中国人身上根本没有灵魂，有的只是一股气，一股没完没了的气”。

但是，就连俄国的军官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是具有世界上最古老文明的人，有着欧洲各民族中从未有过的可以与之相提并论的伟大人物……欧洲人和中国人，双方互相蔑视，而又门当户对。虽然欧洲各国人民喜欢夸耀自己的文明和耶稣教义，但是在1900年，在中国的许多城市和农村里，他们的所作所为没有一点可以证明他们有什么特别的开化和文明。况且他们的所作所为，和他们的敌人中国人并没有什么两样的地方。”在南满战役中，俄军甚至对中国普通百姓也滥加虐待，比如在行军路线上驱使附近村庄里的普通中国百姓去为俄国军队排雷。在那些地雷爆炸、中国人被抛到半空的地方，地雷就算清除了，道路也安全了，这时俄国军医才上前来给那些侥幸没有被炸死的百姓包扎。

10月1日，俄军在白塔堡村收到了奉天城的中国商人和教民用英文写的一封信，信中说：“亲爱的总督大人，我们很高兴地向您禀报，此地的蒙古寿军门（奉天）及全体中国官吏，慑于您的英勇无比的光荣军队，已经于前天深夜潜逃。本地的中国暴民得悉此事后，就制造混乱，纵火焚烧商铺和居民住房。因此我们非常迫切地期待您和您盛名远扬的军队尽快地进入盛京。此地已无中国兵，可不损一兵一卒便拿下来。务请尽速来临，拯救人民，保护我们。”

收到这封信后，苏鲍季奇下令部队加速前进。10月1日下午四时，杰尼索夫大尉率领的一连哥萨克护路队穿过敞开的大南门（德盛门），闯进了奉天城。在城门口，哥萨克骑兵的马踩上了中国军队埋设的一个火药箱地雷，火药爆炸，4名哥萨克骑兵严重烧伤。杰尼索夫骑兵连穿过空旷无人的大街，占领了皇宫和盛京将军署。城内既没有中国官吏，也没有中国官兵，他们和城中的大部分居民已经跟着盛京将军增祺一道逃走了。清朝在关外的陪都重镇，此前从未落入外国军队手中（日本军队也只是打到海城－鞍山一线），如今被俄国军队占领了。这也是它在两百七十五年当中第一次失去平静和自由。

1900年时的吉林大东门。由于当时吉林将军长顺采取“开门揖盗”的政策，因此俄军没有进行战斗就占领了这里



10月1日傍晚，阿尔塔莫诺夫上校率领的主力部队进入了奉天城，俄军随即占领了内城的八个大门。他们发现奉天城内许多地方燃起了大火，一些大户人家和许多店铺被洗劫一空，全部欧式建筑和中国基督教徒的住家都被捣毁。盛京将军署、银库和另外一些政府衙门已经空空如也，盛京皇宫也遭到了劫掠。居住在皇宫里的宫人和太监都出来迎接俄国兵，请求他们“给予保护”、“以防中国兵和胡子趁乱抢劫”。阿尔塔莫诺夫安排居民扑灭了城中大火，在皇宫、衙门和仓库门口派了岗哨，此外向位于奉天郊外的努尔哈赤福陵（东陵）和皇太极昭陵（北陵）也派去了守卫队，防止当地“红胡子”趁乱打劫。东西伯利亚第十一团被指定为奉天城的守备部队，其团长东布罗夫斯基上校为奉天城防司令兼军事总督。

10月3日，苏鲍季奇中将举行了隆重的入城仪式，前卫部队绕城一周后，

就在城北区宿营。苏鲍季奇将军在皇宫里住下来，弗雷舍尔将军率领的部队也来到奉天，驻扎在城外的浑河北岸。10月4日，随军神父皮沃瓦罗夫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前面的宽阔广场上举行了一次宗教祷告仪式，祈祷"至高无上的全俄罗斯最高统帅沙皇陛下合府长寿无疆"。10月6日，两支俄国部队（北满部队和南满部队）在奉天以北的铁岭会合了，随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苏鲍季奇将军、新任南满部队司令切尔皮茨基将军和北满部队司令沃尔科夫将军在盛京皇宫的广场上举行了联合阅兵式。

俄国在满洲的军事行动至此正式结束了。俄国的外贝加尔、阿穆尔和远东三个省立即宣布了解除动员、哥萨克军复员的命令，因为前一年俄国远东和满洲地区谷物歉收，维持大量军队的话费用太大。然而俄国军事指挥官却寻找了种种理由来为推迟撤兵寻找借口：寒冷的天气快到了，必须为撤军修建沿途营房和休息站；铁路尚待修复，而最适合撤出军队的松花江和阿穆尔航道已经冰封；此外，俄军和"红胡子"武装之间还有许多起剿匪战斗，满洲各地的"红胡子"（其实其中一些是反俄的民族主义武装，但也鱼龙混杂、夹有一些趁火打劫的败类）数量之多，如果没有正规军协助，铁路警卫队就不能对付他们。到当年12月，进入满洲的42个俄国陆军步兵营中有28个营仍然留在那里。

攻占奉天之后，俄军中将什塔克尔伯格率领一支由步、骑、炮三个兵种组成的部队渡过辽河，占领了新民厅，之后继续向西北推进，把奉军的残余部队赶到了内蒙古。在东南方面，阿尔塔莫诺夫上校率领的部队在10月9日占领了凤凰城。在北边，保罗·冯·伦嫩坎普（Paul von Rennenkampf）将军在9月23日只带了很少几个哥萨克兵就穷凶极恶地占领了吉林城，吉林将军长顺不但没有逃走，反而极其隆重地迎接俄军的到来，因此吉林是东三省首府中唯一一座没有建立


占领奉天城的俄军在德盛门内的登城马道上合影


吉林将军长顺（中坐者，1839–1904），满洲正白旗郭布罗氏（达斡尔人）。咸丰年间任侍卫，后参加平捻战争，并先后随多隆阿和左宗棠在陕、甘、新疆平叛，以骁勇善战闻名。历任科布多参赞大臣、巴里坤领队大臣、哈密帮办大臣。1888年任吉林将军，澄清吏治，清除盗贼，整顿旗务，整顿货币，赈济灾民，颇有令名。义和团战争中因未使吉林卷入动乱而受清廷表彰。1908年终于任上。他是清朝末代皇后婉容的曾祖父

起俄国行政当局的城市。

盛京将军增祺在俄军到来之前及时逃到了内蒙古，从那里给苏鲍季奇将军寄去一封信，极力为自己辩解，证明自己不想破坏"俄中之友谊"，并且把一切罪过都推到"包藏祸心的义和团"身上。在得到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许诺的安全保证后，增祺决定待得离奉天近一点，搬到了新民厅，并且继续给俄军写信试探风声，看他能不能恢复在盛京的将军职权。阿列克谢耶夫给苏鲍季奇拍电报说，就让这位满洲将军留在新民厅，直到接到新的命令为止。直到当年11月，阿列克谢耶夫才勉强地同意与盛京将军签署协定，允许他恢复对盛京地区的部分管辖权。

在1901年八国联军参与国同总理衙门进行共同谈判、准备缔结对华和约时，俄国驻华公使格尔思还偷偷地撇开其他各国公使，单独与清朝的全权谈判代表李鸿章和庆亲王就满洲问题进行秘密接触。为了让中国能够爽快地答应俄方即将提出的狮子大开口的条件，俄国先是提供了一些甜头：坚决反对德国要求处决同义和团运动有牵连的中国高级官员的要求，反对让中国派特使去为柏林克林德男爵事件道歉、并立一座谢罪牌坊的要求，反对瓦德西元帅率领德军向西安府继续进军，反对英、法、美三国为被杀害的中国基督教徒勒索赔偿的企图。关于赔款问题，1901年2月5日，俄国提出了一个"适度"的数目，即1800万海关两（约600万英镑）。

在俄国统治集团内部讨论正由俄国实行军事占领的满洲地区今后的体制、以及绥靖俄国远东边疆的最好办法时，关东省总督阿列克谢耶夫不止一次地表示赞成保持中国的主权和行政管理机构。他认为，对这些地方实行俄国管理，或如一些俄国军官所主张的那样，援引布哈拉汗国和浩罕汗国的例子将其直接吞并，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对俄国来说是危险的。

另一方面，俄国陆军大臣克鲁泡特金要求占领满洲地区，尤其是北满。他指出，阿穆尔河（黑龙江）在抵御中国军事威胁方面是一道没有什么作用的屏障，因为沿河没有道路，因此防御起来很困难。而占领北满会改善俄国远东地区对中国的防御地位。另一方面，如果占领整个满洲地区，俄国就会有一条同时面对中国和朝鲜（即日本）的复杂的前



俄国占领奉天后，在大西门上搭建兵营、架设大炮，准备对其实行长期占领

线。克鲁泡特金建议立即归还奉天省和吉林南部，并继续暂时占领整个黑龙江省的全部和吉林省的大部分，即起自珲春城（它本身也包括在内），直到嫩江与松花江的汇合处一线以北的地区。克鲁泡特金主张今后俄国像租借“关东省”那样租借整个北满地区。

此外，克鲁泡特金还希望将来俄国能有一个更好的机会，能够在同布哈拉汗国大致相同的（政治）基础上，把北满地区建成一个独立的国家，一个“黄俄罗斯附属国”。比这更好的方案，是直接吞并北满地区，这样就没有必要再沿着阿穆尔河修建一条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了——在义和团动乱后，许多俄国人意识到那条穿越中国领土的中东铁路在战时并不是绝对安全的，因此重新提出了修建阿穆尔铁路的要求。和总长度1200俄里的中东铁路（干线）相比，后者是一条延伸2400俄里的巨大工程。在克鲁泡特金看来，要避免这种麻烦，除了直接吞并北满地区、或者至少在那里建立起一个像布哈拉那样的“黄俄罗斯”保护国外，别无它法。

在中俄秘密谈判中，李鸿章让他的儿子告诉俄国人说，如果俄国放弃对满洲地区的领土要求，中国就准备完全支付俄国所要求的全部赔款[注]，并且给予俄国公司以开发蒙古和喀什噶利亚的独占权。俄国方面则在1901年2月提出了与此相反的要求。俄国人拟议中的结束满洲占领状态的对华条约有几项要点，包括承认中国对满洲的主权；暂时的俄国军事占领；解除满洲地区中国军队的武装；要求中国允诺北方各省的陆海军军队不聘用俄国以外的教官；赔偿中东铁路、华俄道胜银行和俄国侨民由于义和团暴乱所造成的损失等等。

这项拟议中的条约草案有两条条款特别赤裸裸地暴露了俄国的野心，即由中东铁路公司按照与中东铁路相同的特惠条件修建一条从该铁路南下支线到长城的铁路作为对该公司的赔偿（第九条），以及在中国建立一个广大而有效的势力范围：“中国政府不经俄国政府同意，不得将同俄国毗邻的所有省份（即满洲和蒙古）以及同俄国邻近的甘肃、新疆两省内的塔尔巴哈台、伊犁、喀什噶尔、叶尔羌、和田、克勒底雅等地区的铁路修筑、矿藏开采或任何工业企业方面的特许权给予任何外国及其公民。在上述省份的所有地方，除牛庄港以外，中国政府不经俄国政府同意，不得用自己的资金修建铁路，也不得将这些地方的任何一块土地让给外国人使用。”

为了促使中国方面接受这部条约，维特指示华俄道胜银行总经理璞科第，让他从1898年为了贿赂中国官员而创立的“特别基金”中拨出50万卢布，划到李鸿章的账号上去。不过，这一次李鸿章却没有被收买下来，他拒绝了俄国人提出的大部分要求。中国和俄国关于满洲撤军问题的谈判直到1902年时为止仍然没有丝毫解决问题的迹象。俄国人准备用一项“分阶段撤军”的计划来拖延撤出东北三省的时间（将满洲占领军分三期撤出，每期六个月）。除此之外，俄国人还提出了其他漫无边际的贪婪要价：中国军队永远退出满洲；在那里使用俄国货币；警察部门由俄国人掌握；将中东铁路租借地拓宽至铁路两侧各10公里；满洲地区所有海关移交给中东铁路公司；满洲公私土地上一切金矿、油矿、煤矿、镍矿均让与该公司；鸭绿江沿岸2000平方公里“上好林区”让与中东铁路公司；在秦皇岛、营口设立俄租界……等等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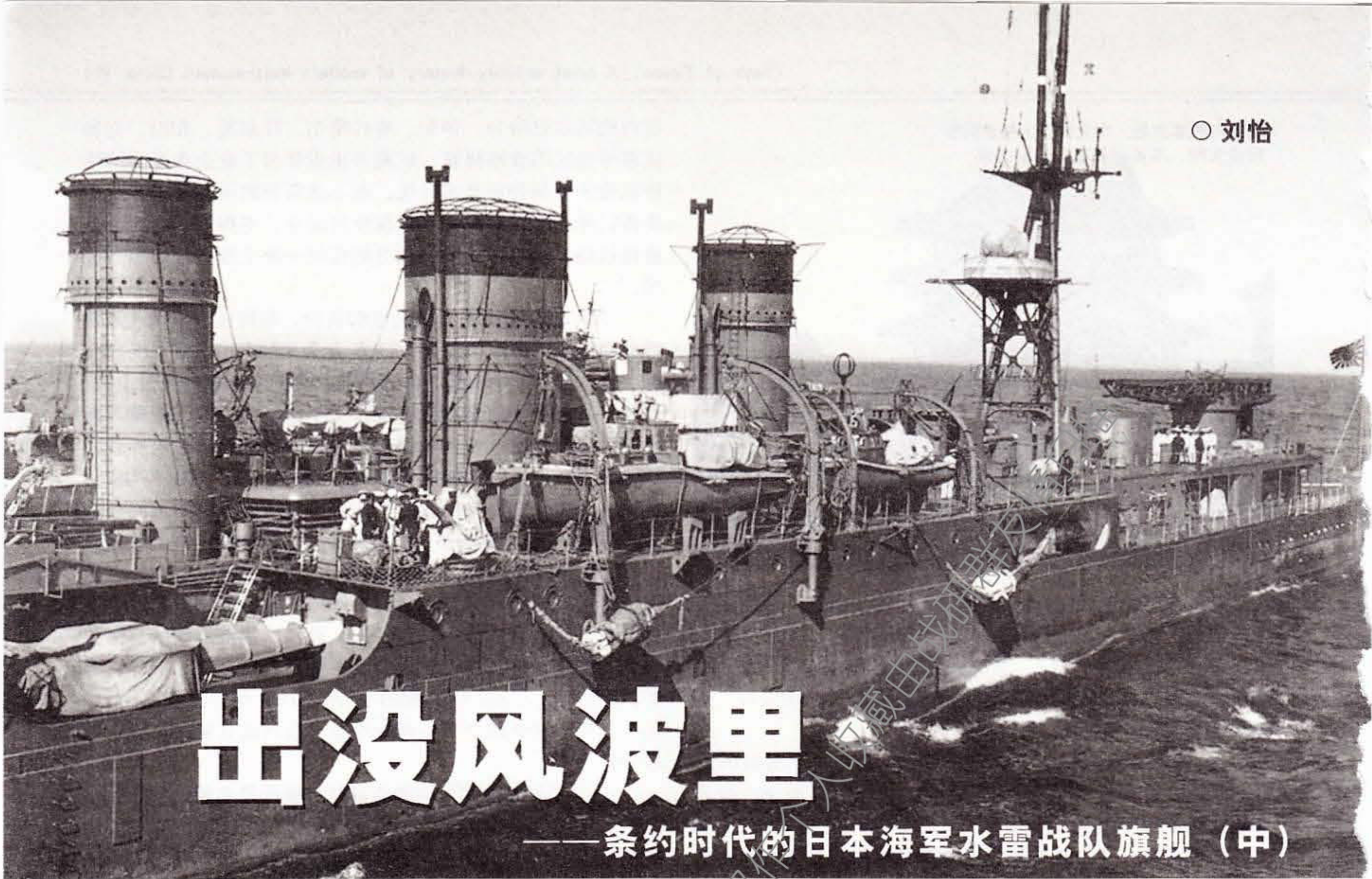
但是帝俄外交部玩弄的这种技巧被手段老辣的李鸿章透露给其他国家，俄国受到了列强的直接警告。美国国务卿海约翰重新提出了“门户开放”的口号，而日本则警告说，在俄国军队撤出满洲之前，日本不与俄国就朝鲜问题达成任何友好协议，并向总理衙门许诺说，日本将在“任何情况下”协助中国“促使俄军及时全部撤出满洲”——在干涉还辽事件之后已经“卧薪尝胆”十年之久的日本人，此时已经羽翼丰满，准备摩拳擦掌地参加到这场规模宏大的远东逐鹿竞赛中来了。

（未完待续）



位于哈巴罗夫斯克市中心的“东方征服者”、俄国侵华鼻祖叶洛菲·哈巴罗夫雕像

【注】后来中国依据《辛丑条约》向俄国支付的赔款为关平银一亿三千零三十七万一千一百二十两，即中国赔款总额的28.97%。这笔钱完全补偿了俄国在义和团事件当中受到的所有损失，绰绰有余地偿付了俄国占领北直隶和满洲地区的军事和行政开支，还留下了一笔可观的盈余。根据中东铁路公司的估计，修复被义和团破坏的245俄里铁路，每一俄里需要花费4000到5000卢布。再加上车站、宿舍、机车、工厂设备的损失，中东铁路在义和团运动中的直接物质损失一共只有600万到800万卢布左右



○ 刘怡

出没风波里

——条约时代的日本海军水雷战队旗舰（中）

五、太平洋战争前的水雷战队旗舰轻巡洋舰的航空设备

在完工之初，14 艘5500 吨级轻巡中只有6 艘长良级和3 艘川内级各搭载有一架十式舰战。由于母舰不具备飞机回收能力，舰载机平时须保存于陆上基地，只在训练和远航时才拆开运上军舰。在完工较早的5 艘球磨级巡洋舰中，木曾号虽有试验型滑台，但平时并不配备飞机。半道出家的十式舰战在空间狭小的巡洋舰上使用极为繁琐，为避免发生事故，指挥官干脆减少飞机的出动。所以在1927 年之前，5500吨级轻巡的航空侦察能力仅存在于纸面上。

当时正在海军大学进修的军令部出仕高木惣吉大尉（后官至海军省教育局长，1944 年策划过暗杀东条英机的行动）对此极为不满，他在1925 年写了一篇论文，质疑陆用侦察机在海战中的价值，建议在巡洋舰上配备航程更远、具有回收和反复出动能力的水上飞机。这就是所谓的“甲种对策”。

大正年间，日本海军对舰载水上飞机的类别与功用尚无明确区分，只是含糊地认为应当同时研发航程较近的双座水侦和远程三座水侦。八八舰队案立项时，海军尚无标准的三座水侦，使用较多的双座水侦是一战后从德国获得的汉萨－勃兰登堡W－29（由中岛、爱知两公司仿制约300 架），其时速175 公里，续航力约4 小时。1927 年，爱知公司又仿制德国亨克尔HD－25 研发成功专用于滑台起飞的二式双座水侦，航程4.5 小时，生产了14 架。这些飞机或者速度较慢，或者航程不够远，性能都不理想。到了1924 年，军令部决定重新研发新的双座和三座标准舰载水侦。

横须贺海军工厂是三座水侦项目的唯一竞争者，桥本贤辅工程师充分利用已有技术，在之前被海军否决的十年式双座双浮舟大型水侦基础上开发三座型号。他选用了木制骨架外加帆布蒙皮的机身，安装1 台400 马力洛林－迪特里希12D 液冷发动机，乘员增加为3 人。1926 年1 月，原型机作为制式采用，定名为十四式水侦（E1Y），由横厂和爱知、中岛两公司合作生产约320 架。量产型号十四式2 号水侦（E1Y2）换装450 马力洛林－迪特里希12E 发动机，时速增加到178 公里，最大航程可达9 小时。这是第一种由日本人自己设计并投入量产的水上侦察机。

高木惣吉既然提出要在轻巡洋舰上部署水上飞机，可选用的最新机型自然就是十四式水侦。当时由良号刚刚担任了第1 潜水战队旗舰，军令部认

5500 吨级轻巡搭载的第一种远程侦察机——横须贺海军工厂开发的十四式水侦，图为十四式二号（E1Y2）。这种木制机身、帆布蒙皮的双翼机是日本自产的第一种实用化水侦，各型共生产320 架



为，潜水战队在对美作战中将扮演重要角色，担任潜水战队旗舰的轻巡洋舰需要承担侦察敌情、引导潜艇攻击等任务，应当优先装备侦察机。所以在1927年12月，由良号首先将其舰载机换装为十四式水侦；次年初，第3战队所属的阿武隈号也以十四式水侦替换了十式舰战。

十四式水侦平时可以折叠机翼、收容于舰桥下的机库中，不过其重量和翼展均超过十式舰战，所以很难借助舰上的滑台正常起飞。为解决此问题，由良号和阿武隈号在舰桥右侧加装了一台吊杆式起重机，水侦组装完成后即由起重机吊放到水面放飞，返航时也由起重机回收，原来的滑台反倒成了摆设。此外，有资料称，由良号在这一阶段还试验性地搭载过汉萨－勃兰登堡W－29型双座水侦。

除了更新飞机以外，日本海军还考虑以效率更高的弹射器代替起重机作为放飞水侦的工具。1926年，东京一家专产离合器和油压机的小公司——萱场制作所向新成立的海军航空本部（直属于海军省）提议研制舰用发条式弹射器，获得首肯。

1930年4月，萱场制作所研制的首台弹射器样机在横须贺进行了陆上试验，随后就安装到已经转隶第3战队的由良号上，可以弹射十四式2号水侦。

萱场式弹射器（日本海军公文中称“萱场式发舰促进装置”）留下的资料很少，从有限的描述看，其原理应当与飞轮式弹射器相仿，是以发条储存机械能、通过离合器拉动钢索进行弹射的，和日本海军后来广泛使用的压缩空气式以及火药式弹射器结构都不相同。不过萱场式弹射器故障率颇高，由良号在使用飞机的过程中多次出现险情，这引起了航空本部的不满，下令将其拆除。

在这之后，日本海军舰用弹射器的开发重新由军方工厂负责，集中力量研制以缓燃火药为动力的大型机。1930年前后，吴工厂攻克了火药缓燃技术的难关，开发出弹射力2吨的吴式二号1型弹射器。当年10月，第2水雷战队旗舰鬼怒号在舰首滑行台上方安装了17米长的吴式二号2型弹射器，舰桥右侧也像由良、阿武隈一样安装了大型吊车。收容于舰桥下方机库内的飞机可由弹射器放飞，回收时先在水面落定，再由吊车回收。鬼怒号由此成为5500吨级轻巡中第一艘可弹射水上飞机者，也是第一艘具备快速起降舰载机能力的日本轻巡洋舰。由良号随即也将不合用的萱场式弹射器更换为吴式二号2型，神通号则是在1931年11月的改造中安装了这种弹射器。

作为第一批安装弹射器的5500吨级轻巡，鬼怒、由良、神通三舰的弹射器均位于舰首，这是其最突出的外观特征。由于空间和结构强度的关系，弹射器不能转动，需要调节军舰航向以取得合适的风向，常用舰载机为1架。

为适应弹射器上舰的需要，1929年，海军责成爱知、中岛、横厂三家企业分别开发新型双座水侦，要求采用全金属机体。爱知公司从德国购买了亨克尔HD－56的特许生产权，换装东京瓦斯电气工业（社长松方五郎是松方正义元老第五子，川崎造船所原社长松方幸次郎之弟）开发的300马力“天风”星形气冷发动机，拿出一架时速199公里、航程754公里的原型机。1931年12月，该机作为制式机得到采用，命名为九零式1号水侦（E3A）。

由良、鬼怒、神通三舰在1932–1934年搭载的就是九零式1号水侦，没有弹射器的多摩号也曾在1933年7–9月临时搭载一架该型机，以原水雷库为机库，借助加装于后桅的起重机回收。不过“天风”发动机时常推力不足，故九零式1号仅仅生产了12架。

与此同一时期，中岛飞行机会社从美国购买了沃特O2U“海盗”观测机（当时的中国空军亦装备了陆用型O2U－1，通常将Cosair音译为“可塞”。日本购买的是“海盗”的出口型V－65C）的生产许可权，将单浮舟改为双浮舟结构（量产型又恢复为单浮舟），进行结构强化。此前中岛公司曾获得英国布里斯托尔“木星”发动机的生产许可证，技术人员又参考美国的普拉特－惠特尼R－1340“黄蜂”对其进行改进，在1931年研发出离升功率580马力的“寿”2型星形气冷发动机，这是日本第一种500马力级的航空发动机。

1931年12月，安装“寿”2型改一发动机、双座单浮舟的2号原型机作为制式机采用，正式定名为九零式二号水侦2型（E4N2，双浮舟的原型机称九零式二号1型）。海军对这种时速232公里、续航力4.5小时的飞机相当满意，含原型、量产型、无浮舟的陆用型和单座民用型在内共生产153架。

至于横须贺工厂和川西公司合作研发的九零式3号（E5Y1），因其是在旧式的十四式2号水侦基础上改进而来，不入海军的法眼，最终未能大批生产。

随着新型舰载机的量产，从1932年开始，日本海军对5500吨级轻巡进行了集中的航空设备升级。球磨号于1932年9－12月在吴厂加装了一部吴式二号1型弹射器，位置在5、6号主炮之间的甲板中心线上，5号炮塔前方的小艇甲板向右舷延伸一段，作为舰载机的起飞和整备空间。该舰的标准舰载机为1架九零式二号2型水侦，由后桅附着的吊杆式起重机回收，为加装吊杆，后桅改成了更坚固的三脚檣样式。由于航空甲板面积较大，球磨号的弹射器可以由电动机驱动旋回，根据风向自行调整弹射舰载机的角度，而不必像早先



爱知公司仿制亨克尔HD－56制成的九零式1号水侦（E3A1），含原型机在内共生产12架，是5500吨级轻巡最初搭载的双座水侦。图为伪满洲国海上警察队装备的九零式1号水侦“海警16号”，母舰是海威号警备舰（原二等驱逐舰樫号）

在舰首安装弹射器的鬼怒等三舰一样调整军舰的航向，这就提高了战时的弹射速度。

与球磨号同型的多摩号是在“友鹤事件”后的复原性改善工事期间，于1934年4－11月在舞鹤工作部加装了弹射器和吊杆，安装位置以及舰载机的型号与球磨号相同，但弹射器更换为全长19.4米、最大弹射力3吨的吴式二号3型，可以弹射三座夜间侦察机。两艘军舰都不设机库，舰载机平时露天系止于弹射器上，由滑块固定。1937年11－12月，球磨号也将型号较老的吴式二号1型弹射器更换成了吴式二号3型，最大弹射力有所增加。

继球磨级之后，长良级和川内级的弹射器换装在1933－1934年相继实施（包括鬼怒、由良、神通三舰，它们把舰首的弹射器移到了尾部），型号均为吴式二号3型，细节上则略有差别：长良级的弹射器安装位置与球磨级相同，川内级则是将7号主炮移动到靠近舰首的甲板室最末端，将弹射器安装在6、7号主炮之间。所以从外观上看，长良级和球磨级的弹射器位于后桅之前，川内级的弹射器则在后桅之后。军舰的后桅均被改为附有吊杆的三脚樯样式，舰载机为1架九零式二号水侦，长良、由良、五十铃、鬼怒四舰还在后桅上增加了一个带一具90cm须式探照灯的平台。

在这次改造中，有6艘军舰拆除了舰首的机库和滑行台，阿武隈、名取、那珂三舰则在滑台上安装1座四联装九三式13mm机枪，将其改成了高射机炮平台。名取、阿武隈、由良三舰的航空整备甲板位于小艇甲板左舷的扩大部分，其余6艘的航空甲板则在右舷的扩大部分。

由于伦敦条约限制了三强搭载舰载机的巡洋舰不得超过巡洋舰总数的25%（此条款从未被任何一国严格遵守），为表示“恪守道义”，日本除保留无舰载机的天龙、龙田、夕张三舰外，还挑出球磨级的木曾、大井、北上三舰，没有为其加装航空设备，此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无条约时代之后。这样一来，拥有舰载机的5500吨级轻巡只剩下11艘。不过这绝非出于善意，部分也是因为军令部已经在考虑将这三舰改



九四式水侦（E7K2）

为用途特殊的“重雷装舰”。

继十四式与九零式之后，日本海军继续着三座水侦和双座水侦并行开发的方式，即“七试三座水侦”与“八试双座水侦”项目。前者由川西公司中标，称为九四式水侦（E7K），时速259公里、续航力14小时；后者由中岛公司中标，称为九五式水侦（E8N），具备与同时代战斗机接近的格斗性能，可以兼任水上战斗机。1934－1935年，大部分5500吨级轻巡都将九零式二号水侦更换成了九四式和九五式水侦，这也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旧式轻巡的主力舰载机。

一般来说，各舰搭载何种类型的飞机是由所属战队的性质以及执行任务的区域决定的。编入普通战队（如1941年时长良、球磨所属的第16战队，多摩、木曾所属的第21战队）和遣外警备部队的军舰只搭载双座水侦，编入水雷战队和潜水战队的军舰因为要执行远程侦察、引导任务，通常搭载三座水侦。以多摩号为例，该舰在1934年11月15日担任第1潜水战队旗舰，为进行远程搜索、指引潜艇编队攻击，舰载机定为1架三座九四式1号水侦。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后，该舰编入第三舰队、前往中国沿海进行警备，因为舰载机在执行任务时可能与中国战斗机遭遇，特将飞机更换为具备空战能力的双座九五式水侦。1941年日美开战前夕，多摩号成为负责北方警备的第五舰队旗舰，为了在北太平洋进行远程搜索和接触，又重新搭载了三座的九四式2号水侦。


1935年7月16日在华北沿海执行警备任务的球磨号离开青岛港、准备前往旅顺。后部鱼雷发射管正指向舷外方向，吴式二号1型弹射器上系留有1架九零式二号1型水侦

1937年之前，九四式、九五式水侦通常都只执行白昼侦察、索敌任务，近程接触和观测任务则由战列舰、重巡洋舰搭载的双座水侦担当。不过在伦敦条约签署后，为了强化水雷战队的夜战能力，特别是夜战部队在决战前夜集中雷击的命中率，海军还考虑在通常充任水雷战队旗舰的4艘5500吨级轻巡（3艘川内级和阿武隈号）上搭载专用的夜间侦察机，简称“夜侦”。

夜侦的主要任务是在暗夜中锁定美国舰队的位置，进行长时间跟踪，引导部队在黎明时分发动雷击（日出后的跟踪侦察由重巡洋舰搭载的双座水侦接替进行）；必要时它还要在战场上空投掷照明弹，协助己方舰队进行照射炮击，兼充弹着点观测和修正之职。为了加强隐蔽性，夜侦往往通体涂得漆黑，被士兵们戏称为“乌鸦”。

日本海军决策层认为，夜侦必须具备较大的航程和优良的操纵性能，因其主要在深夜活动、不必考虑与敌方战斗机遭遇，速度不须太快。根据此项要求，航空本部决定在新机上配备3 名乘员，并采用尺寸较大的飞艇式机身。可惜，第一个吃螃蟹的爱知公司就栽了跟头——1932 年5 月首飞的六试小型夜侦（AB-4）虽然拥有6.5 小时的续航力，但乘员座席的配置过于怪异，造成前方视界不良，离着水时平衡舵也经常失灵，最终仅生产了6 架就告下马。

1934 年4 月，日本海军省再度责成爱知、川西两公司开发“九试夜间侦察机”，爱知的原型机在1936 年作为制式采用，称为九六式水侦（E10A），生产了15 架。

九六式水侦安装一台550 马力91 式W 形液冷发动机，时速206 公里，最大续航力可达14.3 小时。但海军嫌其过于笨重（全长11.21 米、高4.5 米，全备重量3.3 吨），速度也不够快，在九六式刚刚投产的同一年就开始了后继型号“十一试特殊水侦”的研发。这次的订单又被爱知公司抢到，即九六式的改进型九八式水侦（E11A），1938 年6 月作为制式采用。九八式换装一台620 马力的91 式22 型W 形液冷发动机，时速217 公里，航程2065 公里，稳定性和观察视界都优于之前的型号，首批两架量产型在1938 年搭载到长良、神通两舰上。

一般而言，日本海军的水上飞机比较注重速度和机动性，九五式水侦就具备很强的格斗能力，日后问世的零式水侦和“瑞云”更是具备了耸人听闻的俯冲轰炸功能。与这些飞机相比，夜侦因为采用特殊的飞艇式机身，显得迟缓笨重。在1935 年前后的几次夜战演习中，对青军（假想敌）进行夜间侦察的九六式夜战都遭到探照灯的照射，飞行员和观测员出现视觉眩惑的状况，飞机被高射炮火包围、无力脱逃。加上美国舰队的空中掩护已经大大加强，如果碰上追击者，夜侦绝无生还的可能。从成本来看，仅仅为几艘旧式轻巡洋舰就开发一种专门的侦察机也很不划算。几经权衡，海军决定使用性能较为均衡的三座水侦兼任夜间侦察任务，不再研制专门的夜间侦察机。1940 年之后，昙花一现的“夜侦”就从水雷战队旗舰上消失了。

中日战争中的日本旧式轻巡洋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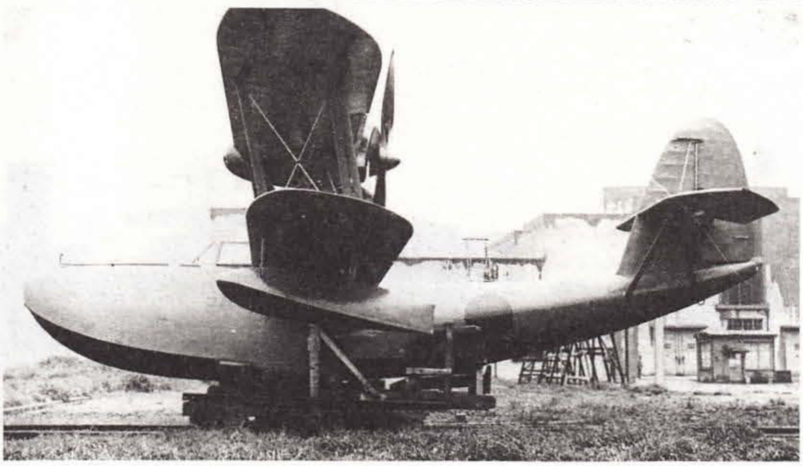
1937 年1 月1 日，日本海军进入了无条约时代。此时，联合舰队的巡洋舰保有量为：7100 吨级重巡和8300 吨级重巡各2 艘，10000 吨级重巡8 艘，在建或即将改为重巡的8500 吨级“大型轻巡”6 艘，5500 吨级轻巡14 艘，3500 吨级轻巡2 艘，3000 吨级轻巡1 艘。

在前一年的6 月3 日，日本海军军令部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三次修订，确定用于对美作战的巡洋舰军力需求为重巡20 艘、轻巡8 艘、水雷战队旗舰用轻巡6 艘、潜水战队旗舰用轻巡7 艘，如此尚短缺重巡2 艘、轻巡4 艘。由于现有的全部17 艘轻巡和古鹰级、青叶级重巡均已老朽需要替换，军令部计划在1937-1947 年的十年间陆续新建6 艘10000 万吨级重巡（伊吹级）和21 艘6000 吨级轻巡（阿贺野级、大淀级），以满足用兵需求。在此期间，天龙级和夕张号将转为警备舰；5500 吨级轻巡中有4 艘编为一个通常战队，作为菲律宾攻略部队主力，在开战之初参与对美国亚洲舰队的进攻，另有2 艘充任一线潜水战队旗舰，其余8 艘则转为警备舰或训练舰。

不过，在规划1937-1941 年度的第三次舰艇补充计划（丸三计划）时，海军方面已经意识到了全国财力有限、造船资源不足的困境。在船台数量和经费都不如的美国的情况下，要在短期内迅速赶上对手的实力，必须在新造舰艇的种类上区分优先度。在此状况下，整个丸三计划没有列入一艘新造巡洋舰，而是集中力量进行2 艘大和级超级战列舰和2 艘翔鹤级航母的建造。直到1939-1945 年度的第四次舰艇补充计划（丸四计划）定案，4 艘阿贺野级和2 艘大淀级轻巡的建造才被列入日程。当第一艘新型6000 吨级轻巡阿贺野号正式竣工时，时间已经是日美开战后10 个月的1942 年10 月了！新舰迟迟无法动工使得17 艘老舰不得不超期

1933 年3 月12 日在东京品川海岸试飞中的九零式二号2 型水侦“报国-20 号”，机身编号下方的“富国号”字样表明该机是由富国兵卫保险公司“献纳”的





右：最后一种批量生产的“夜侦”——爱知九八式水侦（E11A1），盟军绰号Laura。1936 年10 月由森盛重工程师在九六式夜侦基础上开始研发，1938 年6 月作为制式采用。九八式水侦延续了九六式的双翼、飞艇式机身布局，安装一台620 马力91 式22 型W 形液冷发动机，时速217 公里，航程2065 公里，乘员3 人，装1 挺7.7mm 机枪。1938 年前后，有2 架九八式水侦曾搭载于长良、神通二舰，在中国前线执行过侦察、哨戒任务。此时海军已经注意到夜侦的技术缺陷，很快就以大型三座水侦兼任夜侦职能，九八式包括原型机在内仅生产17 架

1934年初锚泊于吴港的那珂号。该舰于1933—1934年在吴厂进行了现代化改装，将7号主炮后移，在6、7号主炮之间加装了一部吴式二号3型弹射器，搭载一架九零式2号水侦。不过当时该舰并未拆除前部滑行台，而是在其前端加装1座四联装13mm机枪，成为防空机炮平台



服役，直到日美全面开战，它们依然是联合舰队的中坚。

无条约时代开始的那一年，日本海军的17艘旧式轻巡中，天龙、龙田所属的第10战队（原第一遣外舰队）和夕张所属的第5水雷战队正在中国沿海警戒，14艘5500吨级轻巡只有6艘编入作战部队，其余8艘（6艘编入内地警备战队、2艘编入训练单位）正在船厂改装。

1936年9月"汉口事件"（汉口日领馆巡查吉冈在租界内被枪杀，我方资料称"吉冈案件"）后，对华态度日益强硬的军令部炮制了一个《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声称"处理今后问题，必须确立全国上下一致的决心"，为此"不惜行使武力，以促进外交"。简而言之，就是要主动制造擦枪走火的机会，诱使中方作出过激反应，以此为据说服政府和国民对华全面开战。1937年1月8日，经过修订的《方针》又加强了华北的舰艇力量，以"适应将来华北时局的发展"。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当天，日本驻华的第三舰队主力除第11战队（辖炮舰和二等驱逐舰13艘）和二等驱逐舰早苗分散停泊于长江中上游外，主力舰只正在台湾近海与马公要港部、台湾军部队举行联合演习。在接到驻北平武官发回的"在卢沟桥附近同中国军队爆发冲突"的电报后，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中将马上命令下村正助少将（"日本马汉"佐藤铁太郎中将的女婿）指挥第10战队的天龙、龙田两舰赶往青岛，警戒华北水域；大熊政吉少将指挥第5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和二等驱逐舰朝颜驶往厦门，警戒华南水域；长谷川清本人则在11日清晨乘旗舰出云号驶抵上海，准备执行武力威慑和撤侨任务。与此同时，正在伊势湾进行例行训练的第一舰队第8战队（由良、名取、鬼怒）和第1水雷战队（川内带3个驱逐队）也驶返佐世保，准备护送佐世保特别陆战队前往中国增援。

7月29日凌晨，根据军令部下达的大海令第1、第4号，联合舰队司令长官永野修身从停泊于佐伯湾的旗舰陆奥号上发出了"膺惩平津地区之中国军"的作战令。根据这一指令，吉田善吾中将指挥的第二舰队（辖第4、第5战队，第2水雷战队和第2潜水战队）编成华北部队，负责护送陆军第5、第6、第10师团前往朝鲜和平津地区，并监视青岛、天津等地的中国海陆军。为方便协调，此前锚泊于青岛的天龙、龙田两舰也转归华北部队指挥。第三舰队负责华中和华南作战，为加强其力量，特启用尚在训练舰状态的北上、多摩和木曾三舰，组建新编第3水雷战队（北上带1个驱逐队、2个水雷队）、第4水雷战队（木曾带3个驱逐队）和第9战队（多摩、重巡妙高），统归第三舰队指挥。加上在华北部队所属第2潜水战队担任旗舰的神通，到8月第一周，已有4艘5500吨级轻巡驶往中国水域。

进入8月之后，中日对抗的局势愈

1937年1月20日结束性能改善工事后的鬼怒号，停泊于广岛湾。舰尾弹射器上可见一架九零式二号2型水侦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分享传播，仅供收藏研究使用



中日战争爆发时任第三舰队司令长官的长谷川清中将（1883-1970）。福井县人，海兵32期出身，日俄战争期间服役于三笠号，在1905年三笠号爆沉事故中受重伤。一战结束后多次在美国任职，与山本五十六关系较好，被视为海军中的亲美派；又因为与福井同乡、“知华派”海军前辈津田静枝等人关系密切，被视为遣华舰队司令的最佳人选。1936-1938年他是第三舰队和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因为侵略中国的“功绩”获颁勋一等旭日大绶章。1939年晋升海军大将，随后因反对南进政策退出现役，于1940-1944年出任台湾总督。长谷川清对台湾基础教育的普及颇有贡献，但也是“皇民化”和“台湾独立”的重要策动者。二战结束后他一度因甲级战犯嫌疑被拘捕，随后无罪开释，参与了海上自卫队的重建工作。长谷川清以私生活不羁著称，井上成美认为他是一个中规中矩的二流提督

发紧张，日军第1、第2联合航空队的飞机在辽东半岛、台北和朝鲜半岛间频繁调动，中国海军也开始将主力舰艇集中到南京江面，准备开战。8月9日，上海发生了“大山勇夫事件”，还在佐世保港待命的第8战队和第1水雷战队随即将佐世保第1、吴第2特别陆战队总计1200人运往上海，至11日深夜全部登陆完毕。此时，在中国水域的5500吨级轻巡已经增加到8艘，上海地区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总人数也超过了4000人，这些陆战队的指挥官便是那位在美保关事件中表现优异的大川内传七少将。

8月13日傍晚，上海战事爆发。次日清晨，从安徽广德起飞的中国空军诺斯罗普2EC轰炸机攻击了停泊于黄浦江口的第三舰队旗舰出云号，附近的川内号立即以机枪对空还击，并派出水侦警戒。作为报复，出云、川内两舰随后派出舰载九五式水侦空袭了虹桥机场和闸北。同一天下午，东京的海军省发表了“为促使国民政府反省，政府批准采取一切必要之有效手段”的声明。

由于第2航空战队所属的3艘航母已经抵达马鞍群岛附近，长谷川清决定由航母舰载机和从台湾起飞的九六式陆上攻击机承担空袭中国空军基地、夺取制空权的任务，第8、第10战队和第1水雷战队的轻巡搭载的水侦仅负责支援陆上作战。

在之后的几天里，从7艘5500吨级轻巡洋舰和出云号上起飞的九五式水侦每天上午准时起飞扫射龙华和虹桥机场，携带炸弹攻击浦东的国军阵地，停泊在吴淞海面的第8战队3艘轻巡洋舰还以140mm主炮轰击位于江湾五角场地区的上海市政府和吴淞炮台周边的中国军队，并派水兵组成临时陆战队登岸助战。16日，第1水雷战队旗舰川内号也在舰载机的校准下，自远东体育场向江湾镇一带实施间接射击，不过这批炮弹差点落到日本陆战队自己的阵地上，在大川内以无线电通报情况后，川内号中止了射击，返回吴淞锚地。

开战前三天，上海附近的日舰分编成第一（第11战队）、第二（第8战队、第1水雷战队）、第三（第3水雷战队）三支警戒部队，第一部队吃水较浅的炮舰在黄浦江下游执行岸轰任务，第二、第三部队的巡洋舰泊于吴淞海面，只负责远程支援。8月17日清晨，由于战况日渐激烈，长谷川清命令第8战队司令官南云忠一率名取、由良、鬼怒、川内4艘轻巡驶入黄浦江，炮击大场、江湾一带的中国炮兵阵地。当天上午9时许，第1水雷战队司令官吉田庸光少将率川内、名取首先进入黄浦江，在川内号舰载机校准下对江湾以西的中国军队阵地进行间接射击；一小时后，南云也亲率由良、鬼怒两舰抵近射击，整个炮击行动长达一个半小时，但收效甚微。18日，鬼怒、名取再度进入黄浦江进行炮击。次日，名取还奉命率第21驱逐队驶往马鞍群岛，将搭乘靶舰摄津、矢风抵达此处的部队运往上海。

8月14日，一直在吴港担任训练舰的大井号也被编入现役，军令部将该舰和五十铃，重巡摩耶、青叶、衣笠，布雷舰严岛、冲岛以及原属第二舰队的第5战队、第2水雷战队（神通带3个驱逐队）加强给第三舰队。由于仅凭上海地区的少数海军部队无法取得突破性进展，8月15日，参谋本部决定编组“上海派遣军”，将陆军部队投入淞沪战场。

8月20日，大井、五十铃等舰护送陆军第3、第11师团先遣队7500人自本土出发，于22日拂晓抵达马鞍群岛，次日凌晨在吴淞镇、川沙口两处登陆；23日白天，第二梯队6000人也在相同地点上岸，并得到巡洋舰火力的支援。为吸引中国守军的注意力，鬼怒、由良等舰自22日起即连续炮击狮子林炮台、浏河镇右岸等处阵地，以混淆视听。至8月23日中午，上海派遣军第一批1.5万余人全部抵达一线，司令官松井石根大将也乘上了第8战队旗舰由良号。

在此之后，战局开始向日本一方倾斜。9月中，日军又有第9、第13、第101三个师团抵达上海前线，10月10日开始向中国防线发动总攻，于同月26日攻陷大场。10月20日，军令部还将驻留于青岛等地、负责黄海和东海警戒的第9战队（妙高、长良）、第14战队（天龙、龙田，由原第10战队更名）和第4、第5水雷战队（当时在华南）单独编成

1937年8月停泊在黄浦江上的轻巡洋舰长良号。其前方白色的双桅军舰是美国亚洲舰队炮舰“阿什维尔”号（PG-21）



第四舰队，以丰田副武中将为司令长官；第三、第四舰队合称为“中国方面舰队”，统以长谷川清为长官。

日本海军的“中国方面舰队”是与联合舰队同一级别的单位，司令长官直接向军令部总长伏见宫亲王负责；其编成内除了不含战列舰战队外，已经囊括了日本海军大多数现役航母、巡洋舰和航空队。11月5日，第四舰队护卫陆军的柳川兵团（第十军）所部3个师团在杭州湾登陆，策应上海战事。11月12日中国军队撤出上海，向南京方向溃退，日本陆军开始准备溯江进攻南京。

由于时值长江枯水期，吃水较深的5500吨级轻巡洋舰无法上行至南京江面作战，加之中国海军在江阴江面设置了沉船阻塞线，长谷川清遂留下第11战队的炮舰支援进攻，而让多数巡洋舰返回本土进行修理和改装。

在中日两军激战于上海的同时，负责华南警备的第9战队和第5水雷战队则忙于撤退汕头、厦门等地的日本侨民。华北的警戒部队原计划趁火打劫、在8月下旬攻打青岛，却因东京反对分散兵力而作罢。为防止中国军民通过海岸线调动部队、输入外国军火，8月24日，在优势航空兵力的配合下，长谷川清宣布第三舰队对长江以南的中国沿海开始第一次封锁，驶经华南沿海和长江下游的一切可疑船只均须接受临检，船只进入中方控制下的主要港



1938年在华中方面活动的日军第8战队。左侧四烟囱军舰为那珂号，右侧三烟囱舰为由良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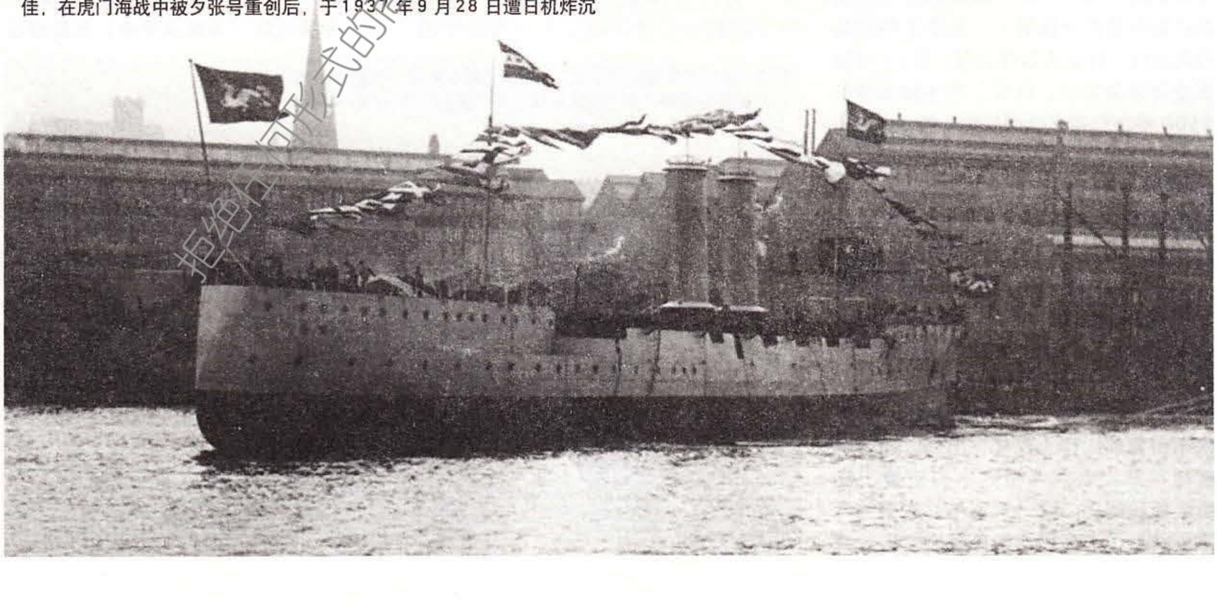
口受到限制。9月5日，封锁范围扩大到江苏海州湾以北（除青岛外。海州即今连云港市海州区）的中国沿海，第四舰队随后也参加了封锁。为防止国际舆论提出质疑，日军不承认其行为是战时封锁，而是诡称为“交通遮断”。

日本海军对华南要港的封锁主要由第5水雷战队承担，司令官大熊政吉少将命令第5、第13、第29驱逐队分别负责监视厦门、福州和汕头，他本人亲率旗舰夕张号作为后援。9月3日晨，夕张号和二等驱逐舰朝颜号驶近东沙群岛主岛东沙岛，发炮轰击岛上的气象大楼和无线电台，并派出陆战队员登陆，岛上中国守军苦战一昼夜后退却。日军随后又控制了虎门外围的万山群岛，并在其中的三灶岛上建立水上飞机基地，试图彻底封锁广州港，但效果并不理想。监视汕头的驱逐舰疾风和追风还报称，广东地区的中国第四舰队（原广东海军）潜伏于虎门要塞一带，准备伺机对日舰发动偷袭。

9月14日清晨，夕张号率领疾风、追风驶入珠江口，袭击了正在进行例行巡逻的中国巡洋舰肇和号和炮舰海周号。肇和号原系清政府1910年在英国订购的防护巡洋舰，排水量2750吨，仅有2门6英寸主炮和0.75-2英寸厚的水平装甲，航速不足20节；海周则英国退役炮舰改造的缉私舰，战斗力更不值得一提。虽然灯台岛炮台也开火助战，但夕张号的140mm主炮还是接连命中目标。海周号首先被命中舰尾，搁浅座沉于虎门附近；肇和号被夕张号前主炮的第三次齐射命中机舱，在撤退时又接连中弹，被迫搁浅于珠江浅滩。

整个虎门炮战历史约40分钟，夕张号仅在烟囱部位被破片击中数次，损失微乎其微。这也是整个中日战争期间，唯一一次发生在双方水面舰艇之间的大规模交战。不过此时日军尚未掌握华南制空权，当夕张号结束战斗、

肇和号系清政府1910年在英国阿姆斯特朗公司订购的防护巡洋舰，1913年完工后由民国海军接收，成为中国第一艘安装蒸汽轮机的军舰。排水量2750吨，煤油混烧锅炉，总功率6000马力，航速20节，安装2门6英寸主炮、4门3英寸速射炮和2具18英寸鱼雷发射管，甲板有0.75～2英寸防护。该舰在民国初年的内战中相当活跃，但因长期缺乏维修舰况不佳，在虎门海战中被夕张号重创后，于1937年9月28日遭日机炸沉



驶返大铲岛泊地时，广东空军的“霍克”战斗机携带小型炸弹对其进行了4次小规模空袭，夕张号被近失弹破片击中数次，少数舰员负伤。此后日军改以空袭对付广东海军残部，9月25－30日，肇和、海虎、江大、舞凤等舰相继被日机炸沉，华南战事遂告一段落。

淞沪会战结束后，中国方面舰队的主要任务改为配合陆军向长江中游挺进。11月20日，日俄战争结束后已经废止近32年的最高统帅机关——大本营又一次在东京建立；同日，海军开始实施战时编制，华北地区的作战任务被解除，第二舰队在和第四舰队交接后返回本土，溯长江向南京方向的进攻则由第11战队的内河炮舰承担。12月13日，南京被日军攻陷。

驻泊于青岛的第四舰队在1938年初运送陆军部队占领了青岛市区、烟台和威海卫。在后两次行动中，第3潜水战队旗舰球磨号不仅以炮火提供支援，炮术长岛内百千世少佐还率领水兵组成的陆战队直接参与了登陆。

进入1938年后，日本海军在联合舰队的编制内保留了6艘5500吨级轻巡，即第8战队的那珂、鬼怒、由良，担任第1、第2水雷战队和第2潜水战队旗舰的川内、神通、五十铃；中国方面舰队编下另有5艘，即分别担任第3、第4、第5水雷战队和第3潜水战队旗舰的北上、木曾、长良、球磨以及第9战队的多摩，加上同样驻防中国的天龙、龙田，除去正在检修和改装的夕张、大井等少数几舰外，剩余的17艘旧式轻巡已处于空前活跃的状态。

同年2月1日，中国方面舰队编下又成立了用于华南作战的第五舰队，下辖第9战队（妙高、多摩）、第10战队（天龙、龙田）、第5水雷战队（长良带3个驱逐队）和第3、第4航空战队。当时日军已控制华北、华中大部和东南沿海，中国只有借助广九、粤汉铁路线，从香港输入军火、药品和稀缺物资，经广州运往内地。最繁忙时，仅广州一处输入的物资就占内地总进口量的80%（此外中国尚可自西南滇越铁路及经西北从苏联输入少量物资）。为切断广州这根最重要的“血管”、弱化中国政府的抗战意志，1938年9月，日军大本营决定进攻广州。

当年10月9日，第五舰队20艘舰艇护卫陆军第二十一军（3个师团）乘坐的106艘运输船驶离马公港，于12日凌晨

1938年日军占领东沙岛后，夕张号巡洋舰在岛上树立的“夕张战死者之牌”



在大亚湾口登陆。由于日方握有制空权，战至21日，广州宣告沦陷。为建立可威胁滇缅路的航空基地，1939年2月，第五舰队又掩护陆军饭田支队和2500名特别陆战队员在海南岛登陆（Y作战），抢占了这一战略要地。同年6－10月，第五舰队继续掩护陆军攻占汕头、南宁，基本结束对华南沿海的封锁。

1939年11月15日，鉴于中国战场的海军作战已接近尾声，大本营海军部下令调整中国方面舰队的编制，原第三、第四、第五舰队分别缩编为第一、第三、第二遣华舰队，增加用于陆上作战的根据地队，在战争高潮期间加强给该部队的各水面舰艇部队则返回联合舰队原编制下。隶属第四舰队的球磨、长良和第五舰队的能代因此驶离了中国，返回本土进行改装和检修。

进入1940年之后，日本海军开始了针对日美战争的“第四次战备促进”，14艘5500吨级轻巡洋舰中，除鬼怒、北上、大井、木曾、能代五舰仍列为“第三预备舰”外，其余皆进行了强化防空火力和夜战能力的改装。这些超龄的老舰将要驶入南方的未知之海，对抗一个令人生畏的强大对手。

日本海军的氧气鱼雷与“重雷装舰”

5500吨级轻巡刚刚服役时，球磨级和较老的天龙级一样装备六年式533mm鱼雷，长良级、川内级与夕张号则装备八年式610mm鱼雷。这两种鱼雷都属于传统的湿式热动力



1939年完成现代化改装的神通号，摄于11月13日，佐多岬标柱间全力公试中。与完工时相比，前桅高度略有降低，见张所面积扩大，舰桥改为封闭式，后桅换装110cm探照灯，弹射器由舰首移至后桅之后。由于武备和上层建筑重量增加，该舰的公试排水量已超过7000吨，航速降至33节以下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QQ群内传播个人收藏国内战史情扫描

鱼雷，以压缩空气为氧化剂。压缩空气在燃烧室中与燃料充分混合，点燃后产生高温高压气体、推动内燃机前进。因为空气中可供助燃的氧气只占21%，剩下的是氮气、惰性气体和二氧化碳，所以燃料的燃烧效率并不高，鱼雷的射程和速度都不令人满意。氧化剂燃烧后剩余的氮气和惰性气体因为不溶于水，从雷尾排出时还会造成大量气泡，暴露鱼雷的航迹。

为改善鱼雷性能，吴工厂在1926年前后曾引入英国白头公司技术，试图研发航速超过40节的高速舰用鱼雷。1928年，八年式的改进型C型试验鱼雷（1930年正式定名为九零式610mm鱼雷）研发成功，次年又研制出用于替代六年式的八九式533mm鱼雷。这两种鱼雷的航速可达46节，36节时的射程分别为10000米和15000米。

在“海军假日”前期，日本海军17艘旧式轻巡装备的就是八九式和九零式鱼雷，它们的射程比旧式的八年式和六年式有了不小的提升，但相较水雷战队设立之初“以战列舰16英寸主炮射程（30000米）为攻击基准”的目标还是差了一大截。

要使鱼雷的射程得到明显提升，必须增加燃料和氧化剂的携带量，这会导致鱼雷直径和长度的增加。如果要让鱼雷在35节高速时的射程达到30000米，其口径必须超过28英寸。这在1930年代的技术条件下是无法实现的。英国和美国海军已经注意到了此问题，在1930年伦敦条约后建造的新型巡洋舰上，两国逐步放弃了鱼雷武器，转而致力于提高主炮的射程和命中率。但日本海军一直对日俄战争中袭击旅顺口的经验念念不忘，继续在提高鱼雷的射程和威力上下工夫。

1928年，刚刚从英国考察归来的大八木静雄造兵少佐提出了一个新思路——以液氧作为助燃剂。与压缩空气助燃剂相比，液氧的优势极为明显：由于液氧在燃烧过程中反应更为充分，在氧化剂体积相等的情况下，使用液氧助燃可以获得更大动能，明显提高鱼雷射程；燃料和液氧充分混合并燃烧后生成可溶于水的二氧化碳，消除了鱼雷的尾迹；产生等量动能所需的液氧大大少于压缩空气，多余的空间可用于增大战雷头。

但是，纯氧与可燃物的混合物性质极不稳定，点火之后很容易发生爆炸，将鱼雷和整个发射装置全部炸飞。英美等国在1920年代也尝试过氧气鱼雷的研发，但都在这一瓶颈阶段相继停止了工作。而日本人抱着一股蛮力投入研制，意外地在1931年取得了突破——吴厂水雷部的技术人员发现，汽油抗爆剂对氧气和燃料混合物的反应能起到稳定作用，而如果先以50%氧气和50%空气的混合气体点燃燃料，再输入纯度更高的氧气进行燃料，发生爆炸的概率就会大大降低。

在这一成果基础上，大八木和朝熊利英造兵中佐（吴厂水雷部设计主任，后官至海军技术中将）、岸本鹿子治大佐（吴厂水雷实验部长）等人共同开发出了一套新的海水冷却系统和氧气制造机，以装备新型鱼雷。为最大限度增加爆炸威力，这种鱼雷的口径被设定为技术上可实现的最大值——610毫米（24英寸）。

1932年底，第一枚试验型氧气鱼雷由吴厂制造出来；次年，首批2枚样雷试射成功，正式定名为九三式610mm鱼雷（1933年为神武纪年2593年）。1935年11月，第一批量产型九三式一型改1氧气鱼雷正式上舰，日本海军的水雷战队正式步入氧气鱼雷时代。

九三式一型改1鱼雷长9米，全重达2.7吨，前部装有填充490公斤炸药的战雷头，36节速度时的射程高达40000米，发动机输出功率520马力时的极速可达50节（此时射程20000米）。相比之下，美国海军1935年装备部队的Mk-15型533mm鱼雷装药374公斤，33.5节时的航程仅为9150米，不及前者的四分之一。而日本在1943年改进出的九三式三型鱼雷将雷头装药增加到780公斤，36节时的航程依然可达30000米。

为配合氧气鱼雷在军舰上的使用，日本海军早在1932年就研制出可旋回的四联装九二式610mm鱼雷发射装置，于1934年起先后安装到新完工的驱逐舰和巡洋舰上。九二式发射装置长8.87米、宽4.53米、全重16.2吨，最大旋回角105度（部分型号可360度回转）。配合改型发射装置的还有带120mm双筒望远镜的九一式3型鱼雷指挥仪、九三式瞄准速度仪和九三式鱼雷计算仪。

伴随着氧气鱼雷的出现，军令部多年来一直津津乐道的攻势布雷作战寿终正寝，17艘水雷战队旗舰上的1号机雷布放装置在1930年代相继拆除。而日本人随后就像得到了新玩具的小孩子一样，开始孜孜不倦地把“攻势水雷战”当成制胜法宝。1928年，军令部对《海战要务令》进行第三次修改，水雷战队被定义为夜战部队主力，要求“驱逐队在一般情况下对敌施以猛烈果断的袭击，以夜间秘密逼近、近距离攻击为宗旨”。而当以“渐减邀击”为主要策略的决战方针在1936年前后最终形成为包含9个阶段的具体实施方案时，夜战部队被设定为将在马绍尔群岛以东迎战美国舰队，在本方主力舰与对方进行决战的前夜尽可能多地削弱美国舰队的实力。

按照“渐减邀击作战”的要求，夜战部队的用兵思路在1934-1936年进行了重大调整，最终确立了“四面包围攻击”的战策：夜战一开始，4艘金刚级高速战列舰（支援队）和4艘高雄级重



二战期间，陈列于华盛顿美国海军总司令部门口的一枚九三式鱼雷。按照美军的记录，这枚鱼雷是1942年瓜岛战役期间从克鲁兹角的海滩上回收的，但迟至1943年底，大多数一线美舰指挥官似乎仍不知道日军装备有一种射程超出巡洋舰主炮的特殊鱼雷

巡（直率队）将首先以主炮从前后方突破美国舰队的外围防御，随后由分属第5、第6、第7、第8战队的12艘重巡洋舰（妙高级、最上级、利根级、伊吹级）从四个方向发动第一轮氧气鱼雷攻击，以扩大突破口。外围美舰被消灭后，4艘轻巡洋舰率领的第1、第2、第3、第4水雷战队将驶近目标、发动第二轮雷击，力求最大限度削弱美国主力舰，轻巡搭载的“夜侦”则为此番攻击提供照明。

在这一过程中，整个夜战部队将使用800具以上鱼雷发射管；而因为相当一部分舰只具备再度装填能力，最终发射的氧气鱼雷总数可能超过1000枚！为满足这一需求，从1936年完工的白露级开始，所有新建的日本驱逐舰都安装四联装九二式610mm鱼雷发射管，先后建造了白露级（10艘）、朝潮级（10艘）、阳炎级（18艘）、夕云级（20艘）等型号。1939年度造舰计划中列入的丙型驱逐舰岛风号甚至安装了3座五联装发射管，一次可以齐射15枚鱼雷！

夜战方针确定之初，军令部设想日美战争不会在1944年之前爆发，所以理想的水雷战队旗舰将是4艘新完工的阿贺野级巡洋舰。但进入1939年之后，由于日美关系紧张，海军对新型水雷战队旗舰的需求陡然加强；而在优先建造大型舰艇的方针确定之后，阿贺野级在1942年之前完工的希望已相当渺茫。在此情况下，日本海军不得不因陋就简，对旧式5500吨级轻巡的鱼雷发射管进行改装，使其可以发射610mm氧气鱼雷，暂时充当夜战用水雷战队旗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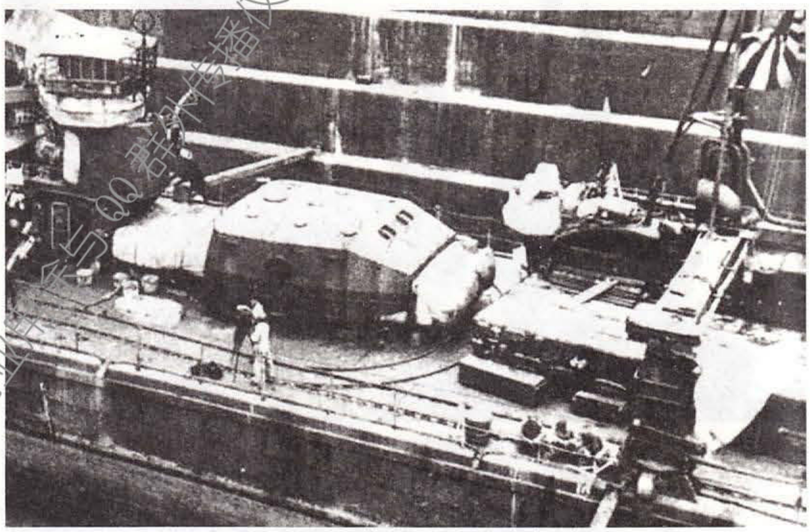
根据1940年11月15日下达的“第四次战备促进令”，第1、第2、第4水雷战队的旗舰阿武隈号、那珂号和川内号在1941年3-5月首先接受改装。这三舰原有的4座双联装八年式鱼雷发射管全部被拆除，在后方原3、4号发射管的位置安装2座四联装九二式2型发射装置，可360度旋回，前部空出的两个发射位则由甲板室盖住。由于三舰在此前的改造中已经对水雷战指挥所进行了扩建，本次改造没有增加新的射控设备。第3、第5水雷战队旗舰神通号和鬼怒号原定在1941年秋接受改装，但因为新生产出的鱼雷发射装置要优先用于在建的新舰，两舰直到日美开战也没有完成预定的改装。

不过比起“重雷装舰”的概念来，3艘水雷战队旗舰的改造就显得小巫见大巫了。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1937年的日本海军第三阶段战备促进案中，目的是最大限度强化夜战雷击能力，特别是对美国舰队外围防御的突破。当时美国已经准备建造安装9门12英寸主炮的“阿拉斯加”级大型巡洋舰，军令部担心仅靠重巡洋舰的8英寸主炮和第一轮雷击不足以将其消灭，希望在两轮雷击之间以类似扫荡的补充攻击来确保战果。按照舰政本部的构想，担当补充攻击的舰只应具有与驱逐舰相当的高速，同时具备空前的雷击密度——每舰安装11座四联装九二式610mm鱼雷发射管！这种完全以氧气鱼雷为主战装备的特殊突击舰，就是所谓的“重雷装舰”。

重雷装舰周身遍装鱼雷发射管，在黑夜中冒着极猛烈的炮火向敌舰突击。此时倘有一枚炮弹命中，整个军舰可能当场爆炸，在相当程度上是一种有去无回的自杀舰。耗费巨资建造一种也许只是一次性使用的特攻舰，自然不是资源不足的日本人的算盘。5艘球磨级在1930年代已经逐渐落后，是阿贺野级服役后首批被替换的舰种，它们的航速和基本性能都符合重雷装舰的要求，成本也较低廉，自然成为改造的首选。

不过，直到1940年前后，日本海军才为重雷装舰项目争取到20座四联装鱼雷发射管，仅够2艘军舰的改装之用。所以球磨级中只有现代化程度最低的大井号和北上号在1940年10-11月入坞，分别在吴厂和佐世保工厂进行重雷装舰改造，鱼雷发射装置的数目也削减为每舰10座。原定在同一批进行改造的木曾号工事则被延后，此后因战争爆发未能进行。

大井号和北上号的主要改造项目包括拆去除1－4号炮塔外的所有主炮、高炮、原有的鱼雷发射管和布雷轨道，舰体中部加宽1.6米，两舷每侧安装5座九二式3型四联装鱼雷发射装置，1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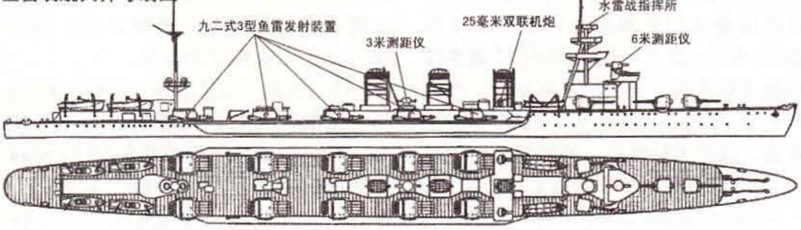
右上：甲型驱逐舰不知火号上的四联装九二式610mm鱼雷发射装置及再装填设备，1942年9月。“重雷装舰”及现代化改装后的水雷战队旗舰安装的鱼雷发射管与之相同

右下：广岛县吴市海事历史科学馆收藏的九三式鱼雷推进部残骸

烟囱两侧各加装1座双联25mm机炮。由于鱼雷发射管占据了舰体中部大部分位置，后桅之后的甲板室略有延长，救生艇挂架的位置也发生变化，舰尾加装了深弹发射架。原定1号至4号旧主炮将更换为四座双联八九式127毫米高炮，但同样因为高炮生产数不足而作罢。1941年12月底，即日美正式开战近一个月之后，两艘“重雷装舰”终于完成改造，随即合编为第9战队，纳入第一舰队编下。

令人乍舌的雷击战能力是“重雷装舰”最显著的特征。每舷的5座四联装发射装置使其单舷鱼雷齐射量高达20枚，相当于2.5艘阳炎级驱逐舰；2艘重雷装舰在一次攻击中可以齐射80枚氧气鱼雷，相当于10艘旧式5500吨级轻巡洋舰。为尽量节省空间，这些鱼雷发射装置均不带旋回电机，全部由人力操作旋转，不过因为采取了减重措施，每座发射装置的重量只有12吨。舰上也没有再装填设备，只有供一次发

重雷装舰大井号线图



射的鱼雷量。

为配合鱼雷兵器的使用，两艘“重雷装舰”在前桅顶端设置了可360度观察的水雷战指挥所，其中设置带120mm双筒望远镜的零式鱼雷指挥仪，气象条件良好时可对30000米外的目标实施雷击。航海舰桥顶端的4米测距仪更换为6米样式，备用水雷战指挥所和主炮射击盘也得到更新。

改装后的重雷装舰公试排水量增加到5860吨，满载7041吨，吃水增加到5.6米。不过因为动力设备进行了更新，航速仍可以达到31.67节，续航力4000海里/14节，编制468人。讽刺的是，这两艘古怪的军舰是为夜间决战而生，而从它们问世的那一天起，所要从事的却是以航空力量为基干的长期消耗战。所费不赀的“重雷装舰”，直到战沉也未能取得哪怕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

六、美日开战之初的旧式轻巡洋舰“东风，雨”

1941年12月4日拂晓前，位于马里兰州切尔滕汉姆的美国海军M无线电监听站截获了一通发自东京的日语天气预报。值班通信士拉尔夫·布利克斯(Ralph Bricks)抄录下了原文，用领班室里的密码本进行了对照，发现电文的内容是“东风，雨”(Higashi no kaze ame)。

对日本驻外使领馆和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来说，“东风，雨”意味着日美开战已成定局，战争将在数日之内爆发。而对启动“出师准备”已有一年之久的日本海军来说，这不过意味着不可逆转的走向日美决战的趋势得到了确认。

从1940年到1941年，联合舰队在原有的常备舰队第一舰队（决战部队）与第二舰队（夜战部队）之外，又相继编成了第三舰队（菲律宾攻略部队）、第四舰队（内南洋防卫部队）、第五舰队（北太平洋防卫部队）、第六舰队（潜艇部队）及南遣舰队（印度支那半岛攻略部队）[注]。在航母逐步取代战列舰成为决战主力的背景下，这些部队将与第一航空舰队（航母部队）和基地航空队紧密配合，力争在开战初期就取得对英、美、荷舰队的战略优势。

由于新型轻巡洋舰尚未完工，17艘



1935年在昭和十年度特别大演习中与僚舰阿武隈号发生碰撞的北上号，阿武隈号舰首切入北上号左舷。当时两舰都属于特设第7舰队



被阿武隈号舰首撞坏的北上号左舷鱼雷发射管

【注】 此处的第三舰队、第四舰队系在“战备促进”名义下为准备对美开战编组的新部队，与中日战争期间“中国方面舰队”编成内的旧第三、第四舰队不同。在更早的“海军假日”时代，联合舰队仅保有第一、第二两个常备舰队，只在每年秋季的年度特别演习期间临时编成一些新单位。如1935年著名的“第四舰队事件”中，第四舰队即属于临时单位，与后来作为常备舰队设立的第四舰队有重要区别


1939年2月26日在周防滩和驱逐舰进行合练的川内号。其右后方的驱逐舰是初春号

旧式轻巡在开战初期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到1941年12月为止，海军以它们为核心编成了6个水雷战队、2个潜水战队（第4、第5）和4个通常战队（第9、第16、第18、第21）。根据所属舰队的不同，这些战队在1941年12月8日开战当日（东京时间）处于不同的位置：驶向夏威夷的南云机动部队中，自第一舰队临时调拨的第1水雷战队赫然在列，该战队的旗舰是已经换装了新型鱼雷发射管的阿武隈号，其任务是前敌哨戒和反潜。

第三舰队所属的第16战队（长良、球磨）、第5水雷战队（旗舰名取）和第二舰队所属的第2（旗舰神通）、第4水雷战队（旗舰那珂）护航菲律宾攻略部队朝吕宋岛进发；第3水雷战队（旗舰川内）和南遣舰队所属的第4（旗舰鬼怒）、第5潜水战队（旗舰由良）则护卫进攻英属马来半岛的部队。

第四舰队所属的第18战队（天龙、龙田）以及第6水雷战队（旗舰夕张）负责攻击威克岛和关岛，临时编入第15战队（属第二遣华舰队）的五十铃号则要在香港海面监视驻港的英国军舰。

不承担作战任务的军舰中，第五舰队所属的第21战队（多摩、木曾）也在千岛群岛附近巡弋警戒，只有第9战队的两艘“重雷装舰”还在船厂进行改装收尾工事。

在同型各舰中，阿武隈号因为参与至关重要的夏威夷作战，所受的关注度无疑最高。不过该舰沿途所经之处并无美国潜艇袭扰，由于对手猝不及防，对珍珠港的空袭也取得完美成功，归途中还受到多摩、木曾所属的第21战队的欢迎。

停泊在香港外海的五十铃号也忠实地完成了封锁任务，还派出带炸弹的舰载水上侦察机攻击正在入坞修理的英国浅水重炮舰“蛾子”号（HMS Moth），该舰后来自行爆破毁弃。12月25日英军宣布投降后，五十铃号于次日正午时分驶入英军船坞前泊地，派出陆战队员接管了九龙防务。本舰在香港断断续续待到1942年4月，随后才编入第16战队参与荷属东印度作战。

菲律宾方面，第十一航空舰队的岸基攻击机于12月8-13日摧毁了驻菲美军的大部分飞机，美国亚洲舰队旗舰“休斯敦”号重巡洋舰也在12月8日撤往荷属东印度群岛。

12月8日凌晨，由第2水雷战队和第5战队护航的龙骧号航母还空袭了棉兰老岛的达沃机场，炸毁了跑道和机库。因此，当第16战队护航下的陆军木村支队于12日凌晨在吕宋岛东南端的黎牙实比（Legazpi）登陆时，几乎未遇到任何抵抗。

在北部两个支援点登陆的部队倒是遇到些小麻烦：第5水雷战队在10日白天奉命守卫阿帕里登陆场，几架在空袭中幸存的美军B-17轰炸机对战队旗舰名取号进行了攻击，名取号被多枚近失弹炸伤，一个油柜破损、部分燃油外泄，不得不驶返马公抢修。春风号驱逐舰也被美机炸伤，1艘扫雷艇沉没。在另一处登陆场维甘警戒的第4水雷战队也在10日白天遭到10余架B-17轰炸机和P-40战斗机的空袭，旗舰那珂号被美军机枪扫射，有3人战死，2艘运输船被炸成重伤，还有1艘扫海艇沉没。

不过在日军掌握制空权之后，后续的登陆就显得轻车熟路了。12月22日深夜，由第4、第5水雷战队护航的第48师团主力在林加延湾（Lingayen Gulf）登陆，麦克阿瑟决定向巴丹半岛撤退。1942年1月2日，日军占领马尼拉。

马来部队的经历则可谓一波三折。这支由南遣舰队司令长官小泽治三郎中将指挥的小舰队下辖第7战队、第3水雷战队和第4、第5潜水战队，拥有5艘重巡洋舰、1艘训练巡洋舰和3艘5500吨级轻巡（川内、鬼怒、由良），负责为进攻马来半岛的山下奉文第二十五军乘坐的18艘运输船护航。12月4日清晨，舰队从海南岛的三亚港出航，为混淆视听，全队在绕过印度支那半岛后首先朝暹罗湾北部前进，在X日（登陆日）之前12小时才折向马来半岛东岸。

12月6日下午，马来部队在交趾支那南端的柬埔寨角被英军“卡塔林纳”式水上巡逻机发现，英国远东军司令部判断其目标为泰国，对马来的入侵也颇在眉睫。但英国远东军总司令布鲁克-波帕姆空军上将（Sir Robert Brook-Popham）担心英军抢先进入泰国会引发外交抗议，坐失良机，马来部

跟随南云机动部队前去偷袭珍珠港的阿武隈号巡洋舰，摄于日本时间1941年12月7日5时30分，自第一补给队“极东丸”号上拍摄





1941年12月8日傍晚，穿过柔佛海峡、踏上最后征途的英国Z舰队旗舰“威尔士亲王”号，舰身涂有蛇纹状的热带迷彩。左上角可见“反击”号战列巡洋舰

队得以从容完成转向，于东京时间12月8日凌晨在宋卡、北大年、哥打巴鲁三处登陆。

从时间上说，第一批日军涌上哥打巴鲁滩头的时间是12月8日1时30分，比“宣战时间”早了差不多90分钟。在行动中，从三井物产公司征用的大型运兵船淡路山丸（9794吨）被英国飞机炸成重伤，残骸于12日由荷兰潜艇K－12击沉，成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损失的第一艘水面船舶。

12月8日下午，驻新加坡的英国Z舰队两艘大型主力舰“威尔士亲王”号、“反击”号和4艘驱逐舰由菲利普斯海军上将（Sir Thomas Phillips）率领，在没有空中掩护的情况下驶向暹罗湾纵深，企图拦截日本舰队。9日下午3时，Z舰队在新加坡和哥打巴鲁之间被第30潜水队旗舰伊－65号发现，不过潜艇发出的警报直到两小时后才被小泽的旗舰鸟海号接收到。此时马来部队位于英舰正北方，双方仅相距120海里，且正以30节以上的相对速度不断接近。

对小泽和负责整个南方作战支援的第二舰队司令长官近藤信竹来说，Z舰队的巨炮和高速令人不寒而栗。除去小泽的9艘巡洋舰，坐镇昆仑岛东方海面的近藤还有2艘较老的金刚级高速战列舰和2艘重巡洋舰，但与新锐的“威尔士亲王”号相比显然差出一截，唯一可倚仗的只有驻扎在西贡附近的第21、22航空战队所属的108架陆上攻击机。17时30分，小泽命令正在马来半岛东岸卸载的运输船急速向北退避，同时要求航空部队开展侦察攻击。

1822时，第4潜水战队旗舰鬼怒号（该舰的位置最靠南，此时正在西行与主队会合）自行弹射的1架九四式水侦在东南侧发现了正以16节速度朝东北方向前进的Z舰队，随后，第7战队的铃谷、熊野两舰弹射的九五式水侦也与鬼怒机会合。当晚1940时，双方的距离已缩短至83海里，小泽命令全队转向与英舰相同的航向，以26节高速追赶对方，企图凭借氧气鱼雷与英国战列舰决战。考虑到他那5艘重巡洋舰最厚的装甲也只有140mm，这无疑是在自杀（有研究者认为，小泽此举只是为了在陆军面前做出“奋力拼杀”的姿态，他很清楚近藤一定会阻止这种以卵击石的冒险）。

正在南方部队旗舰爱宕号上的第二舰队参谋长白石万隆少将闻讯后，果然大为惊恐。他指出：英舰装有雷达，日本海军传统的“家艺”夜战技术与之相比没有优势，因此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在9日夜间发生遭遇战。近藤在2015时下令岸基航空队在10日拂晓首先对Z舰队发起攻击，水面舰艇在这之后承担打扫战场任务，避免发生夜间水面战。

接到小泽在17时30分发出的警报后，第22航空战队司令官松永贞市少将（曾任五十铃号舰长）在1815时和1904时分两批派出了35架陆攻，26架挂航空鱼雷、9架挂250公斤炸弹，向南寻找英舰。

在此期间，2037时，马来部队主队与之前孤悬南方的鬼怒号会合，小泽这时才发现，密集的大雨和恶劣的海况使他的舰队只能以16节速度行驶，加上之前弹射的水侦无法回收（小泽命

1939年4月29日在宿毛湾进行训练的联合舰队各舰。左侧为特型驱逐舰胧号，右侧的四烟囱轻巡是那珂号，胧号与那珂号之间可见重巡摩耶号，画面最右侧是另一艘重巡鸟海号的舰首，那珂号4号烟囱之后露出的宝塔状桅楼则属于战列舰扶桑号。空中掠过的是基地航空队的九六式陆攻



令飞机在完成任务后降落于南海上的昆仑岛，实际只有3架成功着降，铃谷机迫降于海面，熊野机、鬼怒机失踪），夜战得手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此情况下，他于21时下令转航向北，逐渐远离了敌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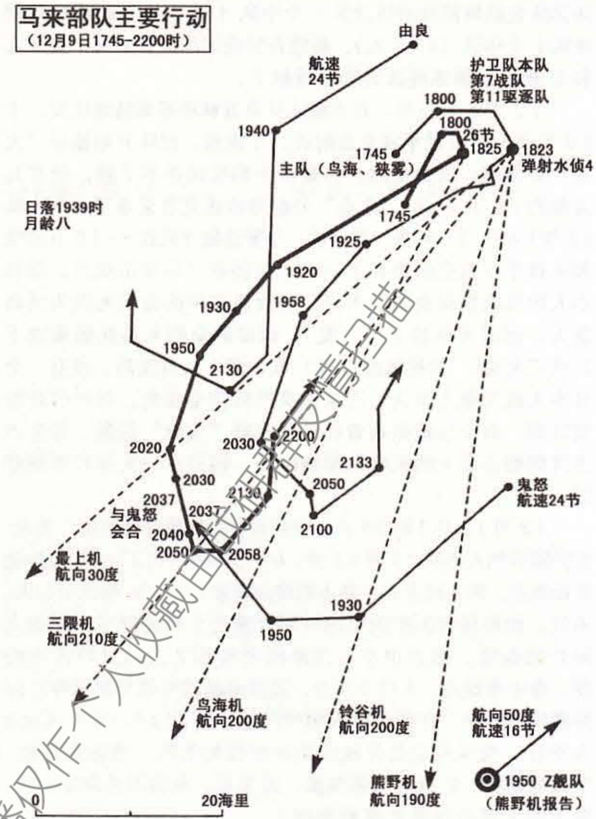
不过，从西贡飞来的攻击机可不知道小泽的行动，他们依然冒着恶劣的天气继续南进。21时30分，元山航空队的九六式陆攻发现了小泽的旗舰鸟海号，想当然地将其认作"反击"号，投下照明弹，随后就要发射鱼雷。大惊失色的小泽一面下令以灯光信号向飞机表明身份，一面拼命向西贡发电报："中攻3架现身鸟海号上空，对鸟海投下照明弹。"尴尬的松永只好急电叱责带队的中西一二少佐："（你部）位于友舰上空。返航。"

12月10日凌晨1时许，当Z舰队行至阿南巴斯群岛附近时，"威尔士亲王"号收到一份内容有误的情报，菲利普斯决定调头向南、驶往哥打巴鲁以南150海里处的关丹(Kuantan)去拦截日本运输船队。几乎就在同时，日军第19潜水队的伊－58号潜艇也再度发现这两艘英国主力舰，并在0341时报告了第4潜水战队旗舰鬼怒号，战队司令官吉富说三少将很快判断出英舰的准确航向。这一次，近藤信竹无论如何也不愿让小泽再去冒险了，他下令："着航空部队及潜水部队极力捕捉击灭此敌。"支援部队则驶往北大年海面避战。

当天正午时分，"威尔士亲王"号和"反击"号在距离关丹仅75海里的南海上遭到第22航空战队的94架陆攻的围攻，于两个半小时后沉没。至此，皇家海军在马来亚已不复存在。

小泽舰队完成对第一批登陆部队的运输和护航任务后，返回金兰湾进行了整补，随后于12月中旬再度将第二批部队送至马来半岛东岸。在这次行动中，川内号的水侦于12月19日中午在哥打巴鲁海面发现了正在跟踪日本舰队的荷兰潜艇O－20号，立即对其投下炸弹，并引导绫波、浦波、夕雾3艘驱逐舰对其进行攻击。

O－20号的通讯设备严重受损，在下潜隐蔽时一度又陷入浅海的淤泥中；当天夜间，该艇重新浮上水面，试图以全速撤退，却被监视的浦波号逮了个正着。O－20号最终在发射完全部鱼雷（无一命中）后由舰员自沉，过于"热心"的浦波号唯恐该艇再次水遁，冲上去丢下一串深弹，炸死了7名已经坐上救生筏的幸存者。加上随舰同沉的艇长和6名轮



机人员，O－20号只有32人幸存。

1942年1月中旬，日军进至马来半岛南部，获胜已成定局。南遣舰队诸舰随后结束马来方面作战，开始参与对荷属东印度群岛的进攻。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时，真正遇上麻烦的是出马进攻威克岛的夕张号和天龙、龙田两舰。这个距离夏威夷足有3200公里的小岛只有不到500名陆战队员驻守，最有力的防御武器是6门从退役战列舰"北达科他"号上拆下来的5英寸炮。第四舰队司令长官井上成美中将为了把主力用于占领关岛，只派第6水雷战队司令官梶冈定道少将指挥所部担当护航任务，另外由天龙、龙田所属的第18战队提供火力支援。登

1941年9月，在中太平洋特鲁克基地进行开战前最后训练的天龙级。近处为天龙号，远处为龙田号，均已追加防空机炮；但因舰龄过长，通常只承担反潜、哨戒、护航等辅助任务



陆部队包括舞鹤特别陆战队1个中队（350人）和第6根据地队1个中队（310人），搭载在特设巡洋舰金刚丸、金龙丸和2艘由旧驱逐舰改装的哨戒艇上。

12月8日下午，日本舰队从夸贾林环礁集结地出发，于10日23时许驶至威克岛附近。午夜前，部队开始换乘"大发"登陆艇，准备抢滩。但是井上和梶冈并不了解，就在几天前的12月4日，"企业"号航母给威克岛运来了一个中队12架F4F-3"野猫"战斗机。尽管这批飞机在8-10日的空袭中被千岁航空队炸坏了一半，但仍有一半反击能力。而日本人的气象预报也做的不好，进攻岛东岸的金龙丸因为风高浪大，迟迟无法放下"大发"，西岸的金刚丸虽然勉强放下2只"大发"，却被风浪打翻1只。到11日凌晨，没有一个日本人成功登上滩头，进攻的突然性完全丧失。梶冈只好改变计划，命令运输船拖着已经下水的"大发"后撤，首先由巡洋舰炮击岛上的机场和岸炮阵地，随后在白天强行实施登陆。



上图：1941年5月美军航拍的威克岛

下图：在威克岛战斗中被日军摧毁的F4F"野猫"战斗机



12月11日3时25分，夕张号开始向威克岛射击，天龙、龙田随后加入作战；3时43分，6艘驱逐舰的127mm舰炮也开始炮击。到4时左右，岛上的储油罐被140mm炮命中起火。不过，始终保持沉默的美国守军好像终于被唤醒了，岸炮立即开始轰鸣。炮击由不久前刚刚安装到岛上的火控雷达指挥，命中率很高。4时03分，离岸最近的疾风号驱逐舰后部弹药库被命中，在两分钟内爆炸沉没，舰长以下168人仅1人幸存。疾风号也是开战以来日军损失的第一艘正规舰艇。夕张号则被11枚近失弹包围，而天龙、龙田因为离岸太远，射出的大部分炮弹都落到海滩上。

趁此机会，4架完好的美军F4F战斗机也摸黑自岛上起飞，扫射了防空火力薄弱的日本舰队。5时37分，如月号驱逐舰被埃尔罗德上尉驾驶的"野猫"投下的炸弹命中，引爆了甲板上堆放的深水炸弹和鱼雷，如月号在5分钟内沉没，舰长以下156人战死。金刚丸则遭到机枪扫射，油舱一度起火。胶着持续到上午10点，梶冈见海况毫无好转迹象，强行抢滩只会带来更大损失，被迫下令撤退。13日晨，夕张号悻悻驶回夸贾林岛泊地。

直到12月22日晚间，得到第2航空战队（航母飞龙、苍龙）和第6、第8战队（共计6艘重巡）加强的日本舰队才重返威克岛，在大批轰炸机的掩护下再度开始强攻。这一次，梶冈可谓煞费苦心：登陆开始前，天龙、龙田两舰首先在威克岛东北海岸附近施放烟幕，造成佯攻之势，以吸引守军火力。与此同时，真正的登陆船队则在潜艇导引下向南岸接近。为防止恶劣的海况再度耽误换乘，载有部队的第32、33号哨戒艇与"大发"一同冲向海滩，登陆部队也增加到了3个中队（其中一个中队为敢死队）、总数近千人。23日凌晨，日军终于登岸成功，在付出重大伤亡后占领了炮台和机枪阵地；上午10时40分，梶冈向坐镇夸贾林的井上报告：威克岛已被完全占领。

12月27-29日，天龙、龙田和夕张相继驶返夸贾林，结束这场难言胜利的威克岛之战。为攻克这个弹丸之地，日军付出了2艘驱逐舰沉没、2艘哨戒艇损毁、近30架飞机被击落击伤，海陆军战死总人数超过700人的代价，而美军仅战死130人，损失飞机12架。夕张号和天龙、龙田在此次作战中均被击伤，并暴露了防空火力不足的痼疾。在联合舰队节节胜利的背景下，这仅是一些无关痛痒的小节；但待到战争进一步深入时，日本人却要为"小节"付出越来越多的代价。



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的夕张号，正在向左舷方向转弯。由于舰体尺寸较小、余裕度不足，该舰在开战后拆除了部分主炮以加强防空火力

荷属东印度攻略

结束对马来半岛和菲律宾的进攻后，日军挥师南下，直趋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之间的荷属东印度群岛（日文汉字称为"兰领东印度"或"兰印"）。这里年产石油800万吨，是扩张中的日本帝国垂涎已久的目标。大本营计划以第二、第三舰队会同陆军第十六军，从马来亚、菲律宾这两个侧翼夹攻婆

罗洲，首先占领出产石油的打拉根(Tarakan)、巨港(Palembang)等要地，并取得锡里伯斯岛(Celebes，今印尼苏拉威西岛)作为根据地，随后集中兵力攻占爪哇岛。由于预期盟军将组织相当规模的抵抗，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和陆军第3飞行集团的430架飞机将为进攻部队提供空中支援。

美英荷澳四国盟军在荷印方面的作战是由新成立不久的西南太平洋四国盟军总指挥部(简称ABDA－C)负责的，英国人韦维尔担任名义上的总司令，海军总指挥是美国亚洲舰队司令哈特海军上将(Thomas Hart)。哈特麾下的战舰包括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USS Houston，CA−30)、2艘轻巡洋舰和13艘驱逐舰，来自皇家澳大利亚海军的2艘轻巡洋舰和7艘驱逐舰，以及由赫尔弗里克中将(Conrad Helfrich)指挥、拥有4艘轻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15艘潜艇的荷兰东印度舰队。

ABDA舰队的巡洋舰大多设计于1920年代，与所有“海军假日”时代的产物一样薄皮大馅，在缺乏空中掩护的情况下，仅凭这支临时拼凑的舰队去抵抗日本人的锋芒是不可想象的。但盟军可用的力量委实有限：美国太平洋舰队的主力还沉在珍珠港的淤泥里，英国的战略重心在欧洲，澳大利亚要集中力量加强本土防务；荷兰因为本土已经被德国所占，虽有力保东印度群岛的决心，却无多余的兵力可用，还要留神防范与殖民政府同床异梦的印尼当地人。因此，ABDA舰队的行动表现出极大的消极性和混乱性，即只有当日军主动发起进攻、甚至已占领某个据点时，盟军舰队才姗姗来迟，进行一番徒劳的袭扰；至于主动出击，则是他们不敢也无力奢求的。

1942年1月5日，日本陆海军达成了进攻婆罗洲的协定，以菲律宾的达沃为基地的西村祥治少将第4水雷战队将掩护陆军坂口支队向西登陆打拉根，占领当地的机场、港区和油田。1月11日凌晨，对打拉根的进攻顺利完成。同一天，号称“空之神兵”的日本海军空降兵对锡里伯斯岛北端的万鸦老(Manado)实施了伞降。

在巩固对打拉根的占领后，西村祥治随即率旗舰那珂号和3个驱逐队掩护坂口去攻占婆罗洲东南岸的巴厘巴板(Balikpapan)。尽管ABDA舰队在望加锡海峡部署了8艘潜艇，还派出陆基轰炸机对日舰进行空袭，击沉了4艘日军运输船，但坂口支队还是在1月25日成功攻入巴厘巴板市区。随后的一个星期里，锡里伯斯岛首府肯达里、荷印东部要冲安汶岛也被日军占领。

从2月第一周起，设在爪哇岛北岸的ABDA舰队基地开始遭到从巴厘巴板和肯达里起飞的日军陆基攻击机的轰炸，2月3日，日机在望加锡海峡空袭了驶往巴厘巴板的盟军舰队，美国轻巡洋舰“马布海德”号被1枚炸弹重创，不得不返回本土修理；重巡洋舰“休斯敦”号的3号炮塔被炸毁，只余前方的6门主炮可以战斗。

初战不利的ABDA舰队一时失了锐气，哈特上将把四国海军部队的指挥权移交给了荷兰人赫尔弗里克，随后称病回国了。赫尔弗里克倒是希望采取主动，但在日军相继攻占望加锡、马辰和巨港之后，ABDA部队已经被压缩到爪哇岛一隅之地。2月19日凌晨，由第8驱逐队掩护的陆军今村支队在巴厘岛登陆，直接威胁爪哇岛北岸。由荷兰人多尔曼少将(Karel Doorman)指挥的3艘轻巡洋舰、7艘驱逐舰和9艘鱼雷艇虽然驶往巴厘岛登陆场挑战，却因为夜战技术不佳及调度不力，被区区4艘日本驱逐舰痛击，损失荷兰驱逐舰“皮特·海因”号，荷兰轻巡洋舰“特罗姆普”号和美国驱逐舰“斯图尔特”号丧失战斗力，而日舰仅有一艘遭重创。至此，爪哇的陷落已只是时间问题。

2月19日，进攻爪哇的日军第48师团分乘41艘运输船从望加锡泊地出发，兵分两路进入爪哇海。日舰在巴厘巴板稍作耽搁，随后于26日爪哇岛东部的泗水港(Surabaya)。登陆舰队仍由第4水雷战队提供直接掩护，高木武雄少将指挥第5战队的2艘重巡洋舰那智、羽黑，和田中赖三少将的第2水雷战队担任间接掩护。

25日中午，这支船队在望加锡海峡被荷兰海军的“卡塔林纳”水上巡逻机发现，赫尔弗里克中将决定派多尔曼

ABDA舰队中的荷兰巡洋舰“特罗姆普”号





隶属于ABDA舰队的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属“北安普敦”级，完工于1930年，标准排水量9006吨，安装9门8英寸主炮、4门5英寸高炮和6具21英寸鱼雷发射管，可搭载2−4架水侦，航速32.5节，水线附近和机舱有3英寸装甲防护。1942年在巴达维亚海战中沉没，为纪念该舰，1943年完工的“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CL−81以“休斯敦”号为名

指挥所有可用舰艇前往泗水进行拦截。之前停泊在丹戎不碌港（Tandjung Priok，巴达维亚的外港）的英国重巡洋舰“埃克塞特”号（HMS Exeter）、澳大利亚轻巡洋舰“珀斯”号（HMAS Perth）和2艘英国驱逐舰立即前往泗水与多尔曼会合。在此之前，多尔曼本人已经率荷兰轻巡洋舰“德·鲁伊特”号（HrMs De Ruyter）、“爪哇”号（HrMs Java），美国重巡洋舰“休斯敦”号和5艘盟军驱逐舰驶离爪哇岛南岸的芝拉扎（Cilacap），在爪哇岛以东和马威安岛以北进行巡逻。

26日，两支盟军舰队在泗水港会合，随即再度出航寻找日本舰队，但一无所获。此时ABDA－C已决意放弃爪哇岛，但荷兰人深感无处可退，决心尽一切努力拖延日军登陆的时间；从纸面上看，双方主力舰的实力大致相当，尚可一战。

2月27日下午，荷兰侦察机在马威安岛以西再度捕捉到高木舰队，多尔曼决定倾巢而出，率全部可用舰只前去截击。当他们在日本船队南方60海里外被那智号的水侦发现时，高木武雄相当吃惊。当时日军正以第2水雷战队为前锋、第4水雷战队为左翼向西航行，2艘重巡在稍北位置，高木命令运输船暂时向西退避，战斗舰艇准备迎敌。为校正弹道，神通号、那智号、羽黑号还各自弹射了1架观测机。

东京时间17时40分，神通号在方位50度、15海里外发现了英国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HMS Electra）的桅杆，高木惟恐对手占得先机，下令立即转向。5分钟后，神通号在16800米距离上对“伊莱克特拉”号开火；17时47分，远方的那智号也加入了射击，泗水海战（盟军方面称第一次爪哇海战）爆发了。

多尔曼的舰队中包含在前几次遭遇战中被击伤的“休斯敦”号等舰艇，航速慢于日舰。那智号开火后，“德·鲁伊特”号的机舱很快被1发8英寸炮弹命中，所幸并未爆炸。为防止敌舰抢占T字横头，多尔曼在17时51分下令向西回转，与第4水雷战队交火。西村祥治则试图发挥九三式鱼雷的射程优势，他冒险穿越友舰的射击火线，绕到多尔曼舰队侧翼，于18时04分前后齐射了27枚鱼雷（那珂号4枚）；紧接着，田中赖三的旗舰神通号和高木的重巡羽黑号也发射了12枚鱼雷。不过除了提前自爆的巨大响声外，“威力强大之氧气鱼雷”的初演可谓失败透顶。

为避免久战不决、影响运输船靠岸卸载，高木于18时37分下达了突击令。日舰随后高速南行，开始以更加可靠的主炮齐射覆盖盟军巡洋舰。由于日舰事先弹射了3架校射机，其命中率开始逐步提高。18时38分，那智的一发8英寸炮弹穿过“埃克塞特”号锅炉室上方的甲板、落入舱内爆炸，炸毁了该舰8台锅炉中的6台，“埃克塞特”号起火倾斜、被迫撤出战斗。紧跟在该舰之后的“休斯敦”号、“珀斯”号和“爪哇”号也不明就里地左转，结果队形大乱。被友舰抛下的“德·鲁伊特”号不得不调头寻找后续舰只。乘此机会，日舰再度朝ABDA舰队发射了39枚鱼雷。



卡雷尔·多尔曼少将（1889–1942），1889年出生于乌德勒支一个信奉天主教的军人世家，17岁进入荷兰皇家海军学院，自1910年起长期服役于一线。多尔曼是荷兰海军第一批飞行员之一，1914年即取得飞行资格，1938–1940年任东印度群岛海军航空兵司令。战争爆发后，他受命担任ABDA联合舰队总指挥，与日军对方周旋，最后在泗水海战中英勇战死。荷兰海军有3艘军舰以卡雷尔·多尔曼命名

18时45分，荷兰驱逐舰“科特纳”号（HrMs Kortenaer）被一枚鱼雷命中右舷，当即折断沉没。多尔曼被迫下令各舰施放烟幕，同时率旗舰暂时向东南方退去，重新整理队形；重伤的“埃克塞特”号则由荷兰驱逐舰“德·威特”号（HrMs Witte de With）掩护，以5节航速沿巽他海峡（Sunda Strait）南撤。海战的第一阶段至此暂时告一段落。

在长达一个小时的交火中，2艘日军重巡先后向ABDA舰队发射了1271发8英寸炮弹，只有5发中的，命中率仅为0.4%；而39枚鱼雷中只有1枚击中目标，命中率也不过2.5%，与日常操练中自鸣得意的“打死靶”数据有着天壤之别。九三式鱼雷动辄自爆的表现同样令人灰心。而多尔曼虽然失去一艘主力舰，斗志却依然旺盛，考验还在前头。

在高木舰队的东南方，ABDA舰队以驱逐舰施放的烟幕为掩护，重新完成了集合。“德·鲁伊特”号随后打出旗语：“各舰跟随我！坚决反攻！”（Ik val aan, volg mij!）多尔曼舰队以驱逐舰“伊莱克特拉”号和“朱庇特”号（HMS Jupiter）为首，朝西北方驶去。

19时15分，第5战队再度捕捉到多尔曼的踪迹，高木决心以鱼雷结束战斗。在不到20分钟时间里，羽黑号、那智号以及两个水雷战队的大部分舰艇

ABDA舰队中的荷兰轻巡洋舰“爪哇”号。该舰系德国日尔曼尼亚船厂1916年设计的旧式轻巡洋舰，属一战德国轻巡的放大版，标准排水量6670吨，航速31节，10门5.9英寸主炮均为后部敞开的炮廓式。由于建造时间过长，该舰在1925年完工时即已落后。同型舰“苏门答腊”号在荷兰沦陷后撤往加拿大，1944年7月作为人工港防波堤自沉于诺曼底滩头



朝ABDA舰队发射了92枚鱼雷，依旧无一命中。第2水雷战队的队形却被“伊莱克特拉”号冲乱，神通号被该舰1弹命中、造成1死4伤，第4水雷战队的驱逐舰朝云号机舱被击毁，有4人阵亡、19人受伤。不过“伊莱克特拉”号也在极近距离上遭到朝云号5英寸主炮的直接命中，丧失了动力，随后被峰云号发射的鱼雷击沉。由于19时50分已经日落，战场上的能见度下降到15海里，多尔曼下令4艘驱逐舰朝第5战队发射全部24枚鱼雷（同样无一命中），随后再度施放烟幕、南行脱离了战场。

白昼作战结束时，日军仅有1艘驱逐舰受重伤、运输船队全然无损；而多尔曼虽然失去撤退的“埃克塞特”号、沉没的2艘驱逐舰和若干掩护舰，依然有4艘巡洋舰和6艘驱逐舰可供作战。双方都不愿轻易放弃，希望在随后的夜战中扭转局势。

20时27分，日舰开始回收之前弹射的5架水侦，“珀斯”号和“休斯敦”号乘机靠近神通号、发动了突袭，但被日舰发射的鱼雷逐退。由于己方既无空中掩护又无侦察机可用，多尔曼一度进行复杂的机动、希望找到日军运输船。在此过程中，“朱庇特”号撞上爪哇岛北岸本方布设的水雷沉没，宾福德中校指挥的4艘美国驱逐舰则因燃料不足、被迫向泗水港返航；再算上留在白天的战场上营救“科特纳”号幸存者的“遭遇”号（HMS Encounter），多尔曼只带着4艘巡洋舰径直北驶、紧紧跟随高木舰队。

比起白天双方实力大致均衡的状况，此时的ABDA舰队既无驱逐舰掩护、通讯也不畅，加上弹药消耗过半，几无任何胜算。而神通号和那珂号的水侦却对它们保持着接触，将其行动通报给高木。

东京时间2月28日0时33分，已经组成战斗队形的第5战队在东南方14600米外观察到了孤军前来挑战的多尔曼，高木将2艘重巡面朝东北方平行排开，企图利用月光进行目测无照射炮击。7分钟后，“德·鲁伊特”号也发现了那智号和羽黑号，它的6英寸主炮开始轰鸣，照明弹映出了日舰宝塔状的桅楼。这一次，高木耐住性子确定了敌舰的航向，最后才在0时53分朝12800米外的ABDA舰队齐射了12枚九三式鱼雷。7分钟后，了望哨到海平线上观察到火山喷发般的壮观景象：“德·鲁伊特”号的弹药库爆炸了。

泗水海战中被日军鱼雷击沉的荷兰驱逐舰“科特纳”号



“德·鲁伊特”号的舰尾被羽黑发射的一枚鱼雷命中，从艏楼末端到中部弹射器附近都燃起大火，殉爆的弹药裹持着火焰和碎片冲起几十米高，机舱损毁、电力全失，损管失效。几分钟后，无力回天的多尔曼下令弃舰，他本人则和拉康鲍尔舰长留在舰桥上与军舰共命运。在最后时刻，多尔曼还以灯光信号向“珀斯”号下令：“休斯敦号和珀斯号向巴达维亚港撤退！不要管我！”“德·鲁伊特”号的残骸在海面上燃烧了近三小时才消失，有345名官兵随舰沉没。

继“德·鲁伊特”号之后，由德国日尔曼尼亚船厂设计的“爪哇”号也被那智号的鱼雷命中。这艘设计于一战时期的老舰几乎没有防雷击能力，舰尾被当场炸断，在两小时内即告沉没，舰员损失高达512人，幸存者不到20人。“珀斯”号和“休斯敦”号拼死捞起了“德·鲁伊特”号的17名和“爪哇”号的2名幸存者，随后就按照多尔曼最后的命令朝西南方的丹戎不碌港撤退。而日舰因为弄错了对方的航向，知道数小时后才发现敌舰已经成功脱逃。

第一次爪哇海战在一片狼藉中结束了，这是日俄战争后



泗水海战中ABDA舰队的旗舰——荷兰轻巡洋舰“德·鲁伊特”号。该舰系当时荷兰海军最强大的巡洋舰，设计阶段得到德国技术援助，标准排水量6442吨，航速32节，安装7门5.9英寸主炮和10门40mm机炮，搭载2架水侦，水线附近有2英寸装甲防护，1936年完工后一直担任荷属东印度分舰队旗舰。1942年2月28日凌晨，“德?鲁伊特”号在巴汶岛附近被那智号和羽黑号发射的氧气鱼雷击沉，舰队司令多尔曼少将与舰同沉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

联合舰队第一次参与大规模水面舰艇交战，也是对日军多年苦心操练的夜战技术的第一次检验。高木舰队在白昼遭遇战中指挥无度、表现令人失望，只是在夜战中稍许挽回颜面；而被寄予厚望的九三式鱼雷如同变化莫测的“神经刀”，其时灵时不灵的表现也让日本人相当头疼。日舰在长达7个半小时的战斗中消耗8英寸炮弹1619发、5.5英寸炮弹221发、5英寸炮弹515发和九三式鱼雷151枚，仅命中4发8英寸炮弹和3枚鱼雷（不计5英寸炮弹命中数量），虽取得击沉2艘轻巡洋舰和3艘驱逐舰的战果，仍得归功于运气。

在先期脱离战场的几艘盟军战舰中，宾福德指挥的4艘美国驱逐舰在3月1日凌晨击退4艘拦截的日本驱逐舰，于3月4日傍晚抵达澳大利亚，成为ABDA舰队中少有的幸存者。重伤的“埃克塞特”号则和掩护该舰撤退的“德·威特”号在28日白天抵达泗水港，该舰会合了“遭遇”号以及主机故障的美国驱逐舰“蒲柏”号，企图于当天夜间撤往澳大利亚。不过“埃克塞特”号抢修后的航速只能达到23节，该舰尚未驶入巽他海峡时，就被那智号、羽黑号和2艘驱逐舰盯上了。由于第5战队的2艘重巡在前一天的交战中消耗了40%的弹药，高木武雄还召唤第三舰队司令长官高桥伊望中将指挥另外2艘重巡妙高号、足柄号及2艘驱逐舰前来助战。

3月1日正午时分，“埃克塞特”号和“遭遇”号在一场被称为第二次爪哇海战（日方视其为泗水海战的一部分）的水面交战中被鱼雷和炮火击沉，“蒲柏”号则在当天下午遭龙骧号航母的舰载机重创，被迫自沉。3月2日凌晨，第48师团的第一批部队登上爪哇岛北岸的克拉甘，赫尔弗里克中将坐着最后一架“卡塔林纳”逃向英军控制的锡兰岛，直到三年多之后才再度返回。

第一次爪哇海战中最后撤退的“休斯敦”号和“珀斯”号在2月28日中午返回了丹戎不碌港，两舰当时分别只剩下300发（“休斯敦”号）和160发（“珀斯”号）主炮弹，射控装置因严重受震而损坏，燃料也出现不足。

“休斯敦”号舰长鲁克斯上校（Albert H. Rooks）鉴于直航澳大利亚风险太大，计划先经爪哇岛西端的巽他海峡、前往南岸的芝拉扎检修，随后再行撤退，力主战斗到底的赫尔弗里克中将在撤退前也首肯了这一命令。两舰在补充部分燃料之后，于28日傍晚重新出港，一路向西驶去；荷兰驱逐舰“伊弗森”号（HrMs Evertsen）则在一小时后出港跟随。

继高木舰队掩护的东爪哇攻略部队在克拉甘登陆后，进攻西爪哇的日军第2师团也分乘56艘运输船从金兰湾出发，驶向巴达维亚港（Batavia，今印尼雅加达）。为这支部队提供掩护的是原显三郎少将（其父是甲午战争时的名将坪井航三）指挥的第5水雷战队（旗舰名取）和第7战队所属的2艘重巡最上号、三隈号，共计重巡2艘、轻巡1艘、驱逐舰13艘。

原显三郎的主力在抵达巽他海峡入口后，即驶往万丹湾（Banten Bay）卸载登陆部队，另有6艘驱逐舰掩护着6艘运输船前往孔雀港（Merak）实施登陆。当“珀斯”号和“休斯敦”号在3月1日凌晨接近巽他海峡时，恰好被负责登陆区域警戒的日军驱逐舰吹雪号发现。东京时间0时30分，原显三郎的旗舰名取号也确认了目标。原少将为阻止敌舰攻击尚未卸载完的运输船，决定以名取号为诱饵、将敌舰引到万丹湾以北的开阔地带，同时召唤正在更北方海域巡弋的最上号和三隈号赶来截击，以8英寸主炮和九三式鱼雷消灭两艘敌舰。

盟军巡洋舰的指挥官是“珀斯”号舰长沃勒上校（Hector Waller）。当两舰从巴比岛南方接近万丹湾时，“珀斯”号的了望哨发现圣尼古拉角（Sint Nicolaas Point）附近有一艘“澳大利亚巡逻舰”，“珀斯”号以灯光信号要求对方应答，但该舰拒绝回应并开始施放烟幕。原来，那是第5水雷战队所属的春风号驱逐舰。沃勒在确认对方乃是日舰后，率先在0时37分下令开火。“珀斯”号发射的照明弹使万丹湾内的日军运输船一览无余，两艘盟舰遂不顾名取号的诱敌计，直奔运输船而去。原显三郎只好下令本战队所属的驱逐舰发射大批鱼雷，并以5英寸和4.7英寸主炮对敌舰进行齐射。

“休斯敦”号和“珀斯”号冒着炮

1942年初的“珀斯”号，舰身施以迷彩伪装。该舰系英国朴茨茅斯船厂为澳大利亚建造的“利安德”级轻巡洋舰，标准排水量7000吨，航速32.5节，安装6门6英寸主炮、8门4英寸高平炮和8具鱼雷发射管，搭载1架水侦，水线有4英寸装甲带。“珀斯”号于1942年3月1日凌晨在巴达维亚海战中被日军鱼雷击沉



第二次爪哇海战中被日军击沉的英国重巡洋舰“埃克塞特”号，1939年因参加追击德国袭击舰“施佩伯爵”号的拉普拉塔河口之战名噪一时。该舰属英国最后一批条约型重巡“约克”级，标准排水量8390吨，航速30节，安装6门8英寸主炮、4门4英寸高平炮、2门“砰砰”炮和8具鱼雷发射管，搭载2架水侦，水线附近和机舱侧壁有3英寸装甲防护。两个粗细不一的烟囱是其最显著的外观特征



火一路疾行，同时向右舷方向的驱逐舰和万丹湾内的运输船进行射击。日舰白雪号被1枚6英寸炮弹命中舰桥，春风号被多枚在极近距离上爆炸的炮弹炸伤。而名取号以下各舰虽然朝敌舰发射了28枚鱼雷，却没有一发命中，而“珀斯”号也向日军运输船发射4枚鱼雷作为回应。万丹湾内一时火光摇曳，热闹非常。

不过，“休斯敦”号随即就发现右前方的潘姜岛（Pandjang Island）阻住了航道，为避免搁浅，盟舰必须在潘姜岛以西转舵北上。而日军第7战队的2艘重巡此时已在圣尼古拉角东北方就位，1时19分，两舰在11200米距离上朝“休斯敦”号发射了6枚鱼雷，随即又打开探照灯、锁定盟舰，两天内双方的第三次巡洋舰对战开始了。

战斗一开始，三隈号的供电系统一度发生故障，探照灯意外熄灭。该舰经过抢修，于1时30分再度发出突击令：“全军向敌舰进击！”此时双方间的距离已缩短至9000米，2艘日本重巡和位于西北方的驱逐舰在4分钟内朝对手发射了35枚九三式鱼雷。“珀斯”号右舷水线附近首先被1枚8英寸炮弹命中，随后前部锅炉室又中一枚鱼雷，丧失了动力。1时37分，第2枚鱼雷在该舰舰桥右下方爆炸，紧接着第3、第4枚鱼雷也相继中的。1时42分，“珀斯”号向左倾覆沉没，沃勒舰长以下375人阵亡（有部分阵亡者是在弃舰后被日本驱逐舰的机炮扫射而死的），另有307人被日舰捞起，不过其中三分之一以上的船员在随后三年中因疾病、饥饿和折磨死在了巴达维亚的日军战俘营里。

不屈的“休斯敦”号仍在孤军奋战。该舰在1时40分被一发8英寸炮弹命中后部机舱，随后左舷也被一枚鱼雷命中，航速下降到15节。但该舰仅剩的两座可发射的8英寸炮塔仍在继续射击，还命中了万丹湾内的第2号扫海艇。不过随着日舰的火力越来越精确，“休斯敦”号的舰桥和主炮塔多次被命中，鲁克斯上校下令向弹药库注水。

1时56分，“休斯敦”号的主炮终于停止了轰鸣。4分钟后，鲁克斯本人被爆炸的弹片打死。此时“休斯敦”号已被4枚鱼雷和50发以上各种口径的炮弹命中，却仍在以机炮和小口径高炮进行射击，星条旗也依旧在旗杆上飘扬。略有些无奈的原显三郎下令巡洋舰停止射击，派驱逐舰敷波号以鱼雷解决“休斯敦”号。2时06分，美舰的弹药库被九三式鱼雷引爆，舰尾高高翘起、颤抖着从视界中消失了，鲁克斯舰长以下696人战死，有368名幸存者被日舰救起。一个小时后，姗姗来迟的“伊弗森”号也被2艘日本驱逐舰击伤，搁浅后因弹药库爆炸沉没。至此，ABDA舰队已经不复存在了。

在这次被称为巴达维亚海战（盟方称巽他海峡之战）的混战中，还发生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插曲——1时30分前后，有一排来路不明的鱼雷窜进万丹湾内的日本运输船队中，当场炸沉了7170吨的佐仓丸，龙城丸、蓬莱丸（9192吨）和龙野丸（6960吨）也中雷遭到重创。

8770吨的龙城丸（真名神州丸）是日本陆军专门设计的拥有登陆艇格纳库和飞机弹射器的“乙型特殊船”，该舰右舷中雷后倾斜搁浅于浅滩，正在船上的第十六军司令官今村均中将及其幕僚跳进水里，泡了三个多小时才被友舰救起。

一般认为，击沉“神州丸”的鱼雷正是2艘日本重巡朝“休斯敦”号发射的，只是因为九三式鱼雷射程甚远、在失的后还继续前进，才造成这意外的“战果”。不过从当时各舰的位置看，运输船也有可能是被“休斯敦”号的主炮或“珀斯”号之前发射的鱼雷击沉的。



“休斯敦”号舰长阿尔伯特·鲁克斯上校（1891–1942），早年为潜艇指挥官，后进入海军防务学院进修，1941年起担任亚洲舰队旗舰“休斯敦”号舰长，苏腊巴亚海战后被追授国会荣誉勋章。美国海军有一艘“弗莱彻”级驱逐舰DD–804以鲁克斯命名，美国陆军工程兵在华盛顿州的一处营地被命名为鲁克斯公园

原显三郎鉴于这些鱼雷出现的实在离奇，在次日特派第5驱逐队司令吉川周吉中佐上岸向今村道歉，含含糊糊地承认了误击友舰的可能性；心领神会的陆军也以“海陆团结”为重，将这段悬案草草糊弄过去。3月8日，盟军留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残部宣布投降，荷印作战结束了。

在水雷战队奏捷荷印的同时，已经前进到肯达里的南云机动部队也开始朝南方海域出击。1942年1月23日，陆军南海支队在机动部队掩护下攻占了俾斯麦海中新不列颠岛的拉包尔（Rabaul）；2月19日，从4艘航母上起飞的180架日机又空袭了澳大利亚的达尔文港。

在随后的一个月里，东南战线上的日军相继攻占新几内亚的莱城、萨拉莫阿，俾斯麦海中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和所罗门群岛中的布干维尔岛，完成了推进到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一线的第一阶段作战任务。南云舰队随后又挥师西进，将萨默维尔上将指挥的英国东方舰队一直逼退到东非。几乎每个星期都可以从日本的广播中听到《军舰进行曲》和日本播

在1942年爪哇海战中被日军己方鱼雷击沉的陆军运输船神州丸号。由于当时坐沉在浅水中，因此得以打捞出水，在翌年10月修复。该舰最终在1945年1月在台湾高雄外海被美军飞机炸坏，随后被潜艇击沉



电战研群友情扫描

音员的那种“能让敌人肝胆俱裂”的夸张颤音。

在一片凯旋的捷报声中，唯一的坏消息来自那珂号：3月26日，该舰奉命与第16战队的名取号以及3个驱逐队组成攻略部队，护送搭载于2艘运输船上的海军根据地队去占领爪哇岛南岸190海里外的英属圣诞岛（Christmas Island）。3月31日清晨，登陆行动顺利完成，但舰队也被正在附近执行伏击任务的美军潜艇“海狼”号（USS Seawolf，SS-197）发现。后者在2100米距离上朝那珂号发射了4枚鱼雷，意外地无一命中，不得不在深弹的爆炸声中下潜。不过绰号“潜航艺术家”的瓦德尔艇长（Frederick Warder）在潜望镜中注意到了那珂号高大的后主桅、系留于弹射器上的水上侦察机和三脚樯式前桅，断定这是一个值得攻击的目标。“海狼”号因此极有耐性地潜伏到海岸线外15海里处，等待日舰返航。

4月1日凌晨4时许，“海狼”号的潜望镜中果然发现了正在缓缓出港的名取号，不过瓦德尔将其误认为前一天已经攻击过的那珂号，因此对名取号上悬挂的战队司令旗感到迷惑。无论如何，该艇还是在5时13分对名取号发射了3枚鱼雷，因为引信不良的缘故（这一阶段美国鱼雷的通病），其中一雷提前爆炸，依然无一命中。“海狼”号只得再度下潜。

对瓦德尔来说，这个愚人节玩笑实在开大了——傍晚时分，当“海狼”号再度上浮到潜望镜深度、观察日本舰队的动向时，居然又一次发现了那艘始终打不死的巡洋舰，当时它正在弹射一架水侦，而且那面奇怪的司令旗也消失了。瓦尔德当然不了解自己的误判（战后美国海军学院编写的潜艇部队官方战史也认定“海狼”号攻击的是同一艘军舰），他现在满心想着的都是尽快消灭这艘敌舰，结束这个荒诞的愚人节笑话。“海狼”号飞快地朝敌舰发射了2枚鱼雷，下潜到安全深度。片刻之后，声呐中传来一声巨响，随后深弹爆炸声响成一片。该艇隐蔽到深夜，然后驶向澳大利亚。

“海狼”号在4月1日这天攻击的第二个目标确实是前一日逃过一劫的那珂号。该舰躲过了第一枚鱼雷，被第二雷击中右舷中部，1号锅炉室附近被炸出一个6.1米×6米的大洞，进水800余吨，舰体严重右倾。那珂号随后由名取号拖往万丹湾，在4月10日进入新加坡实里达基地、由修理舰进行堵漏作业，最终在6月中驶返本土。该舰在舞鹤海军工厂的维修和改装持续了整整10个月之久，直到1943年4月才重新返回现役。而那珂号在美军潜艇面前的不堪一击，也预示着姊妹舰们不祥的命运。

从中途岛到瓜岛

1942年6月4日中午11时许，中途岛西北方海面，一截短短的绳梯正从燃烧着的赤城号航母垂向海面，干瘦秃顶的南云忠一中将、又矮又胖的草鹿龙之介少将、满脸病容的源田实中佐等人一个接一个地顺着绳梯坐到一条内火艇上。几分钟后，内火艇靠上第10战队司令官木村进少将的旗舰长良号，这艘舰龄超过二十年的老舰升起司令旗和南云的中将旗，成为了第一航空舰队的代理旗舰。

印度洋之战结束后，“胜利病”发作的日本海军高层为第二阶段作战的方向问题发生了争执。大本营海军部坚持南进战略，主张控制新几内亚以东的所罗门群岛和新喀里多尼亚－斐济一线，孤立澳大利亚这个盟军反攻的跳板；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则力主继续东进，寻歼在珍珠港漏网的美军航母。

1942年4月18日，哈尔西中将指挥的“大黄蜂”号航母起飞16架陆军B－25轰炸机空袭了东京，反对东进的声音被大大削弱。5月初，奉命前去占领莫尔兹比港的日本舰队在珊瑚海与美军TF17特混舰队爆发遭遇战，双方各损失1艘航母，日军在短期内吞下整个新几内亚的企图就此破产，联合舰队只有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全部希望寄托在进攻中途岛、引诱美国舰队实施决战

1942年2月时的多摩号，舰身施以迷彩伪装，舷外可见消磁电线。该舰在日美开战当天奉命与木曾号一同驶往北太平洋，掩护南云机动部队返回母港，途中因海况恶劣多处受损，不得不进行舰体补强工程。图中所见的是完成补强后的该舰，前桅被截短以降低重心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传播，欢迎分享收藏电子书战史



1942 年 2 月在小笠原群岛海面巡弋的木曾号，由第五舰队附属报道班员拍摄，舰身涂有迷彩伪装。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舰与多摩号编成的第 21 战队作为第五舰队主力在北千岛和小笠原方面执行巡逻、护航任务，由于北太平洋海况恶劣，舰龄超过二十年的木曾号出现金属疲劳与折损状况，不得不在 1942 年 1 月中旬返回横须贺进行维修和补强。图中可见该舰的前桅已被截短

的 MI 作战上。

有 6 艘 5500 吨级轻巡参与了对中途岛的进攻，即第 2、第 3、第 4 水雷战队的旗舰神通号、川内号和由良号，第 9 战队的北上号、大井号，第 10 战队旗舰长良号，它们分属三支部队：长良号是南云中将的第一机动部队的警戒兵力，这支拥有 4 艘航母的舰队将承担空袭中途岛和寻歼美军航母的重任；由良号和神通号属于近藤信竹中将指挥的中途岛攻略部队，其中由良号属于警戒队，神通号则要为登陆中途岛的步兵乘坐的 14 艘运输船护航。川内号、北上号和大井号则跟随山本本人亲率的主力部队行驶在南云之后 300 海里处，它们将承担打扫战场和临时支援的任务。作为战略佯动，细萱戊子郎中将的第五舰队将在 MI 作战开始前攻击阿留申群岛，第 21 战队（多摩、木曾）就在这支部队中。

作为一种纸面构想，MI 作战计划可谓精彩至极，但它并未考虑到执行过程中的种种问题，仅有 4 艘航母的南云舰队也很难同时完成空袭中途岛和应付美军航母两项任务。加之美军破译了日方秘密，尽管日军在总兵力和作战经验上都胜过美军，南云舰队在第一攻击日 6 月 4 日上午的绝大多数时候表现也很优异，但到当天中午，失败还是已成定局：赤城、加贺、苍龙 3 艘航母被美军俯冲轰炸机炸成重伤，只剩飞龙号一舰尚有战斗力。南云忠一改以长良号为旗舰后，即下令坐镇飞龙号的第 2 航空战队司令官山口多闻发动反击。当天下午，飞龙号的两次攻击重创美军航母“约克城”号，但飞龙号也在日落之前被美机炸成一片火海。MI 作战第一天结束时，南云已经没有一艘航母可用了。

4 日深夜，长良号上的南云清点了自己手中的兵力，他还有 2 艘高速战列舰、2 艘重巡洋舰、1 艘轻巡洋舰和 12 艘驱逐舰，尚堪一战。

由于主力舰队就在西方 300 海里外，得到噩耗的山本一度打算让北方部队的 2 艘航母隼鹰、龙骧从阿留申群岛兼程赶往中途岛，南云的残部则在 4 日夜间与美舰展开夜战，待次日主力部队和增援航母赶到战场后再行发动进攻。

但指挥美国舰队的斯普鲁恩斯少将（Raymond A. Spruance）与其前任哈尔西截然相反，具有可贵的冷静节制的美德，在完成对飞龙号的最后一次攻击后，2 艘完好的美军航母即向东退出战场，与南云脱离接触。5 日天亮之后，这支舰队还可以在中途岛岸基兵力的掩护下对南云的残部和新到战场的山本主力舰队发动空袭，并挫败一切在该岛登陆的计划。而隼鹰号和龙骧号因为航速太慢（最高 26 节），在 24 小时内都无望接近中途岛。山本权衡利害之后，于 6 月 5 日凌晨宣布全军撤退，结束了这场“联合舰队七十年来之最大作战”。

12 月 10 日清晨，疲惫的长良号缓缓靠上了联合舰队旗舰大和号的舷侧。在草鹿参谋长“南云长官与卑职愿亲手雪恨”的陈情后，南云忠一获得了暂时的赦免。关键时刻，山本还需要他继续指挥机动部队的作战。

MI 作战失利后，兵力不足的联合舰队被迫接受战争长期化的现实。为继



1942 年 6 月中途岛海战之后成为南云忠一旗舰的长良号巡洋舰

续压制澳大利亚、应对即将到来的盟军反攻，日军一面恢复自新几内亚北岸向莫尔兹比港的进攻，一面把航空基地推进到所罗门群岛南部和新几内亚东部，试图夺取空中控制权。7月4日，美军发现日本正在所罗门群岛东南部的瓜达尔卡纳尔岛（Guadalcanal）修筑机场，试图威胁美澳交通线。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上将果断决定改变以新几内亚作为主攻方向的原定计划，出兵瓜岛。

7月14日，为应对东南方面战事，联合舰队编成了以三川军一中将为司令长官的第八舰队，驻扎在拉包尔。第八舰队下辖第18战队（天龙、龙田）、第13驱逐队、第7潜水战队和第7、第8根据地队，以及临时从第一舰队借调的第6战队（4艘重巡）。原第6水雷战队缩编而成的第2海上护卫队（旗舰夕张）当时正停泊于拉包尔，也被置于三川的指挥下。第八舰队整体实力偏弱，但得到驻拉包尔的基地航空队的支援，应付岛屿作战已属足够。

8月7日凌晨，美军南太平洋部队掩护海军陆战队第1师主力在瓜岛登陆，岛上的2940名日军（其中2700人为工兵）逃入丛林，美军顺利占领了完工80%的机场、仓库、通信所和发电所；图拉吉岛（Tulagi）的日军水上飞机基地也被摧毁，15架飞机全被击落。

驻拉包尔的日军第25航空战队在7日上午派出两批共27架一式陆攻、9架九九式舰爆和18架零战前去空袭登陆场，却遭到弗莱彻中将TF61特混舰队从3艘航母上起飞的62架F4F“野猫”的拦截，损失16架。8日白天，日军再度出动37架飞机空袭瓜岛，仅击沉1艘运输船、击伤1艘驱逐舰，己方损失却达19架。而美军到当天日落时已有11000人登上瓜岛，6000人登上图拉吉岛，基本结束了地面战事。

三川军一认为，要挽救瓜岛战局，必须亲率舰队出击。8月7日清晨，他不等联合舰队司令部做出指示，就下令第八舰队主力备航。先任参谋神重德大佐（海大甲种31期第一名毕业的高材生）为三川制定了一个夜战计划：舰队在8日白天接近战场，首先隐蔽，待夜幕降临后突然杀向滩头，以氧气鱼雷和8英寸舰炮对尚未卸载完人员、物资的美军运输船进行屠戮。

8月7日下午，第八舰队以单列纵队阵形驶出拉包尔泊地，三川乘坐旗舰鸟海号一马当先，随后是五藤存知少将指挥的第6战队4艘重巡，松山光治少将指挥实力较弱的第18战队（天龙号、驱逐舰夕止号，离港执行护航任务的龙田号由夕张号顶替）殿后，总计5艘重巡、2艘轻巡、1艘驱逐舰的部队向圣乔治水道集结。

8日清晨，驶至布干维尔岛东北60海里处的三川舰队弹射了4架水侦，搜索250海里范围内的敌情。令他兴奋的是，弗莱彻因为连续两天遭到拉包尔航空队的袭击，担心航母受损，主动将TF61后撤到了圣伊莎贝尔岛西北海面（这一行为后来成为弗莱彻被打入冷宫的主要原因），这使得日本舰队在整个8日夜间不会受到空袭的威胁。水侦还发现瓜岛北岸的霍尼亚拉泊地（Honiara）停泊着多艘运输船，另有若干巡逻舰在埃斯佩罗斯角附近巡弋。

三川估计瓜岛附近的美军有1艘战列舰、4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和15艘运输船，他下令舰队沿布干维尔海峡南下，以26节高速通过圣伊莎贝尔岛和科隆班加拉岛之间的“槽海”，从拉塞尔岛以北朝霍尼亚拉泊地接近。



第一次所罗门海战的指挥者、第八舰队司令长官三川军一中将（1888—1981）。广岛县人，海兵第38期、海大甲种第22期出身，历任驻法海军副武官，重巡青叶号、鸟海号、战列舰雾岛号舰长，第二舰队参谋长、军令部第二部长等职。开战时为第3战队司令官，率部参与珍珠港、印度洋、中途岛诸役的支援，瓜岛战役开始后指挥新编第八舰队。三川在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中的指挥历来有很多争议，普遍认为获胜的运气成分较大。三川此后未获高升，战争末期出任西南方面舰队及第二、第三南遣舰队司令长官，1945年5月以中将军衔退役

在瓜岛北岸等待三川舰队的是由澳大利亚海军的克鲁奇利少将（Victor Crutchley）指挥的美澳联合编队TF62。在弗莱彻的航母撤离战场后，克鲁奇利与登陆行动总指挥特纳、陆上部队指挥官范德格里夫特进行了商议，决定8日夜间冒险让运输船留在霍尼亚拉泊地，9日拂晓后一次性卸载重要物资，一俟天亮立即撤退。

TF62拥有8艘巡洋舰和15艘驱逐舰，克鲁奇利把他的旗舰“澳大利亚”号重巡洋舰与同样来自澳大利亚的“堪培拉”号、美军重巡洋舰“芝加哥”号、驱逐舰“帕特森”号和“巴格利”号布置在萨沃岛（Savo）与瓜岛之间宽7海里的南方水道上，美军重巡洋舰“文森斯”号、“阿斯托里亚”号、“昆西”号和2艘驱逐舰“赫尔姆”号位于萨沃岛和佛罗里达岛之间宽3海里的北方水道上，佛罗里达岛和瓜岛之间的东方水道上有美军轻巡洋舰“圣胡安”号、2艘驱逐舰和澳大利亚轻巡洋舰“霍巴特”号，另有2艘美国驱逐舰“拉尔夫·塔尔博特”号和“布鲁”号前出至萨沃岛西北作为哨戒舰。

对趁着夜色杀来的日本舰队，克鲁奇利在当天下午已经接到了预警。但

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中三川军一的旗舰鸟海号，属高雄级



驾驶侦察机的澳大利亚飞行员将三川的兵力误判为巡洋舰3艘、驱逐舰3艘、水机母舰2艘，克鲁奇利怀疑水机母舰是去中所罗门某个岛屿建立基地、准备9日白天对瓜岛进行空袭的，而三川的巡洋舰只有3艘，不可能对装有雷达的TF62构成威胁，所以盟军各舰战备状态相当松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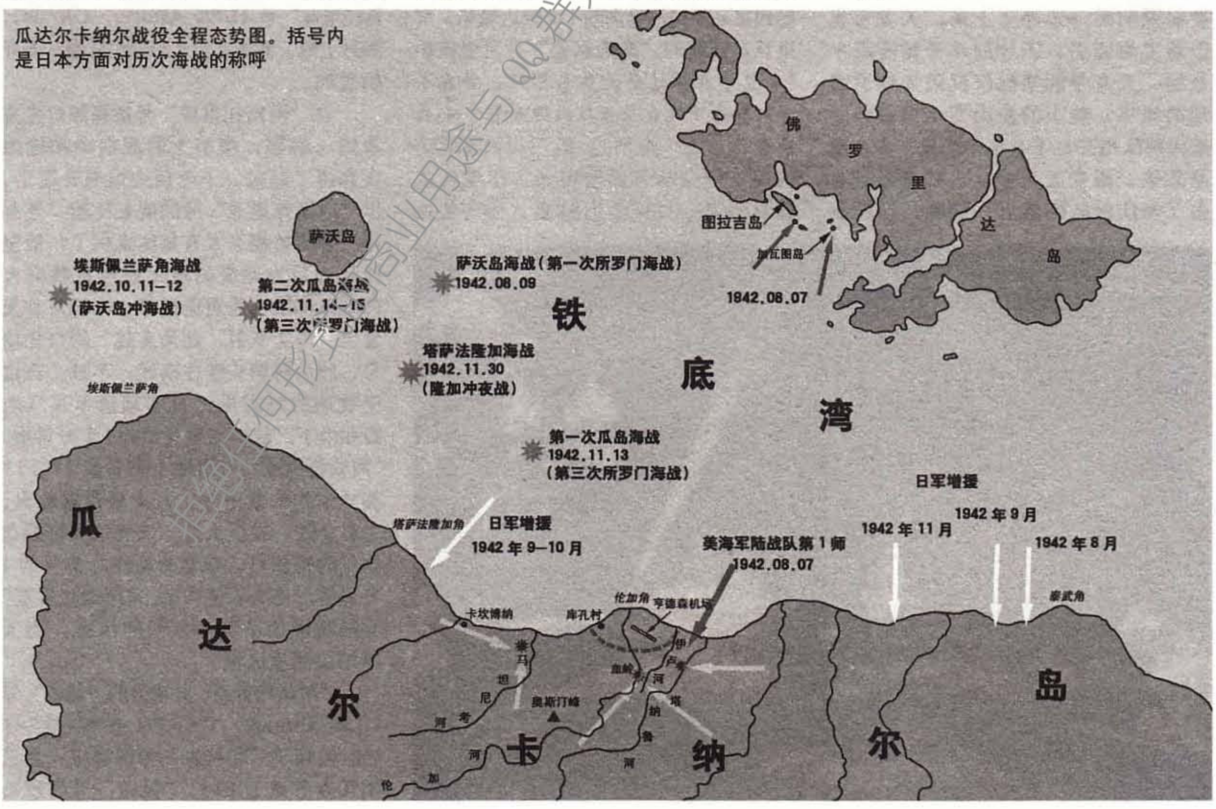
当地时间18时42分，三川向所部发出训示："发扬帝国海军之夜战传统，期待突入之必胜。各自冷静沉着，克尽全力。"23时20分，7艘日本巡洋舰排成单纵阵，各舰相距约1200米，以26节速度朝瓜岛摸过去。9日0时43分，舰队驶入萨沃岛西北水面，正在此处警戒的美军雷达哨舰"布鲁"号（USS Blue，DD-387）没有任何反应；7分钟后，日舰又绕过了另一艘美军哨戒舰"拉尔夫·塔尔博特"号（USS Ralph Talbot，DD-390）。1时26分，舰队进入萨沃岛南方水道，鉴于整个编队长达8000余米、难于统一调度，三川下令各舰自行指挥。4分钟后，鸟海号下达了突击令。

三川舰队驶入南方水道之时，TF62总指挥克鲁奇利少将刚刚结束在伦加角附近特纳的旗舰上举行的军事会议，正准备乘汽艇返回"澳大利亚"号。离舰之前，他曾指定"芝加哥"号舰长博德上校（Howard Bode）代为指挥南区的舰艇，但并未交代应对突发情形时的预案。睡梦中的博德也无法想象，日本巡洋舰怎么可能甩掉西面那两艘哨舰，突然出现在自己眼前。


原定在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中担任旗舰的澳大利亚海军重巡洋舰"澳大利亚"号，但因临时运送指挥官上岸开会而未参加战斗

1时38分，鸟海号在右舷4500米外发现一个舰影（后证实为"堪培拉"号），该舰立即发射4枚鱼雷，但无一命中。敌舰似乎毫无反应，也没有开火。此时第6战队的4艘重巡已经跟了上来，在右舷极远的距离上，了望哨发现了三个黑影，那是美军南方部队的"堪培拉"号、"芝加哥"号和"帕特森"号。三川原本的计划是重点攻击运输船队，但他不愿错过消灭盟军巡洋舰的良机，立即下令之前弹射的水侦投放照明弹，开始攻击。

美军舰艇中第一个反应过来的是驱逐舰"帕特森"号（USS Patterson，DD-392）。1时43分，该舰的了望哨发现了5000米外的衣笠号，立即以无线电和灯光发出信号："警报！警报！不明舰只入港。"该舰试图发射鱼雷，但舰长下达命令的声音已经被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盖住了——鸟海号在2700米距离上发射的第二批4枚鱼雷有2枚命中了"堪培拉"号（HMAS Canberra）的右舷，该舰还被24发8英寸炮弹击中，右倾10度、动力全失，在5分钟内就丧失了战斗力。



瓜达尔卡纳尔战役全程态势图。括号内是日本方面对历次海战的称呼

"堪培拉"号后面的美国重巡洋舰"芝加哥"号（USS Chicago，CA-29）遭到青叶、加古、衣笠三舰的围攻，1时47分，"芝加哥"号的舰首被加古号发射的1枚鱼雷击中，炸出一个直径5米的大洞，另有1雷未炸，前主桅也中了1发8英寸炮弹。从睡梦中惊醒的博德舰长下令还击，该舰一面前进一面向日军队尾的第18战队发射了25发炮弹，给日本人带来了一点惊吓。不过博德显然是个蹩脚的指挥官，他忘了自己还负有指挥南区舰艇的责任，更忘了身后的霍尼亚拉泊地就停泊着三川寤寐求之的运输船。"芝加哥"号径直朝萨沃岛以西驶去，既没有通知运输船撤离，也没有向北区的舰艇发出任何警报。

第6战队纵列中的最后一艘是古鹰号，该舰在1时44分曾向"帕特森"号发射4枚鱼雷，不过无一命中。古鹰号随后以前主炮打哑了"帕特森"号的4号炮塔，并对已经起火的"堪培拉"号加放了一通炮弹，单独北上追随主队。

不过，跟在第6战队之后的第18战队就显得有些狼狈了：旗舰天龙号的了望哨始终没有发现目标，只是被动地随着前方的古鹰号行动。1时47分，勇敢的"帕特森"号在3000米距离上发现了天龙号，该舰冒着倾盆大雨，一边发射照明弹一边冲了上来，天龙号也以前主炮还击。不过战斗开始还没半分钟，天龙号的罗经仪就因为剧烈震动而损坏，舰上的松山光治少将担心被大部队甩开，下令不予恋战、向古鹰号靠拢。跟在天龙号之后的夕张号攻击了南区部队的最后一艘舰只、驱逐舰"巴格利"号（USS Bagley，DD-386），不过由于前主桅上的射击盘发生故障，炮弹没有命中。"巴格利"号舰长下令发射鱼雷，但射击诸元还没有设定，夕张号已经加速北上了。

在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中战沉的美国海军"芝加哥"号重巡洋舰



第18战队的最后一艘军舰是驱逐舰夕止号。该舰一度被"芝加哥"号的火力笼罩，还没缓过神来时，全舰电力就突然中断了。这艘幽灵一样的驱逐舰随后转舵西行，躲到萨沃岛北方避战，直到海战接近尾声时才与友舰重新会合。

短短6分钟时间里，南区的4艘美舰有1艘失去战斗力，2艘遭到受创。日舰如果再向东航行十几分钟，就能捕捉到霍尼亚拉泊地内的15艘运输船，那里只有返航的"澳大利亚"号可资掩护（*衣笠号在掠过萨沃岛东岸时，曾在未开灯状态下对霍尼亚拉泊地发射了4枚鱼雷，但无一命中*）。但三川担心北区的巡逻舰会从背面偷袭他，尽管此次进攻的第一目标是运输船，他还是决定先解决TF62的残部。赶巧北区的3艘巡洋舰因为雷雨交加和状态放松，并未察觉到日舰的存在；"文森斯"号虽然注意到南区的火光，却误以为是"芝加哥"号正在射击敌人的侦察机，并未提高警惕。



第一次所罗门海战的情景：鸟海号重巡洋舰正在利用驱逐舰探照灯向美舰瞄准射击

三川舰队绕经萨沃岛东岸北上时，北区的巡洋舰刚好也在同一位置以10节航速向西北方前进，双方形成追尾之势。由于日舰航速较快，两个纵队间的距离很快从7000米缩短到了5000米，鸟海号意识到前方有敌情，遂于1时44分发射了鱼雷，同时在1时50分下令开灯。一瞬间，鸟海、青叶、加古、衣笠4舰的探照灯全部指向美舰队尾的"阿斯托里亚"号（USS Astoria，CA-34），同时主炮、高炮甚至25mm机炮一齐开始轰鸣。

在"阿斯托里亚"号被探照灯光笼罩的一刹那，舰桥上的观察哨和枪炮官都跳了起来，下令后主炮准备还击。但"阿斯托里亚"号的舰长比起"芝加哥"号的博德又太有集体意识了，他坚持认为后方追来的是正在与日舰交火的南区部队，为避免误伤，本舰应首先发出"停止照射、此为友舰"的灯光信号，然后再调头驶往南区。不过，在这段耽搁的时间里，日军却毫不客气地弹如雨下。从2点整开始的15分钟里，"阿斯托里亚"号遭到4艘日舰28门8英寸主炮的集中射击，上层建筑起火、主机全毁，操纵失控。该舰试图打掉衣笠号的探照灯，但意外命中鸟海号的1号炮塔，使其不能转动。"阿斯托里亚"号随后驶向萨沃岛东南的浅滩，当天中午在那里沉没。

"阿斯托里亚"号前方的"昆西"号（USS Quincy，CA-39）在南区战斗开始时接到了"帕特森"号的警报，当三川从后方摸上来时，"昆西"号的舰长

下达了射击令，但这一次却是炮手没有准备好。三川的4 艘重巡从右舷后方逼近到2500 米处，与此同时，一度与主队脱节的古鹰和天龙、夕张则从左侧追了上来，意外地与第6 战队形成了夹击之势。

鸟海号的第3 次齐射命中“昆西”号中部的飞机弹射器，点燃了该舰的水侦，“昆西”号顿时成了一支燃烧的火炬，遭到日舰的集中炮轰。该舰曾以1 号主炮冒死还击，命中了鸟海号的海图室，炸死36 人。倘若弹道稍微偏差一些，作战室里的三川就难逃一劫了。另有一发5 英寸炮弹击中青叶号的鱼雷发射管，造成一场小火灾。不过这也是“昆西”号仅有的战果了，左舷方向那3 艘较老的日舰抓住难得的以众击寡的时机，向该舰发射了鱼雷。2 时10 分，“昆西”号的舰桥被古鹰号前主炮命中，舰长及多数军官阵亡。2 时16 分，天龙号从左舷方向射来的1 枚533mm 鱼雷（亦有资料认为是青叶号的610mm 鱼雷，但青叶号此时似位于右舷一侧）命中“昆西”号机舱下方，该舰丧失动力、开始左倾，于2 时38 分沉入海底。

现在，位于战场北区的美国巡洋舰只剩下位置最靠前的“文森斯”号（USS Vincennes, CA-44）了。该舰认为1 时50 分射来的探照灯光属于友舰，这给了加古号首先开火的机会。直到8 英寸炮弹迎面打来，如梦初醒的“文森斯”号才开始还击。“文森斯”号的舰长雷夫科尔（Frederick L. Riefkohl）是从安纳波利斯海军学校毕业的第一个波多黎各人。他下令加速到25 节、转舵规避，但1 时55 分，鸟海号发射的2 枚九三式鱼雷命中了该舰左舷中部，“文森斯”号机舱受损，航速开始下降。此后该舰的水上飞机也被衣笠号击中起火，日本巡洋舰悠哉悠哉地关闭了探照灯，以主炮横扫“文森斯”号的上层建筑。该舰被74 发炮弹命中，到2 时03 分又中了夕张号发射的一枚鱼雷，动力完全丧失，向萨沃岛浅滩漂去。2 时16 分，雷夫科尔舰长下令弃舰，“文森斯”号漂浮到2 时50 分彻底倾覆沉没。

在南区部队遭到日舰横扫时，北区的两艘驱逐舰“赫尔姆”号和“威尔逊”号曾调头南下支援。它们与北上的三川舰队擦肩而过，彼此射击了数发炮弹，都没有造成损伤。这两舰随后就开始抢救重伤的“堪培拉”号——在短短20 分钟里，TF62 派驻在萨沃岛周边的5 艘重巡洋舰全部丧失了战斗力，通往霍尼亚拉泊地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

2 时16 分，三川召集第八舰队司令部人员开会，协商下一步行动。由于第18 战队在战斗中一度冲到了第6 战队前



萨沃岛海战中，从鸟海号舰桥拍摄到的日舰以探照灯瞄准美舰开火的情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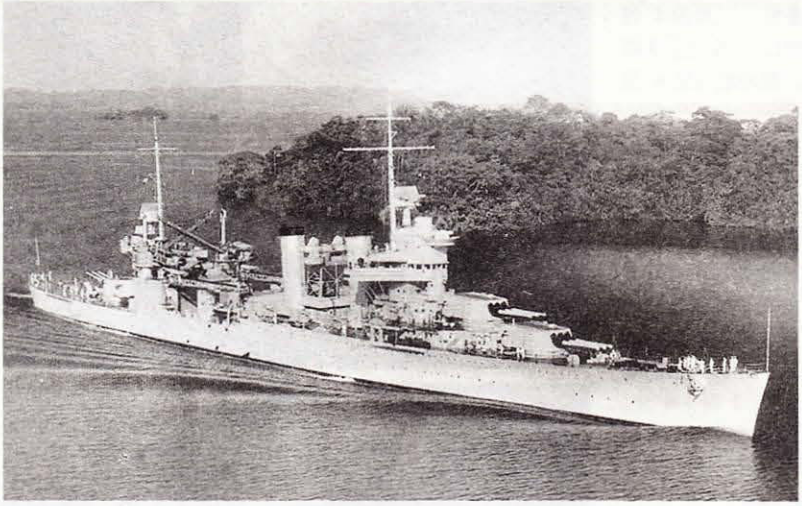


萨沃岛海战中被日舰探照灯笼罩的“昆西”号，舰尾已经中雷、正在下沉。前方的火焰来自水上飞机起火的“文森斯”号



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中的美国重巡洋舰，前面是“文森斯”号，左后方为“昆西”号，远处是“阿斯托里亚”号。画面右方远处是日本海军的重巡洋舰鸟海、青叶和加古。空中是水上侦察机投下的照明弹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仅供个人收藏由战研群友情扫描



在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中被击沉的美国海军“文森斯”号重巡洋舰，属“新奥尔良”级，1937 年完工，标准排水量10136 吨，安装9门8 英寸主炮和8门5 英寸高炮，搭载2-4 架水侦，航速32.7 节，水线附近有4－6 英寸装甲带。“昆西”号和“阿斯托里亚”号与其为同型。为纪念“文森斯”号，1944 年完工的“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CL－64 以“文森斯”号为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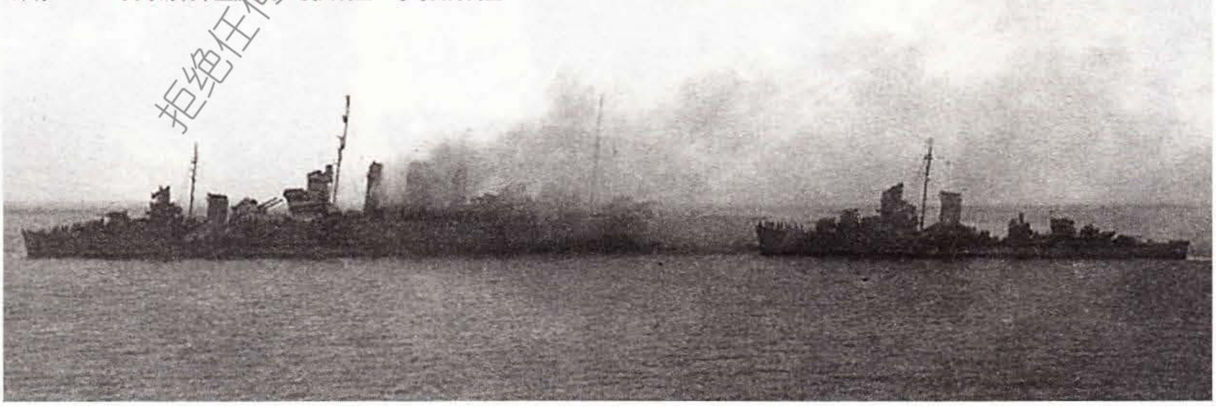
在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中沉没的美国重巡洋舰“阿斯托里亚”号，与“文森斯”号和“昆西”号同属“新奥尔良”级，1939 年曾运送病逝于任内的日本驻美大使斋藤博的遗体前往日本。为纪念该舰，1944 年完工的“克利夫兰”级轻巡洋舰CL－90 以“阿斯托里亚”号为名

方，日本人现在需要一点时间来重新集队，重巡洋舰也需要时间重新装填鱼雷。三川怀疑萨沃岛以东还有其他美国军舰（这一点倒是实情，但这部分美舰仅有2 艘轻巡洋舰和2 艘驱逐舰），他估计：重装鱼雷、向东继续扫荡至少要花费两小时，攻击运输船队又要耗去相当时间。待整个行动结束，天色必然已大亮，美军航母舰载机将飞来空袭。鉴于没有任何一架侦察机汇报过那3 艘美国航母的准确位置，他倾向于规避风险、满足于既有战果，立即朝拉包尔返航。

神重德和第八舰队参谋长大西新藏少将对三川的决定表示赞同，其他僚属则持强烈的反对态度。鸟海号舰长早川干夫大佐（加藤友三郎的外甥）认为，“如果丢下眼前的大运输船队返航，（瓜岛）飞行基地就将陷入敌人之手，后果严重”。他建议三川将司令部转移到青叶号、率领大部队先返航，由他本人指挥鸟海号单独执行攻击运输船的任务，这样即使天亮后美机飞来空袭，损失的也只是一艘军舰，但三川和神重德都不置可否。神重德尤其主张集队后立即撤退，避免留在战场上遭致不测（因为冒险夜袭的计划也是由他提出的，即使是在神重德死后二十多年，旧海军人员依然将之作为讥讽的对象）。2 时23 分，三川最终从鸟海号上发出了指令：“全军撤退。”同时打开探照灯指示旗舰位置。

当第18 战队以30 节高速朝萨沃岛以北的集合点驶去时，战斗一开始被日舰骗过的美国驱逐舰“拉尔夫·塔尔博特”号也出现在了这一位置，夕张号舰长阪匡身大佐（1944 年莱特湾海战时

1942 年8 月9 日上午，美国驱逐舰“帕特森”号和“布鲁”号正在营救重伤的“堪培拉”号的舰员。“堪培拉”号随后由友舰发射鱼雷击沉。该舰系苏格兰布朗造船公司为澳大利亚建造的“肯特”级重巡洋舰中的一艘，标准排水量9850 吨，航速31.5 节，装有8 门8 英寸主炮、4 门4 英寸高平炮、4 门“砰砰”炮和8 具鱼雷发射管，搭载1 架水侦，弹药库有1－4.5 英寸的装甲盒防护。“澳大利亚”号与其为同型



任扶桑号战列舰舰长，在苏里高海峡战死）下令立即开火。不明就里的“塔尔博特”号以灯光信号和无线电拼命呼救：“贵舰正对友军开炮！停止炮击！”夕张号以更猛烈的炮击作为回应。不过射击盘故障还是对该舰的命中率造成了一定影响，加上三川不愿久战，“塔尔博特”号在中弹起火后还是勉强脱逃。

3时20分，第18战队与第6战队完成会合，沿着来时的航路折返。夕张号和夕止号驶向布干维尔岛以南的肖特兰岛泊地，第6战队驶向新爱尔兰岛西端的卡维恩，三川本人则率鸟海号和天龙号返回拉包尔。当第6战队在9日上午行至新爱尔兰岛北方海面时，美国潜艇S-44号用4枚鱼雷击沉了加古号，这也是日军在此役仅有的一个重大损失。

发生在萨沃岛海面的这场夜战，日方称为第一次所罗门海战，美方称为萨沃岛海战。加上9日中午因伤重自沉的“堪培拉”号，盟军在此役损失了4艘重巡洋舰，另有1艘重巡洋舰和2艘驱逐舰重伤，1077人战死。而三川除去意外损失的加古号（战死67人），仅有鸟海号被命中2弹、青叶号中1弹，都不是要害部位，阵亡58人。

但三川并未因此获得赞誉——就在日本舰队驶离萨沃岛海面后几个小时，霍尼亚拉泊地内的美国运输船又开始了卸载。尽管这些担惊受怕的舰船在送上37天的给养和4个基数的弹药后就仓皇撤出了瓜岛，但正是这点微不足道的物资影响了瓜岛之战的走向：8月20-21日，由驱逐舰偷运上岛的日军一木支队先遣队在特纳鲁河口被美军歼灭；20日，第一批31架美机由护航航母“长岛”号运至瓜岛，进驻刚刚完工的亨德森机场。这支以“仙人掌航空队”（Cactus Air Force，因机场附近寸草不生、遍布仙人掌而得名）为名的飞行队规模日渐扩大，很快掌握了瓜岛海面的白昼制空权。等待着日本人的将是漫长而残酷的“放血”。

七、“被渐减”的轻巡洋舰

“东京快车”

第一次所罗门海战后，由于美军逐步在瓜岛站稳脚跟，而从拉包尔起飞的日军基地航空队无法就近夺回制空权，山本五十六只得命令由第一航空舰队残部改组而成的新编第三舰队（机动部队，并非此前的菲律宾攻略部队）前出到特鲁克，依旧由南云忠一指挥，一面摧毁亨德森机场和“仙人掌



第18战队司令官松山光治少将（前排）与参谋在天龙号2号主炮之后合影，摄于1942年6月。松山光治（1891-1959）出身海兵40期，同学中有山口多闻、大西泷治郎等名人，早年担任过北上号、衣笠号、高雄号巡洋舰的舰长，1942年出任第18战队司令官，参加第一次所罗门海战。两年后他一度转入预备役，但很快被重新征召担任第7护卫船团司令官，战败时为第105战队司令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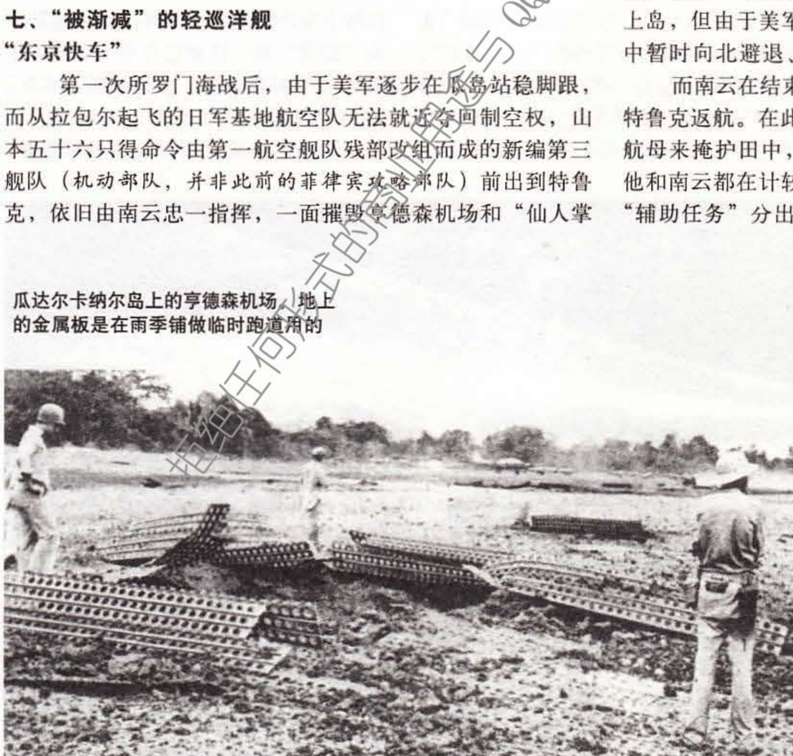
航空队”，一面诱出TF61的3艘航母、实施决战。8月24日，第三舰队在圣伊莎贝尔岛东北海面与TF61爆发遭遇战，史称第二次所罗门海战。日方损失了作为诱饵的轻型航母龙骧号和75架飞机，美军则有“企业”号航母被炸伤，损失飞机25架。南云报仇雪恨的企图又一次落空。

南云舰队与美军航母发生交战之前，第2水雷战队司令官田中赖三少将也乘坐旗舰神通号驶离特鲁克，负责将一木支队第二梯队1500余人及横须贺第5特别陆战队运往瓜岛。田中本人指挥神通号和3艘驱逐舰作为支援兵力，掩护2艘载有陆军的运输船波士顿丸和大福丸；陆战队则装载在特设巡洋舰金龙丸（9300吨）及4艘由旧式驱逐舰改装的哨戒艇上，由另一个驱逐队掩护。田中原计划在21日将部队卸载上岛，但由于美军航母在瓜岛东南方出现，三川军一命令田中暂时向北避退、等待机动部队与敌方交战的结果。

而南云在结束与TF61的战斗后，却于24日夜间自行向特鲁克返航。在此期间，三川一度请求山本五十六留下1艘航母来掩护田中，但山本正因为损失了龙骧号而耿耿于怀，他和南云都在计较何时才能消灭美国航母，拒绝为护航之类“辅助任务”分出兵力。而三川鉴于陆上战局紧急，不愿把延迟再三的增援继续拖下去。于是，田中只好在没有空中掩护（拉包尔航空队因新不列颠岛上空天气不佳而无法出动）的情况下调头向南，硬着头皮朝瓜岛海域进发。

8月25日凌晨，正在圣伊莎贝尔岛东北方航行的田中舰队被一架PBY巡逻机发现。上午9时许，当日舰进至马莱塔岛以北海面时，遭到了从亨德森机场起飞的18架SBD俯冲轰炸机的攻击。神通号的1、2号主炮塔之间被一枚227公斤炸弹直接命中，前部弹药库附近起火，河西舰长被迫下令向弹药库注水以避免爆炸。美军的F4F战斗机还以机枪朝该舰的上层建筑扫射，神通号有60余人伤亡。跟随在该舰之后的金龙丸则被另一枚炸弹命中，引爆了舰

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亨德森机场，地上的金属板是在雨季铺做临时跑道用的





瓜岛战役期间多次指挥“东京快车”的第2水雷战队司令官田中赖三少将（1892–1969）。山口县人，本姓本间，过继给田中家为嗣。出身海兵41期，是联合舰队经验较丰富的水雷战专家之一，1942年10月埃斯佩兰萨角海战中曾成功发挥氧气鱼雷优势、取得以弱胜强的战果。美国海军历史学家里森对田中评价很高，为其取绰号曰“顽强者田中”，但日本海军上下颇不以为然。1943年后田中改任舞鹤警备府司令官，最终在第13根据地队中将司令官任内迎来战败

上装载的弹药，丧失航行能力。田中只好将司令旗从神通号转移到阳炎号驱逐舰上，命令凉风号掩护神通号以12节低速向特鲁克返航，同时继续集合残舰朝瓜岛进发。

到了这时，联合舰队司令部终于决定终止运兵行动，下令田中返航。而正在收容金龙丸落水人员的驱逐舰睦月号随后又遭到从圣埃斯皮里图岛（Espiritu Santo）起飞的3架B-17轰炸机的攻击，机舱中弹、倾覆沉没。田中只得收容了该舰和金龙丸的幸存者，以鱼雷将丧失动力的金龙丸击沉，随后分头朝拉包尔和布干维尔岛南面的肖特兰岛（Shortland）返航，结束这趟吃力不讨好的护航之旅。

经历8月24–25日的苦战后，联合舰队改变了作战策略。鉴于“仙人掌航空队”可用的飞机数增加到64架，为避免损失宝贵的航母，山本决定减少机动部队的出动，同时不再在白昼朝瓜岛方向派出大规模运输船队。日军在肖特兰岛设置了一个水上飞机基地，作为增援瓜岛的中转站，驱逐舰在白天驶离拉包尔，抵达肖特兰岛后装上部队和弹药，随后趁夜潜往瓜岛北岸、将部队送上海滩。

田中赖三的第2水雷战队在这类偷运任务中逐渐如鱼得水，从8月29日到9月4日，他们不仅将一木支队余部和陆军第十七军新派来的川口支队总计6000余人偷运上岛，还击沉2艘美军驱逐舰。每当夕阳西下、巡逻的美机消失之后，被日本人自己称为“鼠式运输”的这种运兵驱逐舰就驶入瓜岛海域“接班”，其效率之高，以至于美国人给他们起了个绰号——“东京快车”（Tokyo Express）。

进入9月，日军大本营将原驻东印度群岛的第38师团以及从中国战场、南方军和本土调来的部队加强给驻拉包尔的第十七军，责令其限期反攻瓜岛。10月3日夜间，日军第2师团司令部在瓜岛塔萨法隆加角（Tassafaronga Point）登陆；9日深夜，第十七军司令官百武晴吉中将和他的指挥部也随“东京快车”上岛。

尽管日军在10月11日凌晨的埃斯佩罗斯角海战中损失了古鹰号重巡洋舰和吹雪号驱逐舰，嗣后又被美机炸沉2艘驱逐舰，但金刚号和榛名号战列舰却在13日深夜的一次炮击行动中成功地击毁了“仙人掌航空队”的90架飞机中的65架，摧毁机场主跑道并烧光了库存的航空汽油，此后美机的出动率大大降低。海上的美舰中，“萨拉托加”号航母在8月31日被日军潜艇重创，“黄蜂”号则在9月15日被伊-19号击沉，美军陷入了只有“企业”号和“大黄蜂”号2艘航母可用的“九月危机”。与此同时，瓜岛上的日军却已增加到23000余人、拥有火炮近百门，还得到驻特鲁克和拉包尔的4艘航母、5艘战列舰、10艘轻重巡洋舰及30余艘驱逐舰的支援。日军遂决定于10月下旬实施海陆联合进攻，一举克复瓜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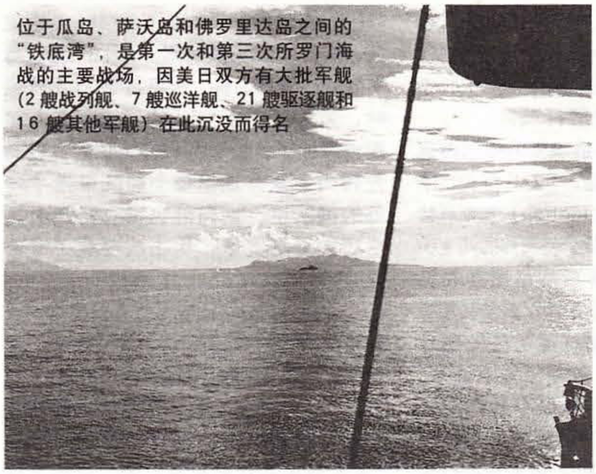
对新任美军南太平洋部队司令哈尔西来说，从10月24日傍晚到26日日落的40多个小时乃是决定命运的两天。在这两天里，陆上的日军第2师团以不间断的“万岁冲锋”朝美国海军陆战队第1师的阵地发起猛攻；驻拉包尔的日军航空队也出动大量飞机空袭瓜岛，支援陆军的反攻。瓜岛战局到了最危急的时刻。

10月24日下午，第八舰队所属的第4水雷战队司令官高间完少将指挥由良号和秋月（旗舰）、村雨、五月雨、夕立、春雨5艘驱逐舰驶离肖特兰岛泊地，准备在25日凌晨炮击瓜岛泰武角附近的美军阵地，为预定于同一时间攻入亨德森机场的陆军部队提供支援。与此同时，第6驱逐队的3艘驱逐舰也将驶往泰武角以西的伦加角泊地（Lunga Point），攻击美军巡逻舰。由良号此前曾在实施“鼠式运输”时遭到过美军潜艇和轰炸机的攻击，但均损伤轻微、得以全身而退，高间少将希望此次炮击行动也能一帆风顺。

25日凌晨，从由良号上面弹射起飞的一架水侦在亨德森机场上空投下了照明弹。由于发现第2师团未能在预定时间突入机场，高间决定暂且北上，等待陆上发出的信号。此时第6驱逐队发来“捷报”称，该部已在伦加角附近击沉1艘美军拖船和1艘巡逻艇，另有2艘扫雷舰正在朝南逃窜，高间转念一想，认为不如乘机包抄这批美军残舰，



瓜岛亨德森机场全貌。该机场以中途岛战役中牺牲的海军陆战队航空兵VMSB-241中队长洛夫顿·亨德森少校命名，拥有2条战斗机跑道和1条轰炸机跑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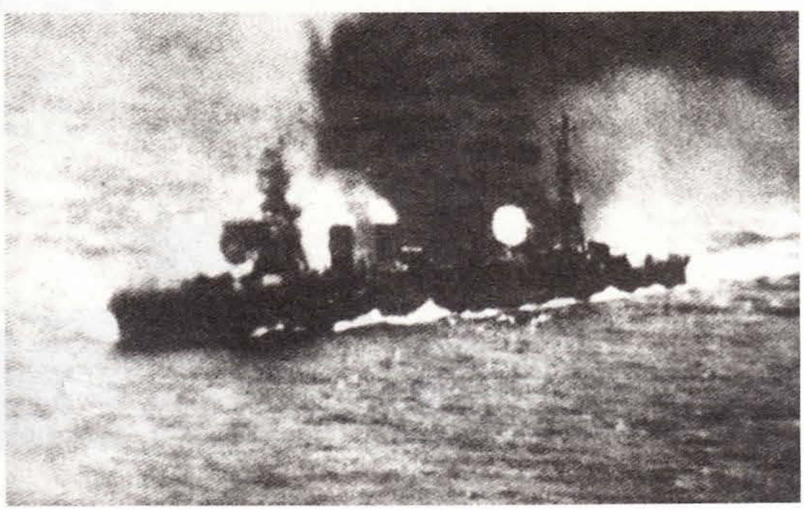

位于瓜岛、萨沃岛和佛罗里达岛之间的“铁底湾”，是第一次和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的主要战场，因美日双方有大批军舰（2 艘战列舰、7 艘巡洋舰、21 艘驱逐舰和 16 艘其他军舰）在此沉没而得名

遂率部朝东南方航进。

上午11时，当日舰行驶于瓜岛和马莱塔岛之间的因迪斯彭塞布海峡（Indispensable Strait）、距泰武角东南已有30余海里时，突然遭到从亨德森机场飞来的美军VS－71中队5架SBD俯冲轰炸机的突袭。防空能力单薄的由良号首先被2枚227公斤炸弹直接命中，后机舱起火，航速大大降低。新型驱逐舰秋月号虽有8门长身管100mm高炮保护，也被2枚至近弹炸伤，1名水兵战死，推进轴只剩一根可用。高间见状不妙，下令立即取消任务、朝肖特兰岛返航。但美机不依不挠，除“仙人掌航空队”的4架SBD继续进行袭扰外，陆军航空兵的P－39“飞蛇”战斗机也赶来助战。拖着黑烟的由良号步履维艰，航速降到了14节，只能靠人力操舵，边抢修边返航。

下午3时许，4架SBD、3架F4F和4架P－39对已经逃至萨沃岛和圣伊莎贝尔岛之间的日舰发动了第二波攻击，五月雨号驱逐舰被至近弹击伤右舷，鱼雷发射管无法使用，秋月号也再度被至近弹擦伤，航速降至23节。

由良号舰长佐藤四郎大佐认为已无望返回基地，建议让军舰在圣伊莎贝尔岛北岸冲滩搁浅，待天黑后再由友舰拖回肖特兰岛。但就在高间作出决断之前，6架从圣埃斯皮里图岛飞来的B－17“空中堡垒”重型轰炸机对由良号发动了新一轮攻击，该舰至少被命中3弹，已经得到控制的火势再度复燃，完全丧失动力。高间与佐藤商议后，决定立即弃舰。20分钟内，包括佐藤舰长在内的由良号大部分舰员转移到村雨号上，高间下令受伤的秋月号搭载这部分官兵和各舰伤员首先向拉包尔返航，他本人则改以村雨号为旗舰，准备率残部继续完成炮击泰武角的任务（随后由三川军一下令取消）。春雨号和夕立号各朝瘫痪在海面上的由良号发射了一枚九三式鱼雷，以免该舰被美军俘获。


由良号的最后时刻：1942年10月25日，瓜岛东方海面剧烈燃烧中。该舰在当天上午遭到美军VS－71中队5架SBD的突袭，机舱附近中2枚227公斤炸弹，航速大大降低，回程中又先后遭到8架SBD、7架陆航P－39、3架F4F和6架B－17轮番轰炸，丧失航行能力，日落后由友舰发射鱼雷击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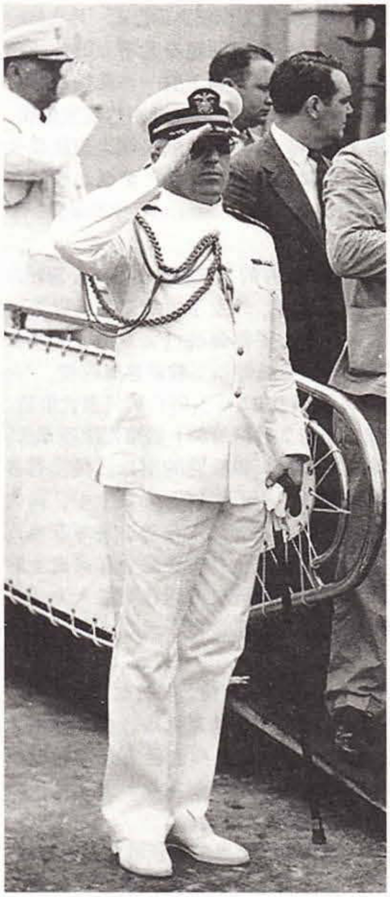
10月25日傍晚6时30分，2号烟囱之后已成一片火海的由良号被友舰的鱼雷命中前部，脆弱的舰身几乎立即炸成两截，艏楼之前的部分倾覆沉入海中，剩下的一小截舰尾依然漂浮在水面。夕立号随后驶近该舰，以5英寸主炮连续射击，由良号终于彻底消失在了海面。这是开战以来联合舰队损失的第一艘巡洋舰，也是美日双方战沉于瓜岛、萨沃岛和佛罗里达岛之间的“铁底湾”（Ironbottom Sound）中的最新一个冤魂。

10月26日日出后，美军仅有的2艘航母在圣克鲁斯群岛以北与复仇心切的南云舰队遭遇，爆发了中途岛海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航母交战——南太平洋海战（美方称圣克鲁斯海战）。美军在付出“大黄蜂”号航母和1艘驱逐舰沉没、“企业”号重伤，损失飞机81架以及266人阵亡的沉重代价后，使南云损失了92架飞机，并有2艘航母和1艘重巡洋舰重伤。尽管此役被视作日军的战术胜利，但获胜的南云已经没有多余的兵力可以投入瓜岛海域的战斗了。到26日上午，损失过半的日军第2师团被迫停止攻击，转入守势。美军在自己的力量降到最低点之前，幸运地抓住日军在配合和调度上的漏洞，将其各个击破，挫败了瓜岛战役期间日军投入力量最大、准备最充分的一次反攻，为自己赢得了近二十天的喘息时间。

进入11月，瓜岛战局再度陷入僵持。美日双方都已没有航母可用。美军虽控制瓜岛北部和亨德森机场，但无法阻止“东京快车”的偷运，也无法保障瓜岛周边己方巡逻和辅助舰艇的安全；而日军因为始终无法夺得制空权，又无法保障岛上部队的给养供应，一时也难以反攻。

到11月5日前后，由于坐镇瓜岛的百武晴吉一再催促，山本五十六决定再度派出驻特鲁克的联合舰队主力，将陆军第38师团的14500余名官兵和大批武器、弹药一举运送上岛，同时对亨德森机场进行炮击。运兵船队依然由“东京快车”的老“司机”田中赖三指挥，14500名士兵和大批重武器、粮草和弹药分别装载在11艘高速运输船上，由田中本人所率的11艘驱逐舰护航。执行炮击任务的“挺身攻击队”则由第11战队司令官阿部弘毅中将指挥，包括第11战队的2艘战列舰比睿号、雾岛号，第10战队旗舰长良号，以及在上个月损失了旗舰由良号的第4水雷战队残余的11艘驱逐舰。

日方的计划与8月和10月的两次增援几乎毫无二致：“挺身攻击队”于9日下午从特鲁克和肖特兰岛出航，预定于12



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第一夜战死的丹尼尔·卡拉汉少将（1890–1942），1911年毕业于安纳波利斯官校，一战期间曾随“新奥尔良”号巡洋舰前往欧洲参战。二战爆发前，他是罗斯福总统的海军事务助理，1941年开始指挥“旧金山”号重巡洋舰，1942年升任南太平洋部队参谋长，同年11月13日凌晨在瓜岛海面战死。卡拉汉是美国海军在二战中殉职的第三位将军，随后被追授荣誉勋章。著名历史小说《战争与回忆》主人公帕格？亨利上校的形象有部分取材于卡拉汉的事迹，他的弟弟威廉·卡拉汉曾任“密苏里”号战列舰首任舰长，战后官至中将

日夜间驶入铁底湾、执行炮击任务；田中的护航队则要晚一天离开肖特兰岛，预定在炮击行动结束后的11月13日凌晨驶近瓜岛，完成登陆行动。

同一时期，战斗欲极强的哈尔西也在向瓜岛派遣增援部队。12日白天，卡拉汉（Daniel J. Callaghan）和斯科特（Norman Scott）两位少将指挥的两支护航运输队分别从圣埃斯皮里图岛和努美阿驶抵瓜岛，卸下了6000名步兵和一批给养。卡拉汉得知有巡逻机发现日舰正驶向瓜岛海域，判断“东京快车”可能趁夜炮击机场，他命令卸载完的运输船迅速撤离，留下护航的2艘重巡洋舰、3艘轻巡洋舰和8艘驱逐舰组成TG67.4特混大队，在瓜岛北方海面迎接阿部的到来。

瓜岛当地时间19时许，阿部舰队以18节航速驶入埃斯佩罗斯海峡北口。由于海面大雨倾盆，胆怯的阿部一度打算掉头返航，整个队形顿时大乱。到13日1时前后全队靠近射击阵位时，长良号和阿部的旗舰比睿号已经直冲在最先，在它们前方只有2艘驱逐舰夕立号和春雨号担当警戒，比睿号左右两侧各有3艘护卫驱逐舰，殿后的雾岛号和另外3艘驱逐舰则在混乱的变向中被甩到了后方，而阿部还浑然不觉。此时卡拉汉刚好也带着送走了运输船的TG67.4驶入铁底湾，1时25分，位于单纵阵7号位置的轻巡洋舰“海伦娜”号（USS Helena，CL-50）首先以SG雷达发现了敌舰。

TG67.4当时正以一列纵队的阵型高速前进，8艘驱逐舰前后各4，5艘巡洋舰则居中。卡拉汉为避免误击友舰，下令各舰以无线电向旗舰“旧金山”号（USS San Francisco，CA-38）报告位置，浪费了12分钟时间。1时37分，当美舰最终开始右转、准备占领T字阵位时，先头驱逐舰“库欣”号却已与日舰距离过近了。为避免相撞，该舰自行向左转向，意外地把整个舰队带进了阿部的编队里。而阿部也没有料到天黑后还能撞见美军，伏击战变成了遭遇战。

1时51分，比睿号打开探照灯，径直照在6000米外TG67.4的5号舰“亚特兰大”号（USS Atlanta，CL-51）的舰桥上，“亚特兰大”号舰桥上的斯科特下令立即射击。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美军称瓜岛以北海战）第一夜的交战开始了。

战斗爆发伊始，“亚特兰大”号就被右翼的日军驱逐舰晓号命中舰桥，斯科特和全部幕僚悉数殉职。该舰随后又中了另两艘日舰发射的2枚鱼雷，很快沉没。不过比睿号也在转向时暴露于美国驱逐舰“拉菲”号（USS Laffey，DD-459）的火力下，在极近距离上遭到4门5英寸舰炮的扫射，主炮射击指挥所、射击方位盘、前后副炮射击指挥所和1号炮塔俯仰电路全部被击毁，阿部弘毅和西田正雄舰长受伤，军舰丧失了指挥能力。

美军驱逐舰随后又以20mm机炮和鱼雷集中攻击比睿号，该舰的右舵被鱼雷炸坏。后方的美军旗舰“旧金山”号也以8英寸主炮“关照”了倒霉的日舰晓号，该舰在中弹15分钟后倾覆沉没。不过“旧金山”号随后的一轮齐射意外命中了失去控制的“亚特兰大”号，为避免误伤友舰，卡拉汉下令停火确认目标。在这几分钟里，比睿号尚有战



重巡洋舰“旧金山”号，排水量9950吨，装备9门203mm主炮，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中担任旗舰，被比睿直接命中舰桥，指挥官卡拉汉少将以下主要人员全部战死。“旧金山”号最终由“海伦娜”号拖带到圣埃斯皮里图岛抢修，幸免沉没。图为1942年12月在加利福尼亚州母马岛海军船厂大修的“旧金山”号，圆圈处为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中中弹的部位

斗力的3号主炮塔直接命中"旧金山"号的舰桥，卡拉汉和他的幕僚也步了斯科特的后尘。不过"旧金山"号随即以一次齐射命中比睿号的舰尾，海水从破孔处灌入舰内、使舵机失效，比睿号只得改以人力操舵。该舰随后开始转向，蹒跚地朝萨沃岛东南方驶去。

第一夜战斗中，长良号一直紧跟在旗舰之后。"旧金山"号的主炮曾对该舰造成1处近失弹，损伤轻微；长良号自身也没有突出的表现，只击伤了"库欣"号驱逐舰。但在铁底湾的其他区域，战斗却进行的异常残酷："库欣"号在救助沉没的"亚特兰大"号时被日舰天津风号击沉，重创了比睿号的"拉菲"号被随后到达战场的雾岛号用主炮击毁，第一次参加夜战的重巡洋舰"波特兰"号（USS Portland，CA-33）则被一枚九三式鱼雷炸掉了舰尾。

由吉川洁中佐指挥的日本驱逐舰夕立号尤其凶悍，该舰和天津风号一头扎入美军纵队尾部，与轻巡洋舰"海伦娜"号、"朱诺"号以及3艘美军驱逐舰混战在一起，先以氧气鱼雷重创了"朱诺"号和驱逐舰"巴顿"号，随后又击沉了"蒙森"号。不过夕立号最终也自身难保，被"海伦娜"号的主炮打成重伤，被迫在黎明时分弃舰。

正在瓜岛上观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罗伯特·莱基（Robert Leckie）后来在他的书中回忆这场夜战的场面，说："火红色的炮弹如点点繁星般自海面升起，曳光弹则拖着长长的橘黄色尾巴，犹如彗星。从岛上望去，海面像华美的黑曜石一般光滑平静，军舰仿佛点缀在上面的棋子，周围时时激起片片涟漪，仿佛朝水塘中投入了几颗小卵石。"

2时26分，激战了一个小时的铁底湾开始安静下来。美军当时已经损失了1艘轻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另有2艘重巡洋舰、1艘轻巡洋舰和3艘轻巡洋舰丧失战斗力，只有"海伦娜"号和新型驱逐舰"弗莱彻"号还毫发无损。而阿部虽然遭受了2艘驱逐舰沉没、比睿号重伤的挫折，却还有雾岛号、长良号以及4艘完好的驱逐舰可以使用。但阿部弘毅的神经此时已经崩溃，3时左右，比睿号以灯光信号向雾岛号


11月12日第三次所罗门海战前夜，正在瓜岛海域卸载物资的美军运输船队，黑烟是被击落的日军陆攻

和长良号发出指令："取消预定任务，立即返航！"

日出后的7时05分，隐蔽在瓜岛以南、一直在接受修理船维护的美军航母"企业"号派出20架TBF攻击机和SBD俯冲轰炸机空袭了比睿号，中午时分，"仙人掌航空队"的30余架TBF也赶来助战。比睿号在萨沃岛东北约5海里处完全瘫痪，开始进水沉没。傍晚19时，阿部和西田舰长最终决定弃舰，并由驱逐舰时雨号发射鱼雷将比睿号击沉。

13日中午，按照阿部的命令撤出瓜岛、向特鲁克折返的雾岛号和长良号奉命驶往所罗门群岛东北海面，准备与近藤信竹中将的增援部队第二舰队会合。此时山本已经得知阿部舰队的炮击行动失败的消息，他转而命令三川军一率领前一天从拉包尔出发的第八舰队4艘重巡（摩耶、铃谷、鸟海、衣笠）、2艘轻巡（五十铃、天龙）和6艘驱逐舰与近藤部队会合，在13日夜间再度执行炮击任务。

此时三川已经到达瓜岛北面175海里处，鉴于近藤距瓜岛还有一天航程，山本下令三川在13日夜间单独执行炮击任务。如果三川能压制亨德森机场，田中赖三的运输船队就


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中，比睿及雾岛正在向"旧金山"号重巡洋舰射击。右侧为僚舰比睿，正在用探照灯照射敌舰

在14日凌晨驶近滩头、登陆卸货；如果巡洋舰不足以克制岛上美军火力，那么三川应在炮击结束后北上与近藤会合，在14日夜间重新返回战场，依靠金刚、榛名、雾岛3艘战列舰主炮的齐射摧毁机场，在15日凌晨让田中的运输船卸载。

哈尔西也在调兵遣将。由于TG67.4的巡洋舰在第一夜战斗中已损失殆尽，他现在只剩下了最后一张王牌——位于瓜岛以南480公里处的战列舰特混舰队TF64（尚未完全修复的“企业”号只能在白昼天气理想时投入使用）。TF64拥有“华盛顿”号和“南达科他”号这两艘当时美国最新、最快、火力最强的战列舰，司令官威利斯·李少将(Willis A. Lee)是海军中最杰出的炮术和雷达专家之一，不过他的护航兵力很弱，只有4艘临时拼凑的驱逐舰。13日中午，接到命令的TF64开始以26节高速驶往瓜岛，不过他们距离战场很远，至少要到14日白天才能就战斗阵位。

瓜岛当地时间11月14日0时10分，三川舰队驶入了三个月前曾经取得大捷的铁底湾。为防止美军鱼雷快艇发动夜袭，谨慎的三川自己率鸟海、衣笠两舰在萨沃岛以西警戒，而令第7战队司令官西村祥治指挥摩耶、铃谷去进行炮击。1时30时，两舰的20门8英寸主炮在黑暗中开火，进行了长达35分钟的无照射炮击。按照日本人夸大其辞的估计，他们击毁了18架美国飞机、击伤32架（美军称损失2架、伤16架），兴奋的三川立即向特鲁克发出“机场已摧毁”的捷报。2时30分，毫发无损的三川舰队开始有序地撤出战场；与此同时，田中的登陆船队则调头朝南进发。


轻巡洋舰“亚特兰大”号，排水量6000吨，装备16门127mm主炮和8具533mm鱼雷发射管，航速33.6节。斯科特少将座舰。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中被日军驱逐舰雷弹齐射重创，次日被迫自沉

14日天亮后，“企业”号的10架SBD在小雨中追上了北上中的三川舰队主力。吉布森中尉(Robert D. Gibson)在300米高度投下2枚227公斤炸弹，第一枚炸死了衣笠号的泽正雄舰长和大部分高级军官，第二枚穿入轮机舱爆炸，衣笠号左倾10度，速度开始变缓。另一艘日本重巡洋舰摩耶号也被1枚炸弹命中左舷，37人阵亡。

10时45分，三川的旗舰鸟海号也被第二波17架SBD投下的炸弹命中锅炉舱，五十铃号则被2枚近失弹破坏了一个锅炉室和舵机，只得改以人工操舵。倒霉的衣笠号随后再度被1枚近失弹炸伤机舱，终于在正午时分带着511名舰员沉没。三川的其余舰艇只是凭借高速直航和猛烈的对空射击才遍体鳞伤地逃回拉包尔，“所罗门海胜利者”的“威名”自此不复存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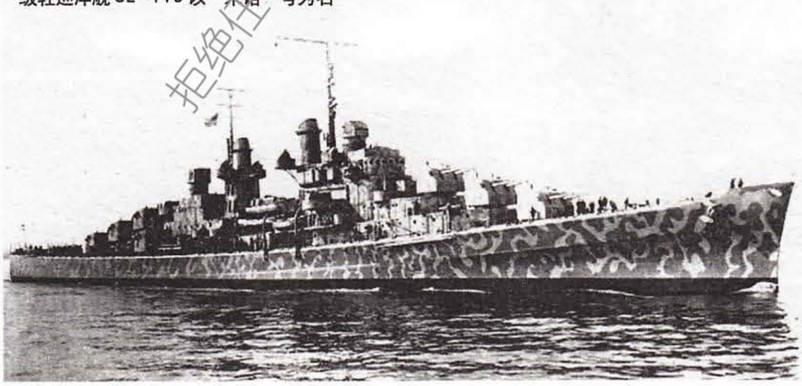
至于被“机场已摧毁”的谎报坑害了的田中，此时还在以极低的航速大摇大摆地朝瓜岛前进。“企业”号的SBD在收拾完三川之后，就和“仙人掌航空队”的TBF以及从圣埃斯皮里图岛飞来的B-17组成混合编队，一起收拾远道而来的日本援军。

整个14日下午，超过200架次美机对田中舰队发动猛攻，他的11艘运输船中有6艘当场沉没，还有1艘在返航途中倾覆，第38师团尚未登陆便已死伤过半。尽管田中成功地捱到天黑，把残存的4艘运输船带到塔萨法隆加角抢滩，但15日天亮后还是被美机炸的干干净净，好不容易运到岸上的粮秣弹药也被燃烧弹炸毁，血本无归。

至此，日军对瓜岛的第三次大规模支援行动已经完全失败，但14日上午已经抵达瓜岛以北250海里处的近藤信竹并不清楚这一点。在他的印象中，亨德森机场已经在13日晚间被三川舰队摧毁，田中舰队将在14日日落后驶向瓜岛卸货。而近藤本人则将先期抵达瓜岛以北的第4战队爱宕号（旗舰）、高雄号两艘重巡和第3水雷战队（川内号带3艘驱逐舰）与阿部舰队残部组成了一支新的炮击部队，计有战列舰1艘（雾岛）、重巡2艘（爱宕、高雄）、轻巡2艘（川内、长良）和驱逐舰9艘，准备在14日晚间再度执行炮击任务。

其实倘若近藤再等一天，位于东北海面的另外2艘日本战列舰金刚号、榛名号和航母隼鹰号就可以与先头部队会合，而美军此时已无后援，日军集中

轻巡洋舰“朱诺”号(CL-52)，属“亚特兰大”级，完工于1942年2月，标准排水量6718吨，安装16门5英寸高平炮、16门28mm机炮和8具21英寸鱼雷发射管，航速32.5节，水线附近有2.75英寸装甲带。“朱诺”号在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第一夜的战斗中被日军驱逐舰发射鱼雷重创，次日下午在撤退时被日军潜艇伊-26号击沉，在舰上服役的衣阿华州沙利文家五兄弟全部遇难。为纪念该舰，1946年完工的“亚特兰大”级轻巡洋舰CL-119以“朱诺”号为名



兵力可以取得更大的战果。但近藤和第一夜战斗前的阿部一样误判美军已经撤出铁底湾，加上对田中舰队的状况一无所知（近藤在14日晚进入铁底湾时，并不知道田中的运输船已经在空袭中基本被毁，而再度炮击其实良失意义了），放心地以20节速度朝瓜岛前进；而TF64此时已经进入瓜岛南方海域待机了。

日军的航空侦察也依旧蹩脚。从圣伊莎贝尔岛的莱卡特基地起飞的1架水侦报称在瓜岛以南有2艘“大型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这个消息没有引起近藤的注意。他认为自己占据火力优势，可以高枕无忧。而李少将却从侦察潜艇“鲑鱼”号发回的电报中提前获知了近藤的行踪，于是战局又演变成了和12日晚间别无二致的状况。

天黑之后，近藤舰队以第3水雷战队为先导，从北面接近瓜岛海域。吸取阿部弘毅的教训，近藤命令川内号和2艘驱逐舰从萨沃岛东面进入铁底湾，顺时针绕萨沃岛航行；绫波号驱逐舰单独从萨沃岛西面进入，逆时针绕岛航行，准备夹击拦截的敌舰。与此同时，第10战队旗舰长良号和4艘驱逐舰则在萨沃岛西面向南航行，掩护本队侧翼；近藤本人率领炮击分队（雾岛、爱宕、高雄）和2艘驱逐舰自萨沃岛北面向西面曲折航行。这种安排可以避免战列舰和重巡洋舰卷入最初的混战，集中全力进行炮击。但TF64此时已在埃斯佩罗斯角以西恭候，他们的目标正是日军主力舰。

当地时间11月14日23时，日军先头扫讨队旗舰川内号驶抵距TF64编队18000码的位置，立即被“华盛顿”号的SG雷达发现，李少将下令主炮做战斗准备。7分钟后，川内号的了望哨报称“2艘巡洋舰在萨沃岛以南向西航行”，此时“华盛顿”号的3号炮塔已经开始装填16英寸穿甲弹，按照操典，这一过程应在30秒之内完成，而“华盛顿”号的炮组只花了14秒！23时17分，川内号和浦波号、敷波号2艘驱逐舰遭到了“华盛顿”号的第一轮齐射，第3水雷战队司令官桥本信太郎少将被冲天的水柱吓了一跳，立即施放烟幕、狼狈地向北逃去。不过大概是因为过度慌乱，桥本并没有发现那两艘“巡洋舰”的火力凶猛的有些异常，也没有把这个反常状况报告给近藤。

23时20分，沿萨沃岛西侧单独南下的绫波号也发现了那两艘“新型巡洋舰”和4艘美国驱逐舰；10分钟后，长良号所率的另外4艘日本驱逐舰从萨沃岛西侧南下，逼近美军侧翼。第10战队司令官木村进吸取第一夜战斗的教训，下令各舰尽早做发射鱼雷的准备。而TF64那4艘没有雷达的驱逐舰单单注意到长良号3个烟囱的独特外观，集中全部火力对该舰进行射击，却忽视了日本驱逐舰。利用这个间隙，几艘日舰集中火力轰击美舰“普雷斯顿”号，引爆了该舰已经装填好的鱼雷，“普雷斯顿”号在23时47分沉没。“格温”号的机舱被5英寸炮弹击穿，“沃尔克”号被一枚九三式鱼雷炸成两截，“本汉姆”号的舰首也被炸断。半小时之内，美方4艘驱逐舰非沉即伤，全部丧失战斗力。

危急关头，李少将只有亲自出马。23时46分，他下令战列舰以26节航速进入攻击阵位，向绫波号开火。“华盛顿”号灵活地左转，绕过燃烧中的两艘驱逐舰的残骸，躲到日舰看不到的阴影里。由于没有安装雷达，近藤的了望哨在一片火光中根本发现不了“华盛顿”号。就在此时，少将突然发现紧跟在旗舰之后的“南达科他”号不见了。

“南达科他”号的位置在“华盛顿”号之后，该舰以副炮朝绫波号连续开火，但也遭到了日舰的还击。正当损管队员修理战损时，轮机长违规拉下了总电闸，“南达科他”号失去了电力供应，雷达、炮塔和通讯设备全部失效，军舰操纵失灵，顺着惯性向右驶到了日舰和正在燃烧的己方驱逐舰之间。爱宕号上的近藤惊讶地发现，有一艘未曾谋面的巨大敌舰出现在视线里，并且是一艘战列舰！爱宕号、雾岛号和绫波号几乎同时打开探照灯，锁定了“南达科他”号。14日23时59分，雾岛号和2艘重巡同时瞄准“南达科他”号开火，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第二夜战斗的高潮到来了。

在“南达科他”号毫无还手之力的几分钟里，雾岛号的8门14英寸主炮朝该舰倾泻了68发三式烧霰弹、22发零式通常弹和27发一式穿甲弹，南达科他的雷达和通讯线路被毁，3号炮塔下方水线附近被撕开一个3米×2.7米的口子，上层建筑也被打的一塌糊涂，有39人阵亡、59人负伤。所幸该舰的防护值得信赖，主装甲带没有被击穿，关键部位也未受损。而长良号和驱逐舰向“南达科他”号发射的34枚九三式鱼雷居然无一命中，可以说是不幸中的万幸。15日0时15分，盖奇舰长（Thomas Gatch）终于把伤痕累累的“南达科他”号带出了火网，该舰匆匆向西退去。

就在雾岛号集中火力攻击“南达科他”号的几分钟里，隐蔽在萨沃岛以西9海里处的“华盛顿”号以雷达锁定了7700米外浑然不觉的目标。15日0时刚过，该舰的9门16英寸主炮开始轰鸣，由Mk-3型火控雷达引导的炮弹向雾岛号中部直飞过去。

在短短7分钟里，“华盛顿”号连续打出9次齐射，发射了75发16英寸主炮弹和107发5英寸副炮弹，其中9枚主炮弹和超过40枚副炮弹命中日本战列舰。雾岛号的3座主炮塔和舵机全部被打坏，左舷水线上方的主装甲带被击穿了好几个口子，海水汹涌而入。由于机舱也被炮弹命中，喷出的高温蒸汽将来不及撤离的轮机班士兵全部烫死，状况比两天前的比睿号更惨。雾岛号的损管人员连忙向右舷注水以平衡



1942年11月14日深夜，“华盛顿”号战列舰在夜战中向雾岛号开火。由于目标很近，主炮仰角近乎平直

横倾，不料因为注水过多，军舰开始向右倾斜。朝云号、五月雨号和照月号驱逐舰急忙围到雾岛号旁边，准备救助舰员。

事已至此，近藤只好放弃炮击机场的计划，率领爱宕号和高雄号围攻“华盛顿”号。0时13分，两艘日本重巡洋舰朝美舰齐射了8枚鱼雷，不过无一命中。李少将则下令“华盛顿”号转向迎敌，准备以这艘仅存的主力舰单独应对剩余12艘日舰的攻击。美国人最大的优势是“华盛顿”号本身——高速、强火力、重装甲和训练有素的舰员，而近藤因为兵力分布太广，和第一夜战斗中的阿部一样已无法有效指挥。2艘日本重巡最初还能以24节高速追赶“华盛顿”号，但过了没多久，近藤突然想起田中赖三的运输船（彼时仅剩4艘）还在塔萨法隆加滩头上，倘若继续追击，可能将美舰朝运输船赶去。他思量再三，认为此地不宜久留，决定中止行动、率领全队返航。而李因为自己仅存一艘战列舰，也无意继续冒险。“华盛顿”号以26节航速右转180度，掩护着“南达科他”号离开了战场。在它们身后，日本驱逐舰发射的最后一批鱼雷激起了一个60米高的蘑菇形水柱。

美舰驶离战场后，“专业救捞队员”长良号驶向丧失动力的雾岛号，企图将该舰拖回肖特兰；但雾岛号继续右倾，进水已无法控制。近藤下令岩渊三次舰长转移天皇“御真影”，同时全员退舰。3时25分，雾岛号在萨沃岛西南沉入了铁底湾，全舰有250人阵亡。在此之前，绫波号已经因为水线以下中弹、全舰起火而翻沉了。至此，历时三天、波澜壮阔的第三次所罗门海战终于落下帷幕。

航行中的“东京快车”。日本驱逐舰的初始设计目的是用于舰队决战前端的渐减作战，因此主炮与鱼雷火力强大，航速快，防护薄弱，并不适用于护航行动。瓜岛战役中水雷战队不得已用作护航、运输和支援，实际效果不佳



在第三次所罗门海战中，联合舰队损失2艘战列舰、3艘驱逐舰和64架飞机，兵员战死超过1900人，还丢失11艘宝贵的运输船，依然没能完成运输第38师团上岛的任务。而瓜岛上的日军此时仅存19700人（其中约一半有战斗力），无奈的百武晴吉只得下令转入持久战，不再进行夺取机场的进攻。

此时山本五十六已不愿在护航行动中再损失大型舰艇，仅承诺恢复不定期的“东京快车”运输。从11月25日到30日，日军每天派出一艘潜艇驶往瓜岛，将数百个装有粮食和药品的密闭铁桶漂向滩头，由岛上部队以小艇回收。但这种偷运只能满足实际需要的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一，岛上日军已陷入疫病横行、饿殍满地的状况，每天因病饿减员达上百人之多。

尽管有“顽强者”之称的田中赖三在11月29日深夜率“东京快车”为岛上运去了1100个铁桶，还以损失1艘驱逐舰为代价取得击沉美军重巡洋舰1艘、重创3艘的战果（塔萨法隆加海战），但当他在12月11日执行第四次铁桶偷运任务时，旗舰照月号被美军鱼雷快艇击沉，田中本人也游上瓜岛避难。而美军不仅将“仙人掌航空队”扩充至120架飞机，还成功地以海军陆战队第2师替换下疲乏减员的第1师，将岛上的部队增加到5万人。经历了四个半月损兵折将的苦战之后，日军在瓜岛已是山穷水尽。

1942年12月31日，日军大本营被迫在御前会议上做出从瓜岛撤军的决定，行动代号“开号作战”。1月14日，驱逐舰首先将步兵第230联队的700多名士兵送往埃斯佩罗斯角，接替已经毫无战斗力的残军把守正面防线，同时包括利根号巡洋舰和伊－8号潜艇在内的小股部队开始在吉尔伯特群岛以东实施佯动，以吸引美军注意力。包括隼鹰号航母、2艘金刚级战列舰、4艘重巡和神通号、长良号在内的前进部队则在瓜岛以北700海里处提供远程支援。

2月1日日落后，桥本信太郎少将率领的20艘驱逐舰驶近埃斯佩罗斯角，将5414名残军运上舰撤退到肖特兰岛，仅损失1艘。第二批20艘驱逐舰在2月4日夜间撤出4977人；2月7日晚，最后一批18艘驱逐舰冒雨将包括百武中将在内的最后一批2639人撤出瓜岛。在损失了包括2艘战列舰在内的24艘舰艇、16艘运输船、892架飞机和40000多名海陆军官兵之后，日军终于无可奈何地撤出了“伤心岛”。自开战以来，日本帝国第一次被置于脆弱的防御状态。

瓜岛之战已尘埃落定，东南战线的其他部分却并未平静。1942年底，大本营提出“确保要域”的战略方针，驻拉包尔的海军第十一航空舰队司令长官草鹿任一中将和陆军第八方面军司令官今村均中将遂于同年11月18日达成协议，由陆军担负北所罗门地区和新几内亚右翼的防御任务，海军负责拉包尔和中所罗门防务，并伺机破坏新几内亚沿岸的美军航运。12月24日，海军成立以拉包尔为司令部的东南方面舰队，将第八舰队和第十一航空舰队纳入其编下，以草鹿任一为司令长官，专事负责以拉包尔为中心的作战。尽管理论上海军只需负责所罗门群岛防务，但新几内亚战场的陆军没有护航和运输兵力根本无法独立作战，飞机和舰艇数有限的草鹿依旧面临战略分裂的困境。

1942年12月12日，鉴于新几内亚方面的美军已经越过欧文·斯坦利山脉，日军大本营命令安达二十三中将的第十八军迅速占据威瓦克（Wewak）、马丹（Madang）和无人控制的新不列颠岛西部，在这几处修筑机场，坐镇拉包尔的安达决定派第5师团的3个步兵大队和1个野战筑路队去执行此项任务。16日晚，马丹攻略部队分乘2艘特设巡洋舰护国丸（10438吨）和爱国丸（10437吨）从拉包尔驶向目的地，预计两天后在指定地域登陆。草鹿派去为船队护航的是第18战队的旧式轻巡天龙号（旗舰）和4艘驱逐舰矶波、凉风、荒潮、雷，行动代号“Mu号作战”。

美国人也盯上了天龙号这艘旧舰。

以澳大利亚布里斯班为母港的“大青花鱼”号（USS Albacore，SS-218）是一艘1942年6月完工的“小鲨鱼”级潜艇，当年10月才结束首次战斗巡航。艇长雷克少校（R. C. Lake）不满足于呆在特鲁克周围捕猎日军运输船，强烈要求到新几内亚前线参战，布里斯班指挥部遂批准该艇前往新几内亚东北外海待机。18日入夜后，该艇在马丹港外的达尔曼水道（Dallman Pass）发现了遂行“Mu号作战”的日本舰队，立即紧紧跟随。尽管天色已晚，雷克艇长还是自潜望镜中发现了两个大家伙——一艘大型运输船和一艘驱逐舰。

那艘“运输船”正是上田光治大佐指挥的天龙号。该舰在当天清晨曾遭遇从圣埃斯皮里图岛飞来的B-17轰炸机的袭扰，但幸运地全身而退。18日傍晚，舰队以运输船居前、驱逐舰和旗舰殿后的顺序进港，在马丹卸下部队，顺利完成任务。20时23分，正当天龙号一马当先、第一个出港踏上返航之路时，闯进日舰轮形阵外侧的“大青花鱼”号突施冷箭，朝该舰射出了2枚鱼雷，第三雷攻击了跟进的凉风号。在夜幕的笼罩下，了望哨没有做出任何反应。

两分钟之内，两枚鱼雷几乎同时命中天龙号中部。机舱外侧区区2.5英寸的薄弱装甲根本挡不住两颗战雷头爆炸的冲击力，该舰的主机立时停转，开始大量进水。旗开得胜的“大青花鱼”号此时已经机警地撤离了战场，躲过第三发鱼雷的凉风号和矶波号连忙上前救助旗舰。在海上奔走了23年的天龙号因为结构老化和进水太多，已不堪抢救，凉风号只能将上田舰长和天龙的大部分官兵转移到本舰上，随后抛弃天龙号。

两个半小时后，1942年12月18日晚11时许，天龙号在南纬5度11分、东经145度57分，马丹港东北以东9海里处沉没，全舰有23人战死、21人负伤。这艘堪称“水雷战队旗舰之母”的老舰是二战中美国海军潜艇击沉的第一艘巡洋舰，也是开战后日军损失的第二艘轻巡洋舰。

天龙号的舰长上田光治在中日战争爆发时是保津号炮舰的舰长，曾经单舰穿越中国海军在江阴附近设置的沉船阻塞线、俘获重伤搁浅的宁海号巡洋舰，因此声名大噪。1942年12月5日，上田刚刚升任天龙号舰长，不到半个月就碰上了军舰被击沉的倒霉事。他没有像那些“决守舰亡与亡之义”的同僚一样随舰沉没，日后果然被穿了小鞋，叫上级打发到印度尼科巴群岛去当第14警备队司令，协助钱德拉·鲍斯领导的印度国民军（INA）“反攻南亚大陆”。尼科巴群岛属于穷山恶水的蛮荒之地，日本守备队整天都得为吃饭的问题发愁。上田光治在那里无所事事地熬了两年，面黄肌瘦地等到了日本战败的消息。

天龙号战沉后，第18战队在12月20日宣布解散。正在特鲁克维修的龙田号改为第八舰队直辖舰，该舰随后返回了本土，担任新成立的第一舰队第11水雷战队旗舰，仅负责训练任务。而新几内亚前线的日本海军兵力此后更加捉襟见肘。

1943年2月底，第八方面军一度打算趁瓜岛撤军结束、海军舰只宽裕的时机，将第51师团主力运往莱城。3月1日，载有6900名士兵、40余门火炮、40余辆汽车和2500吨各种物资的8艘运输船在第3水雷战队8艘驱逐舰和200架陆海军飞机掩护下从拉包尔出航，两天后在丹皮尔海峡（Dampier Strait）遭遇120架美机集中攻击。美机采用超低空近距离水平投弹的“跳弹攻击”战术发动空袭，日军有7艘运输船和4艘驱逐舰被炸沉，59架飞机被击落，6900名援军中有3664人葬身鱼腹，所有物资全部损失，只有800名徒手士兵最终抵达莱城。而美军仅损失4架飞机，另有2架负伤迫降。

此役之后，日本大本营再无恢复攻势的心气，在第三阶段作战方针中明确提出“今后不进行积极作战，对现有占领地投入力量防卫，进入持久战态势”。WH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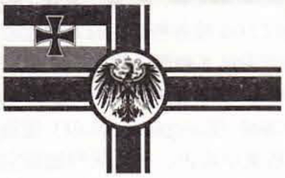
（待续）



天龙号的最后遗影，由美军B-17轰炸机摄于1942年12月18日上午，当时该舰正在护送一支运输队前往新几内亚的马丹港

击沉天龙号的美国潜艇“大青花鱼”号（SS-218），属“小鲨鱼”级，1942年6月1日服役。作为二战中美军战绩最优异的潜艇之一，“大青花鱼”号先后击沉过天龙号轻巡洋舰、大潮号驱逐舰、2艘特设炮舰及多艘运输船，获得4次总统单位嘉奖，最著名的战果则是在马里亚纳海战中以一枚鱼雷击沉日军旗舰大凤号航母。1944年11月7日该艇在津轻海峡触雷沉没







皇帝的海盗

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伯爵和他的“海鹰”号

在英国海军的检查官看来，这艘老掉牙的商用帆船似乎没有什么可值得怀疑的，只不过是一艘刚刚遭受了一场猛烈的北大西洋风暴袭击的挪威不定期货船。

这天恰好是1916年的圣诞节，而这艘名叫“英雄”号（Irma）的商用帆船却在英国“复仇者”号辅助巡洋舰（HMS Avenger）炮口的威逼之下，顶风停在冰岛东南180海里外的公海上接受检查。

毫无疑问，这是战时，英国海军按战时条例规定，对一切不能马上判断为友方的船只都要拦截并进行检查。船长用了一些恰如其分的誓言证明自己是这艘1500吨三桅方帆船“英雄”号的船长——克努特森。按照船上的文件显示，他们正从挪威的克里斯蒂安尼亚（奥斯陆）驶往澳大利亚的墨尔本，装运的货物是无害的木头——产自挪威峡湾峭壁中的优质松树和枞树。

在检查完航行文件之后，这位挪威船长一边喷着咀嚼烟丝时产生的大量唾沫，一边用带有浓重口音的英语邀请检查官去舱里检查他们的证件。这些挪威人看上去好象沉浸在节日的欢乐中，它感染了英国检查官。这真是好极了，因为他看上去象是个极难对付的家伙。这个检查官是个名符其实的巨人，个子足有六英尺开外，具有硕大无比的脑袋，海象般粗的脖子和装卸工一样的胳膊，他那张大嗓门可以使海狮相形见拙。

船长的会客室杂乱无章，零散的纸张撒得到处都是，屋里晾满了内衣内裤（上面绣着他的名字——克努特森），空气中散发着难闻的煤油烟气味。“对不起，检查官先生，”船长说道，“我们的炉子不大好使，实在不知道您今天会大驾光临。”舱壁上斜挂着一个白肤金发碧眼的女人照片，上面题写着“你亲爱的约瑟芬”。角落里的无背长沙发上躺着约瑟芬本人，她头上捆着一条长披巾，脸上显出极度痛苦的表情。

“这是我的妻子，长官先生，”克努特森介绍道，“她最近一直在闹牙疼。”英国军官深表同情，“对不起，夫人，打扰您了”，他说，“但这是履行公务。”

“没关系”，那受着折磨的女人痛苦地哼了一声，接着又陷入原来的沉默中。

在克努特森收拾散落文件的当儿，他递给客人一杯酒，“只要是英国水手就尽管请他们喝酒”，他自信地说，“就此而言，德国水手、美国水手、世界上任何国家的水手都无一例外。”英国检查官出于国际惯例，接受了他的盛情。

船舶证书和航海日志都非常潮湿，而且墨迹斑斑，克努特森解释道，这是因为“英雄”号刚刚经历了一场大风暴。检查官开始查阅证件，这期间克努特森用挪威话和大副随意聊着天，无外乎是“如果我有一件象这位英国军官那样的驼绒厚呢外衣就好了，在北极圈那种寒冷的地方，能穿得暖暖和和可是件惬意的事啊。”这样一类的话题。



这时，英国军官插语道“还能防浪防雨。”他先前并未暗示过他懂得他们的语言。克努特森用惊奇和不加掩饰的尊敬眼光看着他。

终于，检查完毕，英国军官宣布：“船长，所有的证件都没问题。”临出港时，他指示克努特森等见到“复仇者”号发出信号后方可继续航行。

信号是以戏剧性的形式发出的。“复仇者”号启动后，直朝着“英雄”号开过来，只在最后的一瞬间才从“英雄”号的舷边一擦而过，在它的尾部飘动着信号旗—“一路平安。”

的确是“一路平安”，就这样，“复仇者”号让这个海上强盗从眼皮底下溜掉了。“英雄”号的真实名字叫“海鹰”号（SMS Seeadler），这艘表面看上去好似无罪的老帆船，实际上是一艘德国武装快帆船。德皇威廉二世亲自诏准，允许它掠夺它可以威吓并征服的任何船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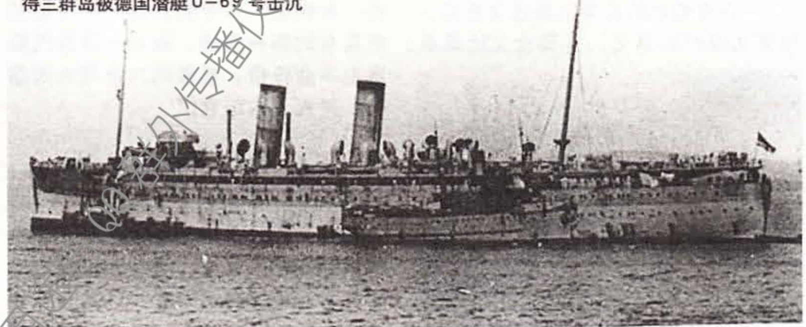
这是个极其危险的使命，当时协约国的海面舰队联合封锁着德国海军的通道，只有德国的潜艇才能悄悄地溜过封锁线，而避免与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舰队一英国皇家海军舰队直接对抗。但是，由于潜艇的燃料储量小，因而在距离上受到限制。德国海军的高级指挥部认识到，如果武装的水面偷袭船要想突破封锁并避开敌军在公海上的检查，那么它们只能是伪装的武装商船或一艘辅助巡洋舰。

在战争开始时，几艘由商船改装而来、装备有火炮的德国海军辅助巡洋舰受命穿过封锁线，伪装成中立国的船只，并开始袭击协约国的食品和物资供给贸易航线。它们当中包括由战前的横越大西洋快速邮船改装而来的“威廉皇太子”号（SMS Kronprinz Wilhelm）、“威廉大帝”号（SMS Kaiser Wilhelm der Grosse）；以及由慢速货船或客货船改装而来的“海鸥”号（SMS Moewe）、“鸬鹚”号（SMS Kormoran）、“狼”号（SMS Wolf）和“豹”号（SMS Leopard）等等。

但是德国人在搞这种商船袭击战时有一个无法克服的困难：德国海军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缺少加煤站，无法为他们那些使用蒸汽机的的辅助巡洋舰补给燃料。曾经俘获和击沉16艘商船、给协约国战时海上运输造成极大麻烦的“威廉皇太子”号，就是在1915年燃煤用尽之后，驶入美国的港口，被解除武装并就地扣留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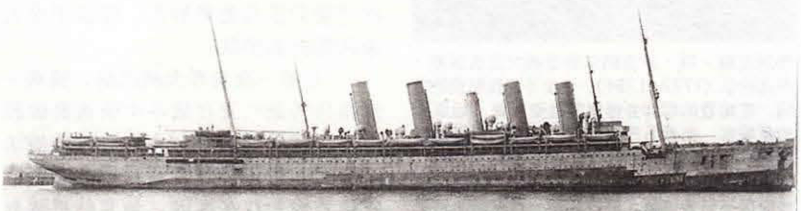
很显然，加强德国在海上劫掠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就是改装一艘无需燃料的商用帆船，为它装备上隐蔽的武器，使它看不出破绽。起初，德国海军部认为这个想法荒谬而可笑，但是它的支持者坚持这一论点。一位激进的海军军官，费利克斯·冯·卢克纳

1916年圣诞节对“海鹰”号实施临检的英国海军辅助巡洋舰“复仇者”号。它是一艘15000吨的商船，1915年3月被英国海军征用，安装了8门152毫米炮，然后在西非海域巡逻，搜寻德国武装商船。1916年9月调往北大西洋，1917年在设得兰群岛被德国潜艇U-69号击沉



945 H.M.S. "AVENGER."

德国海军的辅助巡洋舰“威廉皇太子”号。它原是德国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在1901年建造的快速邮船，登记吨位14908吨。安装了两台总功率33000马力的蒸汽机，最高航速达23.9节，在1902年投入使用时是世界上最快的邮船，在1902年获得了横渡大西洋速度纪录的“蓝飘带”奖。北德意志－劳埃德公司将其投入不来梅港－英国南安普顿－法国瑟堡－纽约航线，载客数为头等舱367人、二等舱340人、三等舱1054人



1914年德国参战时，“威廉皇太子”号正在西航途中。按照德国海军部的命令，它在海上与“卡尔斯鲁厄”号轻巡洋舰会合，后者向其提供了2门88毫米炮、290发炮弹、1挺机枪、1名军官、2名士官和13名水兵，在公海上改装为辅助巡洋舰（后来又从另一艘德国辅助巡洋舰上获得了2门120毫米炮），在随后的8个月里击沉了10艘英国商船、4艘法国商船和1艘挪威船。1915年3月，由于煤炭用尽，“威廉皇太子”号前往美国的诺福克军港，被解除武装并拘留于纽约。1917年4月美国参战后将其没收，并改为运兵船，以美国独立战争时的德国将领冯·施托伊本男爵为其命名。一战结束后美国海军将其出售给一家美国船运公司，1923年解体

尔伯爵（Felix Graf von Luckner）曾对威廉皇帝说“噢，陛下，如果我们的海军部认为它是不可行的、而且是荒谬可笑的，那么，我断言这将是可行的。因为，英国海军部也将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他们决想不到我们会干出这种‘荒谬’的事来——将一艘武装快船伪装成一条无害的老式帆船。”

就这样，“海鹰”号诞生了。它的主人就是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伯爵本人，他伪装成一名挪威船长，化名克努特森。卢克纳尔少校不仅对帆船极为了解和熟悉，而且是个天才的演员，他将成为有名的“海上魔王”。

在224天的航海历程中，“海鹰”号在卢克纳尔的指挥下，寻觅猎物于南大西洋，冒险于广阔无垠的太平洋上。一个在轮船时代驾驶着帆船的强盗，躲闪着协约国的海上巡逻队。被他捕获和击沉的船只有上万吨。卢克纳尔的某些战绩简直令人难以置信，甚至叫那些传奇小说也黯然失色。他的冒险精神，就连他的敌人，英国人和法国人，在战后都为之钦佩。

卢克纳尔的传奇生涯还含有另一层更为深刻的意义，这层含义比简单的侠勇行为更深远的多，即卢克纳尔的这次航行是帆船参与海军作战使命的最后一例。就此而言，它标志着海战史上的一个伟大而光荣的时代的结束，以及标志着新时代到来的转折点。确实，在装备有12 英寸口径巨炮、装备在10 英里或更远的距离上可以击穿1 英尺厚装甲的重型穿甲弹、以及以蒸气和燃油为动力、具有高度机动性的大型战舰时代面前，“海鹰”号和它的船长实在是逆历史潮流而行。



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的曾祖父尼古拉斯·卢克纳尔（1722—1794），出生于巴伐利亚的哈姆，在帕骚的耶稣会修道院接受教育，后成为骑兵军官，先后为巴伐利亚、荷兰、汉诺威等国服务，在七年战争中曾与法国陆军作战。1763年加入法军，被授予中将军衔，1784年被丹麦国王封为伯爵。尼古拉斯·卢克纳尔对法国革命持支持态度，因此在1791年被革命政府授予法国元帅的军衔，并指挥莱茵军（法国国歌《马赛曲》原名《莱茵军战歌》，就是在这一时期谱写的）。在拉法耶特侯爵逃离革命军后，卢克纳尔成为法国大元帅，并受命组建后备军。由于年事已高，他辞去了这一任务，并返回巴黎准备退休。雅各宾派因此将其逮捕，并在1794年把他押上断头台处死

准确地说，“海鹰”号只不过是一艘武装袭击船，依靠狡诈的诡计进行掠夺。然而，作为最后一艘参与战争的帆船，它宣告了自布莱克和特罗姆普到纳尔逊和维勒纽夫一直驰骋疆场的风帆战船至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伯爵并非绝顶睿智之人，但他却清楚地知道他代表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他说：“没有人会忍心去击沉一艘帆船。它们是海上黄金时代的最后幸存者，造船厂再也不会大量地建造帆船了。纵帆船、三桅方帆船、快速帆船的日子即将过去。对帆船，水手们怀有旧时对她们所具有的那种情感，而对一艘蒸汽船谁也不会怜惜，要做的只是用火炮瞄准，开火，击沉它。”

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于1881年出身于一个普鲁士军人世家——骑兵世家。他的曾祖父尼古拉斯·卢克纳尔曾在巴伐利亚、荷兰和汉诺威的军队中担任过骑兵军官。后来，他建立了自己的轻骑兵团，受雇于法国国王。1789 年法国革命之后，他担任莱茵军统帅，并因而获得了法国元帅的称号（不过后来却在1794 年死于公安委员会的断头台）。卢克纳尔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德国贵族轻骑兵中任过军官，很自然，年轻的费利克斯伯爵也很可能会步其先辈后尘，服役于受人青睐的骑兵部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骑兵一直被认为是一支在战斗中快速突破的力量，但在这之后，人们对它的看法改变了。就连费利克斯自己也讲不清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他突然感到有一股强大的力量把自己推向海洋，推向驰骋在广阔海域上的伟大的方帆船。但是，当他把自己打算在海上干一番事业的愿望告诉家人时，他那傲慢的骑兵父亲根本听不进去。

1894 年，年仅13 岁的卢克纳尔从

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伯爵



萨克森的哈雷——他家的庄园逃出，发誓不成为一名堂堂的海军军官誓不返家。为了凭借自己的力量和摆脱贵族家庭的影响，他用母亲家系的名字，为自己改了个名字——费拉克斯·卢德克（Phylax Luedecke）。整整七年，他乘着帆船和其他类型的船只在世界各海域上飘荡，学习有关海洋的一切知识，并屡遭险境，死里逃生。这些都成为他晚年津津乐道的往事回忆，没人晓得他所说的哪些是真实的，哪些是夸张的，因为卢克纳尔极善讲故事，并知道许多有关海洋的传说，那里面有的是例子供他选用。

卢克纳尔登上的第一艘船是艘俄国的方帆船“尼俄伯”号，他在上面当舱童。一天，一阵南大西洋大风袭来，卢克纳尔一个失手，从90 英尺高的索具上落入海中。当他在水中拼命挣扎时，他竟一把抓住了——他一直坚持这么说——只恰巧飞临他头顶上的信天翁的双脚，这是一种两翼张开后有10 英尺长的巨鸟。尽管信天翁拼命向他头顶猛啄，想要甩开他，但卢克纳尔——如他所说的——紧紧抓住了它，以免沉到水中。

“尼俄伯”号的船长担心船在大风中遇到危险，拒绝派救生艇去搭救这个落到海中的小水手——年轻的卢克纳尔的冒险生涯原本很可能就到此为止了。但是船上的大副却坚持要求派出救生艇，甚至拿鱼叉威胁船长。最后船长勉强同意了他的要求，大副召集了几名志愿者，划着小艇，在滔天巨浪

中找到了那只信天翁——也找到了紧紧抓着它的卢克纳尔。

年青的卢克纳尔在澳大利亚的弗里曼特尔陷入情网，迷恋上一个老板的女儿，因而他抛弃他憧憬的海上生活，这事与他的年纪是不相称的。当这段恋爱冷却之后，他便留在澳大利亚做零杂工。起初，他为基督教救世军叫卖宣传宗教的小册子，后来又在西澳洲的琉因角灯塔（Cape Leeuwin Lighthouse）帮工。在那儿他又深深地迷恋上灯塔管理人的女儿，每当他从她身边走过时，混身就燃起了熊熊的爱情火焰。直到最后两人只不过有过一次天真无邪地亲吻，这段罗曼史就结束了。此后，他先后干过袋鼠捕捉手和拳击手的角色，还在一个印度行脚僧的马戏班里呆过一段时间。

离开澳大利亚时，卢克纳尔仍然是个十几岁的孩子，他又继续在公海上度过了几年冒险生活，在近一打的船上干过各种各样的工作——包括干过一阵厨子，经受了海上的种种千辛万苦，从坏血病到船只失事无所不全。后来，他曾非常高兴地描绘了当年在温哥华，自己是如何在一次恶作剧的偷船途中被人抓获的，而当时他们的船就停在码头上。在一次驶向智利的航行中，他再次被关押起来，这次是因为放假上岸喝醉了酒，偷了人家的猪。在夏威夷，他差一点儿被一个神经病杀人犯杀害。他的两条腿都曾折断过，一次是在北大西洋的航行中，另一次是在加勒比海。有一次他的船把他丢在坦皮科港，这期间他在墨西哥给迪亚斯总统当过一阵卫士。

在年轻的卢克纳尔所呆过的如此众多的船只中，只有两艘船对他的一生产生过影响。第一艘是一条挪威的方帆船，他在上面当水手，从哈瓦那驶往澳大利亚，再返回利物浦。就在这艘船上，他练就了一口流利的挪威话。

影响过卢克纳尔的第二艘船是2431吨的“平莫尔”号(Pinmore)，一条1882年造的英国四桅方帆船，它是那个时期最好的一种船。当时船上装载着木材，从温哥华前往利物浦。卢克纳尔在这条船上经历了285天终身难忘的可怕航程。当船绕过合恩角时，由于水尽粮绝，他差点儿死于坏血病。这次航海经历是那样的可怕，以至于从此之后他就将“平英尔”号与自己年轻时的浪漫史紧系在一起。

1901年，20岁的“费勒克斯·卢德克”终于回到了德国。在一本欧洲贵族人名录中，他发现家人已把他列入失踪者名单之中，但他并不打算就此回家——不！在实现自己儿时哲言，成为一名海军军官之前，绝不回去！他继续隐姓埋名。完成了航海学业后，他被德国商船录用，成为汉堡－南美洲航运公司的邮船“佩特罗波利斯”号(SS Petropolis)上的士官。一年之后，他转为德国海军预备役军官，得到进一步的训练，最后终于获得了军官资格，被授予上尉军衔。现在他终于可以锦衣还乡了。

身穿笔挺军装，肩佩金穗带、肩章、腰挎佩剑，头戴大沿帽的年轻伯爵敲响了座落在哈雷的家宅大门。一个女佣人将他引进屋内，他听见了父亲在另一间屋子里的说话声：“海军上尉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没听说过这么个人啊。”于是，费利克斯走了进去，说道：“早上好，父亲，我希望我兑现了我必荣耀地穿上帝国海军军服的誓言。”如果一个人不为这种感人的场面，这样一个坚韧不拔的儿子所感动，那他不是个极为冷酷无情的冷血动物才怪呢。老卢克纳尔张开双臂热烈地欢迎他的儿子。

从此之后，这个年轻人的仕途畅通无阻。他在各种类型的德国轮船上工作过，在这期间他学习努力，因而获得了船长证书，并于1912年2月3日成为德国海军的现役正规军官，获得海军上尉(Kapitaenleutnant)的军衔。他曾经5次抢救落水者，而每一次都拒绝了为表彰他的功绩而颁发给他的奖章，因而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他的勇敢使他赢得了新闻界的关注和英雄的名声。很快，卢克纳尔上尉便引起了威廉皇帝的注意，不过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吸引并使其欢心的。

那还是在澳大利亚时，卢克纳尔从印度行脚僧的马戏班那里学会一些小魔术。有一次，威廉二世在皇室游艇“霍亨佐伦”号上举行各国上层统治者和达官贵人参加的晚会，在晚会上，卢克纳尔玩了一套小把戏。他用一条手绢将一个鸡蛋包住，用掌猛击一下，然后从意大利国王的衣服内袋里掏出了这只鸡蛋。

这套戏法给他的皇帝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从那时起，威廉皇帝便总是将


德国海军“豹”号炮舰，1912–1913年卢克纳尔曾经在这艘军舰上服役


德国海军无畏舰“皇太子”号。卢克纳尔在这艘军舰上担任炮术长，参加了1916年日德兰大海战

上好的差事委派给他，包括搭乘“豹”号炮舰去摩洛哥和德国的西非殖民地做一次广泛而愉快的考察旅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卢克纳尔担任战列舰“皇太子”号（SMS Kronprinz）的主炮塔指挥官。在日德兰海战结束后，他被指派去负责“海鹰”号计划。

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成为“海鹰”号的船长是顺理成章的事。他是个既富有想象力而又被证明有勇气的军官，能讲一口流利的挪威语，这样，中立国挪威的旗号对于这艘伪装的德国武装快船是个十分理想的掩护。更重要的是，在帝国海军中，卢克纳尔是一位不可多得并具有大量帆船航海经验的年轻军官。

“海鹰”号于1878年建造于苏格兰的邓肯公司，是一艘钢制龙骨的三桅快速帆船，由于它的速度之快而小有名气。它最初的船名是“巴尔马哈通道”号（Pass of Balmaha，*这是苏格兰格拉斯哥西北的一处陆上关隘的名字*），长83.5米，吃水5.5米，排水量4500吨，载重吨位1571吨。德国人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捕获了它。大战前夕，它的主人将它卖给了一家美国公司，位于波士顿的哈里斯·伊尔比棉花公司。1916年，它载着棉花前往俄罗斯的阿尔汉格尔斯克，途中被一艘英国辅助巡洋舰“维多利亚”号拦截。“维多利亚”号的舰长率领登船小组进行了检查，发现该船的航海日志当中有一些可疑的地方（*后面还要提及具体原因*）。尽管当时美国是中立国，而俄国更是英国的同盟，但巡洋舰的舰长仍然宣布将其拿捕，降下了船尾的星条旗，升起了米字旗。在指派了一批优秀船员登船接管它之后，这些水手们

1878年建造的三桅风帆货船“巴尔马哈通道”号，长83.5米，宽11.8米，吃水5.5米，满帆面积2600平方米，船员64人，最大航速9节



便起锚前往奥克尼群岛的柯克沃尔湾。

但这条船永远也到不了目的地了。就在第二天早晨，一艘德国潜艇，U-36号，浮出海面，俘获了“巴尔马哈通道”和它所载的棉花。船上的英国船员也全由德国人取代，并将船驶往德国的库克斯港海军基地。就在第二年，当英国对德国实行进一步的海上封锁之际，德国海军开始计划将“巴尔马哈通道”改装成一艘伪装的辅助巡洋舰。

在不来梅港的一个船坞里，工人们给这艘船安装上了隐蔽着数条通道的秘密镶板。全副武装的德国士兵可以通过这些通道突然出现在甲板上。舰艏隐藏有两门可以拆卸的4.2英寸（105毫米）口径的火炮，随时准备轰击那些毫无戒备的敌船。在水线下面，这艘船的龙骨经过重新改造，安装了一台900马力的辅助柴油机，这样当船只处于顶风状态时，可以依靠机械动力来追捕猎物。甲板上设置有两条摩托艇，可以运载登船小组登上敌船。

经过改造，这条船被重新命名为“海鹰”号。作为其主要改装者之一的卢克纳尔伯爵完成了对它的伪装，这可以称之为航海史上最值得注意的伪装之一。从龙骨至上甲板，据卢克纳尔回忆，这艘三桅方帆船变成了一艘“有暗镶板、暗门的神秘之船”。卢克纳尔极力主张把住舱搞得尽量舒适，安装上适当的铺位和卫生设施，并且在住舱内备上图书和杂志。由于断定将俘获大批俘虏，因此在货舱底下修建了秘密俘虏舱，以防遇到敌人大型军舰检查时出现纰漏。

“只要是我抓获的俘虏”，他后来说道，“我就要让他们感到好象是我的客人一样。”这是极厉害的一招。吃得好，待遇好的俘虏就很少会惹麻烦，就不会在“海鹰”号接近另一个目标时发出警报。

“海鹰”号的全体船员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要求他们不仅要有帆船方面的知识，而且要遇事冷静、英勇善战。许多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挪威语——这艘辅助巡洋舰即将伪装为一艘挪威风帆货船。为了使它像条地道的挪威商用帆船，船上特地安装了挪威航海钟、气压计、温度计和其他金属器具。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伯爵和64名精心挑选的船员中的16人都能说一口流利的挪威语。一个名叫海因里希·欣茨的一等水手描述了当时他们的装束打扮：“脚穿一双木鞋，身着一件冰岛羊毛衫，头戴一顶蓝色水手帽，随身带着挪威烟草——斯克里牌口嚼烟草和最重要的挪威身份证。一时间，我们许多人都找到一个万般思念、书信频繁的挪威未婚妻。我们留起了胡须，有了个挪威名字。”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德国海军还有另外一艘“海鹰”号，它是德国海军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建造的6艘“秃鹰”级二等巡洋舰中的最后一艘，排水量1630吨，装有8门105毫米炮，1893年服役，1914年1月退役。一战爆发后，“海鹰”号被拖往威廉港，作为浮动的水雷仓库使用，1917年4月因事故而爆炸沉没。二战中作为美国海军太平洋主要前线维修基地的新几内亚马努斯岛海鹰港是以这艘巡洋舰命名的



卢克纳尔为一个长得纤细、无胡须、名叫施米特的年轻水手准备了一个金发套和一身连衣裙，并进行过排练，充当卢克纳尔的夫人——约瑟芬。这位假扮的女性减少了英国人对卢克纳尔的注意，因为英国男人天生地对女人有礼貌，易分散注意力。而卢克纳尔也一改以往的习惯，不再叼着他那细杆烟斗，而是没完没了地练习着咀嚼挪威烟草、并将嚼过的渣滓吐到甲板上。这种挪威水手的坏习惯是无人不晓的。此外，正如卢克纳尔所说的，“咀嚼烟草为你提供了思考的时间。当有人向你提出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时，你就可以卷起嘴中咀嚼着的烟草，慢慢地缩拢起你的双唇，然后不慌不忙、优雅地吐着”。

在这些离奇的训练刚刚完成之际，德国情报机关发现了一条看上去与“海鹰”号非常相象的挪威帆船。它是“马利塔”号，当时正在哥本哈根卸货，并计划去克里斯蒂安尼亚装货。正好在它航行期间，“海鹰”号可以准备就绪。

当然，如能搞到“马利塔”号的航海日志，那将更有利。显然，这是“费拉克斯·卢德克”的差事。他（根据他自己的描述）碰巧来到哥本哈根的码头上，在那里找到一份装卸工的工作，并借此观察了船上仅有的二名看守人的作息习惯。一天晚上，所有的船员都上了岸，他悄悄地溜上“马利塔”号，向船首走去，割坏了船上几乎所有的缆绳，然后返回船尾，等待着。开始退潮了，潮水使船位下降，缆绳绷紧，直到它们被绷断，发出很大的响声，吵醒了看守人，他急匆匆地向船头跑去。黑暗中，卢克纳尔溜进舱内，在船长的床垫下找到了航海日志，将它塞进腰带，迅速跳上通往码头的跳板，消逝在黑暗中。

1916年11月中旬，冒名的“马利塔”号一切准备就绪，随时可以从不来梅港出发，突破英国人的封锁。它起锚的日期定在真“马利塔”号计划离开丹麦的第二天。但就在即将出发的最后一刻，帝国海军司令部命令它待命，因为一艘偷越协约国海上封锁线的德国货运潜艇“德意志”号（Deutschland）刚刚结束了在当时还是中立国的美国的采购活动，现正启程返回德国。这次访问被大肆渲染，所以英国人知道这艘德国商业潜艇将经过的海域，毫无疑问，他们将加倍警惕。

德方高级指挥部不希望因此而暴露“海鹰”号。三周之后，当卢克纳尔终于接到启航命令时，真“马利塔”号早已驶远，卢克纳尔的船需要另找新的身份。在劳埃德船舶年鉴上登记注册的另一艘挪威方帆船也符合条件，它是“卡莫”号。但是当卢克纳尔把它的名字伪造在“马利塔”号船舶证书上后，又获悉真的“卡莫”号已被英国抓获，并被带进港口进行货物检查。绝望中，卢克纳尔只好选中在他头脑中第一个出现的名字：“英雄”（Irma）。

现在得将新的名字填入所有的船舶证书和航海日志中。但是从“马利塔”号偷来的航海日志已无法再做进一步的涂改了，否则将会露出马脚。卢克纳尔想起了个妙主意，他召集船上的木工和水手长，“找把斧子，砸坏所有的舷窗、窗户、所有的东西”，他指示道，“用海水将所有的东西浸湿。”家具被损坏，拦杆被撞毁，海水被倾注在所有的地毯上、铺位上、文件柜里——特别是船舶证书上。“现在修复所有的东西，”卢克纳尔接下来命令道，“照你们在海上作业时的方法重新钉牢它们。”这条修补好的船，看上去真象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西洋风暴，文件受到自然水渍，墨迹斑斑。现在它张帆启航，驶向战场。

德国潜艇“德意志”号是在1916年由北德意志－劳埃德航运公司和德意志银行联合投资建造的商业潜艇，采用潜航的方式偷越协约国的海上封锁线，与美国进行贸易。“德意志”号和其姐妹艇“不来梅”号由弗伦斯堡的一家私营船厂建造，每艘艇可以装载700吨货物，此外在浮舱内还可以装230吨橡胶。其长度为65米，水下排水量2272吨，主机为两台900马力柴油机，水面航速15节，水下航速7节，续航力12630海里，船员26人。这一批潜艇本来计划建造7艘，但只有“德意志”号和“不来梅”号是作为无武装的商业潜艇建造的，剩余的5艘被德国海军改为U-151型远程潜艇，搭载两门105毫米甲板炮和1674发炮弹，在艇首安装了两具鱼雷发射管，可携带18枚鱼雷。

“德意志”号首次远航美国是在1916年6月23日，船上装有在美国市场上十分抢手的化学染料蒽醌和茜素，以及德国药品（主要是洒尔佛散，即抗梅毒药606）、宝石、邮件等，于7月9日抵达巴尔的摩港。在回程时，船上装载了价值1750万美元的341吨镍、93吨锡和348吨生橡胶，于8月2日抵达不来梅港。“德意志”号对美国的第二次商业航行是在1916年11月，船上搭载的是宝石、有价证券和药品，11月21日从新伦敦港返航，运回了价值1100万美元的有色金属和橡胶，以及6.5吨银币。1917年初的第三次航行因德国恢复无限制潜艇战、美德关系恶化而取消，“德意志”号在1917年2月19日被德国海军征用，加装了两门150毫米甲板炮和6具鱼雷发射管，改为U-155号潜艇。在1917年和1918年，它击沉了42艘商船。

德国投降后，U-155号于11月12日从海上返回基尔港，并在24日依据停战条约移交给英国。英方将其拖往伦敦和其他港口展览，在1921年出售解体。其姐妹艇“不来梅”号在1916年9月首航美国时即在途中失踪，推测是在冰岛附近被英国辅助巡洋舰“曼托亚”号撞沉的

1916年11月“德意志”号在美国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离港的情景。这座港口是美国主要的潜艇基地之一。“德意志”号在离港时撞沉了一艘拖船，经调查确认没有责任后才启程返回德国





一战结束后被英国拖往伦敦展览的U-155号（原“德意志”号）

“海鹰”号刚一进入战斗，即碰上了真正的飓风，但恰恰是这场风暴拯救了他们。因突破封锁需要通过一大片雷区，卢克纳尔知道，为了重创吃水深的轮船或战舰，水雷一般布在离水面几英尺深的水中。帆船吃水浅，如果扯起风帆，快速前进，吃水就更浅。所以，他们扯满所有的帆，利用风将船最大限度地侧倾，安全地穿过了布雷区。两天之后，他们被英国巡洋舰截住进行检查，而这对于他们来说只不过是一场愚弄人的表演罢了。

1916年圣诞节，“复仇者”号刚刚向“海鹰”号发出“一路平安”的信号离去，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船长就急不可耐地现出了他本人的真面目。他吐掉嘴中令人厌恶的烟草块，重新叼起了他那只与那些挪威船长习俗格格不入的精巧小烟斗。扔掉帽沿搭拉在脸上的破帽子，取而代之的是，一顶大沿帽颇为洒脱地斜压在眉毛之上。挪威船长那种满口污言秽语的粗话从他嘴边消失了，代替这些的是一个个委婉的词，而且总是用英语说。船员们换上了他们的德国海军军服，帝国国旗也暂时换下了挪威国旗，在这耽搁的圣诞佳节欢庆之际，全体官兵均沉浸在啤酒、荷兰杜松子酒和果子酒的酒海之中。

节日活动一结束，“海鹰”号的水兵们便将船上伪装用的挪威木材抛入大海。两门4．2英寸口径的火炮从箱中取出，并被安装在船首左右两舷的舷墙后面。“海鹰”号现在随时准备战斗。但伪装用的轻装饰仍保留着，以便能尽可能近地接近猎物，其中包括掩盖火炮的雨布，可垂下遮住船首和艉肋板上船名的帆布彩旗，以及可在两舷展开的帆布挪威国旗。

德国海军最高当局授予卢克纳尔的原始命令只是搜寻和摧毁帆船，因为他们认为用一艘商用帆船去捕获一艘蒸汽船是十分荒谬的。然而，1917年1月9日的早晨，当了



在海上的卢克纳尔船长



满帆航行的“海鹰”号

望哨喊道“左舷后方发现烟迹”时，卢克纳尔竟毫不犹豫地将命令撇在一边，下令劫掠它。他说道，“我要击沉一艘汽船，笑着看它做最后一次下潜。”眼下他打算捕获这艘蒸汽船来作为他的第一个猎物。

当蒸汽船驶近时，卢克纳尔发出信号，向其询问航海钟时间。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要求，因为在一艘老掉牙的商用帆船上，是难得见到精准的航海钟和无线电收发报机的，它们通常利用过往船只核对航海时间。蒸汽船立刻减低了航速，发回信号通知“海鹰”号它将占据上风位置，这样“海鹰”号便可顶风停航以校准航海钟了。

随着卢克纳尔一声令下，“海鹰”号升起了德国海军军旗，露出了左舷4．2英寸口径的火炮。蒸汽船见状大惊，慌忙调头逃跑，可卢克纳尔的炮弹追了上来，越过了它的船头。紧接着三发炮弹分别命中了它的舫部、棍部和烟囱。惊的目瞪口呆的蒸汽船船长连忙顶风停航，乘小艇来到“海鹰”号上。

“你把我要得好苦啊，”汽船船长向卢克纳尔抱怨道。他手下的人也随之被运到“海鹰”号上，并带到下面的俘虏舱里。当夜幕降临时，一声巨响，安放在蒸汽船底层舱内的炸药爆炸了，宣告了这艘从加的夫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英国载煤货轮“格拉迪斯·罗亚尔”号（Gladys Royle）的毁灭。它只不过是“海鹰”号众多牺牲品中的第一个而已。

第二天，了望哨又一次发现海平线上升起一缕黑烟。乘着强劲的海风，“海鹰”号朝敌船首直插过去，并又故伎重演，发出信号询问航海钟时间。但此番对手非但没有“格拉迪斯·罗亚尔”号那份热情，丝毫不理会卢克纳尔发出的信号，反而朝着“海鹰”号直冲过来，公然无视让帆船优先右行这一航海规则。

“海鹰”号及时转向避免了碰撞。卢克纳尔命令升起黑白红三色德国军旗，露出火炮，开炮示警。当汽船调头逃跑时，卢克纳尔采取近距平射，击中其船体和烟囱。事到如今，这艘从马达加斯加岛载运食糖的英国货轮“隆迪岛”号（Lundy Island）已别无他法，只得乖乖地投降。它的船员被带到“海鹰”号上，加入到俘虏的行列之中。

原来，“隆迪岛”号的船长从一开始就对“海鹰”号产生了怀疑。第六感官告诉他，这条悬挂着挪威旗的巨型商用帆船似乎有点儿不大对头，因而他企图夺路而逃。这无论是从个人角度还是从军事角度上讲都不失为上上之策。因为就在几个月前，一艘德国辅助巡洋舰曾使他丢了一艘船，他在作出今后不再参加任何战争活动的保证之后获得

释放。现在这名船长非常恐惧，害怕由于自己未恪守哲言而被吊死在帆桅的桁端上。

无独有偶，这位船长刚登上“海鹰”号，就发现了一位曾在击沉过他前一艘船的德国武装商船上服过役的德国军医，那人知道自己起过哲。但永远保持骑士风度的卢克纳尔安慰这位吓的惊慌失措的船长不必为自己的脖颈担心。当卢克纳尔派出一些船员前去炸沉“隆迪岛”号时，便简单地把这位船长打发到下面的囚舱里。在那儿，他很快就与“格拉迪斯 · 罗亚尔”号的船长在跳棋这块战场上杀得天翻地覆了。俘虏们只是在战斗期间才被关在密舱里，平时则可在船上自由活动，搞一些娱乐，或参加具体的工作，并可拿到和他们通常在自己船主那儿同样多的钱。

此后一连10天未发现猎物。1917年1月21日，一艘帆船的身影终于出现在海平线上。卢克纳尔在此之前曾出榜悬赏“发现下一条船的人将得到50美元和一瓶香槟酒”。就连那些英国水手们，甚至包括他们的船长，也与德国水兵们混在一起，热情而积极地用五花八门的了望工具搜寻着目标。“从来没有一条船，”卢克纳尔回忆说，“有过这样多的了望哨。”

这艘临近灾难的船是2199吨的法国方帆船“查尔斯 · 古诺德”号（Charles Gounod），它满载着谷物从南非前往波尔多。“海鹰”号很快追上并捕获了它，在它的船长和水手们以及许多箱红葡萄酒被弄到“海鹰”号上之后，船就被沉入了大海。

在随后的三个星期里，又有三艘商用帆船在巴西与西非之间的中大西洋上成为卢克纳尔的猎物，它们分别是364吨的加拿大帆船“珀斯”号（Perce）、3071吨的法国四桅帆船“安东尼安”号（Antonin），和1811吨的意大利帆船“布宜诺斯艾利斯”号，后两艘船都搭载着智利的硝石——生产炸药和化肥的原料。


“海鹰”号上的协约国商船船员获释后在返回欧洲的船上合影

“海鹰”号的水手用机枪击沉了“珀斯”号，将它的船员（和船长的新婚妻子）接到了“海鹰”号上来。抓捕那艘意大利帆船时也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只有那艘法国船在抓获时费了点儿事。它是一艘外观非常漂亮的方帆船，航速很快，行家一眼就看得出这点。这正是卢克纳尔喜欢与之较量的那种船。他决心不使用辅助发动机，而仅靠风帆追上对手。

最初，卢克纳尔在这种风帆对风帆的追逐中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后来起了风暴，按常规，法国船长收起了顶桅帆组和顶上桅帆组，而卢克纳尔却仍让“海鹰”号张满所有的风帆。“‘安东尼安’号的船长一定认为我发疯了，”卢克纳尔回忆道，“在大风暴中竟然不落下顶桅和上桅顶帆组


英国画家描绘的“海鹰”号在海上航行的场景。由于海况恶劣，只挂出了三分之二的帆

——他这辈子还未见过这种怪事。这情景太有趣了，以至于他打算将此拍摄下来。”这时两船距离相当近了，近得可以看见“安东尼安”号的船长正在拍照。这时卢克纳尔下令用机关枪扫射。

“开始着实叫他大吃了一惊，”卢克纳尔谈到这位法国船长时说，“紧接着，他怒目圆睁，‘这些疯子究竟想干什么？’”随即，用卢克纳尔的话讲，“这位法国船长开始用法语中能找得到的最粗野的词汇向我们怒吼起来。当一个法国人诅咒时，你在很远的地方都能听见。”这话一点不假——就连风暴的狂啸也未能将其吞没。

“安东尼安”号投降后，它的船长和船员受到欢迎，加入到日益壮大的俘虏群中。“但最令人兴奋的是，”卢克纳尔回忆道，“我们缴获了那架柯达相机和那卷胶卷。”

到目前为止，卢克纳尔船长所作的一切都是非常令人兴奋的，而且也是符合海战国际法的。然而，在这一次又一次的冒险中，一件令人难过的事发生了，过去的回忆与当前需要的矛盾折磨着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1917年2月19日，“海鹰”号追上并抓获了“平莫尔”号——这条雄伟的英国方帆船曾经是年轻的“费拉克斯·卢德克”的家啊。

在“平莫尔”号的船员被全部转移到“海鹰”号上之后，卢克纳尔独自划着小船来到这旧时的家。他走在许多年前曾经多次走过的甲板上，船随着波浪轻轻地起伏着，四周静谧无声。卢克纳尔走进艏楼，找到他以前的铺位，那自己亲手钉的、用来挂接漏水的小铁盒的钩子，依旧留在铺位上方的天花板上。他又向船尾的围栏走去，在那上面他曾刻下自己的姓名，借着微光，“费拉克斯·卢德克”的字样仍依稀可见。

返回“海鹰”号后，卢克纳尔决定——也许是出于怀旧和需要的双重原因，再驾驶“平莫尔”号航行一次。他后来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大胆计划的：“由于出来的时间相当长了，我检查了一下我们的储备，发现有些物品已经非常短缺，特别是烟草、水果和蔬菜。鉴于我们离里约热内卢只有100海里左右的距离，我决定由我自己驾‘平莫尔’号驶向此港口。”

“平莫尔”号上的大多数船员都是挪威人，所以卢克纳尔在这次冒险中假扮挪威人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由于我发现‘平莫尔’号在里约热内卢没有代理人，”卢克纳尔回忆道，“我想只要运气好，我是能安全取胜的。”

1917年3月，他驾船驶入中立的里约热内卢，因无法模仿真船长的签名，为了掩饰，他将自己的胳膊用带子吊起来。“平莫尔”号受到拖轮和海关官员惯常的欢迎。曾蒙骗过“复仇者”号巡洋舰英国军官的假船舶证书，又一次递到了巴西港口检查官的面前，而卢克纳尔被告知船舶证书完全符合要求，使他再一次得以蒙混过关，船刚被拖到锚地，卢克纳尔就跳上岸，亲自安排采买去了。

当卢克纳尔迅速返回码头时，好运气又一次降临。他碰上一位英国军官，这位军官向他透露，他们的巡洋舰“格拉斯哥”号一加完煤，即刻启航，与另一艘巡洋舰“紫水晶”号一起去搜捕一艘据报告在特立尼达以西100海里左右海面上的德国武装快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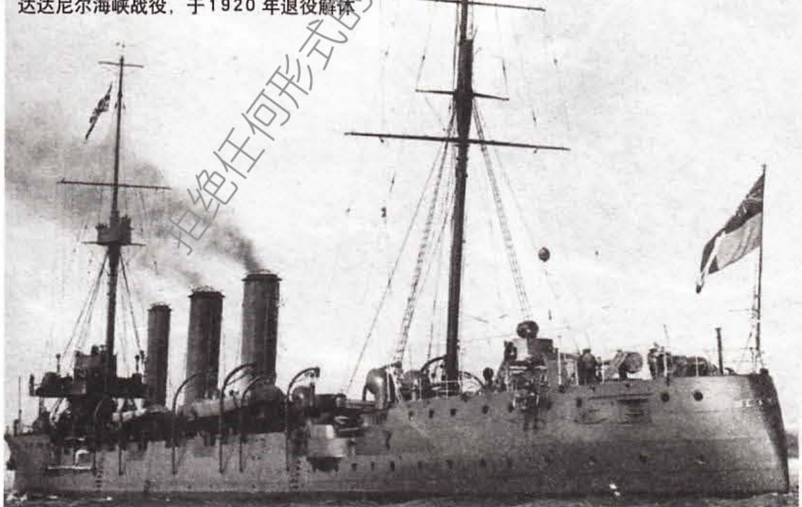
由于得知强大的敌人将要出现这一消息，卢克纳尔不想冒险进一步深谈了，同时也是为了避免碰到“平莫尔”号真船长在此地的朋友，他急匆匆地返回被他强掠来的“平莫尔”号上。很快，码头上的汽艇就载着他订购的货物来了，其中包括350磅烟草，20000支香烟和50箱雪茄。拿到出关证后，“平莫尔”号就悄悄地离开了里约热内卢，三天之后在指定地点与“海鹰”号会合。

货物被转移到自己的船上，这时他的内心经受着煎熬。当“平莫尔”号上有价值的设备清理完毕后，爆破组被派到了这艘帆船上，伯爵则下到“海鹰”号上他自己的住舱内，等待着将“平莫尔”号——自己早期生涯中重要的一部分——葬入海底的那一声沉闷

1917年3月在大西洋上搜寻“海鹰”号的英国装甲巡洋舰“格拉斯哥”号。这艘军舰自开战起就一直部署在南大西洋，1914年曾经参加了福克兰海战，1927年出售解体



在南大西洋搜寻“海鹰”号的英国三等巡洋舰“紫水晶”号。它曾经参加1915年的达达尼尔海峡战役，于1920年退役解体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仅作个人收藏



“海鹰”号船头的破浪神，今陈列于澳大利亚堪培拉的海事博物馆

的爆炸巨响。

但“海鹰”号的生涯才刚刚开始。它很快又拦到了一艘丹麦货船“维京”号，由于丹麦是中立国，因此在检查完船上没有违禁物之后，就把它放走了。2月26日，“海鹰”号逮到了另外一个猎物：1953吨的加拿大帆船“英国义勇兵”号（British Yeoman），船上载着一批令“海鹰”号的船员和俘虏们兴奋无比的货物——生猪和活鸡。当天傍晚，逮到了一艘运输智利硝石的法国帆船“罗什福考尔”号（La Rochfoucauld）。

3月5日，又一艘法国方帆船“杜普雷”号（Duplex）被轻而易举地俘获了。它的船长刚被带到“海鹰”号上时，看上去还兴致勃勃的，显然他还以为所有这些只不过是某种玩笑。等到卢克纳尔领他来到下面的会客舱，在那里见到了挂着的德皇威廉二世像、以及许多德国战斗英雄的画像时，法国人脸上的那种觉得有趣的神情才骤然消失。“我们完了，”他嚎陶着，窘迫而凄惨。还是在瓦尔帕莱索时，他的两位同事就警告过他，要小心敌人的武装帆船，并建议他给船主发海底电报以求得指示。但他愚蠢地轻视了他们的劝告，想看看到底能发生什么事情。

“你那两位朋友的船名叫什么？”卢克纳尔问道。“‘安东尼安’号和‘罗什福考尔’号。”船长说。卢克纳尔转身用德语向传令兵很快地说着：“把五号和九号船长带上来。”当那两人走进屋时，“杜普雷”号的船长马上认出了他的两位朋友。这个没有听从同事忠告的船长这时绝望地喊道“噢！整个法兰西都在这儿了。”

又过了一星期，一天早晨，瞭望哨发现了一艘英国轮船，卢克纳尔命令尾随追踪。这艘船名叫“霍恩加特”号（Horngarth），仔细观察后证实它不仅装备有无线电，而且还有一门5英寸口径的火炮。卢克纳尔又玩弄起他的惯用伎俩——询问航海钟时间，可是没得到回答。接着他在甲板室上面点燃了一些盛着化学品的盘子，顿时，火舌窜起，浓烟滚滚，与此同时他们发出求救信号。

根据古老的航海习惯法，一艘船在海上遇到火灾时，任何路过的船只都不能见死不救（否则事后会在相关的海事法院遭到起诉）。“霍恩加特”号向他们靠来，顶风停了船。但还得使它的无线电和火炮失效才行，卢克纳尔决定继续迷惑他们。他弄灭了火，并让他的‘妻子’——淡黄头发的“约瑟芬”，穿着能把那双笨重皮靴盖住的长裙，在甲板上走来走去。

当“霍恩加特”号上的船长和水手们拥靠在栏杆上，贪婪地盯着这位“约瑟芬”时，卢克纳尔升起了德国旗，露出了他们的炮，并首先对准对方的无线电室开火，炮弹一下就将其击毁了。为了加强效果，“海鹰”号的水手们用一节旧烟囱安装成的假炮在这时也发出了巨大的爆炸声，喷射出滚滚的烟云。英国船长大声发出命令，让炮手们各就各位。然而，此时卢克纳尔又想出唬人的另一招儿。他派3个人带着话筒爬到高处，一起用清晰的英语虚张声势地高声喊道：“鱼雷，准备好！”轮船的驾驶台上立即有了反应：“别放鱼雷，看在上帝的份儿上，别放鱼雷！”

“霍恩加特”号投降了，但卢克纳尔的胜利中夹带着不幸，炮击无线电室时，“霍恩加特”号上的一名军官不幸被弹片击中，死在“海鹰”号上，他被用英国国旗裹着，光荣地被海葬了。

“海鹰”号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不久船上就已收纳了262名俘虏，卢克纳尔急于将这些俘虏清理出去，以便腾出地方容纳新俘获的俘虏。3月21日，他们朝南向合恩角航行时，碰到了一艘符合其意图的方帆船，它是法国的三桅商用帆船“卡姆布朗纳”号（Cambronne）。开始，想到马上就要失去自己的船，法国船长的脸上现出绝望的神情。接着，让他吃惊的是，又听说自己的船可以不被弄沉，但必须用它将俘虏运往里约热内卢。

卢克纳尔需要一个他可以信任，并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守“海鹰”号秘密的船长来完成此项任务。因而指定了老资格的，他以往尊重的‘平莫尔’号船长穆伦，并叫他发



美国画家描绘的“海鹰”号油画，当时该船正在绕过海况极端恶劣的合恩角，卢克纳尔船长亲自操舵。注意当时的帆船已经采用了液压式机械操舵装置

誓在到达里约热内卢以前不和任何船只联系。“卡姆布朗纳”号上装载的一部分硝酸盐被丢入海中，它的中桅被截断，以便降低速度，然后将俘虏转移过去。

在“卡姆布朗纳”号朝里约热内卢驶去的同时，卢克纳尔朝北开，直到相互看不见时，又突然调头向南驶去。“卡姆布朗纳”号到达里约热内卢后，俘虏立即报告了卢克纳尔的航向是合恩角海域。这样，英国海军从太平洋向合恩角海域派去了三艘巡洋舰——装甲巡洋舰“兰开斯特”号（HMS Lancaster）和辅助巡洋舰“奥特朗托”号（HMS Otranto）和“奥比塔”号（HMS Orbita），但却找不着“海鹰”号的踪迹。英国人被找不到对手踪迹的痛苦折磨着，给卢克纳尔船长起了个绰号叫“海魔”（the Sea Devil），后来卢克纳尔在他的回忆录里得意洋洋地把这个称呼（德文是Der Seeteufel）当成自己的正式绰号。

卢克纳尔把运送俘虏的船打发去巴西后，便一直向南疾驶，在英国海军集合截击他之前穿过了合恩角。两个月之后，在靠近赤道的中太平洋海域，“海鹰”号又击沉了三艘大型的美国四桅贸易纵帆船——529吨的“A．B．约翰逊”号、673吨的“R．C．斯莱德”号和731吨的双桅小帆船“马尼拉”号。但与大西洋的猎获物相比，它们只不过是一些微不足道的战利品。这时，“海鹰”号上面的生活用品日趋减少，脚气病和坏血病在俘虏蔓延，此外在船壳上附生的藤壶和海藻越来越多，影响航行速度。卢克纳尔不得不寻找一个可以下锚停泊的安全港口，补充水和食品，并且清理船壳。

1917年7月31日，“海鹰”号锚泊在莫皮利阿环礁（Mopelia）附近。这是一座位于法属社会群岛内、青笼葱翠而人烟稀少的环状珊瑚岛，距离群岛的首府所在地塔希提岛大约有450公里。尽管“海鹰”号的吃水只有5．5米，但仍然无法通过珊瑚礁之间的狭窄浅水道，因此卢克纳尔下令在环礁外面抛锚。他自己、64名船员中的大多数，以及46名美国俘虏全都上了岸。他们发现这是一座物产丰富的天堂般的岛屿，有无数的海鸟、海龟和鱼贝。当天夜晚，他们吃的是甲鱼汤、烤大虾、海鸥蛋和肉菜蛋卷。两天以后，“海鹰”号在此触礁了。

关于此事有两种不同的说法：卢克纳尔坚持说发生了一次海啸，巨大的海浪扑向“海鹰”号，把它抛向珊瑚礁。这时卢克纳尔忠实的船员在甲板上环绕着他，人们最终都幸存下来。但那些美国俘虏对此说持不同意见，他们坚持说，卢克纳尔愚蠢地将船停靠在紧挨着珊瑚礁的地方。出事这天，他和大多数船员都上岸消遣快活去了，美国俘虏们和少量的德国人呆在甲板上干零活。这时天气平静无风，但在海平面以下却有一股强劲的海流冲激着船体，使它拖拽着锚，向礁石撞去，而人们却束手无策，只好看着船冲上了珊瑚礁，被搁浅在礁上。船的龙骨有5处破损。

长期以来，研究“海鹰”号的西方海军历史学家一直认为美国人说的是真实情况。他们认为，卢克纳尔虽然是个真正的英雄，但他为了掩饰这件事情而说了谎，本来这个事故可以避免。据法国关于这一地区的天气记载，1917年8月这里根本没有海啸。

无论“海鹰”号触礁的真正原因是什么，在船触礁后，船员们利用两艘小艇，把所有能从船上搬下来的东西都利用起来。他们用木料、帆布和棕榈叶建成了一个棚屋村，那些美国俘虏甚至用美国的街名来命名这里的路，有百老汇、宾夕法尼亚大街和鲍韦雷街。他们有从抓获的“查尔斯·古诺德”号上弄来的大量葡萄酒、法国白兰地和从“霍恩加特”号上缴来的香槟酒，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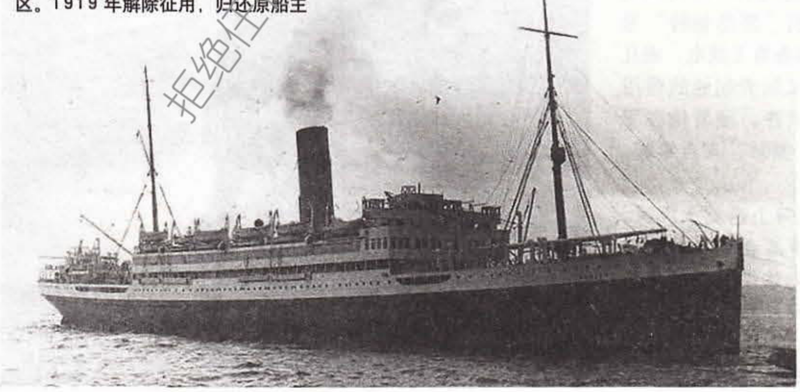
1917年参加围剿“海鹰”号的英国装甲巡洋舰“兰开斯特”号。它从1915年起一直部署在太平洋海域



英国辅助巡洋舰“奥特朗托”号，1909年建造，12128总吨，1914年被英国海军雇用（而非征用），加装8门120毫米炮，航速18节，1918年与汽船“克什米尔”号相撞后在英国近海搁浅报废



英国辅助巡洋舰“奥比塔”号，1915年建成，15678总吨，建成后被英国海军雇用，加装6门152毫米炮，航速15节，部署在太平洋地区。1919年解除征用，归还原船主



及有充足的烟草供应。但这样过了三个星期以后，这些冒险家们感到生活太单调无聊了。

“单调乏味的生活折磨着我们的神经，”卢克纳尔后来回忆说。因此他和5 个船员勇敢地决定从这个岛屿上逃走。他们装备了一条救生艇，给它取名为“塞西莉皇太子妃”号(Kronprinzessin Cecilie)。在给它装上一根桅杆并挂上帆，储备了粮食和武器———一挺机枪和一些步枪，手枪、手榴弹、炸弹，以及1000 磅子弹。在这之后，他们就出航了，打算去抓获他们遇到的第一艘商船。

他们向东航行，朝库克群岛和斐济群岛驶去。3 天后，他们来到了新西兰属库克群岛中的阿伊图岛（Aitu)，对岛上的新西兰居民说他们是一群为了打赌而坐小船穿越太平洋的荷兰和美国水手。这些新西兰人并没有怀疑，而是为这伙人补充了给养。在下一个岛屿，阿伊图塔基岛(Aitutaki)，卢克纳尔和他的部下故伎重演，这次冒充的是挪威水手。岛上的居民有些怀疑，但是没有扣留这帮人。

卢克纳尔的下一个目标是拉罗通加岛（Rarotonga)。小船在强劲的风中颠簸着，要不断地舀着灌进船里的海水。强烈的太阳当头曝晒，经海水盐分浸渍而变硬的衣服把他们的皮肤都擦破了。他们只靠吃硬饼干和咸肉维持生命。卢克纳尔和他的部下忍耐着，坚持了28 天。

最后，在航行了2300 海里后，他们来到了斐济群岛的瓦卡亚岛（Wakaya Island)。在这里，卢克纳尔继续搬出了那套“打赌的挪威水手”的故事，但是有一个多疑的居民望着这几名“挪威人”浅黄色的金发，认为他们也有可能是某艘搁浅的德国潜艇上的艇员。这个人前往英属斐济当时的首府莱武卡（Levuka）向当地警察局报告此事，斐济总督向瓦卡亚岛派去了一名英国警官和四个士兵。

9 月21 日，卢克纳尔和他的船员碰上了英国警察部队。这些英国警察除了警棍和手铐之外没有配备武器，因此只是在他们搭乘的岛间渡轮“阿姆拉”号上面大声地虚张声势，威胁说要开炮。六名德国人最初想反抗，但又一想，反抗的结果不过是送掉性命，因此投降了。他们的使命和任务也随之告终。卢克纳尔和他的手下交出了武器，被装上船，送往新西兰北岛奥克兰的一处拘留营。

在莫皮利阿岛上，留下来的德国船员从他们正在监听的英国人无线电中获知了舰长被俘的消息。正好这时一艘法国籍的小型货船“吕特斯”号（Lutece）来到了莫皮利阿



莫皮利阿环礁的卫星地图。左上角X 记号为“海鹰”号搁浅的位置

岛，停泊在环礁外面，准备和当地的土著波利尼西亚人进行贸易。“海鹰”号的中尉克林格带着一伙人划着小艇靠上了“吕特斯”号的船舷，来到船上，然后突然掏出手枪控制了船长室和电报室。这艘船上的法国人也成了俘虏，被押送到岛上，而德国人全都登上了这艘法国船。他们从船舱里找出几桶油漆，把船名改成了“富图那”号（Fortuna)，然后启程驶往南美。

德国人离开莫皮利阿岛后，“约翰逊”号的大副史密斯带着三名美国水手，划着“海鹰”号丢下来的一艘小艇，向1600 公里外的美属萨摩亚群岛驶去。10 月4 日，他们来到了萨摩亚的首府帕戈帕戈，把“海鹰”号的下落通知了那里的美国行政当局。萨摩亚总督派出一艘船前往莫皮利阿，将岛上的美国人和法国人接了回来。与此同时，那艘倒霉的“富图那”号在智利的复活节岛附近海域触礁，德国船员们弃船上了岸，向智利当局投降了。

另一方面，被关在新西兰战俘营里的卢克纳尔伯爵仍然拒绝承认战争对他来说已经结束的这个事实。关押他的战俘营位于奥克兰城外的莫图伊赫岛上，战俘营的营长有一艘取名为“珍珠”号的、他倍加珍爱的摩托艇，用来往返于莫图伊赫岛和奥克兰港之间。

1917 年12 月13 日，卢克纳尔借助假装布置排练一场圣诞节的戏剧的机会，带着其他一些德国战俘越狱了。他们夺取了“珍珠”号摩托艇，逃到了奥克兰东边的科罗曼德尔半岛。在那里，他们用机枪劫持了一艘名叫“莫阿”号的小货轮，然后向位于新西兰北岛和汤加群岛正中间的克马德克群岛(Kermadec）驶去。这座群岛距离北岛有1000 公里，位于南太平洋的主要航线上，有许多大船经过那里，或者就地停泊取水。

追击“莫阿”号的新西兰海军辅助



被关押在新西兰奥克兰的卢克纳尔船长（拄拐杖者）和其他德国俘虏



1930 年乘坐“不来梅”号邮船前往美国访问的卢克纳尔，旁边是他的瑞典妻子。最左边是“不来梅”号船长利奥波德·齐根贝恩，左二和左三是亨利·福特夫妇

巡洋舰“伊里丝”号猜到了“莫阿”号的目的地，在12月21日追上了这艘小船，重新逮捕了卢克纳尔舰长和他那帮胆大妄为的手下。在这之后，卢克纳尔在严密的监视下被关押在新西兰的多处战俘营里，直到1919年才被释放。

“海鹰”号经历的戏剧生涯前后历时7个月，航程3000海里，穿过了大西洋和半个太平洋。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伯爵——这个“海鹰”号上的海魔王——令人吃惊地俘获了14艘分别属于5个国家的船只，其中3艘是汽船，11艘是和“海鹰’号一样的帆船。对此一个评论员写道，“沉没的船及货物总计价值2500万美元，另外还有不计其数的成百吨的货物被耽搁在港口内。”还有一件令卢克纳尔直到1966年他85岁临终时仍感到骄傲的事是，在他所从事的“皇帝的海盗”的生涯当中，仅仅死了一个人，这就是“霍恩加特”号上被炮弹弹片击中而死去的那名英国军官。

战争结束后，卢克纳尔返回了德国。他在1921年5月21日加入了共济会汉堡分会，还把自己在海上的冒险生涯写成了一本回忆录，在德国成为畅销书。曾经为“阿拉伯的劳伦斯”作传的美国记者兼作家洛韦尔·托马斯在1927年为他写了一本名为《海魔》的传记，把卢克纳尔伯爵的名声传播到了更多的国家，而卢克纳尔自己则先后写了六本书。

卢克纳尔1912年在汉堡娶了他的第一位妻子，生下一名女儿。1924年，这位退休的船长在瑞典的马尔默迎娶了第二位老婆，年轻的英厄堡·恩格斯特鲁姆小姐（Ingeborg Engestrom）。1926年，卢克纳尔买了一艘帆船，取名为“祖国”号，驾着它航行到了美国。在那里，他受到如同迎接飞行英雄查尔斯·林德伯格一样的热烈欢迎，许多城市邀请他去用德语和英语发表演讲。卢克纳尔成为许多美国达官贵人的座上宾，包括外交官、政客、甚至还有美国退伍军人协会。

卢克纳尔用最少的人员伤亡代价赢得最大成功的做法赢得了人们的钦佩。汽车大王亨利·福特赠送给他一辆汽车，美国总统柯立芝也邀请他到白宫去做客（但是由于德国政府不赞成而被迫取消），旧金山授予卢克纳尔伯爵“荣誉市民”的称号。

卢克纳尔伯爵结束了在美国的风光旅行之后，于1928年返回德国，居住在哈雷城外的自家庄园中。他和当地一些名门来往非常密切，经常到一位名叫理夏德·布鲁诺·海德里希的天主教作曲家家中做客，给他的孩子们讲海上冒险的故事。作曲家的长子是一位瘦长个子的、腼腆而文静的金发少年，他后来回忆说，正是“海魔”卢克纳尔的那些冒险故事让他在1922年作出了参加魏玛共和国海军的决定。这个年轻人的名字叫莱因哈德·特里斯坦·欧根·海德里希。

1937年和1938年，卢克纳尔夫妇驾驶着自家的帆船“海魔”号（Seeteufel）进行了一次环球航行，拜访了曾经关押过他的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由于在年轻时长年从事艰苦的水手工作，因此卢克纳尔长得高大强壮，可以用手指捏弯一枚银币。在访问纽约时，他曾经横着撕开了一本纽约市电话号码簿（当时美国最厚的书籍之一）。在1938年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澳大利亚工党的报纸上刊登了一幅漫画，依次是德皇威廉二世撕毁保证比利时中立的条约、希特勒撕毁另外一项条约、以及卢克纳尔撕碎一本词典，漫画的标题是“他们都有这个习惯”。

尽管一些美国人和澳大利亚人把卢克纳尔看作是纳粹政权的支持者，而且希特勒在1939年也曾经试图将这位伯爵的海上传奇生涯用来进行宣传，但卢克纳尔伯爵并不是纳粹政权喜欢的那种类型的人。由于卢克纳尔拒绝退出共济会、拒绝放弃美国许多城市授予他的荣誉市民头衔，因此汉堡的纳粹地方党部安排了一次栽赃陷害的荣誉法庭审判，控告卢克纳尔伯爵“乱伦”和“与未成年少女发生关系”（像



1924 年在哈雷市参加“德意志日”游行的卢克纳尔（3），他右边是埃里希·鲁登道夫将军（1）

纳粹德国那样猥琐的专制政权在抹黑一个人时总有这类层出不穷的龌龊手段），但因“证据不足”而不了了之。尽管如此，纳粹当局还是冻结了他的银行帐户。

1943 年，卢克纳尔伯爵设法营救了一名犹太人妇女罗丝·扬森，交给她一本从炸弹废墟里找到的护照，想法帮助她从中立国瑞典逃到了美国。1945 年，当纳粹政权覆灭在即时，哈雷市的市长请他出面与正在逼近该市的美国军队谈判，以无条件投降为代价，避免城市遭到破坏。卢克纳尔答应了市长的请求，与美军获得了联系，但是在听说当地的纳粹党党部因为这桩“叛国罪”而判处他死刑后，卢克纳尔再也没有返回自己的家乡，而是向西逃到了不来梅，在战后与瑞典裔妻子一道定居在马尔默。

1966 年 4 月 13 日，这位传奇的老水手在马尔默的家中平静地去世。为了纪念他，西德和法国在 1973 年到 1975 年之间拍摄了一部长达 39 集的电视连续剧《卢克纳尔伯爵》，在美、德、法、新西兰等国出版了 22 本研究卢克纳尔伯爵的专著。2004 年，在他的故乡哈雷市成立了“费利克斯·冯·卢克纳尔伯爵协会”，致力于在原属卢克纳尔家族的庄园（二战后被东德政府充公）当中恢复伯爵居住时的原貌，并且展览他的生平和著作，以感谢这位伯爵在二战末期为了保护哈雷而做出的贡献。如今有来自 14 个国家的人参加了这个协会。

附录一

“海鹰”号的船型属于“Windjammer”，即钢制大型帆船。这种船兴起于十九世纪下半叶，是一度垄断了海洋贸易的快速“飞剪船”（Clipper）的后裔，但船身不再是木质的，而是钢质的。这种新型帆船各个部位的尺寸都大得惊人，多数船只的长度至少有 300 英尺（近 100 米），其钢质桅杆高度可达 200 英尺，某些帆桁竟有 100 多英尺长。船上最大的帆在干燥时就有一吨重。

在工业机械化迅速发展的年代，欧洲的工厂需要大量的原料，比如用来给庄稼施肥的秘鲁鸟粪肥，用来生产硝酸、炸药和各种化工产品的智利硝石，还有澳大利亚的谷物和煤、南美洲的木材和牛肉……在商船使用蒸汽机的早期时代，大型帆船有许多优势。它们几乎可以在任何海域生存下来，并战胜可怕的巨浪，而这些巨浪会冲垮蒸汽船的烟囱，浸灭锅炉，像剪断锡箔纸片那样切断它们的螺旋桨。十九世纪七十到九十年代的蒸汽船在天气好时，平均


awm.gov.au
1938 年卢克纳尔和妻子访问澳大利亚的情景


1931 年，美国“信不信由你”博物馆馆长罗伯特·里普利（左五）与卢克纳尔（左二）和作曲家乔治·戈什温（左一）等人参加新书发布仪式


卢克纳尔用手指捏弯一枚硬币，摄于 1956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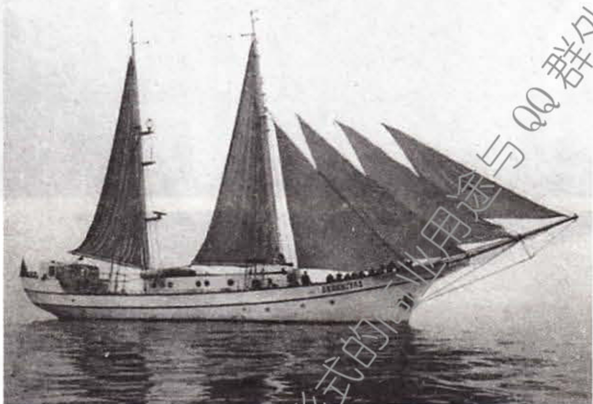
1975 年法国和西德合拍的 39 集电视连续剧《卢克纳尔伯爵》

航速可以达到 7 节，而商用帆船除非遇到顶风或无风的情况，否则在各种情况下都要比蒸汽船航行的更快——德国的五桅钢帆船“福托西”号曾经创下24 小时航行378 海里、平均航速1 6 节多的纪录。

而且风是不用花钱的，南大西洋和南太平洋上的煤炭码头却寥若晨星，而且码头费用极高。这样，越远离故乡，至关重要的燃料就越发昂贵。锅炉用的淡水也是个大问题，特别是在南美干旱缺水的西海岸线上尤为突出。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蒸汽船在海上所需的费用也是十分惊人的。如果它们的船主想获得利润，就得让它们马不停蹄地连轴转。而商用帆船的航运费用是经济低廉的。当这些巨型帆船等待装货时，它们甚至可以在远离码头的泊位上等上几个星期或几个月的时间，然后装上货物驶回家，照样获得利润。

采用钢质结构是这些帆船的最大优点。钢质舱壁、钢质船舷、甚至钢质桅杆，使它们的强度和尺寸都得以增加。木材实际上已经弃置不用，只有极少数用来铺设加班和装潢像船长交谊室这类房间的内部。由于尺度和强度大幅提高，船体设计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早先木质帆船的圆弧形船舷和船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直线型船舷和深而平的船底，这样就可以提供最大限度的货舱容积。

钢质船体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是安全性。在二十世纪初，许多商用帆船满载煤炭往来于英国与南美洲之间，而煤在受潮而又不通风的情况下是会自燃的。这对木质帆船或者蒸汽船来说都是致命的威胁，而对于钢质帆船来说，它们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密封船舱、控制火势、直驶港口。1893 年，钢质帆船“锡达班克”号就因为成为这种“火船”而名噪一时。当时它满载着煤从澳大利亚的纽卡斯尔去美国旧金山，路上煤火足足燃烧了一个多月。水泵夜以继日地抽水灭火。在最严峻的时刻，爆炸掀掉了舱盖，但船员们再次将煤舱封住。呛人的蓝烟使所有的抢救工作都变得十分困难，高温将甲板缝间的沥青都熔化了。然而这个浮动的火炉继续在太平洋上航行着，直至驶入旧金山港、将火扑灭。一艘木质帆船或者一艘蒸汽船在这种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能驶达港口的。





卢克纳尔的双桅游艇“海鹰”号（上图）在二战后被苏联没收，改为渔船“希望”号。目前卢克纳尔基金会正致力于修复该船

随着船只越造越大，三桅帆船便让位于四桅、甚至五桅方帆船了。帆的设计也开始相应改变，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建造的第一批商用帆船是名副其实的方帆船，因为桅杆上的帆全是方形的，过去木质帆船上的纵帆、三角帆都不见了，而且开始使用绞车来代替过去的人力升帆和降帆工作。钢质帆船上的船员人数也日益减少。过去一艘1500 吨的“飞剪船”需要50 到60 名船员，而一艘2500 吨的钢质帆船上的船员数却平均少于30 名。钢质帆船一般来说在甲板的中部增加了一个岛式建筑，把主甲板切成两个井围，这样可以消解海水在甲板上横冲直撞的冲力，而且还可以布置高级船员和水手的居住区。在岛式建筑与船艏楼和船艉楼之间往往有几条狭窄的架空通道，被称作“飞栈”，它可以使船员躲开时常浸满甲板的海水。德国人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保护船员的安全：每当驶入风暴区时，就沿甲板的两侧张起救生网。

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商用帆船基本上垄断了从智利向欧洲运送硝酸盐的航运业务（这也是海鹰号为什么拦截到那么多运输硝石的帆船的缘故）。这些硝石是人所共知的最脏的货物，有毒，易燃，当它们被磨成粉装入袋子中时又沉得要命。但是，从1890 年到1914 年，它是最能赢利的货物之一。欧洲的农民每年要消耗掉50 多万吨硝酸盐作为肥料，而各国需要数百万吨硝酸盐生产军火。在欧洲的土壤里没有硝酸盐，在德国人发明人工合成硝酸盐的方法之前，欧洲唯一的硝酸盐来源在数千海里外的智利沙漠里。由于智利的码头工人采取一种特殊的方式——一艘船只有一个码头工人为其装货，因此一艘能载运3 万袋硝酸盐的货船差不多要等一个月的时间，这名工人才能把所有的袋子装到货舱里。这种长时间的等候对于蒸汽船船主来说是一桩赔钱的买卖，因此从事这种航运业务的几乎全都是商用帆船，它们把产自欧洲的优质燃煤运到智利或巴西，然后在回程运载这些沉重的硝酸盐。

1905 年是商用帆船的巅峰时期，当时劳埃德船级社注册的商用帆船有3500 艘以上，船东包括英国、美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挪威、丹麦、瑞典和俄属芬兰等国，大约有15 万水手在商用帆船上工作。由于苏伊士运河开通后英国船主把注意力放在了蒸汽船上，而美国人在横贯大陆的铁路通车之后侧重于开发国内的广袤地域，较少注意到海洋运输方面，因此商用帆船的领域主要由法国、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所垄断，尤其是德国汉堡的莱伊茨航运公司和法国敦刻尔克的博狄斯父子公司。

第一次世界大战象征着钢质大型帆船时代的终结。这倒并不是因为像“海鹰”号那样的袭击舰在战争中摧毁了许多这样的帆船。钢质帆船没落的主要原因是，伴随战争而来的船舶设计工艺和蒸汽动力方面的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蒸汽船的锅炉房里，合算的石油取代了昂贵的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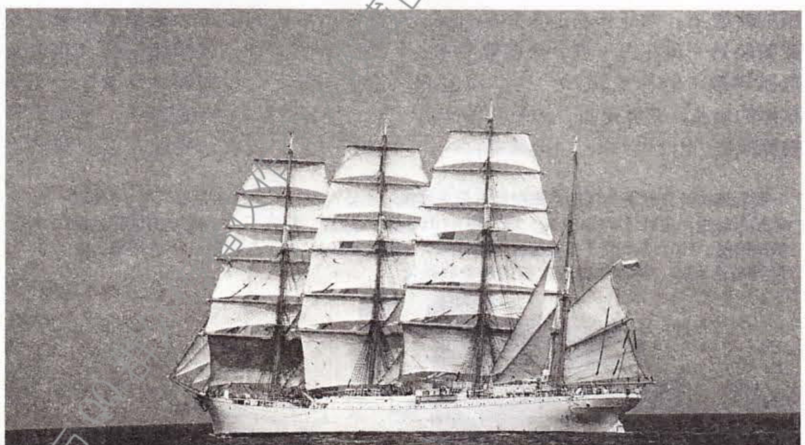
苏联／俄罗斯风帆训练舰“克鲁森施特恩”号，1926 年建造于不来梅港，原为德国莱伊茨航运公司的4700 吨货船“帕多瓦”号，用来运输智利硝石和澳大利亚小麦。二战结束后，“帕多瓦”号作为战争赔偿移交给苏联，成为以喀琅施塔得为基地的波罗的海舰队训练舰，1965 年移交苏联渔业部，作为渔船船员训练舰。1976 年美国建国两百周年庆典中，曾作为领舰率领来自世界各国的帆船队驶入纽约港。苏联解体后一度作为旅游船，1995—1996 年曾沿着约翰·冯·克鲁森施特恩海军中将的路线进行环球航行。有趣的是，该船移交苏联后仍保留了原来的黑白两色涂装，这是莱伊茨公司帆船的标志，取自普鲁士国旗的黑白二色



船主们纷纷转向燃烧石油的蒸汽船和蒸汽轮机商船，只有极少数的老顽固仍然使用那些张着巨大白色翅膀的帆船。此外，战时发展起来的人造硝酸盐工业摧毁了钢质帆船最重要的货源——智利的天然硝石。战后巴拿马运河的全面通航使得蒸汽船的航线大大短于帆船的几条生命运输线。凡尔赛和约迫使德国交出了每一艘1600 吨以上的商船，包括每一艘商用帆船；法国的商用帆船巨头博狄斯公司也在1926 年卖掉了最后一条船，然后宣告破产。从那时起，就只有很少几条钢质商用帆船还能浮在水面上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作为德国战争赔偿的一部分，苏联海军获得了莱伊茨航运公司的“帕多瓦”号(Padua)，将其改名为“克鲁森施特恩”号（Kruzenshtern)，作为风帆训练船。曾隶属于同一家公司的帆船“北京”号(Peking）如今作为博物馆停泊在纽约，另一艘“波美拉尼亚”号(Pommern）是芬兰阿兰群岛的水上博物馆，第三艘“贸易风”号（Passat）停泊在吕贝克港，也是一座水上博物馆。另外一艘作为战争赔偿移交给盟国的钢质帆船是1936 年建造的“霍斯特·威塞尔”号，希特勒和鲁道夫·赫斯都参加了它的下水典礼。这艘船交给美国海岸警卫队，并改名为“鹰”号(USCGC Eagle)。

不过，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许多国家的海军建造了钢质帆船的复制品，作为训练船，比如智利海军的“爱斯梅拉达”号、阿根廷海军的“解放”号等等。目前仍然拥有钢质



苏联／俄罗斯帆船“谢多夫”号，原为建于1919 年的芬兰货运帆船“玛格达雷娜·维嫩2 号”，1936 年出售给德国，1945 年作为战争赔偿移交给苏联，登记吨位7300 吨，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传统风帆船

美国海岸警卫队帆船“鹰”号（USCGC Eagle，WIX-327），原为1936 年建造的“霍斯特·威塞尔”号，属于“戈尔希·福克”级训练帆船，排水量1784 吨，最高风帆航速17 节，柴油机航速10 节。二战后作为战利品被美国接收，移交给康涅狄格州新伦敦的海岸警卫队学校作为训练舰



风帆训练舰的国家有美国、德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荷兰、比利时、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西班牙、葡萄牙、澳大利亚、墨西哥、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厄瓜多尔、巴西、智利、阿曼、印度等国。

附录二

“海鹰”号与战时的海上国际法

◎私掠船和辅助巡洋舰

在海上战争法则中，需要界定合法的海上交战者。如果一艘船只没有获得作战资格而擅自在海上作战的话，那么它的全体船员将不享受战俘的待遇，有时甚至要被当作海盗来审判和处决。根据国际公法的规定，“私掠”(Privateer）是指一个船主在一个交战国的授权下，为了他在战争中的利益，武装船只一边在海上进行私掠船战术，以阻碍敌人的商业航行。这个词也指该船的船长、全体船员，而船只本身也被称作是“Privateer”(私掠船)。

私掠船在很长时间里是被承认具有在海上交战的资格的。尽管它被允许从事战争行为，但自始至终是一艘私有船舶，而非海军的军舰。私掠船和海盗船的区别，在于前者具有政府颁发给船长的私掠船许可证，而后者没有。对于一个海上力量弱小的国家来说，私掠船制度是一种战胜强大敌人的好办法，不少国家使用这种方法在不花费大量经费的乾坤下，建立起自己的海上武装力量，同时还培养了大批优秀水手和军官。

私掠船所掳获的船只和货物通常在指定的地点拍卖，收入由皇室（国库）、船主、船长以及全体船员按照比例分配。在十七和十八世纪的海战中，私掠船战术占有很重要的地位。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往往只把私掠船许可证授予本国的国民，私掠船的船主提供一笔保证金，以保证赔偿可能由它造成的损害。私掠许可证就像一个契约，控制着私掠行动的限度，比如说只能针对某个国家、只能在某个海域攻击等等，这和海盗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如果船长破坏了契约，就很有可能被要求赔偿对方的损失、甚至取消许可证。但是后来也产生了一些弊病，比如说变成不分青红皂白的海上抢劫，特别是变成对中立国、甚至有时对本国货船的抢劫。

因此，在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结束后不久，由各主要海洋国家签署的《巴黎宣言》决定废止这一制度。在此之后，除了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外，在海上再也没有出现过私掠船。大多数海洋国家都加入了巴黎宣言，只有美国和中国（清帝国及其后续的法理继承者）是没有加入这一宣言的两个大国。

私掠船制度的废除并没有就此消除产生该制度的考虑，即通过武装商船的办法来弥补军舰的缺乏或不足。1856年以后产生了两个代替的解决办法，即志愿舰队（Volunteer Fleet）和辅助巡洋舰（Auxiliary Cruiser / Merchant Cruiser）。

志愿舰队是直接将商船编入海军作战舰队，这些商船在纪律方面、职责方面和法律地位方面被看作同军舰一样。这一做法曾经在普法战争中被普鲁士海军使用过，在1878年俄土战争及其之后的一段时间里被俄国海军使用过，在美西战争时被西班牙使用过，在日俄战争时被日本和俄国海军使用过。当时俄国海军志愿舰队有14艘辅助巡洋舰和4艘运兵船，它们是由俄国国民认捐购置的，在和平时期用来从事客货运航行、向远东移民、运兵、以及向萨哈林岛流放犯人的任务。而日本则利用各大轮船公司的大型客轮充当运兵船、哨戒船、通报船和辅助巡洋舰，在1905年5月27日的对马海战中，日本海军拥有16艘这样的辅助军舰。

1907年10月，各列强在海牙和平会议上签署了一项关于将商船改装为军舰的公约（海牙第七公约），美国、中国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没有签署这项条约。按照该公约的规定，带有武装、从事作战活动的商船将作为军舰管理，由职业的海军军官指挥，全体船员服从军事纪律的管理，同时要将该船列入海军的军舰名录，悬挂军舰的特殊标志（例如海军旗）。一旦完成这种改装，此船便成为国家海军的组成部分，在法律上具有公船的地位（像军舰一样免于临检和拿捕）。这种经过改装的商船被称作辅助巡洋舰。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国

一战初期被计划改装为辅助巡洋舰的英国卡纳德轮船公司邮船“卢西塔尼亚”号，1907年投入航线，总吨位31500吨，排水量44060吨，最高航速26.7节，是当时世界上最快的邮船。1915年5月7日被德国潜艇U–20号击沉，船上1959人中有1198人遇难，令世界舆论大哗，并导致美国对德关系急剧恶化



德国邮船“威廉大帝”号是“威廉皇太子”号的姐妹船，1914年德国参战后加装6门105毫米炮和2门37毫米炮，改装为辅助巡洋舰，但是在8月26日于西属撒哈拉外海与英国巡洋舰“飞人”号遭遇，在交战中被击沉





一战中的德国辅助巡洋舰“海鸥”号，原为莱伊茨公司1914年建造的货船，竣工后即被德国海军征用，加装4门150毫米炮和1门105毫米炮、2具鱼雷发射管和500枚水雷，在一战中击沉协约国商船39艘。一战后归还原船主，1945年4月在挪威松格峡湾被英军飞机炸沉

和德国都将一些快速的远洋邮船加装甲板炮，改装为第一等的辅助巡洋舰。在英国方面，这样的邮船有加拿大太平洋汽船公司的“不列颠皇后”号、“日本皇后”号、“俄国皇后”号，卡纳德轮船公司的“卡尔马尼亚”号、“卡罗尼亚”号，白星轮船公司的“劳伦提克”号和“条顿尼克”号等等。

在战争爆发时，英国海军部还征用了卡纳德轮船公司三条最大、最快、最豪华的邮船——1907年创下横渡大西洋速度记录的“毛里塔尼亚”号(RMS Mauritania)、它的姐妹船“卢西塔尼亚”号（RMS Lusitania）和“阿基坦尼亚”号（RMS Aquitania）。但是由于这三艘快速邮船的日常耗煤量很大——每天910吨——而英国海军部的煤炭储量有限，因此最后决定只征用“阿基坦尼亚”号（不久之后把它也改成了医院船）。

德国人在一战前建立起一支规模和质量不亚于英国人的大型邮船队，但是开战时只有其中的三艘——“威廉皇太子”号、“威廉大帝”号和“艾泰尔·腓特烈亲王”号在公海上被改装为辅助巡洋舰。其巨大的燃料消耗量使得这些客轮不能进行长距离的航行。“威廉大帝”号被一艘英国巡洋舰击沉，“威廉皇太子”号和“艾泰尔·腓特烈亲王”号在结束了为时不到一年的海上狩猎生涯后前往美国的港口解除武装，并被就地扣留（这两艘船在1917年美国参战后都被美国海军没收了）。

次一等的辅助巡洋舰是由速度比较慢的蒸汽机货船改装的，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中，德国也主要使用这种类型的轮船从事海上袭击活动。它们具有强大的火力（五到七门150毫米炮，数门105毫米和52毫米炮，若干具鱼雷发射管和四五百枚水雷），以及充足的煤炭供应，保证了这些辅助巡洋舰实现大范围的活动能力。这一类轮船中最著名的两艘是“海鸥”号（SMS Moewe）和“狼”号（SMS Wolf），前者的两次出动（1915年12月到1916年3月，1916年12月到1917年3月）摧毁了18万吨的协约国船舶，而后者从1916年12月到1918年2月期间在太平洋和印度洋巡航，击沉了35艘、21万吨的协约国商船，之后成功返回基尔港。至于使用风帆的“海鹰”号，则属于辅助巡洋舰中的特例。

总的来说，德国海军的辅助巡洋舰是贸易的摧毁者，而英国的辅助巡洋舰主要起贸易保护者的作用。世界海战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一幕战斗就发生在一艘德国辅助巡洋舰和一艘英国辅助巡洋舰之间。

19524载重的英国皇家邮船“卡尔马尼亚”号（RMS Carmania）建造于1905年，隶属于卡纳德轮船公司，航速18节。它是一艘两个烟囱的客船，在战争爆发后被英国海军征用，安装了八门4.7英寸炮。其船长诺埃尔·格兰特（Noel Grant）决定把它伪装成德国商船，以便在遇到伪装的德国辅助巡洋舰时消除其警戒心，从而达到出其不意先发制人的目的。在反复研究了劳埃德商船年鉴后，他选定了18710载重吨、尺寸与其接近的的德国商船“特拉法尔加角”号（SS Cap Trafalgar），在舰首和舰尾漆上了这个名字。

真正的“特拉法尔加角”号建造于1913年，是汉堡－南美洲航运公司比较新的一艘邮船，有三个烟囱，航速17节，往来于德国与巴西和智利之间。1914年8月德国与英国进入战争状态时，它按照战前制订的计划，在乌拉圭的蒙的维地亚卸下所有旅客，然后在8月31日在乌拉圭外海与炮舰“易北河”号会合，从后者上面获得了一批军官、两门4.1英寸炮和6门砰砰炮，在公海上改装为辅助巡洋舰，并且编入德国海军，编号为Hilfskreuzer B（辅助巡洋舰B号）。

当时在南美洲北部委内瑞拉一带有好几艘德国运煤船，由于战争突然爆发、英国封锁北海而不能回国，正好可以为这艘巡洋舰（以及其他几艘正在海上的德国辅助巡洋舰）提供燃料。1914年9月，“特拉法尔加角”号驶往巴西东边500海里处的特立尼达岛（Trinidade e Martim Vaz），德国海军在那里建立了一个秘密的补给基地。为了迷惑可能遇到的英国南大西洋分舰队，这艘袭击舰伪装成一艘英国邮船，其舰长维尔特海军中校为它选定的掩护替身是——不是别的船——“卡尔马尼亚”号。

1914年9月14日，“特拉法尔加角”号抵达特立尼达岛，在那里和从委内瑞拉驶来的两艘加煤船会合。不幸的是，它冒出的黑烟被正好驶经附近的



改装为辅助巡洋舰的英国邮船“卡尔马尼亚”号（RMS Carmania）。RMS前缀意为“皇家邮船”，是指与英国皇家邮政（Royal Mail）签署邮件运输合同、用来运送海外邮件的商船。由于当时客船速度普遍快于货船，因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以客船为邮政船（即邮船）。不过并不是所有的英国客船都有此前缀。其他国家的邮船、客船、货船通常加SS（蒸汽船）或者TSS（蒸汽轮机船）的前缀

“卡尔马尼亚”号发现。它也驶入特立尼达群岛唯一的一处港口，惊骇地发现港里正停泊着另一艘“卡尔马尼亚”号。

德国船长看到另一艘“特拉法尔加角”号出现在特立尼达港入口时，他的惊讶程度不下于英国人。这么巧合的事情，恐怕在海战史上也是绝无仅有的。由于港内面积太小，无法实行炮术机动，因此两艘船不约而同地撒丫子朝港外公海上跑——谁先到达公海，谁就可以抢占有利的发炮位置。英国船先进入公海，并且开了炮，但是射程太近。“特拉法尔加角”号开炮还击，由于德国人的射击技术比较精准，因此在开头时占了上风。就像古时候的两名武士一样，这两艘船你一炮、我一炮地决斗起来，其间还不时夹杂着机枪的射击声。

炮战开始一个半小时之后，双方仍然不分胜负。这时两船的距离接近了几百码，英国人的瞄准开始精确起来。此时“卡尔马尼亚”已经挨了73炮，舰桥被彻底打烂，水线部位也中了好几发炮弹，正在“哗哗”地进水。就在这时，英国水手发现“特拉法尔加角”号调转了航向，也慢慢地停了下来，并且开始往水中放救生筏。原来，“卡尔马尼亚”号的几发炮弹击穿了德国巡洋舰的水线，这艘船的漏水情况比“卡尔马尼亚”号还严重。

“特拉法尔加角”号先沉入了海底。半浮不沉的“卡尔马尼亚”号从海里捞上来279名德国海员。有16名（这个数字存在争议，最多的说法是51人）德国船员在炮战中牺牲，英方有9人战死，十多人受伤。几个小时后，当另一艘德国辅助巡洋舰“威廉皇太子”号闻讯赶到特立尼达岛时，两艘辅助巡洋舰都不见了踪影。

9月15日，处于半沉没状态的“卡尔马尼亚”号挣扎着驶入巴西的裴南布哥港，它搭救出来的德国船员被那两艘运煤船接走，送到了蒙的维地亚。“卡尔马尼亚”号在裴南布哥进行了必要的堵漏修理后返回直布罗陀，在那里进行彻底的检修。之后的两年里，它在葡萄牙海岸执行海上巡逻任务，后来改成了运兵船。1932年，这艘退役的邮船被卖给苏格兰的一家拆船商解体报废。

辅助巡洋舰也在西班牙内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使用。在二战当中，澳大利亚海军装备了两艘辅助巡洋舰，新西兰海军1艘，加拿大海军3艘，法国海军16艘，而英国海军在二战爆发初期改装的辅助巡洋舰有60艘之多。不过，一方面由于盟国采取了护航编队制度，敌方辅助巡洋舰对盟国商船不再构成威胁，另一方面空中巡逻和侦察技术也得到发展，因此这些船大多在1940年之后改回货船或运兵船。

另一方面，在二战当中，德国、日本和意大利的海军实力处于绝对的劣势，因此出于破坏盟国海上运输的需要，在参战后仍改装了若干艘辅助巡洋舰。日本海军征用了13艘“特设巡洋舰”，在印度洋实行破袭作战，不过到1943年时，已经有5艘被盟国击沉，其余的都改回商船。意大利海军有4艘辅助巡洋舰，而德国海军装备了11艘。其中一些大名鼎鼎的袭击船，例如“猎户座”号（HSK-1 Orion）、“亚特兰蒂斯”号（HSK-2 Atlantis）、“企鹅”号（HSK-5 Pinguin）和“鸬鹚”号（HSK-8 Kormoran），都取得了显赫的战果。

1914年特立尼达岛海战的情景。左边是伪装为“特拉法尔加角”号的英国辅助巡洋舰“卡尔马尼亚”号，右边正在下沉的是伪装为“卡尔马尼亚”号的德国辅助巡洋舰“特拉法尔加角”号



在特立尼达海战中被炮火打烂的“卡尔马尼亚”号舰桥



◎武装商船

商船的防御性武装在海上公法当中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原则上，商船不应当参加战斗。但是，各国在传统上承认商船有权抗拒企图捕获它们的敌船。英国国王查理一世在1625年和查理二世在1672年的王室公告就宣布了这一原则。从那时起，关于商船的武装就存在着法律学术上的分歧。

在英国和法国法学界占上风的意见是，商船有权进行防御性武装，这种权利被称作“紧急需要权”或“正当防卫权”。需要注意的是，武装商船与辅助巡洋舰有根本上的区别，前者是用于海上运输，而后者是用于破坏敌人的海上运输。另一方面，德国和其他一些大陆国家反对商船的防御性武装。这些国家强调指出，紧急需要权只能由一个国家来实施，而不能由一艘船、或一艘私船来援用。从军事意义上来说，不允许一艘商船抵抗一艘军舰，当

一艘商船用大炮进行武装时，它就具有了军舰的性质，而不必考虑这些大炮是用于防御还是用于进攻。

其他国家对武装商船的态度各异。一些国家，比如阿根廷和葡萄牙，对此不表态；但是大部分国家，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赞同英国的看法，认为商船有防御权和武装权。只有荷兰把武装的商船和军舰相同对待。

美国对于武装商船的态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发生过几次转变：在战争一开始，美国是承认商船有武装防御权的；到1915年潜艇战出现，以及英国海军部对其商船下达攻击并撞击敌人潜艇的命令，美国转变了立场，认为商船的任何武装都是非法的，因为它“可以被解释为企图使商船在威力上胜过潜艇，并阻止潜艇实行临检权”。但是，随着德国“无限制潜艇战”的加剧和协约国的反对，美国在带有武装的英国邮船“卢西塔尼亚”号被击沉后于1916年再次改变了立场，承认商船具有配备“防御性武装”的权利。

在两次世界大战当中，区分一艘商船的武装是否构成防御性武装的依据，主要是看大炮的口径及其数量是否有限，大炮是否安放在船尾的位置，是否只由船上的船员使用等等。至于商船平时为了自卫而配备的枪支、弹药和匕首等等，由于其性质及微小的数量，构成简单的防御手段，因此用这些手段装备商船是合法的。

关于武装商船的性质的争论，其最大原因在于，如果武装商船被视为军舰，那么它将不能便利地使用中立



二战时美国大批建造的万吨级货船“自由轮”通常都在船头搭载1门3英寸炮，在船尾安装1门5英寸炮，作为自卫武器

国的港口。这也是德国等海运弱国坚持武装商船的军舰性质的一个主要原因：如果能够将武装商船与军舰视为同一类别，那么拥有商船数量最多的英国将不再拥有海上航运的优势。另一方面，把武装商船视同普通商船而非军舰，可以有效地惩治船上的水手们在外国港口的不法行为。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英法以及德国仍然没有改变在武装商船地位问题上的各自立场——德国仍然将武装商船视为军舰，因此在本国的快速商船加装火炮之后，也严格遵守规定，将其改定为“偷越封锁舰”(Blockade Runner)，全体船员和船只本身都列入海军编制——而美国、全体美洲国家和欧洲中立国起初倾向于把武装商船看作军舰，并限制交战国的武装商船使用本国港口。

但是从1941年年底开始，随着德国潜艇战的加剧，各中立国不但不再对交战国商船的武装权利提出异议，而且为了自己的利益，也开始对本国的商船进行武装。从1942年起，美国建造的所有“自由轮”都在船首和船尾安装一门76毫米或127毫米火炮，在船桥上安装7.62毫米和12.7毫米高射机枪，以对付德国潜艇和轰炸机的威胁。



运送核燃料的英国武装货船“太平洋苍鹭”号，左下角小图是船上的30毫米自动火炮

总的来说，武装商船只是在战时的防御措施，二战结束后，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取消了商船的武装。在海盗活动死灰复燃而且越来越猖獗的21世纪，有许多商船用小口径武器和消防水龙头来对付海盗船，而隶属于英国政府所有的“英国核燃料公司”(BNFL)的三艘核材料运输船——“太平洋针尾鸭”号(Pacific Pintail)、“太平洋水鸭”号(Pacific Teal)和“太平洋苍鹭”号(Pacific Heron)——则采取了配备火炮武装的方式，以节省英国海军为其护航的任务，在每艘船上安装了3门30毫米自动火炮，以免在运送核燃料时遭到海盗或恐怖主义分子的劫持。

◎伪装的船旗

“海鹰”号在离开德国港口、进入大西洋投入战斗时，悬挂的是挪威船旗，并且伪装成挪威货船。这实际上涉及到海上交战发则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即伪装船旗的使用。

在陆地上的战争中，禁止使用敌国国旗、敌国军用标志以及敌国军服参加战斗（否则可以作为间谍处以死刑）。但是这些规则在海上却不这么严格。问题在于，对假船旗的使用要做一个基本区分。

首先，是挂着假船旗的航行状态。

对于交战国的军舰来说，挂着假船旗航行是一个根据古老的战争法则而获得允许的战争诈术。这种方法在现代战争中经常得到运用，例如在1877年的俄土战争中，一些土耳其军舰在黑海使用意大利船旗；日本海军的巡洋舰在中日黄海海战中使用美国船旗；两艘美国军舰在1898年使用西班牙船旗；1914年10月冲入英属槟榔屿的德国巡洋舰“埃姆登”号悬挂日本国旗；英国突击队在1942年袭击法国圣纳泽尔港的德国船坞时，“坎贝尔城”号驱逐舰上悬挂的是美国国旗。

至于交战国的商船，英国和法国等一些国家认为，悬挂中立国船旗是古老的惯例，其目的是逃避拿捕。但是这种观点遭到了德国、美国、荷兰和北欧等国家的反对。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商船经常悬挂中立国的国旗，目的是迫使德国潜艇在拿捕和击沉船舶前浮上海面进行登船检查、来核实船只的真正国籍。1915年2月被击沉的“卢西塔尼亚”号邮船在它被击沉前的最后一次跨大西洋航行中，就是悬挂着美国国旗从纽约返回利物浦的。但是各个中立国通常反对这一观点。1941年11月6日，美国海军轻巡洋舰“奥马哈”号在赤道大西洋拿捕了悬挂美国船旗偷越封锁的德国商船“奥登瓦尔德”号，将其带往波多黎各的圣胡安实行扣押，当时美国为中立国。

其次是挂着假船旗的交战状态。悬挂假船旗进行交战是被海事法所命令禁止的，英法等国早在1696年和1704年就针对军舰和私掠船发出过禁止悬挂假船旗交战的命令。法国海军战斗条令中也禁止法国军舰（*潜艇除外*）在任何情况下不挂法国船旗而投入战斗。在前面举过的“埃姆登”号的例子中，当它冲进槟榔屿港、炮击俄国巡洋舰“珍珠”号之前，就降下了日本船旗，升起了德国海军旗。在黄海海战中，攻击北洋舰队的日本联合舰队在投入战斗之前也降下了美国国旗，升起日本海军旗。1942年炸毁圣纳泽尔船坞的那艘英国驱逐舰也是这样做的。与此相反，德国袭击舰“斯佩伯爵”号于1939年10月12日在南非外海击沉英国货轮时，悬挂的却是法国国旗，构成了对战争法则的破坏。当然，这种破坏交战规则的行为，只有在当事人所属的国家（*比如说德国*）战败之后，才有可能得到起诉和定罪。

◎宣誓后的释放

被“海鹰”号俘获的第二艘英国商船“隆迪岛”的船长是在被德国辅助巡洋舰拿捕后经过宣誓而获得释放的。根据1907年海牙第四公约，战俘可以通过承诺不再参加作战活动的宣誓而得到释放。任何战俘经过宣誓释放后，如果又持武器对曾向之作出荣誉宣誓的政府或其盟国作战，并再次被俘时，即丧失战俘待遇、并可送交法庭。但是该公约同时还规定了战俘不得被强迫接受强制释放；同理，战俘的看管国也没有义务一定要接受战俘的宣誓并将其释放。

宣誓释放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方式，可以追溯到罗马与迦太基战争的时期。在十九世纪的历次战争当中，这种释放俘虏的方式很常见，美国内战中，南军和北军甚至在1862年7月签署了通过宣誓方式释放并彼此交换战俘的协议。在二十世纪初的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方式也经常得到使用，比如说俄国就曾经对其俘虏的奥匈帝国斯拉夫战俘采取过宣誓后释放的方式。

但是到更加具有总体战特征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这种做法就已经比较少见了。在二战中宣誓释放俘虏的一个典型例子是，1942年吕宋岛的菲律宾战俘经日本占领军同意后，凭其不再参加作战活动的宣誓而获得释放。另一个例子是1943年在西西里岛的意大利战俘经英国同意，凭其宣誓获得释放。在1940年，苏联曾规定在波兰领土上俘虏的捷克斯洛伐克战俘在宣誓不参加反对苏联的战争之后可以得到释放。此外在朝鲜战争中，韩国及联合国军方面也采取过宣誓后释放的方式。

有关战俘地位的1949年第三次日内瓦公约第21条承认宣誓释放的做法，只要它为战俘所属国家的法律允许，以及有利于战俘健康状况的改善。按照我国有关军事法律的规定，不允许中国军人采取向俘虏国宣誓不参加战斗的方式获得释放。美国军法也禁止士兵采取宣誓的方式获得释放，



1940年1月21日下午，英国海军轻巡洋舰“利物浦”号在距日本千叶县野岛崎35海里的公海上拦截了从旧金山返回横滨的日本邮船“浅间丸”号，并带走了船上搭载的21名德国乘客，令日本国内愤慨舆论大哗，日本的反动统治势力不顾交战国军舰有临检权、且日本军舰曾多次在中国海域对外国船只进行临检的实施，趁机在国民当中大肆进行反英美的“爱国主义”宣传，以逞一时之快感


被英国海军临检组从“浅间丸”号上带走的德国乘客

1955 年、1977 年和1988 年历次颁布的美国陆军军人准则中都有“我不接受敌人的宣誓释放及其他特殊优待”的誓词（I will accept neither parole nor special favours from the enemy）。

◎临检与拿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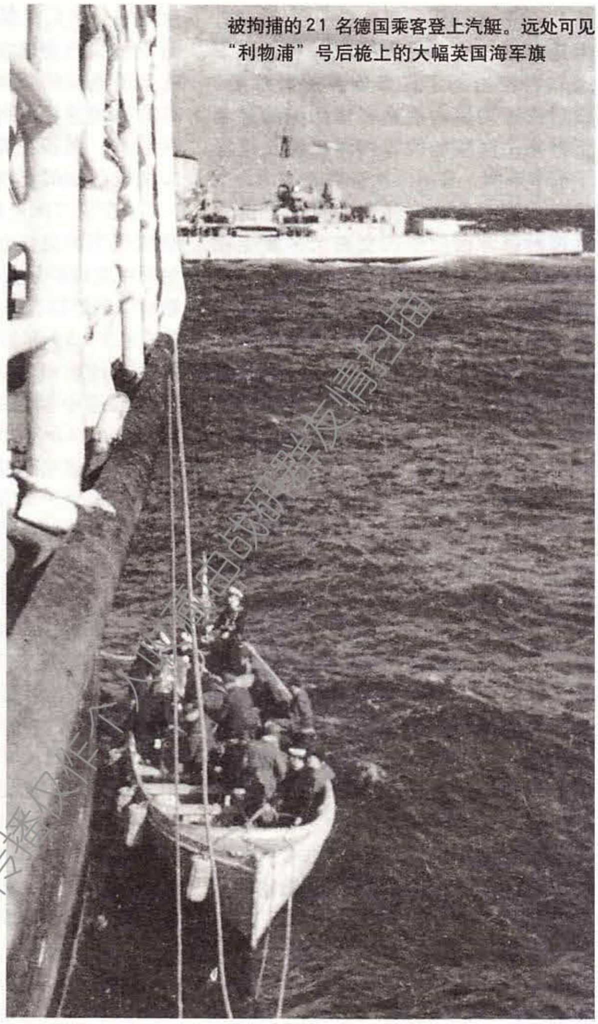
“海鹰”号的前身“巴尔马哈通道”号是在运送棉花前往英国的盟友——俄国的途中，被英国海军拦截并拿捕，随后在前往英国进行进一步临检途中被德国拿捕的。

“临检”是指由一艘军舰的军官在商船上所执行的检查行为，包括检查船舶证件、检查货物、盘问船员和乘客，其目的是确定船舶的路线、乘客的国籍和旅行目的、以及该船可能犯有的违反中立规则的情况等等。交战国军舰在公海上可以对任何商船实行临检，临检的对象既可能是中立国的船只，也有可能是本国的船只（尤其是在船旗、船名、船型等方面发现可疑迹象、或者该船出现在受限制区域的情况下）。至于对可以分辨的敌国船只，则直接行使拿捕权。在临检中发现的搭载违禁货物的中立国船只，或者直接为敌对交战国服务的船只，实施临检的军舰有权对其进行拿捕、捕获或直接击沉。

至于“拿捕”，则是海战当中军舰和私掠船的一项古老权利。商船不能对另一艘商船实施拿捕，陆军或者警察也不能对一艘停泊在港口中的商船实行拿捕（类似的情况叫做扣押）。实际上“拿捕”这个名词是针对船只本身的，对于船上的商品和货物，则使用“扣押”这一法律术语。

被拿捕的船只不同于被没收的船只。按照海上交战法则的规定，在战争结束后，对于拿捕的敌国和中立国船只要予以归还（但不予以赔偿），或者不予以归还、但要给予补偿。至于被拿捕的船只是否应当归还给原来的主人，则取决于拿捕国的捕获法庭的裁决。至于被没收的船只，通常是不予以归还的（比如被俘获的军舰。但是没收国战败之后，其原所有国可以对其重新行使没收权。以简单的例子来说，甲午海战后被日本海军没收的“镇远”号军舰，在马关条约签订后是不归还的；但二战后日本战败，中国对“镇远”号的遗留物——主锚和弹丸——重新行使了没收权）。

拿捕权的另一个原则是“排除公有船舶”。首先，对军舰以及改装为辅助巡洋舰的商船不能行使拿捕权，但对武装商船可以行使。1920 年7 月26 日，法国捕获法庭就对搁浅在法属社会群岛的“海鹰”号残骸所有权作出裁决，“按照法国的传统原则，海上捕获制度只适用于商船”。因此法国当局对于“海鹰”号残骸所有权应当适用的不是拿捕权法则，而是战利品法则。后一项法则针对的是公有财产。其次，国有船舶也应当免于拿捕，但是这一原则只适用于从事公共事业的船舶（灯塔船、挖泥船、沿海救生船等等），而不适用于从事商业活动的船舶。


被拘捕的21 名德国乘客登上汽艇。远处可见“利物浦”号后桅上的大幅英国海军旗

有几类船舶是免于拿捕的：第一是邮政船（这类船只的分级在20 世纪已经取消了）。第二是渔船，但是只包括沿海渔船。这种豁免来自基于人道考虑的古老习惯。但是远洋渔船、捕鲸船和在公海上从事渔业作业的船只，甚至在沿海捕鱼同时从事其他商业活动的船只，都不能免于拿捕。第三，负有宗教、慈善或科学考察使命的船只也不得被拿捕。其中负有宗教使命的船只如今已经很少见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罗马教廷曾经向比利时、阿根廷和哥伦比亚派出大使，这些教廷大使们乘坐一艘西班牙船，悬挂教皇国旗，德国海军许诺给予该船豁免。负有慈善使命的船只包括从战区撤退难民或者运送粮食等人道主义援助的船只。最后，对负有科学考察使命的船只也实行豁免，比如说英国政府在1756 年向法国探险家布干维尔颁发了安全通行证，二十年后法国政府也宣布对英国航海家库克船长的两艘科学考察船不予攻击和拿捕。

最后，医院船在执行救助使命时免受攻击和拿捕，这

是1907年海牙第十公约明确规定的。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海军未加警告击沉了许多艘英国医院船，战后德国的国内法庭在协约国的要求下对攻击医院船的德国潜艇艇长进行了刑事审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双方都有攻击医院船的行为，其中盟国对德意医院船的攻击大多发生在轰炸港口时，因此被判定为过失；美国海军击沉了日本的“阿波丸”号医院船，但该船被日本军方用来偷运军人和战争物资，是违反国际公法的行为。此外美国海军还拿捕过好几艘运载日本士兵的医院船。日本则拿捕过荷兰的一艘医院船。

一般来说，交战国对一艘中立国商船实行拿捕的重要原因是运送战时禁制品。1940年3月，苏联货船“色楞格”号和“马雅可夫斯基”号就在太平洋上受到了英国军舰的临检，这两艘船由于向符拉迪沃斯托克运送战时禁制品（中国钨矿砂）而被拿捕——英国此举是为了阻止禁运物资从英国海军所称的“符拉迪沃斯托克缺口”运往德国。这批钨砂由于没有苏联国内的最终收货人文件而被认为是运往德国的。在日俄战争期间，俄国海军也对8艘中立国船只——5艘英国船、2艘德国船和1艘丹麦船——实行了拿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军（特别是临检行为最多的英国海军）对载有货物的船只的临检很少是在海上当场进行的，这是因为当时已经出现了潜艇从水下发动进攻的危险。对于英国来说，通常的做法是下令被拦截的船只改变航线，在拿捕者的带领下驶往一个受英国控制的地点——最常用和最著名的一个是奥克尼群岛的柯克沃尔湾——然后在那里做进一步的临检。对于被临检货船在港口内或长或短地耽搁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在前往临检目的地港途中意外受损的船只，英国海军是一概拒绝赔偿的，并且受到英国捕获法庭的支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海军继续使用柯克沃尔和其他一些海军基地对中立国船只实行临检，但是“不予赔偿”的原则有些松动。虽然英国捕获法庭在1939年拒绝了一艘挪威货船的船主在这艘船从法罗群岛被带到柯克沃尔的途中搁浅而提出的索赔要求，但是在1940年却赔偿了一艘南斯拉夫货船由于被带到直布罗陀进行临检而给船主带来的耽搁损失。英国捕获法院认为这种耽搁属于国家责任，判定由国家对请求人给予赔偿。

就“海鹰”号这件事来说，它被英国皇家海军宣布拿捕的原因还牵涉到了海上战时法则中的另外一个话题：战时禁制品。禁制品即禁运物资，它来自意大利语contrabbando（字面意义是违反通告、违反命令），指的是一旦由中立国发往或运送给某一交战过，就必然违背其所承担的中立义务、并因此可以被合法拿捕和没收的货物。运载战时禁制品的船舶可以没收，是各国捕获法庭公认的一项近代国际法规则。

战时禁制品可以分为绝对禁制品和有条件禁制品两类。前者是指专门用于军事用途的物品，包括武器、弹药、可以用于战争的马匹和服装、挽马索、马刀、扎营设备、桅杆用木材、缆绳、装甲钢板、军舰、飞机及发动机等等。至于有条件禁制品，则是指既可以供战争之用，又可以供和平时期使用的物品。当这些物品将被提供给敌人的军队或政府部门使用时，就要遭到没收。这一类货物包括粮食、饲料、贵重金属、纸币、铁路器材、民用船舶、望远镜、精密计时器、马蹄铁、马鞍、铁丝网、煤、燃料油和润滑油等等。

有条件禁制品的名单不是一成不变的。在日俄战争中，俄国宣布煤和酒精、石脑油一样是绝对禁制品，而在一战中英国宣布各种燃料都是有条件禁制品，但矿物润滑油例外，它由于可以用于飞机和潜艇发动机而被宣布为绝对禁制品。德国则将煤、焦炭和矿物油列为绝对禁制品，其他燃料为有条件禁制品。至于金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被看作是有条件禁制品，但在1916年之后被各交战国列为绝对禁制品，二战中也是如此。

至于“海鹰”号前身“巴尔马哈”号运送的棉花，它一开始并不被各国视为战时禁制品。1904年，俄国首度宣布棉花为有条件禁制品，并且拿捕了两艘向日本运载棉花的英国商船，为此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抗议。而在1914年到1918年的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棉花都被交战双方视为绝对禁制品。橡胶的情况也与此相似。

尽管中立国经常提出抗议，但是制订战时禁制品清单的权力属于交战国的权限范围。在一战中，随着交战国通过不同方法力图加强对中立国贸易的控制，因此战时禁制品的名单越来越长。1916年，德国将水果、糖果和调味品都列入“粮食”类，而英国将纸张、矿石、钟表列为临时禁制品。到1918年1月，在可以自由运输的物资清单上只剩下了时装、艺术品和儿童玩具了，交战国倾向于全面禁止中立国与敌国的所有贸易。英国在1917年7月宣布的最后一次战时禁制品名单竟然占了《伦敦公报》的整整两页篇幅；意大利在1915年参战时宣布了37项绝对禁制品和13项有条件禁制品，到战争结束时已经分别增加到191项和28项。当然，这种清单中难免有一些荒谬的地方，比如在德国的战时禁制品名单中，鲱鱼和虾被列为禁制品，而牡蛎和淡菜却不是；藤编椅子和空的装酒木桶是禁制品，而纸张却不是。法国把软木、肥皂、石灰、亚麻、丝绸、鞣皮剂都列为绝对禁制品，而酪蛋白、酵母、海绵、各种藻类和亚麻油毡都成了有条件禁制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交战国不



“海鹰”号1917年的状态

再像上一次战争那样详细列举禁制品每一类别中的每一项物品，而是使用含义很广的概括性用语，而让捕获法庭的法官去判断哪些是可以被敌国使用的禁运物资。这就是英国在1939年9月公布禁制品清单时的做法，当时遭到了苏联、意大利、荷兰、挪威等中立国的广泛抗议。德国在1939年8月28日颁布的捕获法令中，也只是笼统地宣布"直接供给陆海空军所用的物品和材料"为绝对禁制品，而没有列出具体的名单。

为了躲避直接的战时海上封锁，交战国采用通过邻近的中立国转口的方法，从而使得海上禁运变得更加复杂了。海军在实施临检或拿捕时，要采取一些更复杂的措施来判断货物是否运往敌国。其中一个判断依据是，货物发往某些经常充当敌人转口站的中立国港口。例如在1940年法国投降前，英法海军将安特卫普、鹿特丹、哥本哈根、挪威卑尔根、瑞典马尔默、西班牙毕尔巴鄂和意大利的所有港口都视为这一类港口。

另外，在与敌国相邻的中立国进口货物不正常地增加时，发往这些中立国的相关货物可以被认为是转往敌国的，可以实行拿捕。这种现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一开始就显露出来了，在1914年11月仅仅一个月中，美国出口到丹麦的货物增长了4倍，出口到挪威的增长了5倍，出口到瑞典的增加了9倍。在这个月，美国出口到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咸肉相当于1913年同期的60多倍；1914年美国出口的棉花与1913年相比，对丹麦增加了3倍，对荷兰增加了5倍，对挪威增加了13倍。

同样的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重新出现，特别是在德国与苏联之间。根据1939年8月19日、1940年2月11日和1941年1月10日订立的苏德贸易协定，在一年之中，苏联向德国提供了90万吨石油、50万吨铁矿石、30万吨废钢铁、10万吨棉花等等。1941年4月，苏联向德国交付了208000吨小麦、9万吨石油、8300吨棉花、6340吨有色金属和2000吨橡胶。同时，英国海军也注意到美国向苏联出口的货物不正常地增加了。正是因为这一原因，英国海军加强了对"符拉迪沃斯托克缺口"的封锁，并据此拿捕了两艘苏联货船。

英国海军是在检查了"巴尔马哈通道"号的航行日志后将其拿捕的。原来，在1915年3月15日，这艘货船曾经载着1500吨棉花在大雾中搁浅，搁浅的位置是德国北弗里西亚群岛中的叙尔特岛（Sylt）。3月20日，这艘船被德国海事救助部门重新浮起，拖往德国的不来梅港，在那里卸下了三分之二的货物。这些都记录在"巴尔马哈"号的航海日志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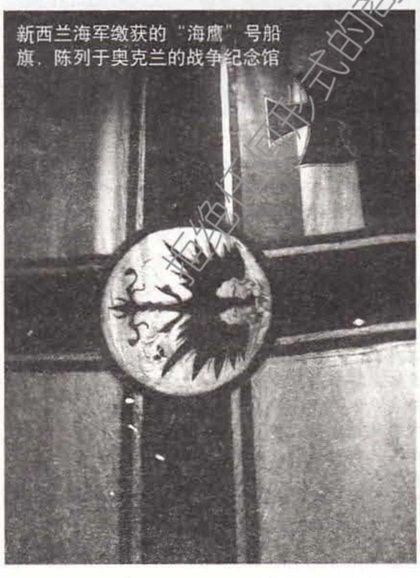
在1856年的巴黎宣言中，曾经规定了对中立国有利的原则，即"船旗保护货物"：敌货装在敌船上，可以拿捕；中立货装在中立船上，不能拿捕；敌货装在中立船上，不能拿捕（船旗保护货物）；中立货装在敌船上，船可以拿捕，但货物应受到尊重（船旗不致没收货物）。但是这一原则被英国有保留地接受，而在1915年英国枢密院颁布的法令正式推翻了这一原则，宣布货物与船舶同一命运。这就是海上捕获法的一个重要原则，即敌国货物的"敌性"可以传染给中立国船只，并"传染"给同一艘船上的其他"无害"货物。但是这种"传染"是有时效性的，不能在船舶返航时进行，不能以船舶先前进行过、但现在已结束的偷运禁制品行为作为拿捕理由（但是欺诈行为——比如伪造航海日志——除外）。

英国海军在对"巴尔马哈通道"号实施临检时，根据其航海日志的内容认为该船由于3月份在不来梅港的卸货活动而构成了破坏中立、偷运战时禁制品的行为，因此英国海军有理由认为它在7月份搭运的这批棉花也是运往德国的，并将其拿捕（简言之，拿捕的原因不是曾经向德国运棉花，而是怀疑这次又向德国运棉花）。至于在前往英国途中德国潜艇对其实施的第二次拿捕，由于当时该船已经被英国海军控制，而且船上装载的货物是运往德国的敌对国——俄国的战时禁运物资，因此也构成有效的拿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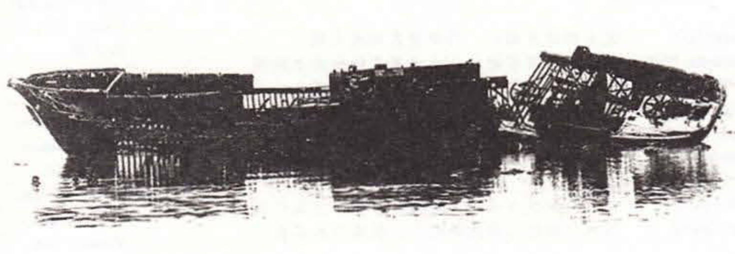
新西兰海军1918年在莫比利阿环礁拍摄到的"海鹰"号残骸



新西兰海军缴获的"海鹰"号船旗，陈列于奥克兰的战争纪念馆



美国海军拍摄的"海鹰"号残骸1939年状态



战研数据库 WHS Database

说明：战争史研究从本辑起将不定期推出《战研数据库》栏目，以图表形式介绍各国陆海空军数据资料，目前推出美国海军数据系列，包括美国1950－2010年援外舰船一览、美国各造船厂历年建造军舰一览、美国海军1776－2010年各级军舰建造数据一览等数据，本期为美国1950－2010年援外舰船一览的第一部分，今后还将陆续登出美国援外潜艇、两栖战舰船、小型作战舰艇和军用辅助舰船数据

美国海军1950–2010年援外舰船一览（一）：水面战斗舰艇

美国海军舷号及舰名		舰级	建造厂	接收方	新舰名	新舷号	移交年份	附注
CL–40	Brooklyn	布鲁克林	Consolidated Steel	智利	O'Higgins	C–02	1951	1992年解体
CL–41	Philadelphia	布鲁克林	Philadelphia NSY	巴西	Barroso	C–11	1951	1974年解体
CL–43	Nashville	布鲁克林	New York Ship	智利	Capitan Prat	C–03	1951	1985年解体
CL–46	Phoenix	布鲁克林	New York Ship	阿根廷	Diecisiete de Octobre	C–4	1951	贝尔格拉诺将军号，1982击沉
CL–49	St. Louis	布鲁克林	Newport News	巴西	Tamandere	C–12	1951	1980年解体
CVL–24	Belleau Wood	独立	New York Ship	法国	Bois Belleau	R 97	1953	1960年解体
CVL–27	Langley	独立	New York Ship	法国	Lafayette	R 96	1951	1964年解体
CVL–28	Cabot	独立	New York Ship	西班牙	Dedalo	R 01	1967	2002年解体
DD–421	Benson	本森	Beth Quincy	中国台湾	洛阳		1954	1974年退役
DD–427	Hilary Jones	本森	Charleston NSY	中国台湾	朝阳		1954	1974年退役
DD–430	Eberle	格里夫斯	Bath Iron Works	希腊	Niki	D–65	1951	1972年退役
DD–431	Plunket	格里夫斯	Federal SB	中国台湾	南阳		1959	1975年退役
DD–438	Ludlow	格里夫斯	Bath Iron Works	希腊	Doxa	D–20	1951	1972年退役
DD–442	Nicholson	格里夫斯	Boston NSY	意大利	Aviere	D–554	1951	1977年作为靶舰击沉
DD–454	Ellyson	格里夫斯	Federal SB	日本	朝风		1954	1969年解体
DD–456	Rodman	格里夫斯	Federal SB	中国台湾	咸阳		1955	1976年沉没



阿根廷海军"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原"菲尼克斯"号



法国海军"贝劳森林"号航母，原"贝劳伍德"号

舰种代号

CVL：轻型航母
CL：轻巡洋舰
DD：驱逐舰
DDG：导弹驱逐舰
DE：护航驱逐舰／护卫舰
FFG：导弹护卫舰

Boston NSY	波士顿海军船厂，马萨诸塞州波士顿
Charleston NSY	查尔斯顿海军船厂，南卡罗来纳州查尔斯顿
Norfolk NSY	诺福克海军船厂，弗吉尼亚州诺福克
Philadelphia NSY	费城海军船厂，宾夕法尼亚州费城
Puget Sound NSY	普吉特湾海军船厂，华盛顿州布雷默顿
Avondale	艾文戴尔船厂，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
Bath Iron Works	巴思铁工厂，缅因州巴思
Beth Hingham	伯利恒钢铁公司欣汉姆船厂，马萨诸塞州欣汉姆
Beth Quincy	伯利恒钢铁公司昆西船厂，新泽西州昆西
Beth S.F.	伯利恒钢铁公司旧金山船厂，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
Beth S.I.	伯利恒钢铁公司斯塔滕岛船厂，纽约州斯塔滕岛
Beth S.P.	伯利恒钢铁公司斯帕罗角船厂，马里兰州斯帕罗角
Brown SB	布朗造船公司，得克萨斯州休斯敦
Consolidated Steel	统一钢铁公司，得克萨斯州奥兰治
Defoe SB	德福船厂，密歇根州海湾城
Dravo Pittsburgh	德拉沃公司，宾夕法尼亚州匹茨堡
Federal SB	联邦船厂，新泽西州纽瓦克湾
Gulf SB	海湾船厂，亚拉巴马州奇克索
Ingalls SB	英格尔斯船厂，密西西比州帕斯卡戈拉
Lockheed SB	洛克希德船厂，华盛顿州西雅图
New York Ship	纽约造船公司，新泽西州昆西
Newport News	纽波特纽斯船厂，弗吉尼亚州纽波特纽斯
Tampa SB	坦帕船厂，佛罗里达州坦帕
Todd San Pedro	托德公司圣佩德罗船厂，加利福尼亚州圣佩德罗
Todd Seattle	托德公司西雅图船厂，华盛顿州西雅图
Western Pipe	西方制管公司，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圣佩德罗

拒绝任何形式商业用途与QQ群传播仅作个人收藏由战研群友情扫描

美国海军舷号及舰名	舰级	建造厂	接收方	新舰名	新舷号	移交年份	附注
DD-458 Macomb	格里夫斯	Bath Iron Works	日本	旗风		1954	1970 年转交台湾↓
DD-458 Macomb	格里夫斯	Bath Iron Works	中国台湾	咸阳(II)		1970	退役
DD-460 Woodworth	格里夫斯	Beth S.F.	意大利	Artigliere	D-553	1951	1971 年退役
DD-468 Taylor	格里夫斯	Bath Iron Works	意大利	Lanciere		1969	1971 年退役
DD-472 Guest	格里夫斯	Boston NSY	巴西	Para	D-27	1973	1978 年退役
DD-473 Bennett	格里夫斯	Boston NSY	巴西	Paraiba	D-28	1973	1978 年退役
DD-484 Buchanan	格里夫斯	Federal SB	土耳其	Gelibolu	D-346	1949	1976 年退役
DD-486 Lansdowne	格里夫斯	Federal SB	土耳其	Gaziantep	D-344	1949	1973 年退役
DD-487 Lardner	格里夫斯	Federal SB	土耳其	Gemlik	D-347	1949	1981 年退役
DD-488 McCalla	格里夫斯	Federal SB	土耳其	Giresun	D-345	1949	1971 年退役
DD-500 Ringgold	弗莱彻	Federal SB	西德	Zerstorer 2	D-171	1959	1981 年转交希腊↓
DD-500 Ringgold	弗莱彻	Federal SB	希腊	Kimon	D-42	1981	1993 年解体
DD-509 Converse	弗莱彻	Bath Iron Works	西班牙	Alm. Valdes	D-23	1959	1988 年解体
DD-513 Terry	弗莱彻	Bath Iron Works	秘鲁			1974	零配件用
DD-515 Anthony	弗莱彻	Bath Iron Works	西德	Zerstorer 1	D-170	1958	1979 作为靶舰击沉
DD-516 Wadsworth	弗莱彻	Bath Iron Works	西德	Zerstorer 3	D-172	1958	退役
DD-517 Walker	弗莱彻	Bath Iron Works	意大利	Fante	D-561	1964	1977 年退役
DD-520 Isherwood	弗莱彻	Beth S.I.	秘鲁	Guise	D-72	1961	1981 年退役
DD-521 Kimberly	弗莱彻	Beth S.I.	中国台湾	安阳	D-997	1967	1994 年退役
DD-528 Mullany	弗莱彻	Beth S.F.	中国台湾	庆阳	D-947	1971	1994 年退役
DD-532 Heerman	弗莱彻	Beth S.F.	阿根廷	Brown	D-20	1961	1982 年退役
DD-540 Twining	弗莱彻	Beth S.F.	中国台湾	贵阳	D-956	1971	1994 年退役
DD-541 Yarnall	弗莱彻	Beth S.F.	中国台湾	昆阳	D-934	1968	1994 年退役
DD-544 Boyd	弗莱彻	Beth S.P.	土耳其	Iskenderun	D-343	1969	1981 年退役
DD-545 Bradford	弗莱彻	Beth S.P.	希腊	Thyella	D-28	1962	1981 年退役
DD-546 Brown	弗莱彻	Beth S.P.	希腊	Navarinon	D-63	1962	1981 年退役
DD-547 Cowell	弗莱彻	Beth S.P.	阿根廷	Almirante Storni	D-24	1971	1982 年退役
DD-550 Capps	弗莱彻	Gulf SB	西班牙	Lepanto	D-21	1957	1985 年解体
DD-551 David W. Taylor	弗莱彻	Gulf SB	西班牙	Alm. Ferrandiz	D-22	1957	1987 年解体
DD-556 Hailey	弗莱彻	Todd Seattle	巴西	Pernambuco	D-30	1961	1982 作为靶舰击沉
DD-561 Pritchett	弗莱彻	Todd Seattle	意大利	Geniere	D-555	1970	1975 年退役
DD-569 Aulick	弗莱彻	Consolidated Steel	希腊	Sfendoni	D-85	1959	1981 年退役


日本海军“有明”号驱逐舰，原 DD-663“爱德华兹”号



韩国海军“忠武”号驱逐舰，原 DD-631“厄尔本”号



原美国海军 DD-570“查尔斯·奥斯本”号驱逐舰，战后移交给西德海军，改名为第 6 号驱逐舰

美国海军舷号及舰名		舰级	建造厂	接收方	新舰名	新舷号	移交年份	附注
DD-570	Charles Ausburne	弗莱彻	Consolidated Steel	西德	Zerstorer 6	D-175	1960	1968 年解体
DD-571	Claxton	弗莱彻	Consolidated Steel	西德	Zerstorer 4	D-173	1960	1981 年转希腊↓
DD-571	Claxton	弗莱彻	Consolidated Steel	希腊			1981	零配件用
DD-572	Dyson	弗莱彻	Consolidated Steel	西德	Zerstorer 5	D-174	1960	1982 年转希腊↓
DD-572	Dyson	弗莱彻	Consolidated Steel	希腊			1982	零配件用
DD-573	Harrison	弗莱彻	Consolidated Steel	墨西哥	Cuauhtemoc	E-01	1968	1982 年解体
DD-574	John Rodgers	弗莱彻	Consolidated Steel	墨西哥	Cuitlahuoc	E-02	1968	2001 年退役
DD-581	Charette	弗莱彻	Boston NSY	希腊	Velos	D-16	1959	1981 年退役
DD-582	Conner	弗莱彻	Boston NSY	希腊	Aspis	D-06	1959	1991 年退役
DD-583	Hall	弗莱彻	Boston NSY	希腊	Lonchi	D-56	1960	1990 年退役
DD-596	Shields	弗莱彻	Puget Sound NSY	巴西	Maranhao	D-33	1972	1990 年退役
DD-630	Braine	弗莱彻	Bath Iron Works	阿根廷	Almirante Domecq	D-23	1971	1983 作为靶舰击沉
DD-631	Erben	弗莱彻	Bath Iron Works	韩国	忠武	D-911	1963	1989 年改训练用船壳
DD-642	Hale	弗莱彻	Bath Iron Works	哥伦比亚	Antioquia	D-01	1960	1973 年退役
DD-644	Stembel	弗莱彻	Bath Iron Works	阿根廷	Rosales	D-22	1961	1982 年退役
DD-651	Cogswell	弗莱彻	Bath Iron Works	土耳其	Izmit	D-342	1969	1980 年退役
DD-656	Van Valkenburgh	弗莱彻	Gulf SB	土耳其	Izmir	D-341	1967	1987 年退役
DD-657	Charles J. Badger	弗莱彻	Beth S.I.	智利			1974	零配件用
DD-663	Heywood L. Edwards	弗莱彻	Boston NSY	日本	有明	DD-183	1959	1976 年解体
DD-664	Richard P. Leary	弗莱彻	Boston NSY	日本	夕暮	DD-184	1959	1976 年解体
DD-668	Clarence K. Bronson	弗莱彻	Federal SB	土耳其	Istanbul	D-340	1967	1987 年退役
DD-670	Dortch	弗莱彻	Federal SB	阿根廷	Espora	D-21	1961	1977 年退役
DD-673	Hickox	弗莱彻	Federal SB	韩国	釜山	D-913	1968	1989 年退役
DD-675	Lewis Hancock	弗莱彻	Federal SB	巴西	Piaui	D-31	1967	1989 年退役
DD-678	McGowan	弗莱彻	Federal SB	西班牙	Jorge Juan	D-25	1960	1988 年解体
DD-686	Halsey Powell	弗莱彻	Beth S.I.	韩国	首尔		1968	1982 年解体
DD-689	Wadleigh	弗莱彻	Bath Iron Works	智利	Blanco Encalada	D-14	1962	1983 年退役
DD-694	Ingraham	萨姆纳	Federal SB	希腊	Miaoulis	D-211	1971	1992 年退役
DD-696	English	萨姆纳	Federal SB	中国台湾	惠阳	D-972	1970	1999 年退役
DD-697	Charles S. Sperry	萨姆纳	Federal SB	智利	Ministro Zenteno	D-16	1973	1990 年退役
DD-699	Waldron	萨姆纳	Federal SB	哥伦比亚	Santander	D-03	1973	1986 年退役
DD-700	Haynsworth	萨姆纳	Federal SB	中国台湾	岳阳	D-944	1970	1999 年退役
DD-702	Hank	萨姆纳	Federal SB	阿根廷	Segui	D-25	1972	1983 年退役
DD-703	Wallace L. Lind	萨姆纳	Federal SB	韩国	大邱	D-917	1973	1996 年退役
DD-704	Borie	萨姆纳	Federal SB	阿根廷	Hipolito Bouchard	D-26	1972	1984 年退役
DD-705	Compton	萨姆纳	Federal SB	巴西	Matto Grosso	D-34	1972	1990 年退役
DD-709	Hugh Purvis	萨姆纳	Federal SB	土耳其	Zafer	D-356	1972	1994 年解体



左：DD-718“汉姆纳”号移交给中国台湾海军后改名为朝阳号，2005年在台湾屏东作为靶舰被“海虎”号潜艇击沉。台湾海军前一代“朝阳”号为DD-427“哈里·琼斯”号，1954年移交台湾当局



日本海军“夕暮”号驱逐舰，原DD-664“利瑞”号

美国海军舷号及舰名		舰级	建造厂	接收方	新舰名	新舷号	移交年份	附注
DD–711	Eugene A. Greene	基林	Federal SB	西班牙	Churruca	D–61	1972	1989 年解体
DD–713	Kenneth D. Bailey	基林	Federal SB	伊朗			1975	零配件用
DD–714	William R. Rush	基林	Federal SB	韩国	江原	D–922	1978	1995 年转菲律宾↓
DD–714	William R. Rush	基林	Federal SB	菲律宾			1995	零配件用
DD–716	Wiltsie	基林	Federal SB	巴基斯坦	Tariq	D–165	1980	1990 年退役
DD–718	Hamner	基林	Federal SB	中国台湾	朝阳		1980	2005 年作为靶舰击沉
DD–719	Epperson	基林	Federal SB	巴基斯坦	Taimur	D–166	1980	1990 年退役
DD–727	Dehaven	萨姆纳	Bath Iron Works	韩国	仁川	D–918	1973	1993 年退役
DD–728	Mansfield	萨姆纳	Bath Iron Works	阿根廷			1974	零配件用
DD–729	Lyman K. Swenson	萨姆纳	Bath Iron Works	中国台湾			1974	零配件用
DD–730	Collett	萨姆纳	Bath Iron Works	阿根廷	Piedra Buena	D–29	1974	1984 年退役
DD–731	Maddox	萨姆纳	Bath Iron Works	中国台湾	鄱阳	D–928	1972	1985 年退役
DD–742	Frank Knox	基林	Bath Iron Works	希腊	Themistocles	D–210	1971	1992 年退役
DD–745	Brush	萨姆纳	Beth S.I.	中国台湾	咸阳(Ⅲ)	D–986	1969	1984 年退役
DD–746	Taussig	萨姆纳	Beth S.I.	中国台湾	洛阳	D–949	1974	2000 年退役
DD–747	Samuel N. Moore	萨姆纳	Beth S.I.	中国台湾	衡阳	D–876	1969	1995 年退役
DD–755	John A. Bole	萨姆纳	Beth S.I.	中国台湾			1974	零配件用
DD–756	Beatty	萨姆纳	Beth S.I.	委内瑞拉	Carabobo	D–21	1972	1981 年退役
DD–758	Strong	萨姆纳	Beth S.F.	巴西	Rio Grande do Norte	D–37	1973	1995 年退役
DD–759	Lofberg	萨姆纳	Beth S.F.	中国台湾			1974	零配件用
DD–760	John W. Thomason	萨姆纳	Beth S.F.	中国台湾	南阳(Ⅱ)	D–954	1974	现役
DD–761	Buck	萨姆纳	Beth S.F.	巴西	Alagoas	D–36	1973	1995 年退役
DD–764	Lloyd Thomas	基林	Beth S.F.	中国台湾	当阳	D–966	1972	1999 年退役
DD–765	Keppler	基林	Beth S.F.	土耳其	Tinaztepe	D–355	1972	1984 年退役
DD–770	Lowry	萨姆纳	Beth S.P.	巴西	Espirito Santo	D–38	1973	1995 年退役
DD–772	Gwin	萨姆纳	Beth S.P.	土耳其	Muavenet	D–357	1971	1993 年退役
DD–775	Willard Keith	萨姆纳	Beth S.P.	哥伦比亚	Caldas	D–02	1972	1977 年退役
DD–776	James C. Owens	萨姆纳	Beth S.P.	巴西	Sergipe	D–35	1973	1995 年退役
DD–777	Zellars	萨姆纳	Todd Seattle	伊朗	Babr	D–61	1971	2005 年退役
DD–779	Douglas H. Fox	萨姆纳	Todd Seattle	智利	Ministro Portales	D–17	1973	1990 年退役
DD–780	Stormes	萨姆纳	Todd Seattle	伊朗	Palang	D–62	1972	2005 年退役
DD–781	Robert K. Huntington	萨姆纳	Todd Seattle	委内瑞拉	Falcon	D–22	1973	1981 年退役
DD–782	Rowan	基林	Todd Seattle	中国台湾	朝阳(Ⅱ)	D–916	1976	1977 年拖回途中搁浅
DD–783	Gurke	基林	Todd Seattle	希腊	Tombazis	D–215	1976	1994 年退役
DD–784	McKean	基林	Todd Seattle	土耳其			1981	零配件用
DD–785	Henderson	基林	Todd Seattle	巴基斯坦	Tughril/Nazim	D–156	1980	退役
DD–786	Richard B. Anderson	基林	Todd Seattle	中国台湾	开阳	D–915	1977	现役
DD–787	James B. Kyes	基林	Todd Seattle	中国台湾	建阳	D–921	1973	现役
DD–788	Hollister	基林	Todd Seattle	中国台湾	邵阳	D–928	1983	现役



中国台湾海军第三代咸阳号驱逐舰，原美国海军DD–745“布拉什”号。第一代“咸阳”号（DD–456）可谓灾星，1956年拖往台湾时在巴拿马运河与一艘哥伦比亚军舰相撞，舰尾受损；接着又在1957年参加演习时与僚舰相撞受损；最终于1969年在马祖触礁报废。台湾方面后来将日本归还给美国的同型退役驱逐舰“旗风”号（DD–458）接收过来，改名为咸阳，服役三年后草草退役，原咸阳号停泊于左营海军学校，七十年代拍摄电影《海军突击队》时作为扮演日军“出云”号巡洋舰的道具被炸毁，之后解体

拒绝任何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仅作个人收藏战研群友情扫描

美国海军舷号及舰名	舰级	建造厂	接收方	新舰名	新舷号	移交年份	附注
DD-789 Eversole	基林	Todd Seattle	土耳其	Gayret	D-352	1973	1995 年改博物馆舰
DD-790 Shelton	基林	Todd Seattle	中国台湾	莱阳	D-920	1973	1999 年退役
DD-794 Irwin	基林	Beth S.P.	巴西	Santa Caterina	D-32	1968	1978 年退役
DD-795 Preston	基林	Beth S.P.	土耳其	Icel	D-344	1969	1981 年退役
DD-796 Benham	基林	Beth S.I.	秘鲁	Villar	D-71	1960	1980 年退役
DD-797 Cushing	基林	Beth S.I.	巴西	Parana	D-29	1961	1982 年退役
DD-799 Jarvis	基林	Todd Seattle	西班牙	Alcala Galiano	D-24	1959	1988 年解体
DD-804 Rooks	基林	Todd Seattle	智利	Cochrane	D-15	1962	1983 年退役
DD-805 Chevalier	基林	Bath Iron Works	韩国	忠武(II)	D-915	1972	2000 年退役
DD-817 Corry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希腊	Kreizis	D-217	1981	1994 年退役
DD-818 New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韩国	大田	D-919	1976	2005 年退役
DD-819 Holder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厄瓜多尔	Presidente Eloy Alfaro	D-01	1978	1991 年退役
DD-821 Johnston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中国台湾	正阳	D-928	1981	现役
DD-822 Robert H. McCard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土耳其	Kilic Ali Pasa	D-349	1980	1988 年退役
DD-825 Carpenter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土耳其	Anitepe	D-347	1981	1997 年退役
DD-827 Robert A. Owens	基林	Bath Iron Works	土耳其	Alcitepe	D-346	1982	1998 年退役
DD-829 Myles C.Fox	基林	Bath Iron Works	希腊			1980	零配件用
DD-830 Everett F.Larson	基林	Bath Iron Works	韩国	庆北	D-916	1972	现役
DD-832 Hanson	基林	Bath Iron Works	中国台湾	辽阳	D-938	1973	现役
DD-833 Herbert J.Thomas	基林	Bath Iron Works	中国台湾	汉阳	D-978	1974	1999 年退役
DD-835 Charles P. Cecil	基林	Bath Iron Works	希腊	Apostolis	D-216	1979	1993 年退役
DD-837 Sarsfield	基林	Bath Iron Works	中国台湾	德阳	D-925	1977	现役
DD-838 Ernest G. Small	基林	Bath Iron Works	中国台湾	富阳	D-963	1970	现役
DD-839 Power	基林	Bath Iron Works	中国台湾	沈阳	D-932	1977	现役
DD-841 Noa	基林	Bath Iron Works	西班牙	Blas de Lezo	D-65	1973	1991 年解体
DD-842 Fiske	基林	Bath Iron Works	土耳其	Piyale Pasa	D-350	1980	1999 年退役
DD-843 Warrington	基林	Bath Iron Works	中国台湾			1973	零配件用
DD-849 Richard E. Kraus	基林	Bath Iron Works	韩国	光州	D-921	1977	2000 年退役
DD-851 Rupertus	基林	Beth Quincy	希腊	Kountouriotis	D-213	1973	1994 年退役
DD-852 Leonard F. Mason	基林	Beth Quincy	中国台湾	绥阳	D-981	1976	2000 年作人工鱼礁炸沉
DD-853 Charles H. Roan	基林	Beth Quincy	土耳其	Maresal Fevzi Cakmak		1973	1995 年解体
DD-857 Bristol	萨姆纳	Beth S.P.	中国台湾	华阳	D-988	1969	1993 年退役
DD-859 Norris	基林	Beth S.P.	土耳其	Kocatepe	D-354	1974	1993 年退役
DD-861 Harwood	基林	Beth S.P.	土耳其	Kocatepe	D-354	1971	1974 年沉没
DD-862 Vogelgesang	基林	Beth S.I.	墨西哥	Quetzalcoatl	D-101	1982	2002 年退役



左：DD-873 "霍金斯"号，台湾海军资阳舰，1995 年退役后将上层建筑及武器拆卸，安放在左营海军学校内充作教学道具



DDG-24 "瓦德尔"号，移交给希腊海军，改名"蒂米斯托克利斯"号，2002 年退役，2006 年作为武器试验靶舰被击沉

美国海军舷号及舰名		舰级	建造厂	接收方	新舰名	新舷号	移交年份	附注
DD–863	Steinaker	基林	Beth S.I.	墨西哥	Netzahualcoyote	D–102	1982	现役
DD–864	Harold J. Ellison	基林	Beth S.I.	巴基斯坦	Shah Jehan	D–164	1980	1994 年退役
DD–866	Cone	基林	Beth S.I.	巴基斯坦	Alamgir	D–160	1980	1998 年退役
DD–869	Arnold J. Isbell	基林	Beth S.I.	希腊	Sachtouris	D–214	1973	1993 年退役
DD–871	Damato	基林	Beth S.I.	巴基斯坦	Tippu Sultan	D–168	1980	1994 年退役
DD–872	Forrest Royal	基林	Beth S.I.	土耳其	Adatepe	D–353	1971	1994 年解体
DD–873	Hawkins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中国台湾	资阳	D–930	1979	1995 年退役
DD–875	Henry W. Tucker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巴西	Marcilio Diaz	D–25	1973	1995 年退役
DD–876	Rogers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韩国	Jeong Ju	D–925	1980	2000 年改博物馆舰
DD–877	Perkins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阿根廷	Comodoro Py	D–27	1973	1984 年退役
DD–879	Leary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西班牙	Langara	D–64	1973	1992 年解体
DD–880	Dyess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希腊			1981	零配件用
DD–881	Bordelon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伊朗			1977	零配件用
DD–882	Furse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西班牙	Gravina	D–62	1972	1991 年解体
DD–883	Newman K. Perry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韩国	京畿	D–923	1981	1998 年退役
DD–886	Orleck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土耳其	Yucetepe	D–345	1982	2010 年改博物馆舰
DD–887	Brinkley Bass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巴西	Mariz e Barros	D–26	1973	1995 年退役
DD–888	Stickell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希腊	Kanaris	D–212	1972	1994 年退役
DD–889	O'Hare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西班牙	Mendez Nunez	D–63	1973	1992 年解体
DD–890	Meredith	基林	Consolidated Steel	土耳其	Savastepe	D–347	1979	1995 年解体
DDG–15	Berkeley	亚当斯	New York Ship	希腊	Kimon	D–218	1992	2004 年退役
DDG–16	Joseph Strauss	亚当斯	New York Ship	希腊	Nearchos	D–219	1999	2004 年退役
DDG–18	Semmes	亚当斯	Avondale	希腊	Formion	D–220	1999	2002 年退役
DDG–20	Goldsborough	亚当斯	Puget Sound NSY	澳大利亚			1993	零配件用
DDG–23	Richard E. Byrd	亚当斯	Todd Seattle	希腊			1993	零配件用
DDG–24	Waddell	亚当斯	Todd Seattle	希腊	Themistokles	D–221	1999	2002 年退役
DDG–25		亚当斯	Defoe SB	澳大利亚	Perth	DDG–39	1965	1999 年退役
DDG–26		亚当斯	Defoe SB	澳大利亚	Hobart	DDG–40	1966	现役
DDG–27		亚当斯	Defoe SB	澳大利亚	Brisbane	DDG–41	1967	2000 年退役
DDG–28		亚当斯	Bath Iron Works	西德	Lutjens	D–185	1969	2004 年退役
DDG–29		亚当斯	Bath Iron Works	西德	Molders	D–186	1969	2003 年退役



右：台湾海军太康号和太平号护卫舰



停泊在苏澳海军基地的“马公”号（左，1805）“左营”号（右，1803）两舰，原分别为美国海军DD–996“钱德勒”号和DD–993“基德”号

美国海军舷号及舰名		舰级	建造厂	接收方	新舰名	新舷号	移交年份	附注
DDG-30		亚当斯	Bath Iron Works	西德	Rommel	D-187	1970	1999年退役
DDG-993	Kidd	基德	Ingalls SB	中国台湾	同德／左营	DDG-1803	2006	现役
DDG-994	Callaghan	基德	Ingalls SB	中国台湾	明德／苏澳	DDG-1802	2005	现役
DDG-995	Scott	基德	Ingalls SB	中国台湾	纪德／基隆	DDG-1801	2005	现役
DDG-996	Chandler	基德	Ingalls SB	中国台湾	武德／马公	DDG-1805	2006	现役
DE-6	Wyffels	埃瓦特	Boston NSY	中国台湾	太康	F-21	1949	1972年退役
DE-47	Decker	埃瓦特	Philadelphia NSY	中国台湾	太平		1945	1954年被击沉
DE-54	Daniel T. Griffin	巴克利	Beth Hingham	智利	Virgilio Uribe	DE-29	1966	1995年改训练舰
DE-60	Gantner	巴克利	Beth Hingham	中国台湾	文山	F-834	1966	1991年退役
DE-62	George W. Ingram	巴克利	Beth Hingham	中国台湾	冈山	F-323	1967	1978年退役
DE-69	Blessman	巴克利	Beth Hingham	中国台湾	钟山	F-845	1967	1997年退役
DE-70	Joseph E. Campbell	巴克利	Beth Hingham	智利	Riquelme	DE-28	1966	零配件用
DE-102	Thomas	坎农	Dravo Pittsburgh	中国台湾	太和	F-23	1949	1973年退役
DE-103	Bostwick	坎农	Dravo Pittsburgh	中国台湾	太湖	F-25	1949	1973年退役
DE-104	Breeman	坎农	Dravo Pittsburgh	中国台湾	太仓	F-24	1949	1973年退役
DE-105	Burrows	坎农	Dravo Pittsburgh	荷兰	Van Amstel	F-806	1970	1967年解体
DE-112	Carter	坎农	Dravo Pittsburgh	中国台湾	太昭	F-26	1949	1973年退役
DE-113	Clarence L. Evans	坎农	Dravo Pittsburgh	法国	Berbere	F-723	1952	1969年退役
DE-161	Barber	巴克利	Norfolk NSY	墨西哥	Coahila	E-21	1969	2001年退役
DE-166	Baron	坎农	Federal SB	乌拉圭	Uruguay	F-1	1952	1990年退役
DE-168	Amick	坎农	Federal SB	日本	朝日	DD-262	1955	1976年转交菲律宾↓
DE-168	Amick	坎农	Federal SB	菲律宾	Datu Sikatawna	PF-10	1955	1989年退役
DE-169	Atherton	坎农	Federal SB	日本	初日	DD-263	1955	1976年转交菲律宾↓
DE-169	Atherton	坎农	Federal SB	菲律宾	Rajah Humabon	PF-11	1955	现役
DE-170	Booth	坎农	Federal SB	菲律宾	Datu Kalantiaw	PF-76	1976	1981年遇台风沉没
DE-173	Eldridge	坎农	Federal SB	希腊	Leon	D-54	1951	1991年退役
DE-182	Gustafson	坎农	Federal SB	荷兰	Van Ewijck	F-808	1970	1967年解体
DE-183	S.S.Miles	坎农	Federal SB	法国	Arabe	F-717	1950	1958年退役
DE-184	Wesson	坎农	Federal SB	意大利	Andromeda	F-592	1951	1970年退役



菲律宾海军护航驱逐舰Rajah Humabon号，原美国海军护航驱逐舰“阿瑟顿”号。Humabon是菲律宾南部宿务岛的土王，1521年麦哲伦航海至此时皈依基督教，并怂恿麦哲伦替他与敌对部落战斗，致其在战斗中死亡。这艘1943年建造的老舰至今仍在菲律宾海军中服役，并多次出现在南海海域的军事演习和其他活动中。

美国海军舷号及舰名		舰级	建造厂	接收方	新舰名	新舷号	移交年份	附注
DE-185	Riddle	坎农	Federal SB	法国	Kabyle	F-718	1950	1958 年退役
DE-186	Swearer	坎农	Federal SB	法国	Bambara	F-719	1960	1958 年退役
DE-187	Stern	坎农	Federal SB	荷兰	Van Zijll	F-811	1970	1967 年解体
DE-188	O'Neil	坎农	Federal SB	荷兰	Dubois	F-809	1970	1967 年解体
DE-189	Bronstein	坎农	Federal SB	乌拉圭	Artigas	F-2	1952	1988 年退役
DE-190	Baker	坎农	Federal SB	法国	Malgache	F-724	1952	1969 年退役
DE-192	Eisner	坎农	Federal SB	荷兰	De Zeeuw	F-810	1970	1967 年解体
DE-193	Garfield Thomas	坎农	Federal SB	希腊	Panthir	D-67	1951	1992 年退役
DE-194	Wingfield	坎农	Federal SB	法国	Sakalave	F-720	1950	1958 年退役
DE-195	Thornhill	坎农	Federal SB	意大利	Aldebaran	F-592	1951	1976 年退役
DE-196	Rinehart	坎农	Federal SB	荷兰	De Bitter	F-807	1970	1967 年解体
DE-207	Kephart	巴克利	Charleston NSY	韩国	庆北	PF-85	1967	1985 年解体
DE-212	Hayter	巴克利	Charleston NSY	韩国	忠南	PF-86	1967	1986 年解体
DE-215	Burke	巴克利	Philadelphia NSY	哥伦比亚	Almirante Brion	DT-07	1968	1974 年退役
DE-216	Enright	巴克利	Philadelphia NSY	厄瓜多尔	25 de Julio	D-01	1976	1989 年退役
DE-228	Ruchamkin	鲁德洛	Philadelphia NSY	哥伦比亚	Cordoba	DT-15	1977	1980 年改博物馆舰
DE-232	Kinzer	鲁德洛	Charleston NSY	中国台湾	玉山	PF-32	1965	现役
DE-233	Register	鲁德洛	Charleston NSY	中国台湾	泰山	PF-38	1966	1991 年退役
DE-236	William M. Hobby	鲁德洛	Charleston NSY	韩国	济州	F-822	1967	2003 年作为靶舰击沉
DE-250	Hurst	埃德萨尔	Brown SB	墨西哥	Manuel Azueta Perillos	D-111	1973	现役
DE-251	Camp	埃德萨尔	Brown SB	南越	Tran Hung Dao	HQ-01	1971	1975 年转菲律宾↓
DE-251	Camp	埃德萨尔	Brown SB	菲律宾	Rajah Lakandula	PF-4	1971	现役
DE-282	Truxton	鲁德洛	Charleston NSY	中国台湾	福山	PF-35	1966	1996 年解体
DE-326	Thomas J. Gray	埃德萨尔	Consolidated Steel	突尼斯	Pres. Bourguiba	E-7	1973	1992 年退役
DE-334	Forster	埃德萨尔	Consolidated Steel	南越	Tran Khanh Du	HQ-04	1971	退役



右：中国台湾海军“玉山”舰，前身是美国海军在二战时在“鲁德洛”级护航驱逐舰基础上改造的快速运输舰(DE-232/APD-91)。所谓“快速运输舰”保留了护航驱逐舰的火力，但是将舯部改为突击队运载舱，并且搭载4艘LCVP登陆小艇，以供快速突袭使用。台湾方面在1965年以每艘10万美元的价格整批购进“鲁德洛”级护航驱逐舰，以壮声色。“玉山”号自1988年后改为二线军舰，从事缉私、反偷渡、驱逐大陆渔船等活动

下：原南越海军“陈兴道”号指挥舰（Tran Hung Dao），1975年南越政权灭亡时搭载南越海军军官及家属逃往菲律宾，随后被菲律宾海军接收。陈兴道（陈国峻）是越南陈朝时期皇族将领，曾率越南军队抗击蒙古军队入侵，封为兴道王，所以被称为陈兴道



美国海军舷号及舰名		舰级	建造厂	接收方	新舰名	新舷号	移交年份	附注
DE-440	McCoy Reynolds	巴特勒	Federal SB	葡萄牙	Corte Real	F-334	1957	1968年退役
DE-509	Formoe	巴特勒	Federal SB	葡萄牙	Diego Cao	F-333	1957	1968年退役
DE-579	Riley	鲁德洛	Beth Hingham	中国台湾	太原	F-959	1968	1997年退役
DE-592	Rednour	鲁德洛	Beth Hingham	墨西哥	Chihuahua	E-22	1969	2001年退役
DE-593	Tollberg	鲁德洛	Beth Hingham	哥伦比亚	Almirante Padilla	DT-03	1964	1973年退役
DE-598	Harry L. Cort	鲁德洛	Beth Hingham	韩国	牙山	F-823	1966	1984年退役
DE-599	Belet	鲁德洛	Beth Hingham	墨西哥	California	B-03	1963	1972年沉没
DE-600	Julius A. Raven	鲁德洛	Beth Hingham	韩国	熊浦	F-825	1966	1984年退役
DE-603	Earhart	鲁德洛	Beth Hingham	墨西哥	Papaloapan	B-04	1963	1976年退役
DE-637	Bowers	巴克利	Beth Hingham	菲律宾	Rajah Soliman	D-66	1961	1966年解体
DE-670	Odum	巴克利	Consolidated Steel	智利	Serrano	F-26	1966	1984年退役
DE-671	Jack C. Robinson	巴克利	Consolidated Steel	智利	Orella	F-27	1966	1984年退役
DE-672	Bassett	巴克利	Consolidated Steel	哥伦比亚	Almirante Tono	DT-04	1967	1977年退役
DE-674	Joseph M. Auman	巴克利	Consolidated Steel	墨西哥	Tehuantepec	B-05	1963	1989年退役
DE-676	Schmitt	巴克利	Beth Quincy	中国台湾	龙山	F-325	1969	1976年退役
DE-687	Kline	鲁德洛	Beth Quincy	中国台湾	寿山	F-893	1966	1976年退役
DE-688	Raymon W. Herndorn	鲁德洛	Beth Quincy	中国台湾	恒山	F-322	1966	1976年退役
DE-693	Bull	巴克利	Defoe SB	中国台湾	庐山	PF-36	1966	1996年解体
DE-706	Holt	鲁德洛	Defoe SB	韩国	忠南	DE-73	1963	1984年退役
DE-712	Cavallaro	鲁德洛	Defoe SB	韩国	庆南	D-81	1959	1984年退役
DE-713	Donald W. Wolf	鲁德洛	Defoe SB	中国台湾	华山	F-33	1965	1993年退役
DE-718	Kleinsmith	鲁德洛	Defoe SB	中国台湾	天山	D-315	1969	1997年退役
DE-721	Don O. Woods	鲁德洛	Consolidated Steel	墨西哥	Usumacinto	E-20	1963	2001年退役
DE-739	Bangust	坎农	Western Pipe	秘鲁	Castilla	D-1	1952	1979年解体
DE-740	Waterman	坎农	Western Pipe	秘鲁	Aguirre	D-2	1952	1974年沉没
DE-741	Weaver	坎农	Western Pipe	秘鲁	Rodriguez	D-3	1952	1979年退役
DE-746	Hemminger	坎农	Western Pipe	泰国	Pin Klao	413	1959	现役
DE-747	Bright	坎农	Western Pipe	法国	Touareg	F-721	1950	1958年退役
DE-763	Cates	坎农	Tampa SB	法国	Soudanais	F-722	1950	1959年退役
DE-764	Gandy	坎农	Tampa SB	意大利	Altair	F-951	1951	1971年退役
DE-766	Slater	坎农	Tampa SB	希腊	Aetos	F-01	1951	1991年退役

希腊海军希拉克斯号护航驱逐舰，原美国海军DE-768“埃伯特”号



美国海军舷号及舰名		舰级	建造厂	接收方	新舰名	新舷号	移交年份	附注
DE-768	Ebert	坎农	Tampa SB	希腊	Hierax	F-31	1951	1991 年退役
DE-770	Muir	坎农	Tampa SB	韩国	京畿	F-71	1956	1971 年退役
DE-771	Sutton	坎农	Tampa SB	韩国	江原	F-72	1956	1971 年退役
DE-1029	Hartley	考特尼	New York Ship	哥伦比亚	Boyaca	D-07	1972	1994 年退役
DE-1033	Claud Jones	琼斯	Avondale	印度尼西亚	Mongsidi	F-343	1973	现役
DE-1034	John R. Perry	琼斯	Avondale	印度尼西亚	Samadikun	F-341	1973	现役
DE-1035	Charles Berry	琼斯	Avondale	印度尼西亚	Martadinata	F-342	1974	退役
DE-1036	McMorris	琼斯	Avondale	印度尼西亚	Ngurah Rai	F-344	1974	现役
DE-1037	Bronstein	布隆斯坦	Avondale	墨西哥	Hermenegildo Galeana	F-202	1993	现役
DE-1038	McCloy	布隆斯坦	Avondale	墨西哥	Nicolas Bravo	F-201	1993	现役
DE-1041	Bradley	加西亚	Beth S.F.	巴西	Pernambuco	D-30	1989	现役
DE-1045	Davidson	加西亚	Avondale	巴西	Paraiba	D-28	1989	2004 年解体途中沉没
DE-1048	Sample	加西亚	Lockheed SB	巴西	Parana	D-29	1989	2005 年解体
DE-1050	Albert David	加西亚	Lockheed SB	巴西	Para	D-27	1989	现役
DE-1056	Connole	诺克斯	Avondale	希腊	Epirus	F-456	2000	2006 作为靶舰击沉
DE-1059	W. S. Sims	诺克斯	Avondale	土耳其			1999	零配件用
DE-1062	Whipple	诺克斯	Todd Seattle	墨西哥	Francisco Javier Mina	F-214	2000	现役
DE-1063	Reasoner	诺克斯	Lockheed SB	土耳其	Kocatepe	F-252	1993	2007 年作为靶舰击沉
DE-1065	Stein	诺克斯	Lockheed SB	墨西哥	Ignacio Allende	F-211	1997	现役
DE-1066	Marvin Shields	诺克斯	Todd Seattle	墨西哥	Mariano Arasolo	F-212	1997	现役
DE-1068	Vreeland	诺克斯	Avondale	希腊	Makedonia	F-458	2001	现役
DE-1073	Robert E. Peary	诺克斯	Lockheed SB	中国台湾	济阳	F-932	1999	现役
DE-1075	Trippe	诺克斯	Avondale	希腊	Thraki	F-457	2000	2003 作为靶舰击沉
DE-1076	Fanning	诺克斯	Todd San Pedro	土耳其	Adatepe	F-251	1999	2000 年退役
DE-1077	Ouellet	诺克斯	Avondale	泰国	Phuttha Loetla Naphalai	462	1996	现役
DE-1078	Joseph Hewes	诺克斯	Avondale	中国台湾	兰阳	F-935	1999	现役
DE-1079	Bowen	诺克斯	Avondale	土耳其	Akdeniz	F-255	1997	2001 年退役
DE-1080	Paul	诺克斯	Avondale	土耳其			2000	零配件用
DE-1081	Aylwin	诺克斯	Avondale	中国台湾	宁阳	F-938	1999	现役
DE-1082	Elmer Montgomery	诺克斯	Avondale	土耳其			1999	零配件用
DE-1083	Cook	诺克斯	Avondale	中国台湾	海阳	F-936	1999	现役
DE-1084	McCandless	诺克斯	Avondale	土耳其	Trakya	F-254	1998	2003 年退役



左：台湾海军“济阳”舰2006年在基隆开放参观的情景



台湾海军“海阳”舰，是采取“先租后买”方式向美国订购的“诺克斯”级导弹护卫舰中的一艘。台方采购“诺克斯”级是为了弥补二战时建造的老“阳”字号驱逐舰纷纷年迈退役后造成的兵力空白。但“诺克斯”级在卖给台湾时舰龄也不断，“海阳”号就在2009年在公海上出现了电力不足、锅炉无法点火、全舰死机的情况

拒绝任何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仅作个人收藏国战研群友倾情扫描

美国海军舷号及舰名		舰级	建造厂	接收方	新舰名	新舷号	移交年份	附注
DE-1085	Donald B. Beary	诺克斯	Avondale	土耳其	Karadeniz	F-257	1998	现役
DE-1086	Brewton	诺克斯	Avondale	中国台湾	凤阳	F-933	1999	现役
DE-1087	Kirk	诺克斯	Avondale	中国台湾	汾阳	F-934	1999	现役
DE-1088	Barbey	诺克斯	Avondale	中国台湾	淮阳	F-937	1999	现役
DE-1089	Jesse L. Brown	诺克斯	Avondale	埃及	Damiyat	961	1994	现役
DE-1090	Ainsworth	诺克斯	Avondale	土耳其	Ege	F-256	1999	2005年退役
DE-1091	Miller	诺克斯	Avondale	土耳其			1999	零配件用
DE-1092	Thomas C. Hart	诺克斯	Avondale	土耳其	Zafer	F-253	1998	现役
DE-1093	Capodanno	诺克斯	Avondale	土耳其	Muavanet	F-250	1998	现役
DE-1094	Pharris	诺克斯	Avondale	墨西哥	Guadaloupe Victoria	F-213	2000	现役
DE-1095	Truett	诺克斯	Avondale	泰国	Phuttha Yotfa Chulalok	461	1994	现役
DE-1096	Valdez	诺克斯	Avondale	中国台湾	宜阳	F-939	1998	现役
DE-1097	Moinester	诺克斯	Avondale	埃及	Rasheed	966	1994	现役
FFG-9	Wadsworth	佩里	Todd San Pedro	波兰	Gen. T. Kosciuszko	273	2002	现役
FFG-10	Duncan	佩里	Todd Seattle	土耳其			1998	零配件用
FFG-11	Clark	佩里	Bath Iron Works	波兰	Gen. K. Pulaski	272	2000	现役
FFG-12	George Phillip	佩里	Todd San Pedro	葡萄牙			2007	封存于美国
FFG-13	Samuel Eliot Morison	佩里	Bath Iron Works	土耳其	Gorkova	F-496	2002	现役
FFG-14	Sides	佩里	Todd San Pedro	葡萄牙			2007	封存于美国
FFG-15	Estocin	佩里	Bath Iron Works	土耳其	Gosku	F-497	2003	现役
FFG-16	Clifton Sprague	佩里	Bath Iron Works	土耳其	Gaziantepe	F-490	1997	现役
FFG-17		佩里	Todd Seattle	澳大利亚	Adelaide	FFG-01	1982	现役
FFG-18		佩里	Todd Seattle	澳大利亚	Canberra	FFG-02	1983	现役
FFG-19	John A. Moore	佩里	Todd San Pedro	土耳其	Gediz	F-495	2000	现役
FFG-20	Antrim	佩里	Todd San Pedro	土耳其	Giresun	F-491	1998	现役
FFG-21	Flatley	佩里	Bath Iron Works	土耳其	Gemlik	F-492	1998	现役
FFG-22	Fahrion	佩里	Todd Seattle	埃及	Sharm el-Sheikh	901	1996	现役
FFG-23	Lewis B. Puller	佩里	Todd San Pedro	埃及	Toushka	906	1996	现役
FFG-24	Jack Williams	佩里	Bath Iron Works	巴林	Sabha	90	1996	现役
FFG-25	Copeland	佩里	Todd San Pedro	埃及	Mubarak	911	1997	现役
FFG-26	Gallery	佩里	Bath Iron Works	埃及	Taba	916	1997	现役
FFG-27	Mahlon S. Tisdale	佩里	Todd San Pedro	土耳其	Gokceada	F-494	1998	现役
FFG-30	Reid	佩里	Todd San Pedro	土耳其	Gelibolu	F-493	1998	现役
FFG-35		佩里	Todd Seattle	澳大利亚	Sydney	FFG-03	1983	现役
FFG-44		佩里	Todd Seattle	澳大利亚	Darwin	FFG-04	1984	现役



巴林海军的佩里级护卫舰 Sabha 号

责任编辑：哈斯朝鲁
封面设计：张长



日本海军夕张号巡洋舰

拒绝任何形式的商业用途与QQ群外传播仅作个人收藏由战研群友情扫描

ISBN 7-204-04651-X

ISBN 7-204-04651-X

K·391　定价：15.00元